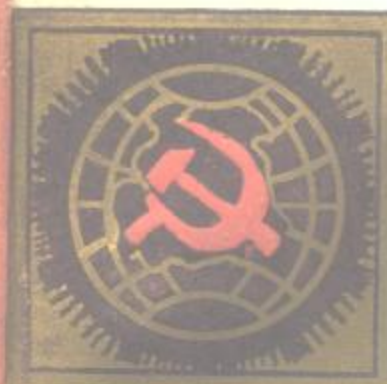




湘鄂贛 苏区史稿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 编写

宜春地区史料征集办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鄂赣苏区史稿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 编写

宜春地区史料征集办

湖南人民出版社

题 字：王 首 道

湘鄂赣苏区史稿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 编写
宜春地区史料征集办

责任编辑：徐日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6,000 印张：9.75 印数：1—4,700

统一书号：11109·205 定价：0.95元

写在前面

一九八〇年初，为了比较系统地研究湘鄂赣苏区的历史，讴歌英雄的湘鄂赣苏区人民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帮助读者了解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我们湘、鄂、赣三省的有关单位，商定合作编写《湘鄂赣苏区史稿》。

本书收集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的工作，始于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因故停顿，直到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继续进行。先后收集了约三百万字的文献资料，访问了近四十位在湘鄂赣苏区战斗过多年的革命老同志和众多的当地群众，经过一年余的多次研究，编写了这部史稿。

本稿力求史料的真实和丰富，寓观点于叙述之中；引文及重要资料，注明了出处；书末附有《湘鄂赣苏区大事年表》和《本书主要参阅文献资料目录》，以资研究查考。

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革命老前辈的指导，几十位同志辛勤地广搜资料，北京有关单位、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档案部门和有关地、县，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编写组的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宋斐夫、黄科云，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湖北省地方史研究室湛宗仁、张志骞、蔡树晖和江西省宜春地区文物资料调查征集办公室金生成、欧阳雨辰七位同志。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编写时间较短，少数文献资料迄今尚未找到，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五月

导 言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①

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黑暗统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毫不迟疑地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展开了血战，开创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战斗的红军，出现了土地革命，出现了苏维埃政权。一块一块的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就是其中之一。

湘鄂赣苏区位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边界地区。这个地区，处在武汉、南昌、长沙之间，是湘鄂赣三省的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个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绝大多数土地、山林为少数地主豪绅所占有。农民终年辛勤劳动，不仅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收入要被地主豪绅作为地租夺去，而且还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困苦不堪，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个地区的广大农民、工人富于革命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初期，就建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北伐战争时，有的县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和工农义勇军。当中国共产党发出武装斗争的号召时，这个地区武装组织纷纷建立，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是在这里爆发的；平江起义更直接地为这个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边境广大地区，万山绵亘，峻岭环峙，地形比较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和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各派新旧军阀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这种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得湘鄂赣苏区军民有可能利用敌人的矛盾，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从而能够有效地实行毛泽东首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方针。

气候温和，土特产较多，是这个地区的又一特点。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十八度左右，降雨量为一千八百毫米左右，无霜期两百来天，四季均可播种。粮食以稻谷、红薯为主，高粱、玉米、小麦次之。经济作物有茶、麻、油料等。手工业以造纸、鞭炮较多。矿产有铁、煤、金、铅、锰等，资源比较充足，虽经反动派长期摧残，经济遭到破坏，但只要充分加以利用，就能较快地得到恢复，可以自给自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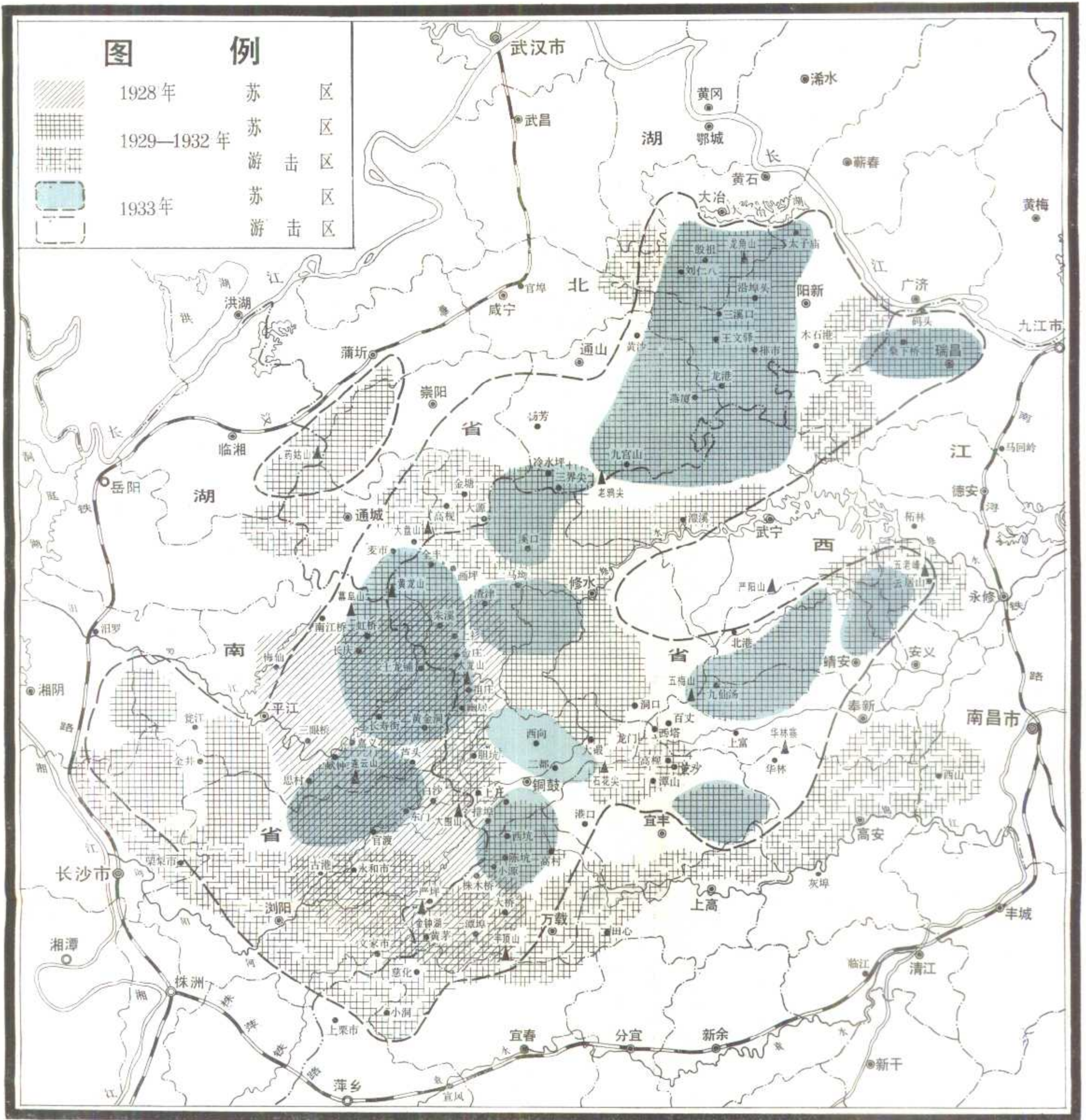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情况，勇敢地领导了湘鄂赣边界地区的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湘鄂赣苏区。苏区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百里。它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以及湘阴、岳阳一部分，湖北的阳新、大冶、通城、通山、崇阳以及蒲圻、咸宁、鄂城一部分，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武宁、宜丰（新昌）、宜春、奉新、高安（瑞州）、萍乡、瑞昌一部分，共计二十余县。有个时期还曾伸展到湖南的醴陵、长沙、

临湘，湖北的嘉鱼和江西的上高、靖安、安义、永修等一部分地区，共有人口二、三百万，其中比较稳定的苏区约有人口一百万。

由于这个地区离大城市较近，周围有赣江、湘江、长江，还有粤汉、株萍、南浔等铁路，敌人运动比较方便，有利于他们调动兵力向苏区进攻；同时，也由于在革命队伍内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斗争，特别是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给苏区人民带来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坚强的人民，有广阔的山地作为依托，有丰富的资源足以利用，终于经过曲折的道路，坚持了十年，克服了各种不利因素，战胜了重重困难，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湘鄂赣苏区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曲折、历尽艰辛而又十分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湘鄂赣苏区形势 1928—1933年示意图



目 录

导 言	1

〔附〕湘鄂赣苏区形势1928—1933年示意图

第一章 “八七”会议前后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边区的政治形势.....	1

一、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	1

二、 白色恐怖笼罩边区，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3

三、 “八七”会议精神指引着边区人民前进.....	6

第二节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红旗.....	7

第三节 湘鄂赣边界各地武装暴动.....	10

一、 鄂南秋收暴动.....	10

二、 万载、修水、铜鼓等地农民暴动.....	12

三、 平江、浏阳农民扑城和游击队的建立.....	13

第二章 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苏区的创建

第一节 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党组织.....	18

第二节 平江起义的准备和经过.....	21

一、 进一步提高士兵的觉悟.....	21

二、 与滕代远紧急商议起义.....	23

三、 抓紧做好起义前的工作.....	24

四、	分头向预定目标进击·····	26
五、	庆祝红五军诞生，决定创建湘鄂赣苏区·····	28
第三节	红五军上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	30
一、	红五军撤出平江县城·····	30
二、	第一次上井冈山失利·····	32
三、	整编队伍再上井冈山·····	33
四、	红五军主力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34

第三章 湘鄂赣边特委的恢复和各项工作的初步开展

第一节	湘鄂赣边特委的恢复·····	36
一、	特委机关建立的原委·····	36
二、	恢复湘鄂赣边特委机关·····	37
第二节	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整顿·····	39
一、	大革命时期边区党组织概况·····	39
二、	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41
三、	边区党组织的初步整顿·····	42
第三节	纠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	43
第四节	红五军一、二、三纵队和鄂东南游击队的活动·····	47
一、	一、二、三纵队在边区的活动·····	47
二、	鄂东南游击斗争的开展·····	49
第五节	召开“四·一二”扩大会议改组特委，进一步 加强党的领导·····	50

第四章 苏区军民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红五军四、五纵队回到边区

第一节	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54

第二节	红五军四、五纵队回到边区打击敌人·····	57
一、	红五军转战各地连战皆捷·····	57
二、	长寿街会议总结战斗经验·····	59
三、	向鄂东南挺进的红五纵队·····	60
四、	大冶兵暴·····	62
第三节	从“九·二”扩大会议到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 委会议·····	65
一、	边境特委“九·二”扩大会议·····	65
二、	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	68
三、	特委和湖南省委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	71
第五章	湘鄂赣边区进入全盛时期，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城	
第一节	从年关斗争到红五月暴动·····	75
一、	轰轰烈烈的年关斗争·····	75
二、	“三·一八”武装大示威运动·····	76
三、	大规模的红五月暴动·····	78
第二节	边境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81
一、	边区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和“左”倾情绪的出现·····	81
二、	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84
第三节	红三军团建立，第一次攻打长沙城·····	86
一、	红五军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	86
二、	二十万红军农军进攻长沙·····	87
三、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	89
第四节	第二次攻打长沙城·····	92
一、	红一军团在浏阳歼灭戴斗垣旅·····	93
二、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和第二次攻打长沙城·····	94

第六章 苏区军民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节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96
第二节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02
一、万载潭埠战役和红十六军两次攻克铜鼓县城·····	102
二、通山战役和官埠桥、马桥战役·····	103
第三节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05
一、红十六军和红一、二、三师各个击破进犯苏区之敌·····	105
二、红军在有利形势下主动出击·····	107
三、革命武装的壮大和省军区的建立·····	110

第七章 湘鄂赣苏区的军事建设

第一节 苏区革命武装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112
第二节 苏区军事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工作·····	115
一、保证党对革命武装的绝对领导·····	115
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117
三、红军的群众工作·····	118
四、建立士兵委员会，军内实行民主制度·····	119
五、实行正确的培训制度和提拔干部的政策·····	120
六、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122
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好后勤工作·····	125

第八章 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

第一节 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和党的建设·····	128
一、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各县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128

二、	苏区党的建设	131
第二节	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第一、二次省委执 委扩大会议	136
一、	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湘鄂赣省委的成立	136
二、	第一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137
三、	第二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141
第三节	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	144
一、	共青团	144
二、	省总工会	147
三、	贫农团	149
四、	妇女代表会	150
五、	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	152

第九章 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

第一节	各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全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的召开	153
一、	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53
二、	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成 立	156
三、	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及组织系统	159
第二节	苏区的土地革命	160
一、	土地革命的开始阶段	161
二、	土地革命的全面展开	163
三、	重分土地和反富农斗争	169
四、	查田运动	172
第三节	苏区的经济建设	174

一、	苏区的经济政策	174
二、	苏区的农业生产	176
三、	苏区的工业生产	177
第四节	苏区的商业、财政、金融工作	178
一、	苏区的商业	179
二、	苏区的财政工作	181
三、	苏区的银行事业	184
四、	苏区的税收工作	186
第五节	苏区的文教卫生事业	187
一、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187
二、	文化出版工作	191
三、	卫生保健工作	192

第十章 第三次“左”倾错误在湘鄂赣省的全面贯彻

第一节	湘鄂赣省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194
一、	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临时省委的成立	194
二、	临时省委三个月工作计划及其实施	197
第二节	湘鄂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201
第三节	苏区的肃反工作	204
一、	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前的肃反工作	204
二、	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后的肃反工作	206
第四节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209
第五节	苏区中央局着手解决省委的问题	213

第十一章 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第一节	边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军事斗争	217
一、	红十六师向袁水、锦水流域行动	217
二、	木石港战役的胜利和王文驿遭受伏击	219
三、	红十七师北上湘鄂赣苏区	220
第二节	边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223
一、	敌人对湘鄂赣苏区中心的进攻	223
二、	省级机关继续转移	226
三、	“六、七月事件”	227
 第十二章 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第一节	重建湘鄂赣苏区主力红军	232
一、	在恶劣环境中坚持斗争	232
二、	八月紧急会议和红十六师的复建	234
第二节	红十六师的发展壮大及再次受挫	240
一、	在主动出击中发展壮大	240
二、	麦市突围	245
三、	粉碎敌人妄图消灭省委和红军的阴谋	248
 第十三章 粉碎敌人的联合“清剿”		
第一节	“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	251
一、	湘鄂赣三省反动派的联合“清剿”	251
二、	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反“清剿”斗争	255
第二节	坚持斗争 善于斗争	260
一、	依靠群众，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	260
二、	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260
三、	到外线开展白区工作	262

四、 找党中央.....	265

第十四章 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一节 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267

一、 作好谈判和应战两手准备	267

二、 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	270

三、 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	271

第二节 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	272

一、 成立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272

二、 省委改为特委和新四军后方留守处的建立	274

三、 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抗日前线.....	276

附 录

一、 湘鄂赣苏区大事年表	278

二、 本书主要参阅文献资料目录	286

第一章 “八七”会议前后边区 人民的武装斗争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边区的政治形势

一、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势力 发动突然袭击

一九二七年，湘鄂赣边区人民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五月十七日，原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划下，率部叛变，乘虚进攻武汉，当受到叶挺将军领导的革命军打击后，便逃窜到鄂东南各县，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五月二十一日晚，驻扎长沙的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反革命叛乱的罪魁祸首何键的策划下，突然围攻和捣毁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各革命机关，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一百余人，捕去四十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反革命势力迅速向全省蔓延。平江县代理县长曹修礼马上宣布“所有机关团体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积极策划“清乡”和屠杀等反革命行动。六月五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发动反革命政变，下令停止工农运动，查封总工会、农协会和报社，收缴农民自卫队武器，并用武装“礼送”共产党人

出境。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反动集团举行所谓分共会议，正式和共产党分裂而背叛革命，从七月底开始便公开地大规模地封闭工会、农会，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本来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右派，这时一致反共反人民。湘鄂赣广大地区，顿时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之中。

五月二十五日，平江县委将驻守南江用以防御夏斗寅叛军的团防队全部调回县城，镇压县城的反革命活动，保卫县级革命机关。当晚，将代理县长、国民党反动分子曹修礼扣押，于第二天驱逐出境。随后，召开了革命团体联席会议，成立了“政务委员会”，推选陈弗章等五人为委员，办理县政；建立了临时特别法庭，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将团防队、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军，由余贲民领导，准备应付更为严重的局面。六月一日，在县城月池塘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声讨许克祥的群众大会，通过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总工会、农协会、女界联合会等革命团体，也相继印发了声讨许克祥的宣言。六月八日，湖北黄石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李兆龙率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围攻进占大冶城的夏斗寅部。进城后，夏已闻风逃窜，只镇压了城里的十多个土豪劣绅。次日，地委指挥三万多农民武装在石灰窑与夏斗寅部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从拂晓到下午二时，击退夏部九次进攻，因敌强我弱，农军便主动撤出了阵地。接着，大冶成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负责县里的工作。不久，夏斗寅窜扰通城，党组织派赵世当率农民武装在南农九岭狙击，得到平江二、三千农民武装的支援，攻入县城，击退了夏部，缴枪二百多支，军用品若干。后来，通城县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革命秩序。六月，江西铜鼓上庄纸业工人三百六

十多人，同农民联合进行讨逆活动。修水县的农民，也纷纷活动起来。七月，遵照党中央指示，湖南平江、浏阳的工农义勇军编入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开赴南昌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工农群众的反击行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边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白色恐怖笼罩边区，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国民党反动派在边区各县首先建立了“清乡委员会”，恢复了地方反动政权。他们特别注意平江县人民的革命活动。七月上旬，王紫剑到平江担任县长，阎仲儒担任“清乡司令”。阎、王到达平江的当天下午，即高喊“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着手搜捕共产党员。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说是“阎王清箱（乡），百姓遭殃”。其他地方，国民党党棍、兵痞、土豪劣绅都张牙舞爪、耀武扬威，大肆活动。在建立“清乡委员会”的同时，各地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实行保甲联防，到处招兵买马，扩充挨户团、常练队、靖卫队力量。妄图强化反动政权，扑灭各地的革命烈火，把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恢复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

他们所到之处，破坏共产党组织，捣毁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机关，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浏阳县反动头子张梅村，组织挨户团，配合鲁涤平部队，大肆清剿革命势力。从马日事变起到十二月底止，仅七个月时间，被他们非法逮捕和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五万多人。平江县境内，每天都有革命者一批一批地被押往月池塘、柘树坪集体屠杀。凄厉的号声随时可闻，革命者的头颅到处可见。铜鼓、

修水等县党的县委机关和总工会、农会被反动分子所捣毁，数百名革命者被捕杀。刽子手许克祥进攻到萍乡，在为时三天中，杀死当地共产党人、农民、学生数百人。在鄂东南，军阀夏斗寅横行无忌。八月间，夏斗寅到达阳新“清乡”，一次就杀害二十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把县委书记罗伟从外地抓回，在城关太玉巷用“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该县龙港、燕厦的反动民团，包围了革命势力较雄厚的石元乡，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兴庆坪一百九十多间房屋，顷刻化为灰烬。凶残的敌人，还对革命者实行割耳、挖鼻、钉钉、油烧、棍压、刷心、碎尸等非人的野蛮刑罚。

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屠杀面前，一些共产党员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有的动摇退缩，有的申明退党，有的甚至叛变，帮助敌人破坏共产党组织，追捕革命同志。然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是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万载县共产党员龙松泉被捕后，在敌人的法庭上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从容就义。阳新县委负责人肖作舟被捕后，反动派对他一再威胁利诱，未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在一次审问他的时候，他一脚踢翻审判桌，大骂敌人不已。临刑时，还高呼“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平江县委负责人罗纳川，坚贞不屈，英勇顽强。署名“幄筹”的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写的《报告平江白色恐怖》的材料说：“纳川已压杠子两次，香袋一次，足掌亦被割开，用竹篾刺刷，要他供出党情。被捕时曾向农民士兵演说，闻者颇为感动。”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昼伏夜出，伺机活动，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在经济上，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实行强征暴敛，反攻倒算，

打击不遗余力。他们以“暴徒”、“匪民”等种种罪名强加于人，四处缉拿革命者的家属和无辜群众，趁机抢劫粮食、猪牛、衣服等财物。他们还大肆加租加息，加重田赋、捐税。许多地方对一九二六年“二五减租”部分实行追加五到八成的利息，连减租部分一起索还。捐税多如牛毛，不下二十余种。“平浏苛捐杂税的繁重，不说甲于全国，至少甲于全省。……一双草鞋、几个鸡蛋都要抽捐。这么一来，不但农民非常痛苦，即一般商人和富农的生活亦很困难，对于地主阶级的横行非常不满。在割据区，谷一石只一元，在敌人势力下区域，谷每石三元或二元余不等。”^①边区的农村自然经济，这时更遭破坏，十分萧条。

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被打散，工人运动由进攻转入防御，农民运动处于散漫不集中的状态；革命统一战线破裂，敌人的力量暂时超过革命力量。这些都是革命低潮时期出现的特点，决定着革命斗争暂时不能轰轰烈烈地大规模地进行。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②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采取了一致行动，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反革命各派之间的矛盾，使得反革命势力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和一致；他们加强对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血腥镇压，使矛盾更加尖锐，在全国人民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加上他们的反动统治是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十分脆

① 1929年6月14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平浏方面综合性报告》。

②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弱的。因此，随着各种矛盾的日趋尖锐，革命或迟或早会发生。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不能遏止革命的洪流，一场更加伟大的革命斗争不久就将出现。

三、“八七”会议精神指引着边区人民前进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制订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行动方针，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分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议决案还为农民暴动制定了十一条口号，其中有：“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等等。

“八七”会议的精神，得到边区人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斗争意志。在“八七”会议的号召下，边区人

民迅速行动起来，开展武装暴动，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节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红旗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来到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向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中央的新政策，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以后，新的省委在长沙北郊沈家大屋等地，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和制订起义计划。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毛福轩、夏明翰、贺尔康等人。会议确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以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号召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发动起义；集中力量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东各县（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以及江西安源）举行暴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工农政权。

八月底，毛泽东赴湘赣边界组织工农革命军。九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部分起义地区的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参加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等人。会议研究了湘东赣西我党所掌握的武装情况、起义部队的组织发动、进攻路线以及发动平、浏、醴广大农民暴动等问题。

当时，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我党领导的卢德铭率领的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湖南的浏阳、平江、醴陵、衡山岳北，江西的安源、萍乡、安福、莲花，以及湖北的崇阳、通城等地的工农武装，共约四千余人，集中在赣西的修水、铜鼓和安源三个地方。警卫团原是去参加南昌起义的，行至奉新县城，得悉“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已向东南进军，会师已经来不及了，便折向西进，转到修水县。平江、浏阳的工农义勇军，也是去

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途中因被敌人所阻，便分头折回修水和铜鼓县境。驻修水和铜鼓的部队，为了掩护自己，约在八月下旬，已组合为江西省防军暂编师，师长余洒度（当时是党员，后叛变），副师长余贲民，辖一、三两团，后又收编了在当地的国民党武装邱国轩团。这次秋收起义，决定以这个师为基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三团编制不变，集中在安源的革命武装编为第二团。

安源会议一结束，毛泽东赴第三团驻地铜鼓，各地部队迅即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厉兵秣马，待命出发。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

长沙六十多名工人，分成几个行动小组，分别破坏了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之间的铁路线。

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高举军旗，浩浩荡荡，向平江挺进。他们原计划攻打长寿街的敌人，但余洒度以邱国轩部打先锋，邱部突然叛变，反戈相向，我军损失人枪两百余。

十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萍乡不克；十一日夺取湘赣边界的老关；十二日攻克醴陵县城，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十五日，又占领浏阳县城，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群众数百人。这时，第二团团长王新亚麻痹轻敌，没有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县城，以致十七日我军遭到优势敌人袭击时，仓促应战，部队被打散。

十一日，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白沙，首战告捷，敌军退往东门。第二天，我军攻克东门，敌向达浒逃窜。十四日敌军反扑，我军与敌鏖战数小时之后，为保存实力，转移上坪。

秋收起义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湘东赣西。但是，当时全国

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也打了几个败仗。毛泽东在浏阳上坪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研究形势，会议决定各路起义部队先往浏阳文家市集中。

十九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团，以及第二团的炸弹队和少数指战员，在文家市会师了。这时，部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向何处进军。去打长沙呢？还是向农村进军？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关系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会上，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想占领反革命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毛泽东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实力，部队暂时不能去夺取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应到敌人统治薄弱的湘、赣、粤三省交界地区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前委在展开充分讨论后，决定停止执行湖南省委原订进攻长沙的计划，转向农村进军。

九月二十日，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一千余人在文家市举行了会师大会。毛泽东根据前敌委员会决议精神，在会上讲了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大家的信心。随后，部队高举着工农革命军军旗，向罗霄山脉中段挺进，开始了向农村的伟大进军。

部队抵芦溪后，遭到敌人袭击，又一次受到较大损失，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二十九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已不足一千人。在此，毛泽东领导大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县古城，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对边界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决定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二

十七日，部队到达茨坪，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此后，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酃县、茶陵、遂川、永新、莲花一带，领导军民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从而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井冈山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康庄大道，为当时湘鄂赣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三节 湘鄂赣边界各地武装暴动

一、鄂南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精神象春风一样吹遍了鄂东南地区。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从九月中旬开始，这一地区爆发了以蒲圻、咸宁为中心的鄂南秋收暴动。

八月初，湖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制订了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分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等七个区，决定以鄂南为中心，实现全省暴动。省委派吴德峰、黄赤光等赴鄂南成立鄂南特委，由吴德峰任书记，指挥鄂南工作。八月底，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鄂南，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提出十日内举行暴动的计划。会后，以蒲圻、咸宁、通山、崇阳等县农协会员为骨干组织了鄂南农民革命军，成立了通城农民革命军，开始了“骚动”。九月初，罗亦农复赴鄂南，把行动时间正式定为九月九日。九月八日，鄂南特委得知晚上有一列火车从武昌开来，内装子弹一万五千发，饷银三万元，押运的敌军只有一班人，便决定先行劫车，然后攻取蒲圻、咸宁县城。当晚，特委集中农民军二、三百人，由黄赤光

担任指挥。当火车到达中伙铺车站时，黄赤光率领八、九名武装人员，以二十三军查车为名上了车。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农军看到信号，即大声呐喊，涌入车内。敌军惊慌失措，全部缴械。

劫车获胜后不久，因发生了“新店事件”，使鄂南暴动中途受挫。“新店事件”是蒲圻“人民自卫军”的叛变。这支部队是由土匪部队改编的，下辖三个队，只有一个队长是共产党员，团长是原来的匪首刘步一。鄂南特委鉴于这支部队成员复杂，决定撤换另外两个队长，以两名共产党员担任队长职务，并拟镇压刘步一。后来，蒲圻县委发现省委巡视员漆昌元与刘步一有私人交往，便派漆昌元去摸一摸情况，视情况再行动。没想到漆昌元到达蒲圻后，刘步一将敌二十三军要他谋杀漆昌元的信件交给了漆昌元，取得了漆昌元和特委的信任。特委便改变了原来的部署，决定将所有部队集中到新店，与蒲圻人民自卫军会合，执行原来的暴动计划。当我先行部队到达新店时，带队的王钟和漆昌元都被刘步一杀害。次日大批部队和特委机关干部赶来，不见漆昌元和王钟前来迎接，已疑内中有变，便派谢一寰、符向一等前去接洽，结果受到刘步一的伏击。我部受到很大损失，特委机关也被打散。

由于“新店事件”削弱了武装暴动的力量，蒲圻的暴动同时陷于失败，通城、崇阳、嘉鱼等县的暴动一时还不能大规模地开展，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又集中夏斗寅部二十三军独立第一、第二两个团，咸宁军事厅警卫团，以及驻蒲圻等地的岳森部一个师，共约两师人马，全力镇压还保持较大力量的咸宁、通山农民自卫军。这时，两支农军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终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遭受重大挫折而失败了。

至此，鄂东南地区的武装斗争暂时处于平息状态。十一月，

湖北省委先后派方步舟^①、吴致民（又名吴铁汉，化名胡梓）等到阳新、大冶、通山工作，成立了阳大县委，找到了一批坚持地下活动的同志，发展了一批党员。一九二八年三月，阳新单独成立县委，建立了龙山、金海、福寿、黄沙、木港、排市、龙港等区委。五月，大冶、通山也成立了县委。随着党的组织秘密发展，武装游击活动才又开始振兴起来。

二、万载、修水、铜鼓等地农民暴动

赣西北地区也兴起了农民暴动，并具有湘赣结合、自发行动的特点。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浏阳县一部分共产党员如辛克明（聂一生）等越过大围山，来到万载金钟湖、白水一带，同当地的农民相结合，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大批农会会员。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棋燕山建立了万载第一个中共支部。此后，逐步向仙源、大桥、高村、潭埠、黄茅等地发展。在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下，工农群众纷纷参加工会农会，从事革命活动，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六月，铜鼓县多处发生工农群众的讨逆活动。八月，修水农民因反抗地主豪绅的压迫，数十人被枪杀，愤怒的农民数千人包围了地主豪绅住宅，反动政府派出军队镇压，农民才被迫解散。

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江西省委制订了《秋收煽动大纲》和《秋收暴动计划》。《大纲》要求：“以农民协会为行使乡村政权的唯一机关，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在乡村中的基础”，

^① 方步舟，湖北省阳新县人，大革命时期入党，1937年3月投敌叛变，解放战争时期在浙江率部起义。

“实行土地革命”，“反抗中央和江西的反动政府统治。”《计划》确定：赣北以修水为起点，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开展暴动活动。这时，赣西北地区的农民暴动进一步活跃起来。

在农军势力较大的修水、铜鼓、万载、萍乡等县，此时立即发布政纲宣言，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十一月，修水集合农民万余人进城示威。县长闻讯后，调二百多名警备队守护县城。广大群众围在城外，赤手空拳同反动派相持半日之久。后因群众领袖牺牲多人，重伤者数十人，加上时间已晚，群众才愤然退去。

一九二八年二月，江西省委决定实行全省总暴动，确定赣西北为响应区域。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因敌人残酷镇压，总暴动计划流产。到五、六月，省委也遭破坏，赣西北的斗争便出现松散状态。以后，党组织慢慢恢复过来，在修水的墩源、茵果、芳南山等地以及铜鼓、万载一部分地方，又开始了查敌情、打土豪、杀劣绅的斗争。

三、平江、浏阳农民扑城和游击队的建立

“八七”会议的精神，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鼓舞了广大群众，使得湘东北地区的平江、浏阳等县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斗争，又由小到大地活跃起来了。

平江原有一支四、五百人的工农义勇队，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奉命与浏阳工农义勇队一起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八月，李六如^①和夏明翰奉省委指示来到平江，找到刚从外地回来的

^① 李六如，湖南省平江县人，1921年入党。青年时期参加辛亥革命，五四时期在湖南组织工人、学生进行爱国运动，入党后在国内外从事革命活动，1973年4月逝世。

罗纳川商量，决定恢复平江党组织，再组革命武装。在献钟召开的县委秘密会议上，提出了“搞武装，建政权，分土地，杀土豪”的战斗口号，并改组了县委领导机关，成立了县暴动委员会，推选罗纳川为暴动委员会主任，初步研究了武装暴动的计划。

暴动委员会决定九月十六日组织农民队伍扑城。以城内一百名工人为内应，以善惠庵的钟声为信号，以夺取县城为目标。这一天晚上，进入县城近郊的农民队伍有三百多人。大家精神抖擞，等待战斗命令。但负责鸣钟的人因故延误了时间，眼看天色将明，只好主动撤退。少数农民气愤不过，拿起梭镖，冲到李家巷一带杀死了几个劣绅才回去。派去炸毁清乡司令部的人，等到天亮时不见攻城，也在门口丢下一颗手榴弹跑了。这次扑城，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平江人民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武装暴动，便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斗争实践中，平江县党组织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他们挖出了原平江工农义勇队埋下的四支步枪，作为起家的本钱。这四支步枪中，有一支已经坏了，打不响，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三支半枪起家”的说法。依靠这三支半步枪，他们第一次组织七十多人攻打献钟警察分所，夺得步枪四支；十二月下旬，将傅定兴从敌军中带出的十多人枪编入游击队，增加了力量；一九二八年一月，又乘军阀混战的机会，在安定、沙墩、三眼桥一带收买和巧夺了溃军一些枪械；二月中旬，在长寿街惩罚了在秋收起义中叛变并袭击我第一团的邱国轩部，俘获三十多人，缴枪三十多支，邱国轩在嘉义被我镇压。这时，游击队已经发展到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枪。

就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平江县委在嘉义举行了全县党的活

动分子会议，建立了上东、下东、南、西、北等五个乡特委，由吴钦民、罗纳川（兼）、邱平川、刘宗义、胡筠等分别担任各乡特委书记；成立了以平江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由余本健任总队长，罗纳川任党代表。总队以下设四个大队，分别驻扎在平江东、西、南、北四乡，开展游击活动。

在革命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平江县委接受群众攻夺平江县城的要求，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再次攻打城关，进行了有名的“二月扑城”。

这一次扑城，组织了号称二十万人的队伍（实际上是几万人）。事先封锁了通往县城的要道，规定了口令、标志。还规定班长以上人员腰里系一根棕和秆（稻草）混合搓成的绳子，一般群众系一根秆绳。当时有“革命分子棕交秆，农民分子系秆绳”的说法。他们制造了一批“土炸弹”和“松树炮”，作好了攻城的火力准备。队伍除按大队、中队和班组织外，还成立了敢死队、搜索队和运输队。在总指挥余本健、党代表罗纳川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攻城。

扑城那一天，农民队员化装成玩龙耍狮、卖柴卖菜、打卦看相等各式人物，夹杂着火力队前进。他们在拂晓时发起攻击，东路敢死队首先冲过浮桥，杀到东街；南路人马直冲到黄沙滩；北路冲进北街，同敌人展开了巷战。但是，当东路敢死队冲过浮桥后，浮桥即被敌人拆除，阻住了东路人马。当城内杀声四起时，敌人的两团援军又从长沙调来，形势极为险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经过紧急研究，扑城部队在夺取了敌人部分枪械后便主动撤退了。

这次扑城，组织工作比第一次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队伍过

于庞杂，指挥十分困难；先头部队暴露目标过早，使敌人有了准备；队伍组织不严，前后不能呼应；特别是在敌强我弱、胜利的希望极少的形势下发动对县城的进攻，因而又受到一些损失。

扑城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遣十五师王东原部等三个师的兵力，单独对平江实行“清剿”。他们进驻各地，大烧大杀。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战斗的罗纳川，被叛徒高岑南告密，在西乡梓江被捕，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后，惨遭杀害。献钟东山一位姓杨的农民被捕后，杨姓土豪劣绅把他带到被农民处决的土豪劣绅牌位面前，每到一处就刺一梭镖，实行惨绝人寰的活祭，后来因一个监斩的敌军营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才一刀将他杀死。这些残酷的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满腔仇恨。许多人离开家乡，参加游击队，同敌人搏斗。到五月，游击队又发展到三百六十多人，有八十多支步枪。六月中旬，县委将游击队改名为平江工农革命军，下设二营四连、三营六连和特务营一连。还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邱训民任总支书记。这支队伍，不断开展活动，严惩了窜扰百福洞的国民党官兵，消灭了高墩、汤墩的挨户团，解除了芦头挨户团的武装，瓦解了泉水守望队，打垮了虹桥、大坪、浆市等地的地主武装，又包围和击溃了江西反动派调来的修、铜、武三县靖卫团三百余人，使自已的人员、装备都有所补充。

与平江县开展游击活动的同时，浏阳县的武装暴动也在发展。一九二七年冬，王首道、张启龙、李贞等回到浏阳，在东乡仁和洞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北乡恢复了区委机关，不久全县就有了五十多个党的支部。一九二八年元月，县委在蒋埠江糙石冲陈昌福家召开浏阳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推选张启龙为县委书记；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党的

活动仍保持秘密状态；并对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作出了决议。二月，一支由何俊（真名何光）、孔荷宠^①组织的有三十多支枪的游击队便成立了。三月，张启龙、刘绍林、唐继芬等又在双洞成立了浏东游击队。六月三日，两支游击队联合起来，成为在浏阳开展游击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浏阳县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智取了张坊、芦头、大岭等地，组织了沿市暴动，进行了石坳战役。一九二八年六月，游击队化装为挨户团，绑着两个人向正在进犯仁和洞的六十多人的大光挨户团走去，并假传报告，说仁和洞的游击队已被消灭，要他们返回驻地。当这些挨户团回头退走时，游击队一阵猛打，将其全部消灭。同月，他们又将进攻芦头的胡岳丘两营敌人，巧妙地引到大山坪进行伏击，打死打伤敌人二十多人。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巧夺智取，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消灭了大量的来犯之敌。

党领导下的湘鄂赣边区的农民武装，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武装镇压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尽管由于力量不够强大，以及主观指导上的某些错误，使得许多暴动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有的甚至为优势敌人所击败，但是，通过这些武装暴动和游击活动，土地革命的口号得以深入人心，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受到了斗争锻炼，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得到了鼓舞，为以后开展革命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① 孔荷宠，湖南省平江县人，大革命时期入党，曾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后屡次违抗中央军委命令，在对敌斗争中动摇逃跑，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1933年被撤职，1934年投敌叛变。解放后被捕，在监狱中病死。

第二章 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苏区的创建

第一节 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党组织

随着湘鄂赣边区农民起义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边区的“清剿”。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独立第五师到平江接防。第五师的第一团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这时，部队来到具有深厚革命群众基础的平江，在党的领导下，在井冈山红旗的影响下，不久便爆发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推动了边区各县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第一团党组织的成员是：邓萍——团部副官，工人出身；彭德怀——第一团团长；李光——彭德怀的马弁；张云生——一营传令班长；李灿——一营二连连长；后来，还增加了一营九连连长黄纯一。彭德怀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湖南南县入党的。一九二七年秋，他所在的唐生智部三十五军第一师从安徽撤回湖南，驻在南县的九都山一带，改编为湖南独立第五师，他任第一团团长。在南县，早在北伐时就产生了革命思想的彭德怀，耳闻目睹湖南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的惨状，十分愤恨。有一次，南县的土豪劣绅要杀害一个叫周桃的十二岁的革命少

年，彭德怀出面“讨保”无效，那个少年终于被杀了。彭德怀更加愤慨，发动部下写了许多“打倒土豪劣绅”、“反对组织杀人的机关”等一类标语张贴出去。他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反动派对他的疑忌，也引起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视。彭德怀是驻军团长，又为该师师长周磐所信任，所以，反动派对他无可奈何。十月间，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派人与彭德怀联系。后来，特委根据彭德怀的表现，经段德昌介绍，批准了他的申请，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反革命的刀光剑影四处闪烁的时候，彭德怀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后来，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欣慰地说：“从此，我有了政治生命，有了党的领导，也有了远大的理想，从而也走入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康庄大道。”

彭德怀入党后，同邓萍等紧密配合，主动工作，根据党的指示，立即在部队中扩展党的力量，加强对士兵的工作，伺机起义。在组织方面，他利用周磐扩张势力的野心，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名，说动周磐办了一所随营政治军事学校。这所学校，招收了一百多名学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湖南各县被反动派追捕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这所学校的校长由周磐挂名，实际负责的是副校长、党组织派进去的共产党员黄公略。共产党员贺国中、黄纯一均在随营学校任职。黄公略原是周磐送去黄埔军校学习的，一九二八年春回部队时带来了黄纯一、贺国中。彭德怀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黄公略送给彭德怀一首诗：“广暴失败旗帜在，树立红军苏维埃。旅沪武岳语弃市，乌云蔽日只暂时。欣谈时局喜春风，柳絮飞舞庆重逢。锦绣洞庭八百里，四江精粹在湖滨。”彭德怀立即回赠一首：“求知

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意向。后来，黄公略调任三团三营营长，黄纯一调任一团九连连长，贺国中成为随营学校的实际负责人。

到平江起义时为止，一团党组织共有共产党员六人，加上黄公略、贺国中和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的一大批积极分子，成为部队中组织和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

在做好组织工作的同时，一团党组织对士兵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李灿所在的连队，建立了以军士为主、吸收个别士兵参加的“读书会”，组织“读书会”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彭德怀经常对士兵说：我们穿工人的衣，吃农民的饭，我们不要忘记工农，要为工农谋福利。全团还建立了“士兵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从维护士兵利益入手，团结进步士兵，开展革命工作。各连还根据彭德怀的授意，组织了“经济核算委员会”以制止军官贪污和克扣士兵军饷；把六千多元公积金，替士兵买了蚊帐，补充了被子，深得士兵的拥护。一九二八年五月部队开赴平江前，彭德怀支持士兵，掀起了一次闹饷风潮。风潮从一团开始，推动了二、三团及随营学校，迫使师长周磐不得不同意筹款，发给每个士兵一元钱饷金。闹饷风潮的胜利，提高了士兵的思想觉悟，使他们初步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开始懂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能胜利的道理。

本来，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党组织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就酝酿过起义。原拟起义以后，把队伍从南县拉往湘西。到六月，接到省清乡督办署的命令，要部队开赴平江“清乡”、“剿共”，党

组织便改变计划，决定到达平江后再考虑起义问题。

第二节 平江起义的准备和经过

一、进一步提高士兵的觉悟

独立第五师一、二、三团，于六月十八日、十九日先后到达平江。师直属单位和第一团团部驻平江县城。第一团第一营驻城郊天岳书院，第二营驻县城南面五十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第三营驻县城北门一带。第二团驻平江北乡南江桥、梅仙一带。第三团驻平江东乡长寿街、嘉义、献钟一带。师随营学校驻岳阳。

部队抵达平江后，党组织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好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加快起义的步伐。

第一团士兵来到平江后，亲眼看到清乡队把捉来的“土匪”成批地杀掉，大批关在牢狱里。他们开始怀疑：平江怎么会有这么多“土匪”？后来，部队党组织经常秘密地在驻地贴出“打土豪分田地”、“消灭清乡队”、“工农和士兵是一家人”等标语，并以其他方式教育士兵，使士兵逐渐知道：“土匪”原来是四乡的贫苦工农，清乡队是地主豪绅的武装。这样，士兵斗争的目标，就由克扣军饷的“上峰”，逐步扩大到土豪劣绅和他们的清乡队。

第一团第三营驻地有个柘树坪，是三营的操坪，也是县衙门和清乡队杀人的场地。每当清乡队杀人时，三营就借口出操进行干扰，有时甚至公开和清乡队干架。清乡队对这支正规军怯着几分，因而总是躲着在夜里杀人。这样便更加激起了士兵的愤慨。有一次，清乡队将三十多个工农群众绑赴刑场枪杀，

三营九连连长黄纯一立即率领全连上操，占领刑场，但清乡队把这些工农群众拉到另一个地方枪杀了。当天晚上，士兵秘密贴出了“打倒屠杀工农的真正土豪劣绅”的标语，第二天，全城反动派一片惊骇。县长刘作柱领着一批土豪劣绅来到一团，要求彭德怀禁止士兵的“越轨”行动，密查写标语的“暴徒”。彭德怀简单明了地对他们说：“暴徒”要铲除，真正的土豪劣绅也应打倒。

为了蒙蔽反动派的耳目，也为了尽快地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使起义的准备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一团也摆出“剿共”的架势，到乡下去“搜山”。每次搜山都是无目标地朝天放点排枪，沿途丢下一些子弹和手榴弹。彭德怀曾对滕代远说过：“我多次率领李灿这个连下去，到农村时，先鸣枪，给革命的同志一个信号，让他们有所准备，进村后有意遗弃一些子弹，再把部队撤走，使地方党知道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是有革命力量的。”^①但尽管这样做了，仍然没有找到地方党。

随着党的秘密工作的开展和士兵的日益觉醒，彭德怀利用他担任团长的公开身份，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为了密切官兵关系，他取消了小厨房，上至团长下至连长排长，一律与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禁止军官打骂士兵，初步废止了体罚制度。彭德怀还经常下连队找士兵谈话，了解思想动态，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他常常直率地在士兵面前表示他对军阀地主豪绅的态度，说军阀地主豪绅“都不是好东西”，并且感慨地说，“当兵的不过是军阀地主豪绅的

^①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载《红旗飘飘》第19期。

守门狗”。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对士兵说：“我们奉命来此‘剿匪’，其实不是土匪，全是穷苦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他们就像你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苦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要活下去，就得要举起铁锤来，把这个社会砸碎。”^①在彭德怀的积极支持下，有的连队演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活报剧”，“读书会”也由阅读一般进步书刊进而秘密地阅读《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通过这些工作，士兵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进一步为起义打好了思想基础。

二、与滕代远紧急商议起义

起义之前，中共湖南省委派到浏阳、平江等地筹划恢复湘鄂赣边特委的滕代远，来到平江县城。滕代远原系湘东特委书记，后将这一工作移交给蒋长卿，七月初离开安源市到浏阳，由浏阳县委派交通员送到平江。中旬到平江县城后，他没有找到平江县委，先与邓萍接上了关系，被安排住在城内君子巷“镜中天”旅馆。当时，彭德怀下乡去了，滕代远与邓萍、李灿、黄纯一等见面后，向他们介绍了全省形势，他们也向滕代远介绍了部队中党的力量和士兵的情绪，谈到组织暴动的问题时，都感到起义的条件渐趋成熟，便由邓萍写信给彭德怀，催他速回团部商议起义事宜。

彭德怀在接信的第二天（七月十八日），即行回城。他迳往平江电报局，查问有无电报，结果发现两份密电：一份是周磐的马弁、士兵会会员、秘密情报工作者陈玉成从长沙发给他的；另一份是周磐给副师长李慧根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体一致。

^① 李寿轩：《从九都山到井冈山》，载《星火燎原》（下册），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原来黄公略在驻南县时，曾给南华安特委机关写了通行证，南华安特委机关被敌人破获后，有人供出了黄公略是共产党员。周磐的电报令即将黄公略和黄纯一等逮捕。两个电报的内容证明情报确实可靠，说明情况十分严重。彭德怀即将密电内容告诉了滕代远。这时，滕代远也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特急信件。信件说南华安特委机关被破坏，有人叛变供出了独立第五师党组织的情况，并指示滕代远和平江迅速策动部队暴动，以争取主动。彭德怀与滕代远两人紧急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没收周磐发来的密电，立即发动起义。

当天，以为滕代远洗尘的名义，在旅馆设宴，彭德怀和一团的共产党员都到了。席间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滕代远扼要地报告了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彭德怀向大家说明了密电的内容，提出了起义的初步计划。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决定领导士兵借闹饷之名，实行暴动，根据湘委的指示，造成湘鄂赣三省边境的割据区域。”^①并举酒宣誓：坚决在平江举行武装起义，解除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新的红军，响应红四军的斗争号召。会议决定七月二十二日为起义时间，对起义的其他工作都作了认真的研究，然后分头紧张地进行准备。

三、抓紧做好起义前的工作

在旅馆开过会以后，彭德怀将滕代远安置到平江县男子中学附近一家农民的草屋里居住。当时，李灿的第二连就驻在男子中学内。李灿的爱人从宜章来探亲，也住在这个农民家中。后

^① 见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湘委”，系指中共湖南省委。

来起义的许多宣传品就是在这个草屋里油印的，起义时用的红布领带是在这个草屋里制成的，一些绝密的会议也是在这个草屋里召开的。这个草屋实际上成了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的司令部。

为了麻痹敌人，争取时间完成起义的部署，彭德怀曾几次署名发电，向湖南省政府报告“清剿”战绩，要求将随营学校调来平江，以补充在作战中损伤的官佐，并请求补给子弹和银饷；又密函贺国中，要他组织随营学校学员请愿，要求开往平江担负“剿匪”任务，嘱他机警行事，如请愿达不到要求，则借野外操演的机会把学员拉往平江参加起义。黄公略所在的第三团第三营驻在离平江城六十里的嘉义镇，彭德怀派人密告黄公略，促其迅速作好准备。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彭德怀便带着李光深入各个连队，找人谈话，了解情况，紧张地进行布置。

对起义，当时提出了政治上的以下最低要求：“一、彻底消灭平江城的民团、挨户团等地主武装，逮捕县长、省督察员、独立第五师副师长等反动头子和一切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政府，推翻国民党党部，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二、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并以缴获的一部分武器移交给地方党委武装工农。三、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政纲和劳动法令。首先是不还债、不纳税、不送租，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八工作制’，增加工资。四、释放在牢狱中的一切政治犯。五、在湘鄂赣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求得与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活动的区域打成一片。建立湘鄂赣边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以便统一领导革命斗争。六、改善士兵生活。凡参加起义的官兵，每人发给现洋三元。官、兵、伙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建立革命的士兵委员会，选举官长，废除打

骂和奴隶教育。七、向富商募军饷，没收地主豪绅及反动头子的财产。除现金作为军饷外，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八、宣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没收各帝国主义在平江的教堂、企业和财物，归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处理。九、拥护苏联，并与各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十、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①

四、分头向预定目标进击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湘鄂赣苏区创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平江起义爆发了。

上午十时，彭德怀在团部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后，宣布实行士兵会章程，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并宣布第三营金营长经济手续不清，财务不公开，且与平江土豪劣绅互相勾结，予以撤职查办，任命第九连连长黄纯一代理营长职务；其他连排长十余人，对革命认识模糊，停职考察，暂不回连。

上午十一时半，第一团第一营全体官兵全副武装，集合在平江城



天岳书院，平江起义地址。起义队伍曾在前面的广场誓师。

^①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载《红旗飘飘》第19期。

郊天岳书院广场上，首先由第一团士兵会负责人李灿宣布武装起义，继由团长彭德怀讲话，他说：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一次光荣的革命任务，去解决那些克扣我们军饷的军阀和屠杀我们工农兄弟的反动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我们不要再当地主老财和军阀的看门狗，我们要为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穿的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接着，详细布置了各连的具体任务和革命纪律，并带头系上了鲜红的领带。最后，命令大家装好子弹，整队出发。战士们摩拳擦掌，雄赳赳地奔赴县城，分别向各自的预定目标进击。

按照起义的布置，李灿率领他原来指挥的一营二连和其他两个连，迅速向县政府和保安队驻地进击，占据了县政府，活捉了县长刘作柱，其余反动官吏也一一就擒；黄纯一率领他原来指挥的三营九连和其他两个连，来到师部驻地福音堂，前冲后堵，缴了师特务连的械，除副师长李慧根、参谋长杜际唐逃脱外，其余反动军官全部被俘。起义部队共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子弹约百万发（主要是师部库存）；将近千名保安队员集中在一个大庙内，向他们宣讲起义的目的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进行政治瓦解工作；并冲进监狱，解除了看守人员的武装，用斧头砸开牢门铁锁，砸碎被捕人的镣铐。当五、六百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知道是彭德怀领导的队伍举行起义将他们救出时，便像潮水般地涌了出来，高呼：“民主自由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很多人抱住起义战士欢呼跳跃，有的拉着起义战士哽咽难语，有的要求马上参加红军，有的立即领着起义战士搜捕反动派，把那些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从床底下、茅厕里抓了出来。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起义部队占领了平江县城，鲜红的镰刀斧头旗，开始和平江上空飘扬。

当天下午，第一团第二营从思村安定桥一带驻地，也开回了平江县城，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按照起义的部署，三支队伍在预定时间起义后，都在平江县城集中。但黄公略于二十一日黄昏即杀死第十连连长，组织全营闹饷哗变。他们与平江第四区（嘉义区）区委书记涂正坤取得联系后，取道周坊、恩溪、钟洞向平江进发。二十三日，当部队行至离县城五里处一个小镇休息时，黄公略即离队到县城商讨工作。正在这时，该营在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动下叛变南窜了。黄公略去该营任职为时不足一月，这种事情的发生不算特别意外，但不遵守预定起义时间，起义后不设法通知，在关键时刻离开部队，则是错误的。二十三日，贺国中率领随营学校员生一百多人，以野外操演为名，从新市街出发，于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浯口，刚准备宿营，得知平江起义胜利的消息，便集合队伍宣布起义。全体员生不顾疲劳，立即连夜急行军向平江进发，在天快亮时赶到了县城。他们同县城的队伍汇合起来，共计二千五百多人。

五、庆祝红五军诞生，决定创建湘鄂赣苏区

平江起义如一声春雷，对打击敌人、唤醒人民、鼓舞斗志，起着巨大的作用。

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下辖十三师一、四、七团。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师长和党代表；一团团长雷振辉（后叛变），党代表李灿；四团团团长陈鹏飞，党代表黄公略；七团团团长黄纯一，党代表贺国中。还有特务连、迫击炮连、机枪连、军医处、经理处、电话队、卫生队等。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共工农红军

第五军委员会，邓萍为书记，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李灿、李光、张云生、贺夷等为委员。

平江起义的消息传遍四方。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共平江县委代表胡筠，率领一批干部进城来接头，工农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背着梭镖大刀，举着红旗，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平江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欲聋。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妇女宣传队向群众宣讲消灭阶级剥削、打倒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新军阀的道理，还为起义战士洗衣服，补鞋袜。起义的胜利，变成了军民联欢的盛大节日。

中共平江县委和红五军党委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扩大宣传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全县实行总暴动；努力肃清反动势力，加强侦察警戒，严防敌军的进攻，严防豪绅地主等反动分子外逃；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会议决定：以平江东乡的长寿街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部队整编完成后，即派第四团向平南发展，与浏阳县委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开展工作；派第七团向平北发展，与湖北省通城、咸宁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开展工作；第一团和军部直属单位向长寿街开进，并向江西省的修水、铜鼓等县发展；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同时打通湘东、湘赣边和赣南，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

七月二十五日，红五军党委和平江县委在月池塘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红五军正式成立，宣布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滕代远报告了政治形势、党的主张和成立红五军的意义；彭德怀扼要地报告了起义的经过和意义，

以及今后的任务。起义部队当众宣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工农谋利益，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武装，打倒国民党军阀，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坚决斗争到底。会上，推选苏构堂为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推选了其他十五名委员，确定了全县的施政方针，号召全县人民联合起来，夺取新的胜利。红五军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根据群众的一致要求，枪决了县长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刘作柱和清乡委员、大劣绅李铁恒等一批反革命首恶分子。出卖平江县委负责人罗纳川的叛徒高岑南，也受到了正义的制裁。

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区、乡、村都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吸收了一批在斗争中表现坚定的积极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红五军将缴获的一部分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拨给平江县委武装工农。平江游击队迅速扩大为有五个大队、千余人枪、有一定战斗力的革命队伍。从此，湘鄂赣边界开始了革命的红色政权同反革命的白色政权长期的对立和斗争。

第三节 红五军上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

一、红五军撤出平江县城

平江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清乡”、“剿共”的部署，牵制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同时，它与红四军的斗争遥相配合，使湖南长沙的反动派处在南北夹击之中。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如坐针毡，迅即调刘鏊、朱耀华部十多个团的兵力，配合湘鄂赣边境地主武装，直扑平江，进行“会剿”。

七月底，红五军第一团还驻守平江县城，第四团已向浏阳发展，第七团朝平北推进。敌刘鏊、朱耀华部以六个团的兵力将平江城包围，敌陈光中、陶广、王东原等部又陆续开到平江，出现了不利于我的严重局面。这时，滕代远、邓萍正在离县城六十里的乡下参加平江县委扩大会议。彭德怀面对这种形势，沉着机智地进行指挥，以六个连的兵力，与十倍于我的敌人血战。经过一日一夜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退出平江。这次战斗中，军需处长（旧军官）将几万元光洋的军饷拐走了。李灿的第一团和回师支援的贺国中、黄纯一的第七团，人员损失很多，年轻的共产党员黄纯一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黄公略的第四团遭到敌人截击，损失也很大。这是平江起义后部队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从平江起义到退出平江县城，只有十天时间。从当时情况看，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已经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部队同优势的敌人作战时，也打得英勇顽强。但是，当时大都只有一股革命热情，缺乏长远的战略思想，尚未深刻懂得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因而在起义获胜后，有轻敌思想，没有迅速将部队撤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致使后来增加了许多不利因素，招致了不应有的损失。正如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所说：“本应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把部队撤离平江县城，东进至江西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没有这样作，而错误的想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的声威。结果适得其反。”

二、第一次上井冈山失利

部队撤出平江城后，在长寿街打了一仗，受了一些损失。八月六日部队进占修水县城，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消灭了一部分靖卫团地主武装。部队进城后，积极做宣传工作，没收了几家地主豪绅的商店、当铺，将粮食、布匹、食盐、铜元、衣物等分给了群众。原来，这里的群众受豪绅地主造谣的影响，都逃光了。通过宣传，当他们看到红军一举一动以后，许多群众涌进城来，纷纷参加打土豪的革命斗争。红五军在修水城呆了九天，帮助当地党组织发展了一些党员，成立了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展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组织；同时，还整训了部队，健全了士兵会。后江西敌军从武宁、万载方面来向我军进攻，红五军吸取前段的经验教训，便撤出修水，经过铜鼓，返回平江东乡，到达黄金洞一带。

八月二十日左右，部队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省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及其领导人员，批准红五军党委的组成及其活动方针；要求红五军避免与敌军主力部队作战，避免打硬战，并设法与红四军取得联络。湖南省委的指示，给部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八月底，部队从黄金洞一带出发，向井冈山推进。这时，沿途的敌人前堵后追，红五军几乎每天都要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奋战数次才能前进。在艰苦激烈的战斗中，许多优秀的同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也有人经不起考验，临阵脱逃，甚至叛变投敌。人员越来越少，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部队进至江西万载大桥，由于一个副连长投敌告密，行动计划为国民党反动派获悉，遭敌朱耀华部袭击。敌众我寡，红五军仓促应战，伤

亡较重，又走散两百多人枪，丢失筹集的饷银二千余元，暂时不能继续前进，只得折回到平、修、铜边界一带休整。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失利。

三、整编队伍再上井冈山

部队折回到平、修、铜边界休整时，剩下不到一千来人。此时，外有强敌围追，内有叛徒投敌，生活也十分艰苦，红五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出现这种情况，除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一、红五军内部人员不纯，反动军官破坏捣乱；二、军内党的力量比较薄弱，政治思想工作不得力，部分官兵思想动摇；三、部队所属单位较多，指挥不便，行动缓慢；四、与地方党的联系不够。军党委认真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整顿部队。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官兵们说：“我们起义是为了干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不能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①彭德怀革命到底的决心，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部队对起义中混进来的反动军官进行了审查和清洗，吸收了一批起义以来革命意志坚决的优秀分子入党，有计划地抽调一部分人到游击队中去工作和锻炼，并派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去做群众工作，从多方面提高部队的觉悟，纯洁部队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将原来的三个团改编成五个大队。一大队长李玉华（旧军官），二大队长黄公略，三大队长贺国中，四大队长雷振辉（旧军官）、五大队长李灿。经过整训，队伍比以前纯洁、精干，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较密切，士气和战斗力

^① 李聚奎：《平江起义时期的彭德怀同志》，载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也提高了。随后，部队在修水的白沙岭，又察觉到第一大队长李玉华和第四大队长雷振辉有投敌的迹象，便通知各大队开会当场扣押了雷振辉。李玉华没有到会，带着一部分武装逃跑了。第二天，军部决定枪决雷振辉。雷振辉夺枪妄图杀害彭德怀，被我三大队区队长、新党员黄云桥击毙。有鉴于此，军部把另一个旧军官、原四团团长、后改任高级参议的陈鹏飞，予以遣送回家。军党委抓住这些事件于九月上旬，用了十天的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普遍召开了党的会议和士兵会，坚定了大家的革命意志，巩固了部队。

部队经过整编后，为了避开敌军的“会剿”，决定向鄂南的九宫山等处发展。当路过修水的渣津时，他们消灭了江西省一个宪兵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击毙了宪兵营长，缴枪一百多支。到达九宫山一带以后，他们打击地方民团，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又吸收了一批工农青年入伍，部队扩大到两千多人。后来又挥师南下，返回平江黄金洞和修水台庄一带。

十月间，红五军党委在修水台庄与前不久成立的湘鄂赣边特委举行联席(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决定将红五军和工农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一纵队长孔荷宠，二纵队长黄公略，三纵队长吴溉之，四纵队长贺国中，五纵队长李灿；并决定一、三纵队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二纵队在浏阳、万载一带开辟工作，以便保卫和发展湘鄂赣苏区；四、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则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开赴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四、红五军主力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国民党反动派获知红五军、红四军即将会合，湖南省政府

主席鲁涤平乃急电湖北省清乡督办署督办胡宗铎等，并联合江西的敌军，对红五军实行所谓“三省会剿”。

按照既定部署，红五军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统一率领，在平、修、铜、浏、万一带，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开展游击活动，想方设法钳制敌人，掩护四、五纵队前进。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四、五纵队在一、二、三纵队钳制敌人造成的有利条件下，向南行动，势如破竹。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克万载县城，消灭了一部分地主武装，筹办了一些军饷物资。部队休整三天后继续南进，沿途打土豪，分浮财，开展宣传活动，扩大红五军的影响。部队经萍乡之宣风到莲花九都时，与毕占云、何长工率领的一部分红四军部队接上了头。经过五个月辗转苦战，红五军主力部队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十二月十一日，在茨坪广场上，红四军、红五军举行了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参加了大会，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了革命的任务，祝贺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合，大大鼓舞了两军官兵的斗志。朱德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今天，我们有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会有几十个军，我们能够粉碎敌人的‘会剿’，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①从此，这两支兄弟部队，为巩固和发展红色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直并肩战斗。

^① 李寿轩：《从九都山到井冈山》，载《星火燎原》（下册），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章 湘鄂赣边特委的恢复和 各项工作的初步开展

第一节 湘鄂赣边特委的恢复

一、特委机关建立的原委

平江起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湘鄂赣边区特委机关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七年秋，党中央为了加强对长江中游各省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长江局。“长江局所辖的范围为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之革命运动与党务。”^①一九二七年冬长江局决定建立湘鄂赣边特委。一九二八年一月，长江局派郭亮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并调二十多名干部到岳阳建立特委机关，开展湘鄂赣边界地区的工作。当时，确定边界的岳阳、临湘、平江、浏阳、崇阳、通城、通山、大冶、阳新、修水、铜鼓、万载等县，均属特委领导。但特委成立仅两个月，到三月间，因叛徒苏先骏^②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原文只写了六省名称。

② 苏先骏，浏阳县人，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十月脱离部队，后叛变。一九三〇年红军攻克长沙后，将他逮捕处决。

告密，郭亮被捕牺牲，特委机关被破坏。

此后，中央决定湘鄂赣边特委由湖南省委领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中央致湘鄂赣三省省委信》中指出：“湘鄂赣边特委因为要指导三省边界各县及武长路工作，故应划归湖南省委指导。”并且明确规定：“此特委应是有相当的时间性的，他的权限不单是政治上指导，而且在组织上也可以指挥。惟特委所辖各县在组织上属于某省委的县委，仍应向该省委作经常的报告，受该省委的指挥。”

特委划为湖南省委领导后，湖南省委旋即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任滕代远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准备恢复特委机关。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滕代远从安源到达浏阳，又从浏阳到达平江县城。在平江，他没有找到平江县委，但同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与彭德怀、邓萍、黄公略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

二、恢复湘鄂赣边特委机关

平江起义后不久，红五军退出平江县城。滕代远、彭德怀在率领红五军转战各地时，抓紧与各县党组织接上关系。到一九二八年九月，除浏阳、平江、修水、铜鼓党组织早已取得联系外，万载、武宁等县党组织也先后取得联系。这就为恢复特委机关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滕代远在铜鼓的幽居，召开了平、浏、修、铜、武（宁）五个县^①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

^① 一说是平、浏、修、铜、万五县。本文系根据王首道1929年12月2日工作报告（第四号）和蒋长卿1929年3月20日向湖南省委并中央的工作报告的说法。

席会议，正式恢复和组成了湘鄂赣边特委。会议确定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等五人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任特委书记，立即开始特委机关的工作。

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工作。认为，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有湘鄂赣边区人民群众的支援，特别是有井冈山革命旗帜的指引，平江起义才取得了胜利。会议初步批判了没有正确对待中产阶级的盲动主义错误，指出，反对盲动主义是当前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会议强调，边区各县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快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施苏维埃政纲，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赤色武装力量，扩大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员编入红军，以加强红军的工农成份，壮大红军的力量。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会议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特委和各县县委都应选择和搞好中心工作区，以便有计划地推进自己的工作。特委以平、修、铜三县毗连的台庄为中心。平江县以恩溪为中心，北乡向巴陵、通城发展；南乡与浏阳东北乡取得联系，向长沙方面发展；东乡与修、铜取得联系；西乡向汨罗、湘阴发展。修水暂以朱溪厂为中心，积极向县城及南北乡发展，东乡应与武宁取得联系。铜鼓以幽居为中心，向修水的山口、漫江发展，并与浏阳东门、白沙取得联系。浏阳东北乡与平南取得联系，南乡与醴北取得联系，西乡向长沙方面发展。^①这样，边区内部就能够有机地联系起来，并通过扎实的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苏区的范围。

这次会议是边区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不久，滕代远、

^①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平修铜的革命斗争》，1929年1月12日。

彭德怀随红军主力上了井冈山。边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根据联席会议确定的方针，坚持斗争，克服困难，开展革命群众运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二节 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整顿

一、大革命时期边区党组织概况

湘鄂赣边区党的基础较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

湘东北地区，以平江县党的组织发展较早。一九二二年，毛泽东就开始关注平江县党组织的发展。他要李六如将平江县的陈弗章（当时平江县工业公会会长）、余贲民（当时平江县农事公会会长）两人找到长沙，经过几次谈话后，介绍他们入了党。不久，平江县即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随后，发展了十多个党员，于一九二三年冬天建立了平江县第一个党支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时，为了大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党员发展到二十多人，四月成立党的特支，到一九二五年，党员发展到三、四十人，改为平江地委。一九二六年，又成立县委。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组织有很大发展，支部扩大到三十多个，党员达三百多人。当时，东、南、西、北各乡和县城的学校，都有党的支部。马日事变后，很多党员转入地下斗争。浏阳县一九二四年发展了少数共产党员。一九二五年，逐步从北乡到东乡、南乡和西乡，不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成立了党的县委。大革命失败后，浏阳县的党组织也被破坏，一部分党员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斗争。

鄂东南地区的通城、通山、阳新、崇阳等县党组织都有一定的基础。一九二四年，通山已有党的秘密活动。一九二五年，阳新有了党的小组，蒲圻、咸宁发展了少量党员，通城、大冶均有党的秘密活动。一九二六年，通山、通城、崇阳等县成立了党的支部，大冶成立了党的特支。其中，崇阳县已有四个支部，党员达四十多人。据一九二九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说：“鄂南在马日以前，农村组织和斗争有相当的成绩。在南昌暴动时，鄂南民众进攻咸宁、通山、鄂城等县，很奋勇的自起响应，尤以通山孤战数月，至万危难守之时，他们还积粮于九宫山，作最后的艰苦斗争，延至四十三天之久。”

赣西北地区，比较平浏和鄂南，党的组织较弱一些。但在大革命时期，修水、铜鼓、万载等县也有少数党员，并组织过工会和农会。修水县一九二四年冬有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冬发展到二十一名党员，成立了五个党小组。铜鼓县一九二五年初开始发展党的组织，冬天成立了铜鼓支部，开展了党的活动。万载县一九二六年有了少数党员，党的活动也在不断开展。

大革命失败后，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的空前浩劫中，边区党组织受到巨大的损失，党员有的被屠杀，有的逃亡外地，少数人跑到敌人营垒中去了。但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较好，在后来发生的秋收起义，特别是平江起义后，党组织便不断有了恢复和发展。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尽管碰到敌人的多次“会剿”，有时连续遭到打击和破坏，有的党员经不起考验，但绝大多数党员有如埋在地下的种子，一经春风吹拂，雨水滋润，又茁壮地生长起来了。

二、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特委机关恢复后，多次召开了会议，研究党的组织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放松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多次派人到新区开辟工作，发展党的组织。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一般是从上到下，有计划地进行的。

湘东北地区，平江县首先在党的基础较雄厚的东南乡大量恢复和发展，然后逐渐扩大。到一九二八年底，献钟区恢复了十四个支部，有党员三百多人；枚团区恢复了十四个支部，有党员一百七十多人；虹桥区成立了二十多个支部，有党员一百六十多人。全县共有党员二万多人。浏阳县的党组织也得到大量的恢复和发展。

鄂东南地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大冶县到一九二九年五月止，党员有四百八十多人，比一年前增加七倍。阳新、通城、通山、鄂城等县，到一九二九年春，党组织普遍有了恢复和发展，并在阳新县委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大冶中心县委，由胡梓任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赣西北地区，加快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特委还派了一批干部到宜丰、宜春、奉新等地，帮助发展新的组织。到一九二九年春，这一地区的修水、铜鼓、万载等县，均建立了县委或临时县委。五、六月间，宜丰、宜春、奉新、萍乡等县也分别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区委。

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三省会剿”，造成了湘鄂赣边界地区许多困难。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止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以及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表面化，爆发了蒋桂战争。这种

军阀混战的局面，给边界地区带来了较为有利的形势。从一九二九年初起约半年时间，党的活动显著增强，边区党组织大量恢复和发展，并在这个时候进行了整顿。

三、边区党组织的初步整顿

边区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未能注意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有关规定，为革命积蓄和保存力量，因而出现了公开发展组织，只重数量，忽视质量，甚至出现了认所有农会会员都是共产党员的现象。这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混进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特务分子。修水县“在四个月的中间，就发展到万多党员。可以说修水的西北两方完全有了组织，……至于西北乡（的）武宁、通山、通城边界，横长二百多里路远的工农群众，经红军过了一次，受了很大的影响，都有自动起来造名册，要求派人前去恢复农会及加入共产党的。……至红军回修水时，才将党的组织重新严密组织起来。”^①有些地方采用“吃血酒”的方法吸收党员，使得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兴风作浪。一九二八年九月敌人在平江献钟、嘉义“会剿”时，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献钟党支部书记谭次伦一同躲在红薯窖里。随后，他以打听敌人行动为名，出窖向挨户团告密，谭次伦就这样遭到逮捕和枪杀。有许多人因没有经过认真教育和严格考验便入了党，他们的思想问题很多，组织纪律性不强、闹极端民主以及脱离群众等现象，也很严重。

为此，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特委组织各县，特别

^①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平修铜的革命斗争》，1929年1月12日。

是平、修、铜等县，对党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有的重新予以审查登记。据当时统计，平江原有党员两万多人，登记后只留下一万几千人；修水原有党员几千人，只留下几百人；铜鼓原有党员数千人，只留下六百多人。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经认真查明情况后，坚决地陆续地进行了清理。对全体党员，则采取训练等措施，加强思想教育。这样，党员数量减少了，质量却提高了，党的工作随之有了显著的进展。

与此同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边区广大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开展了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的“五抗”运动；部分地方还进行了反对盲动主义倾向的斗争，成立了农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到一九二九年春，平、浏、修、铜、阳等县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暴动委员会，革命群众团体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第三节 纠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

盲动主义曾经在边区工作中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在五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上，曾经反对过盲动主义倾向。那时，由于条件限制，只是重点解决了一些对待中产阶级的问题。特委恢复以后，便遵循联席会议的精神，在恢复、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努力纠正当时比较严重的脱离群众和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倾向。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们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滋长起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便形成为“左”

倾盲动主义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很大的损失，在党内受到严肃批评，到一九二八年初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执行。就全国范围来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它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曾指责湘赣边界党组织所主张的建立中心区域和逐步推广的政策是“保守主义”，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太右”，因而提出“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主张没收中等商人的产业，在军事上主张分兵向湘南进攻，等等。这些主张，对于与湘赣边界有密切联系的湘鄂赣边区也不无影响。同时，边区党组织中农民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份，他们的思想往往不够稳定，加上对敌人“会剿”的千仇万恨，容易接受“左”的影响，甚至直接产生“左”的行动。所以，党的第一次“左”倾错误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湘鄂赣边界地区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等“左”的情绪和错误，仍然比较严重地存在着。

“边界盲动主义以平江为尤甚，如破坏乡村的市场，反对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不顾到客观力量，并有死守硬战等口号。”^①综合当时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白色区域乱烧滥杀。“见反动派大烧大杀，以致革命的对于反动的地方，未能以宣传力量去领导，也多以烧杀手段去镇压。”^②平江一负责军事的同志，错误地认为必须将所有农民的屋子烧尽，农民才不致苟安，而要求革命。一些苏维埃政府，为了防止侦探起见，禁止一切人进来，把小商人及苏区外面的工农群众拒之门外，使一切日用品无法运进，造成根据地生活

①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

②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平修铜的革命斗争》，1929年1月12日。

很大的困难。据当时的一些材料反映：平江的虹桥、大坪、田岩、连田、思村，修水的东皋、渣津、山口、漫江等地，大屋被烧得精光，猪牛、鸡鸭、衣服、棉絮等都被拿走，很多人被杀。

二、在对待中农和城镇商贩问题上，一些地方“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或搞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耕制，都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平江一负责人认为，“小资产阶级于革命前途，实有妨害”。很多乡村的市场商店被彻底破坏，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反对。平江的虹桥、思村、献钟、龙门、浆市街，修水的渣津、马坳、山口、漫江，铜鼓的棋坪、黄泥坳等处，市镇一无所存。一切日常用品，无处可买。油盐恐慌，资金外溢。有的地方还规定乡里人不能到城里去，城里人不能到乡里来，从而断绝了城乡联系，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三、在革命队伍内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也发展了。边区特别是平江某些地方，把斩草除根这种即使是对待敌人也是错误的做法来对待同志，造成了内部的思想恐慌。一九二八年发生在平江的“梁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一九二七年阎仲儒“清乡”时，参加赤卫队并负有一些责任的梁正庭思想动摇，逃到修水，把二十支枪卖给了修水的靖卫团，从而捞了一笔钱。在形势缓和后，他仍然回到了平江。梁正庭的儿子梁国基，在革命队伍里表现较好。当时，有几个党员痛恨梁正庭卖枪的行为，因而也对梁国基不满，便擅自决定暗地里将梁氏父子处决。他们乘梁正庭参加平江东乡周坊各区联席会议的机会，在路上用石头将他砸死；接着，又佯称要梁国基到平江参加一个会议，同样在路上用石头将他砸死。对此，很多人议论纷纷，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当时边区一些地方，的确杀

风盛行。“平铜有十二条铁的杀的纪律，其中还有几项抄杀全家的规定。同志们或贪污了几元钱、几十元钱而死者，约几十人。”^① 这些情况，完全带有盲动主义的性质。

四、在军事上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采取硬打死守的做法。有的地方一味追求暴动，忽视深入的群众工作。一些党政机关、党的负责人和交通处等，不顾严格的组织纪律，过早地暴露了自己。

这些盲动主义现象，给边界地区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了一些基本群众的不满，脱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造成了革命队伍内部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当时，党召开“六大”的消息已经有所传闻，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始要求清除盲动主义，使党的工作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特委的领导下，各地揭露了盲动主义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它的危害和产生的原因，从而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清除了盲动主义的影响。对于“梁案”问题，边区特委成立了“梁案审查委员会”，多次督促平江县委予以严肃处理。十一月省委巡视员蒋长卿到达平江，和平江县委责成杀害梁正庭父子的三个党员作出了深刻检讨，并给予他们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还专门发了一份关于“梁案”的《告同志书》，消除了这一事件造成的混乱和影响。

由于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当时又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之下，盲动主义的产生和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要彻底清除它的影响，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尽管特委机关和各县县委对清除盲动主义作了较多的

^① 夏致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

努力，事实上也解决了诸如内部的过火斗争、粗暴对待小资产阶级等许多问题，但当时并没有使盲动主义完全得到解决。后来，特委又在一九二九年“四·一二”扩大会议上、“九·二”扩大会议上和实际工作中，配合红五军党委，对盲动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清除；加上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盲动主义的残余思想和占有的地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基本上予以清除。

第四节 红五军一、二、三纵队和 鄂东南游击队的活动

一、一、二、三纵队在边区的活动

在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反动派向边区大举“会剿”的日子里，留在边区的红五军一、二、三纵队，配合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活动，保卫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维护了人民的利益，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一、二、三纵队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平、浏、修、铜、武、万一带。当国民党反动派凶狠地进行“会剿”时，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隐蔽地进行活动。一九二八年年底以前，二纵队的四、七、八、九中队散布在万载农村，一、二、三、五、六中队散布在浏阳农村；一、三纵队分散在平江、武宁、修水、铜鼓等县活动。根据特委指示，当时主要是配合群众打土豪，实行“五抗”和已熟的稻谷谁种谁收的政策，同时有计划地筹集部队粮饷。那时候，地主豪绅依仗反动驻军的势力，带着挨户团、靖卫队收租收债，强迫农民送谷。红军和赤卫队则针锋相对，选择时机，把被抢去的稻谷夺

回来。

一九二九年初，蒋桂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敌人一部分驻军被调走，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我红五军一、二、三纵队便迅速集零为整，对地主豪绅和反动驻军进行狠狠的打击。二纵队从一月十七日起，先后发动了毛田暴动、鲁家湾暴动、老乌墩暴动和金坑暴动等，消灭了这些地方的挨户团和反动驻军。二月中旬，有一排敌军向我军投诚。随即，我军又消灭了白沙、大胜、永和的挨户团，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一、三纵队在其他地方作战，也取得了很大胜利。地主豪绅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每日胆战心惊，坐卧不宁。

一、二、三纵队，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在斗争中迅速锻炼成为一支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战术比较巧妙的工农武装。在每次战斗中，他们十分英勇，以一当十，以少胜多，使敌人受到很大的损伤。

红军和游击队纪律严明。他们听从指挥，不打人骂人，借物必还，有损必赔。因此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接待，与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游击队放哨、送信、侦察敌情，甚至为了保卫红军、游击队的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红军和游击队还摸索和积累了不少军事斗争经验。根据毛泽东、朱德等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总结了“化整为零，集中围击，敌来我藏，敌退我追，敌左我右，敌往我截，虚张声势，声东击西，打敌哨线，疲惫敌人”等战斗方法。当敌人大举出击时，就隐蔽地抄到敌后，袭击敌人驻地和司令部。当敌人驻扎不动时，就在黑夜分散到敌人驻地附近，鸣枪、放炮、呐喊，使敌人一夕数惊、疲于应付。当敌人兵力较为薄弱时，

就迅速集中兵力，彻底全歼。当敌人兵力增强时，就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打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红军和游击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每到—个地方，就在当地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平时参加生产，战时打击敌人。对敌人经常开展政治攻势，实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并用战地喊话、从“陆海空”散发宣传品等方法，瓦解敌人。

这样，红军和游击队在群众的心目中，开始成为真正的工农子弟兵。湘鄂赣边界地区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与红军和游击队的战斗分不开。潘心源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写的《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的革命斗争》中总结说：“彭、黄兵变^①虽遭到了大的损失，但对于平浏的工农群众斗争，确有大的发展。浏阳自黄公略带两百枪来以后，东乡造成全乡的赤色恐怖，南北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东乡并建立了两个区苏维埃。平江游击队增加四倍以上的枪支，斗争的发展普遍到全县，建立了十几个区苏维埃的组织。斗争的发展并已波及到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各县。”

二、鄂东南游击斗争的开展

在鄂东南地区，武装斗争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大冶中心县委在领导群众“四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同时，以阳新、大冶两县四十人的手枪队为基础，通过地下党策动阳新小箕铺（现属大冶）民团起义，成立了鄂东南地区第一支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后，攻打了阳新大王店保卫团常练队，打死民

^① 指平江起义。

团队长一人，团丁六人，缴获长短枪十八支，群众放鞭炮庆贺。接着，又攻打白沙常练队，重创了这支民团武装。后来向东推进，深入到阳新西南部和通山等地，消灭了通山、黄沙、大畈的民团。部队在黄沙进行整顿时，已有二百多人，六、七十支快枪。

武装扩大后，又攻打龙港镇，激战一个多小时，毙敌多人。接着攻打大冶重镇刘仁八。刘仁八常练队的力量比较强。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游击队和大冶、阳新、鄂城农民数千人，在胡梓、徐宁甲率领下，参加刘仁八战斗，击毙负隅顽抗的匪首刘维敬后，由于受我党影响的军事教官徐德贵带领四十多名常练队员起义，里应外合，才打进刘仁八，将敌人武装全部解除。七月初，又攻克大冶保安镇，八月，在蒲圻车埠等地也取得了胜利。

随着游击战争的节节胜利，游击队不断壮大了自己。一九二九年九月，大冶中心县委作出决定，将大冶、阳新等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成立第十二军。后来，十二军以南山头一带为活动中心，经常攻打阳新、大冶等县保卫团常练队，先后袭击过阳新的三溪口、浯源口，大冶的金牛，鄂城的六里局等地的驻军，均获得了胜利。

第五节 召开“四·一二”扩大会议改组 特委，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随着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整顿，党在政策上、工作上一些缺点错误的初步克服，以及各地游击活动的开展，边区各项工作因而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初以来军阀混

战局面的形成，使边区革命斗争更能比较顺利地展开，因而出现了全面复兴的新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原来成立的特委机关，因为滕代远、彭德怀等一些常委相继离开，仅留下李宗白、王首道等，而王又兼浏阳县委书记，力量的配置与形势的发展就显得不相适应了。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担负起新形势下的繁重任务，特委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改组特委。

这次以改组特委和部署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特委扩大会议，原定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举行。因平、浏代表未能如期到达，改期于四月十二日在平江东乡八区正式召开。会议一连开了四天，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这是边区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扩大会议，又叫平浏修铜四县联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二十七人。其中，修水三人，铜鼓四人，浏阳四人，平江四人，红五军二人，特委四人，各县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四人，省委代表一人。当召开预备会议时，省委巡视员袁国平来到边界，也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旁听代表二十人。

会议认为，自一九二八年边区特委恢复以来，只有六个月时间，边区各方面的工作，无论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恢复发展党组织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工作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隔（脱）离群众”、“党内纠纷”等倾向比较严重，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危害苏区的建设，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会议一致拥护“六大”的决议，要求在政策上和组织上实行一致与团结，军事上和工作上实行统一与集中，以加强党的领导，争取广大群众，

准备和扩大有计划的武装暴动，完成目前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会议在总的方针指导下，着重讨论了工作计划、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为了完成湘鄂赣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实现土地革命，促进湘鄂赣三省的斗争，会议认为边区工作应以大围山脉为中心根据地，向平、浏、修、铜、万各县发展，向长沙取包围形势。

当时，边区的平、浏、修、铜、万、阳、大等县建立了县委或临时县委，已有区委五十个，党员二万余人。会议认为，在此基础上，党的组织要积极慎重地发展，通过开办短期训练班培训干部，对一些问题较多的党组织实行彻底的改造。

会议决定统一边区赤色武装组织。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担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以平江西北乡为活动中心，向湘阴边境及通城一带游击；二纵队以浏、铜、万交界的大浏山为活动中心，向宜春、宜丰及浏、铜、万边境游击；三纵队以修、铜、平边境地区为活动中心，相机深入修水活动，向武宁、通山游击，与鄂南革命武装取得联系。纵队按大队、中队、分队建制，每个分队配备十支枪。同时，给每个区增拨四支枪，以扩大赤卫队武装。在军事策略上，要求统一指挥，实行化整为零，昼伏夜出，彼合我散，彼散我合的战术，取暗袭而不和敌人硬拼。

会议一致通过了边区特委的任务与前途及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党的组织与改造问题决议案和军事问题决议案。还通过了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农村斗争问题、兵运工作问题、共产主义青年团问题、妇女工作问题以及反对帝

国主义问题等纲要，委托新特委参入实际材料，做成详细的决议案。

最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原湘鄂赣边特委改为湘鄂赣边境特委。指挥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通城、通山、岳阳、湘阴、万载、宜春、宜丰等县工作。会议选举了特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并一致通过省委决定，由王首道、李宗白、袁国平、张启龙、黄公略、邓湘君等六人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特委书记，组成了新的领导机构。并成立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作为边区的统一政权组织，以赖汝樵为主席。

“四·一二”扩大会议后，代表们回到各地，积极贯彻“六大”精神，传达会议决议，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为完成新的任务而斗争。

但是会后不久，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边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湘鄂赣三省反动派又一次向革命势力发动了猖狂进攻，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又趋险恶。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军民不得不集中力量应付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同敌人展开又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四章 苏区军民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红五军四、五纵队回到边区

第一节 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湘鄂赣三省反动派采取反革命两手，向革命势力发动猖狂进攻。一方面，他们调集驻防部队近五个团，联合平、浏、修、铜、万、萍、醴等七县反动武装（他们叫“七县联防”），疯狂向革命根据地反扑；另一方面，他们实施“乡村自治”、“减租裁厘”、“自首自新”等软化政策，极尽欺骗诱惑之能事，妄图瓦解革命队伍。这种软硬兼施的反动策略，的确使得刚刚复兴的苏区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打击。“边境在这种烧杀政策之下的牺牲者，数达三万以上，房屋被烧五万余栋，流徙逃亡的民众达十数万，赤色割据区房屋完全十室十空，四周荒芜，人民无衣无食，种种惨状，不堪言说。”^①特别是平、浏、修、铜四县大部分赤色区域，遭受摧残更为严重。反动派重点打击的平江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达一千多人，自

^① 1930年1月28日湘鄂赣边境特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自首新的人亦有数百。凡是公开的组织几乎都遭到破坏。遭受这次打击前，全县有三十六个区委，一万多党员；这时许多区委负责人被杀害或逃走，一些区委无形中被解散，能找到关系的区委只有十三个，未脱离关系的共产党员只有五千多人。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苏区党政军民在红五军的配合下，团结一致，共同拒敌。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保卫和恢复苏区。

平、浏、修、铜是反动派重点进攻的县。敌人推广平江挨户团所谓“集中训练，联防游击，夜出清乡”的经验，强迫群众为他们成立守望队；他们四处清查户口，断绝行人来往，围屋搜山，烧毁房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地主豪绅也纷纷出动，带着挨户团收租逼债，十分凶狠。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实就虚，将赤卫队拉出去，绕到敌人的后面打击敌人。平江县赤卫队在敌人进攻严重的时候，跳出了包围圈，转到浏、万、铜边境一带游击。这样，便避开了在装备方面比自己强得多的敌人，而攻击了敌人的薄弱环节，取得了军事上的一些胜利。如在浏阳的官渡，万载的高村、大桥、黄茅等地，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缴获了敌人步枪八十多支，子弹数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反动派非重点进攻的万载，铜鼓七、八区，浏阳东南乡和鄂东南地区，特委则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发展组织，开展“五抗”运动，争取更大胜利。对敌人驻军较少、地主武装较弱的万载县，特委增强了县委的领导力量，帮助县委抓紧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在全县六个工作区，很快建立了五个区委，建立和健全了四十多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七百多人；工会、农会等团体的发展也很迅速，会员达到了四千多人。

鄂东南地区敌人驻军不多，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发展。阳新全县除城关、富池口、枫林一部分，沿公路一部分集镇，以及方林、陈竹林、木林、星潭等几个孤立反动据点外，其余地方均为革命势力所控制。大冶的南部，通山、鄂城、咸宁、蒲圻等县的一部分，亦为革命势力控制着。整个鄂东南已初步形成武装割据局面。

反动派在大烧大杀的同时，把自己打扮成仁慈的天使，大肆进行软化活动。说什么“我们赞成共产党不准收租的政策”呀，“也要减租裁厘”呀，“但不赞成共产党杀人放火”呀，等等。他们提出什么“不杀觉悟的共产党员”一类口号，释放一些被捕的群众，宣扬“乡村自治”，组织黄色工会农会等，诱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自新自首。针对反革命的卑劣伎俩，党组织一方面展开宣传攻势，揭破敌人的阴谋，唤醒受骗群众；并重新登记党员，洗刷动摇分子，对支部、区委直到县委作必要的改组，稳定和巩固内部。另一方面，派出可靠分子打进敌人营垒，进行分化反动团体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平江下东一带，因为做好了守望队的工作，很多守望队员表面上为敌人做事，背地里却为我方放哨、送信、带路，成为秘密的赤卫队员。浏阳、万载等县，改造黄色工会、农会和洪会，创造了“孤立其首领，夺取其群众，瓦解其组织”的经验。一些参加黄色工会、农会的群众，转而加入到赤色工会、农会中来。一些洪会分子也同当地的革命组织接头，要求参加革命活动。

此外，特委还派人到新昌（今宜丰）等以前没有党组织的县，在天宝、逍遥一带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成立了四个支部，一个区委，接收了工会、农会会员七十多人，开展了一些

活动。

通过以上这些工作，苏区又呈现出一派生机。到九月份，已逐步摆脱困境；到十二月份，则开始了全面复兴。

第二节 红五军四、五纵队回到边区打击敌人

一、红五军转战各地连战皆捷

正当边区群众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彭德怀率红五军四、五纵队，于一九二九年八月返回湘鄂赣边境。

红五军四、五纵队离开湘鄂赣边区以来，与红四军一起在湘、赣边界同敌人作战，取得了很大成绩，学得了许多好经验，又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已经成为一支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新型军队。在来边区之前，他们虽在安福作战中遭到很大损失，四纵队队长贺国中不幸牺牲，加上听到平、修遭到重创，游击范围缩小的消息，士气不免有些低落，但整个军容仍然十分威武，战斗力相当强。部队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从永新出发，十日到达莲花，十一日抵萍乡，十三日到达万载。从万载开始，陆续同“会剿”敌军作战。

八月十四日，红五军四、五纵队一举攻克万载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取得了返回边区的第一个胜利。接着，向万载、铜鼓县境游击，八月底，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这时，根据湖南省委指示，部队与边境支队合编，仍称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取消边境支队建制，全军有三千多人，仍成立五个纵队：一纵队队长孔荷宠，二纵队队长李实行，三纵队

队长吴溉之，四纵队队长郭炳生，五纵队队长李灿。合编后，红五纵队奉命赴鄂东南开辟新苏区，其余部队在湘赣两省边境开展游击活动。

十月一日，红五军攻占平江长寿街。这是红五军成立以来第三次进攻长寿街。第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平江起义后不久，地方党组织报告说长寿街来了小股敌人，约二、三百人，请求红五军去解决。红五军未予侦察，一接火发现敌人有朱耀华部一团之众，激战后，我军退出战斗。第二次是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根据平江黄金洞党组织报告，长寿街只有敌军一个营，要求红五军立即进攻。但一经接触，又发现有陈光中部一个团，经激战，我军损失很大。这一次，地方党报告只有挨户团数百人，发动进攻后，发现除挨户团外，还有敌军一个团，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作战异常英勇，虽然损失不小，最后却取得了很大胜利。战斗结束后，我军进驻长寿街，老区人民情深谊重，热烈欢迎红军。

红五军一、二、三、四纵队在长寿街作了短期休整，军委乘此战斗空隙召开了会议，总结了战斗经验。

此后，根据确定的分工范围，红四纵队向南挺进，到湘赣边莲花一带游击；红二纵队在浏阳、万载、铜鼓一带游击；红一、三纵队和军部在平江、修水一带游击。部队从十月到十一月，与敌人作战十余次，无役不胜，大挫了反动派的气焰，大大鼓舞了边区群众恢复巩固苏区的信心。十一月底，一、三纵队由彭德怀、黄公略、吴溉之率领，开始向南游击，在萍乡上栗市一带与醴陵、萍乡、浏阳的驻军和挨户团激战，打得敌人一败涂地，后来到莲花的路口与红四纵队会合，于十二月中旬去湘赣边区活动，准备造成湘赣与湘鄂赣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的形势。

二、长寿街会议总结战斗经验

十月，红五军在长寿街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的成绩。这一年多来，红五军在异常艰苦的斗争中，“在红四军前委的帮助下，初步学会了如何做群众工作，建立军队及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方法。”^①这次会议是红五军建设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上，大家联系建军一年多来的情况，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会议认为红五军转战湘赣与湘鄂赣边区，一直没有远离这两个边区特委所辖的范围，就是坚持这种思想的体现。在游击战术上，红五军向红四军学习，在战斗中总结，也有许多新的创造。会议认为“红军唯一的良好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在环境较好的时候，宜迅速集中部队，进占政治经济中心地点；应有经常性的扩大红军的宣传，加紧民众组织，增进革命势力与政治影响；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应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打圈子”；“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疲劳，揣测不定；敌人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总之，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②

会议批评了根据地中恃险地筑工事死守的“公开割据保守观念”，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出发，不顾军队、不顾全面的

① 彭德怀：《往事回忆》，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

“地方主义”，以及党组织包办苏维埃，忽视人民群众作用等现象。会议还分析了形势，讨论了部队的发展方向；确定各纵队的共同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粉碎白军进攻，组织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并明确了各纵队在统一指挥基础上的活动范围，为迎接新的战斗准备了条件。

会后，专门向中央写了报告。

三、向鄂东南挺进的红五纵队

红五纵队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在李灿、何长工率领下，向鄂东南挺进。

这个纵队当时有一千多人，五百多支枪。他们从黄金洞一带出发，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于九月上旬抵达崇阳县城附近。经查明，城内仅驻敌军一个连。部队夜晚来到城下，乃于第二天拂晓突然发起攻击，旗开得胜，打响了进入鄂东南的第一仗。部队在城内休整了三天，补充了部分给养，仍以游击姿态沿幕阜山脉的边沿向东北方向挺进。行军四、五天后，抵达通山县的一个村子。当天下午，红五纵队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宣布自己是从江西过来的红军，宣传了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群众欣喜若狂，争相给部队腾房子，送门板，有的还送来了棉被和蔬菜。五纵队从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中了解到敌人驻军情况，便以奇袭的方式，接连消灭了驻守通山之横石潭、富有、大畈等地的常练队，缴获了三百多支步枪和一部分弹药，给通山群众以很大的鼓舞。通山县委书记叶金波向五纵队介绍了鄂东南地区的一些情况，建议五纵队选择黄沙镇为部队的落脚点，以便向其他方面出击。十月初，五纵队由叶金波带领，从大畈到达黄沙镇，受到镇上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部队成员衣着

单薄，在广大群众支援下，经过一个星期突击缝制，便全部换上了新冬装。战士们十分高兴，严格遵守部队纪律，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军民关系十分密切。工农青年要求参加红军的络绎不绝。

为了更好地配合地方党推进鄂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五纵队党委和大冶中心县委在通山的黄沙镇举行了联席会议。湖北省委巡视员吴致民和大冶、阳新、通城、通山、崇阳、咸宁等县委负责人都到了会。会议确定鄂东南地区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本地区的反动武装，扩大红军主力，迅速造成鄂东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会后，大冶中心县委和五纵队党委，遵循黄沙镇会议的决议，按照预定的计划，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横扫通山、大冶、阳新三县反动势力的胜利。

十月底，开始了攻打通山县城的战斗。五纵队从黄沙镇出发，一千多农民手执梭镖、鸟铳一同前往。当时，该城只有敌夏斗寅部一个营。这个营与地方民团不和，与阳新城守敌范石生部也无联系，只能靠驻崇阳、咸宁之夏斗寅部出援。于是，五纵队主力和五百名赤卫队员事先埋伏在通往崇阳、咸宁的大路两旁，另以两连兵力和五百名赤卫队员悄悄开抵县城东郊。翌日拂晓，攻城战斗打响，激战三小时后，城门被炮火轰开，敌人伤亡惨重，便打开西门向咸宁方向逃窜，又遭我军伏击，除当场被我军消灭的部分外，还有三百多人被活捉。六天后，我军胜利回到黄沙镇。这时，大冶中心县委动员一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红军，五纵队的力量更加增强。接着，我军出击阳新龙港镇和龙港洞下两个敌据点，打死民团团丁七、八十人，又攻

下阳新的排市，全歼花潭吴民团，活捉匪首吴汉卿。

十一月间，五纵队开始了进攻大冶的战斗。大冶城内有常练队百余人，他们自恃地形优越，十分骄横。我军事先开进城郊树林中隐蔽，黄昏时发起攻击，爬城队迅速用活动云梯越上城楼，战斗一打响，敌人措手不及，乖乖地缴械投降。

我军乘胜出击，又先后消灭了大冶刘仁八、阳新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等十几个集镇的常练队，全歼驻阳新城守敌范石生部两个营，攻占了阳新县城。

在一个多月中，红五纵队配合当地赤卫队，扫荡了通山、大冶、阳新三县的敌军和反动民团，共缴获迫击炮十多门，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一千多支，以及大批弹药物资，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同时，救出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后来，纵队拨出一部分武器给各县建立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将部分粮食和物资分给贫苦劳动群众，释放了部分敌军俘虏，扩大了政治影响。

随着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各县、区、乡纷纷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通山、阳新、大冶等县还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五纵队的队伍发展到四千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力量更加强大了。

四、大冶兵暴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红五纵队又配合敌独立十五旅中的共产党组织，发动了大冶兵暴。

鄂东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反动派慌了手脚，忙派独立十五旅唐云山部到大冶、阳新等县进攻红军。

独立十五旅的前身是岳维峻部国民军第二军，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张维琛、赵品山在这个部队中当过副营长和政治教官，刘天章烈士曾是这个部队党组织的书记。一九二八年程子华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遭到失败后来到河南确山，经原武汉中央军校同学、共产党员郭炳介绍，去这个部队担任营部副官。

一九二八年冬，蒋介石为了吞并异己，将该部缩编为新一师，由曹万顺任师长，并将黄埔军校学生取代了老军官，我党一些在部队中担任职务的党员也被撤换，程子华由营部副官降为排长。蒋介石这种排挤、歧视非嫡系的做法，引起了老军官和广大士兵的不满，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党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发展组织，到一九二九年春便有党员七十多人，在十四、五个连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加上上级党组织又派了郭子明、耿卓吾等进入部队，党的力量更增强了。当时，中央军委指示，要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把党的组织保存下来，坚持党的工作，等待有利时机，夺取这支武装。

不久，张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反蒋，蒋介石派这个部队应战，党组织便决定利用这个时机，由张维琛等组织起义司令部，准备暴动。不巧，当部队由武汉开往宜昌时，部队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轻率地向一个老军官讲了“兵暴当红军”的主张，暴露了计划，很快遭到了失败。耿卓吾不幸牺牲，张维琛、赵品山、郭子明等都被部队开除，幸好程子华等少数党员尚未暴露身份，才得保留下来。事情发生后，蒋介石令该部徒手回到武汉，进行彻底清洗，改编为独立十五旅，由唐云山任旅长。

在这种局面下，程子华根据周恩来关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阵地，把部队掌握好的指示，首先整理了党的组织，并通过交朋友的办法，秘密地争取和团结党外士兵中的同情分子，慢慢地

积蓄力量。然后，又设法与在外面的赵品山、郭子明等取得联系，和中央军委通气，为再次组织兵暴作准备。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独立十五旅奉命开往大冶、阳新进攻红军。程子华立即与赵品山等商议，决定乘机组织兵暴。正在这时，中央军委从上海派石仲伟、柯乃康（柯庆施）、邓乾元等来到汉口，共同商议后，确定组织士兵暴动后去当红军的计划。并由石仲伟报告中央军委，柯乃康等则与大冶中心县委和五纵队党委联系。

独立十五旅到达鄂东，分驻阳新、大冶、石灰窑一线。程子华所在团驻大冶。柯乃康等与大冶中心县委和五纵队党委联系后，在曹家大院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里应外合，攻取大冶城，实行兵暴。

十二月初，中央军委派刘振山到大冶通知程子华：军委同意里应外合方案，程子华等在部队组织兵暴，红军从外面打进，定十四日晚十二时行动。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到十四日晚十一时半，程子华悄悄把自己所在的五连的党员和班长集合起来，举起了红旗。接着，按规定时间迅速逮捕了连长、排长和连部人员，并着手解决六连、七连和收拾营部等问题。六连有党的组织，很快拿下了连部，七连和营部则同兵暴部队发生了战斗。这时，程子华考虑不宜硬拼，便率领五、六两个连准备出城。五纵队于天刚亮时攻城，敌营长慌忙带七连弃城逃跑，被红军痛击，全部缴械。兵暴部队与红五纵队胜利会师，随即捣毁了县政府，活捉了县长吴屏阶，人民拍手称快。

大冶兵暴的消息传出后，驻阳新城的一、二连一部分士兵，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也奔向了革命根据地。到二十四日，三

营九连内的共产党员王愚乘机拖出士兵八、九十人，在三溪口参加了红军。

大冶兵暴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给白军士兵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给红军增加了力量，受到党中央的嘉奖，被誉为“模范的大冶兵暴”。

五纵队将兵暴部队编为第二支队，由程子华任支队长，陈奇任党代表。同时，又将第十二军与原二支队合编为第三支队，由第十二军军长谢振亚任支队长，游雪程任党代表。至此，红五纵队三个支队共有六千多人，军威大震。十二月下旬，纵队党委与大冶中心县委在刘仁八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决心加强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加强群众武装组织，加强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鄂东南革命根据地。

第三节 从“九·二”扩大会议到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

一、边境特委“九·二”扩大会议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边境特委在平江东乡四区召开了扩大会议，即芦头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边境特委第一届全体执委外，还有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春等县和大围山特区、红五军军委的代表。

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新的形势作出改变策略的新决定；二是选举边境第二届特委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议认真总结了“四·一二”扩大会议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新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要求边区党在实际斗争中执行新的策略原则。会议认为，尽管敌人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国民党全国政局还很混乱，但反动派对边区的驻军并未全部撤退，边区的政治局势仍然比较紧张。鉴于平、浏、修、铜等地苏维埃政权组织公开过早而受到严重摧残的事实，因此，变换当前苏维埃的斗争策略是十分必要的。“在苏维埃政权尚能存在的区域（如铜、浏之一部）须统照客观环境的变化，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半公开的形式”。^①“已经公开的地方应蓄积力量，缓和斗争的形势，逐渐转变；尚未公开的地方，应极力预防继续公开，注意以潜伏的势力造成秘密的割据”。^②会议指出，敌人的猖狂进攻，固然不能消灭革命，但确能打击革命，延长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在斗争当中，不仅要学会直接的或间接的进攻，而且要学会退却；不仅要学会打击敌人，而且要学会躲避敌人的打击。那种盲动主义的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脱离群众的乱烧乱杀，企图与正在凶焰高涨的敌人作武装对峙，不仅不能打击敌人，而且必然招致自己巨大的损失。会议同时指出，“不可有保守和平的倾向，必须积极向外发展，扩大新的区域，巩固旧的区域，加紧准备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建立广大的苏维埃区域。”^③

在农村斗争问题上，决议指出，要尽快恢复苏维埃组织，“发动群众日常小的经济斗争，并注意领导这个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道路”。^④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巩固革命根据地。要记取前段部分地方搞“共耕制”的错误。

①②③④ 引自1930年1月28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因为目前实行这种“共耕制”，没收一切土地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必然侵犯中农的利益，引起富农的反抗，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不过证明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理想主义。”^①在农村斗争中，党的路线是以贫农为基础，联合中农，中立富农，向地主阶级作斗争。对待一些地方的洪会组织，可以采取“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的浏阳经验，加以分化和争取。

会议强调了职工运动，号召各地党组织及时把集镇、农村中的工人、手工业者和雇农组织起来，以建立城市工人运动的基础；要注意改造黄色工会；要扩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会议还通过了工会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等组织法。

会议强调把恢复、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三者结合起来。认为必须洗刷党内的投机分子，严格慎重地吸收党员，加强党的干部训练，注意党的理论工作，坚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并实现罗霄山脉党组织联成一片的任务。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会议选举了湘鄂赣边境特委第二届执行委员十一人，候补执行委员三人。随后，召开了第二届特委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推选王首道、石夫（杨幼麟）、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为常委，王首道任书记。并决定在特委领导机构中设立财务、交通、文书、印刷等科，每科配备干事一至三人，负责各科有关的日常事务工作。同时，还决定在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湘鄂赣边境革命委员会，迎接新的革命任务。

这次会议，针对当时关系边区工作胜败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① 引自1930年1月28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作出了大胆而正确的决议，并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为后来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成为湘鄂赣边区历史上又一次重要会议。

二、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

“九·二”扩大会议以后，整个边境地区，在红五军的积极配合下，按照会议确定的关于“围绕恢复平、浏，巩固铜鼓苏维埃，树立修水党的基础，使之与武宁、通山、通城党组织发生关系，并增强万载党的力量，加强新昌、宜春等县工作，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认真进行工作，开始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红五军开展游击战争，英勇顽强，战果累累，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边区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不到三个月时间，浏阳党组织逐步发展；修水、平江党组织通过整顿，已经恢复；铜鼓、万载有较大进展，与通城、通山、崇阳的党组织先后取得了联系；宜春、新昌、上高等地发展了新的组织。湘东、赣西一部分党组织并与湘赣边特委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边境地区已有党员九千九百余人，数量虽比原来减少，质量却比原来强了。

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的“五抗”运动，继续开展，斗争的火焰燃遍平江、浏阳、铜鼓、万载和鄂东南各县，波及宜春、萍乡、宜丰、奉新广大农村，使农民得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造成了较大的政治影响。一九二九年十月，根据湘鄂赣边境革命委员会颁布的革命政纲第十二条的规定，在平、浏驻防敌军已经撤减；但江西军阀在蒋系军阀尚未溃败前，因未直接参战，对边区革命势力仍然不断进攻。近一个多月来，

浏、修、铜、万等苏区，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改变过去一些地方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及退伍的红军士兵使用。^①得到土地利益的农民兴高采烈。

在工作中，实际上已修改了原来决定的秘密割据的策略，各项工作均公开地进行。苏维埃割据区域扩展到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通城、通山、阳新、大冶等县。武装力量也有很大发展。特委将平、浏、修、铜、万等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湘鄂赣边境独立团，并整顿了边区赤卫队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如农会、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童子团等，都组织起来了。这时，湘鄂赣苏区已经形成，为开创更大胜利的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形势下，部分地方的部分党员和群众，也产生了一些有害的情绪，影响了斗争的深入。

为了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在万载陈坑召开了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

会议一致肯定，“九·二”扩大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执行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必须继续执行。但是，由于形势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工作中一些口号已经不能适应了，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予以改变。

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九·二”扩大会议以来，军阀混战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紧接蒋桂战争之后，发生了蒋、冯间的战争。湘鄂两省军阀直接转入了战争漩涡，已无余力向边区革命势力进攻，故鄂南空虚，通山、通城均未驻防，平、

^① 引自1929年10月2日《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

修、铜、万、武、新、高、萍、袁（袁州，今宜春）诸县还有三团以上驻军，铜、万局部革命势力还受到一些打击。而就整个边区统治阶级来说，其基础日趋动摇，防守日趋薄弱，有利于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开展。如果革命者对这种形势估计不足，不能将党的工作引向前进，就会犯右的错误，就不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会议认为，当前部分地方部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状况，还不能跟上日益向前发展的形势。有的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估计过高，有退缩情绪，甚至借秘密工作为名，躲避斗争；有的对党的政策认识不够全面，降低政策要求，提出实行减租或向小地主交租的口号；有的对反对盲动主义存在错误的理解，以致放弃经常的必要的斗争，成为“不动主义”。会议提请各级党组织高度注意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认真地加以解决，促进党的各项工作的发展。

会议对当前党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运用民主的办法，自下而上地召集乡、区、县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改组各级苏维埃组织，加强边区苏维埃政权建设。并根据边区革命者牺牲达万人以上的情况，成立边境互济委员会，加强对烈属的抚恤和对军属的救济工作。

二、扩大边境赤卫队武装。将各县赤卫队合编为五个大队，命名为湘鄂赣边赤卫军，配合红军作战。这支队伍，大部分向北发展，发动通山、通城的群众斗争；一部分向东发展，发动修水、武宁、新昌等县的群众斗争，以作为平、浏、修、铜割据地区的屏障；一部分向南发展，发动宜春、萍乡的群众斗争，与赣南、湘东革命势力取得联系，实现向外发展的要求。

三、发动年关斗争、“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和红五月总暴

动等群众性斗争，进一步开创湘鄂赣边区的新局面。

四、把建立中心工作区域仍然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湘省特别注意平江，鄂省特别注意通城，赣省特别注意修水。以平、通、修为边区目前中心工作区域，带动全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各县同样需要根据政治、军事工作的地位是否重要，产业工人的多少，群众斗争基础如何，相应地确定中心工作区，以带动全县的工作。

五、加强思想教育、理论学习和支部生活，实行党的民主制，巩固布尔什维克纪律。针对部分党员群众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加强学习和训练。并决定发行《布尔什维克之路》理论刊物，以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这次会议，发展了“九·二”扩大会议的基本思想，根据形势的发展，初步克服了部分党员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有害情绪。会后，特委机关迁至平江长寿街。

三、特委和湖南省委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

“九·二”扩大会议以后，中共湖南省委收到扩大会议的决议案和特委的报告。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和传递方法的限制，以及省委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湖南省委才就苏维埃问题、农村斗争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党的组织问题等给特委回信。信中批评特委“九·二”扩大会议决定的“秘密割据”的策略是“后退的策略”，“错误的策略”。认为特委召开“九·二”扩大会议时，客观环境是极好的。全国反革命政治紊乱，蒋冯战争继续发展。湘省方面何键赴宁援蒋，赣省方面王均去鲁涤平来，政局之紊乱莫过于此时。湘鄂赣虽有少数敌军，但决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主观方面来说，平、

修革命斗争虽然遭到挫折，但浏、铜、万的革命斗争还是向前发展的，并且由于红五军重来，军事上增加了相当的势力，群众斗争情绪也是高涨的。因此，省委指责特委决定从公开割据转到秘密割据，“是忽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群众的力量”，“是替机会主义作宣传”，“是失败情绪的表露”，“是坚持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党所不能适用（容许）的”。省委委婉地指出，苏维埃在公开之前自然需要秘密的活动，边境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所在地，不要使外人知道，但这不过是为了减少敌人对付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我们总的策略。如果把把这个作为我们总的策略，“我们就会和缓斗争，甚至避免斗争，走到取消主义的危险道路上去”。因此，必须同这种观念作坚决的斗争。

省委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的口号不过是目前策略，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土地一概归国家所有。省委认为特委关于当前实行共耕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土地国有，……是替私有的社会制度作宣传”。省委承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建立共耕制度是很困难的，但又认为，“必须宣传土地国有的政纲，以打破农民的私有观念”，决不可“唾骂”共耕制度。省委认为，有些群众没有耕牛农具，也可将几个、十几个农民组织起来，合伙耕种，这可以说是一种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是共耕制的一种形式。

省委明确地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说目前党的路线，在农村斗争中，是“以贫农为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因为富农是农村中的障碍，必须肃清富农的影响，坚决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在干部问题上，省委强调所谓“无产阶级化”，规定农

村中的“下级干部必须由无产阶级分子充当”，知识分子入党要有“长期的候补期”。

特委收到省委这封信以后，立即召集常委会，认真进行了讨论，并从党的原则出发，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写了答复报告，对省委提出的意见和指责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开诚布公的反驳。

报告承认，“九·二”扩大会议所决定的策略“确是有退守的性质”。但是，特委认为，这种退守是暂时的，应该的。在反动统治阶级向边区猖狂进攻、党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党不能不采取相当的退守策略，“以便收容自己的队伍，和缓敌人的进攻，加强在组织方面准备我们的战斗力，在宣传方面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努力争取群众，并注意领导实现部分要求的日常斗争”。这种退守，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积极的进攻。特委认为，布尔什维克依据主客观方面的形势，制定符合当时情况的策略，不管是攻是守，是进是退，都是允许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进攻，从根本上否认妥协让步，这并不是革命的策略。随便给特委扣上“取消派”、“取消斗争”、“机会主义”等帽子，是不正确的。何况，当形势向前发展后，特委为适应新形势，已制订了新的斗争策略，现在再提出这些问题，已是时过境迁了。

特委报告指出，“九·二”扩大会议批评（不是“唾骂”）共耕制的错误，是指民主革命阶段的现在而言，而不是指共产主义社会所实行的共耕制。目前实行共耕制，不仅要没收一切土地，为党的政策所不允许，而且没有具备“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条件，不能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同时，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私有制。再有，从实践上看，

平江、醴陵、浏阳都实行过共耕制，都失败了，这就是明证。因此，省委认为目前还有可能实行共耕制。认为批评共耕制是替私有的社会制度作宣传，这完全是置党的理论、政策和客观现实于不顾。至于边区是否可以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特委表示“尚无经验，当遵来示开始试办”。但接着明确指出：“生产合作社与以前浏、平所实行的共耕制完全是两件事，不容混为一谈。”

特委报告指出，“九·二”扩大会议提出中立富农的政策，是根据“六大”决议和中央第二十八号通告而决定的。当时，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尚未传达到边区特委。最近接到共产国际致中共书和中央接受共产国际对农民运动的指示的决议，在特委常委和平、浏党组织中进行讨论，还有激烈的争论。但是，特委决定接受中央决议，从中立富农转变为反对富农。

上述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当时边区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反映了当时共产党内对于理论政策问题的原则争论，上下级之间平等讨论问题的革命作风，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对于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应该采取什么斗争策略等问题上的观点，湖南省委表现为“左”倾，而特委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也赞同省委的“左”倾观点，但总的表现是较为切合实际的。这一点，在尔后边区工作的实践中，已为历史所验证。

第五章 湘鄂赣边区进入全盛时期， 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城

第一节 从年关斗争到红五月暴动

一、轰轰烈烈的年关斗争

跨进一九三〇年，在召开了湘鄂赣边境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以后，边境地区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蒋冯阎军阀混战正在酝酿的有利时机，相继开展了年关斗争、“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和红五月暴动，加上红五军一、三、四纵队重返苏区，打开了大发展局面，使整个边境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蓬蓬勃勃的形势。

还在一九二九年秋收时，地主豪绅阶级凭借挨户团和驻军的势力，强迫农民交租还债，虽然遇到农民和赤卫队的反抗，但毕竟他们的势力较大，不少农民被逼偿还租债，弄得家中存粮无几。地主豪绅又囤积居奇，实行闭粳，制造紧张气氛。待到年关将近时，不少农民无粮过年，而且有钱无市，普遍出现饥荒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号召开展年关斗争，农民便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后，他们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抗捐，抗税，阻禁闹粳，搬取地主藏粮，到处张贴着“打倒土豪

劣绅”、“收租逼债者杀”等标语。赤卫队四处开展活动，严厉惩罚逼租逼债最凶恶的大地主。

当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级党组织毫不犹豫地选择时机，没收地主粮食、财产和土地，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年关斗争搞得较好的鄂东南地区，农民在“四抗”的基础上，由红五纵队、赤卫队配合，狠狠打击了反动派。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他们发动了阳新城战役。当时，驻在阳新城的敌人，是独立十六旅邓英部第三营，加上常练队二百余人，共六百来人，他们保护土豪劣绅，藏粮闭寨，坑害民众。红五纵队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决心消灭这支反动武装。十九日晚，他们从黄沙镇、三溪口等地出发，二十日中午抵达阳新城郊，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发起攻击，击溃了护城的常练队，城内敌人不敢应战，仓惶向武穴逃窜。这时，红军一涌而入，大部分追击逃敌，歼灭敌人；一部分则负责肃清城内残匪，打开监狱救出被捕同志和群众，烧毁县署，没收豪绅地主的钱粮物品，分给贫苦人民。接着，红五纵队又乘胜组织十多个突击小组，配合赤卫队和广大群众，分途向粤汉路一带出击，沉重打击了大冶县的金牛、保安和咸宁县的柏墩、汀泗桥、马桥、贺胜桥、官埠桥等集镇的地主武装，歼灭十多个民团，活捉了咸宁县长黄思犹，缴获步枪四百多支，银元三万多元，还有大批粮食等物资。

这一次发动年关斗争，人民群众普遍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他们每家每户都分得了一些粮食和物资，到年关的时候，没有地主豪绅上门逼租逼债了，真正过了一个“太平年”。

二、“三·一八”武装大示威运动

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成立纪念日。当时，党在国民党统

治区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工人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陆续开展了罢工斗争。京张、京奉、京汉、津浦、陇海五大铁路的职工，也开展了同盟罢工。为了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五十九周年，援助全国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进一步打开湘鄂赣边区大发展的局面，边区群众在年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边境特委的领导和组织下，又开展了大规模的“三·一八”武装大示威运动。

在浏阳，在“三·一八”前夕，该县刚刚开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大纲》、《猛烈地发展和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工农兵政权，实行红色清乡》、《举行“三·一八”示威运动和红五月总暴动》等决议。当“三·一八”到来的时候，头天晚上，许多山上烧了“望火”；“三·一八”那天，全县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有数万人。

平江县在三月十八日晚上，发动东乡、南乡和北乡成千上万的群众，拿起梭镖，举起红旗，点起火把，举行了示威游行。山上燃起了“望火”，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纪念巴黎公社”、“拥护反帝同盟”、“武装保卫苏联”、“打倒军阀”、“消灭挨户团”等口号，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打掉敌人哨线，镇压了一百多个反革命分子。

围攻万载县黄茅的战斗，是这次“三·一八”武装大示威最突出的事件。黄茅是万载县一个主要的封建堡垒，地主阶级把它叫做“小南京”。镇上驻有一个靖卫团，经常破坏革命运动，捕杀革命群众，抢劫群众财物，群众恨之入骨，多次要求消灭这股反动武装。这次攻打黄茅，特委作了周密的布置，除调来万载的五大队几千名赤卫队员外，还调动了红五军二纵队

和铜鼓、宜春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终于全歼反动武装，击毙靖卫团长周德祥，缴获步枪九十余支。红军占领黄茅后，攻打万载大桥等地的赤卫队也获得了胜利。邻近各地的反动武装，纷纷向县城逃窜。农村许多地方插上了红旗。

铜鼓、宜春、宜丰等县也举行了武装暴动。到处张贴革命标语，消灭地主武装，建立起区、乡苏维埃政权。

在鄂东南，红五军五纵队向粤汉路沿线城镇举行了大规模武装示威，并袭击了由夏斗寅部两个团驻守的咸宁城，又一次攻打了贺胜桥、官埠桥、马桥、汀泗桥等地的民团，拆毁了几十公里铁路，使敌人在粤汉铁路上的交通运输停顿了好多天，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鼓舞了白区人民的斗争意志。

有三、四十万人参加的这次边区“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发动了群众，克服了部分人的失败情绪，提高了群众的斗争勇气，建立了一部分苏维埃政权，由较小的斗争走向了更大的政治斗争。

三、大规模的红五月暴动

继“三·一八”武装大示威运动后，平江、修水、万载、浏阳以及铜鼓、宜春、萍乡、奉新和鄂东南各县，又举行了红五月暴动。

这时，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已经抬头，“左”倾情绪开始在苏区蔓延。红五月暴动等运动，都不免带有一些“左”的色彩。

红五月暴动前，边境特委决定这次暴动的方针是：在实行中央关于湘鄂赣皖豫五省总暴动、夺取武汉为中心的总任务之下，以界于湘鄂赣三省及政治、经济、军事占重要地位的平江

为边区总暴动的中心。暴动发展总的方面是粤汉铁路武长段。北以通城、通山、崇阳与鄂东联系，向武汉发展；东以修、铜、万、新（昌）向南浔路及南昌发展；南以宜（春）、浏等县与赣西、湘东取得联系，向株萍路发展；西以平、浏向武长段和长沙发展。在各县暴动的基础上，完成边境总暴动，夺取五省总暴动的胜利。

暴动发起前，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从赣南来到边区。三月二十三日占领宜春县城。四月攻占万载县城，抵达浏阳东门市。五月三日进驻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二纵队会合。进攻瑞昌受挫的红五纵队，这时也来到长寿街。红五军五个纵队又一次会合在一起，给边区总暴动增添了势头。

平江县武装暴动是五月六日发动的。还在彭德怀率部到达长寿街时，平江县即召开了党政军会议，具体研究了攻打县城的计划，并在第二高小操场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进行宣传发动。暴动即将开始时，驻县城敌人余贤立团及挨户团等，听说红军和赤卫队要攻打县城，便连夜赶修工事，布置防线，四处戒严，日夜防备，由余贤立团防守北门的画桥和小西门一带，配备十二挺机枪；挨户团等则防守东南一带。五月五日，红五军主力配合湘鄂赣边赤卫军及平江东、北两乡部分赤卫队共数千人，从长寿街出发，经钟洞向县城进发，六日上午顺利进入城郊。红五军主力主攻北门画桥，独立团和部分赤卫队佯攻东门，一部分部队在鲁肃山一带钳制敌人。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防御工事顽固抵抗，红军多次攻打，一直激战到下午六时左右，还没有突破北门阵地。后来，我军改变进攻方法，集中火力佯攻画桥，派二纵队悄悄地从右侧山头绕到小西门外，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因全力防守北门，

忽视了这一带的防守，一触即溃。二纵队乘胜分三路追击：一路直插敌人主力后面的北街岭；一路猛扑西街、十字街一带；一路抄到城隍庙和西门。这时，攻打东门、南门的部队也先后攻入城内，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据守北门的敌人企图撤退到西门，行至下贯坪、城隍庙一带时，为我军截击，大部分被俘。县城胜利攻克，共毙敌四百多，缴获步枪一千多支，机枪十二挺，子弹及军用品无数，并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二、三百人。

攻打平江县城获胜后，红五军一、三纵队留驻平、浏、铜、万、萍一带游击，巩固和扩大苏区；二、四、五纵队退出平江，向修水进发。五月十五日，我军配合修水八万农军，攻克修水县城。此后，向武宁、瑞昌方面发展，进入阳新、大冶一带。在这里，我军同敌罗霖、郭汝栋部五个团激战，以佯攻退守阳新城的罗霖部为掩护，集中打击从大冶来援的郭汝栋部，击溃其主力，敌余部在日英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向长江北岸逃窜。我军占领了大冶、黄石等地后便停止追击，在鄂东南休整。

五月二十三日，万载发动暴动。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三纵队，配合当地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再次攻克万载县城，帮助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

六月七日，浏阳县几万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举行了武装暴动。同时，铜鼓、宜春、萍乡、奉新和鄂东南各县也举行了局部暴动。

平、修、万、浏全县性暴动和其他各县局部性暴动，总计参加的人数达八十万以上。

第二节 边境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边区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和“左”倾情绪的出现

随着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兴起，红五军一、三、四纵队重返湘鄂赣边区，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整个边区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政治局面。

(一)苏维埃政权和苏区范围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平江县城攻克后，整个东乡、南乡、西乡的杨晋、谈岑，以及北乡的天岳关、恩溪、枚仙等占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完全成为巩固的苏维埃阵地。用以支撑地主豪绅政权的全县埃户团地主武装，已基本上被消灭。五月十三日，边境特委和平江县委在丽江召开会议，初步拟定了苏维埃组织法、劳动法、土地法，准备召开平江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群众全面进行经济、文化等建设。浏阳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万载、修水、铜鼓、宜春各县苏维埃政权，在红五月暴动中相继建立。武宁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萍乡县建立了两个区苏维埃政府。修铜宜奉边成立了暴动委员会。鄂东南各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阳新、通山除县城和个别据点外的绝大部分地域，大冶南乡及西乡一部分，鄂城之马乡、灵乡、咸宁大幕山之北和高桥一带，蒲圻金丝观、石埂渡以及东和、杨柳塘一带，崇阳之金塘、和平、故乡岭，通城之黄袍山、麦园以东，均为苏区。苏维埃区域扩大好几倍。各革命群众团体的成员，由四万人增加到二十六万余人。

(二)武装力量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二九年红一、三、四纵

队去赣南后，边区只留下二、五两个纵队和赤卫军。这时，边区已成立湘鄂赣边独立师，下辖三个纵队，有枪五百多支；赤卫队已成为各县普遍的组织，分常备、预备两种，常备队有十三万三千余人，枪七百二十多支。^①半年中，湘鄂赣独立师和各县赤卫队人数增加三倍以上。总人数和枪械虽比反革命武装稍弱，可是战斗力要比他们强得多。

在此期间，还加强了对敌军士兵的工作。在敌军士兵中建立了八个党的支部，先后在浏阳、平江、修水、万载和大冶，发动了多次兵暴。士兵自发哗变的则有数十次。《中国苏维埃》载文叙述当时的情况道：“红军及赤卫队的力量日益雄厚，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的部队之投入红军者时有所闻。如最近万载兵变。且每次赤白交战中必有很多兵士携枪跑到红军里来。被红军俘虏的兵士，受到很好的待遇和宣传，回去之后极赞红军的好处：‘土豪劣绅说红军捉了人用开水泡，谁知红军如此的好，我们何必替土豪出死力呢！’因此有许多挨户团兵士自行销差，各县的守望队也多觉悟，其组织正在无形瓦解。”

（三）边境党的组织得到了相当的巩固。特委从一九三〇年二月到四月，兼任平江县委的工作，并得到湖南省委和中央对平江工作的许多指示，使平、浏党组织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修水、铜鼓、万载、宜春、宜丰、萍乡、通城、通山、崇阳、阳新、大冶等县的党组织，也得到了巩固。当时，边区有县委和临时县委八个，特区委三个，区委四十五个，特支二十八个，支部六百一十八个。半年中，共产党员增加到一万零二百五十人。特委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发行了《布尔什维克之路》

^① 见1930年6月27日边境特委向湖南省委的报告（第一号）。

等理论刊物。各县也分别出版了《苏维埃》（平江）、《新浏阳》（浏阳）、《晨钟》（万载）、《赤湖》（铜鼓）、《修江潮》（修水）、《苏光壁报》（通山）等专刊，抓紧了干部教育，开展了宣传工作。特别是通过一系列斗争锻炼，克服了害怕斗争、失败情绪、和平发展、纪律松懈等不正确的观点和错误倾向，政治质量和斗争能力均有显著的提高。现在，边境党的组织，南与赣西南、湘东组织取得联系，如宜春与莲花的组织打成一片，浏阳与醴陵、萍乡的组织打成一片；北与鄂东南组织取得联系，如通山与阳新的组织打成一片，通城与蒲圻的组织打成一片。这就完成了“九·二”扩大会议所确定的使罗霄山脉党组织联成一片的任务。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边境党组织却遇到了“左”倾情绪的干扰，使工作受到了损害。“左”倾情绪严重的人，把一九三〇年五月起蒋、冯、阎军阀在中原大混战出现的对我革命有利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已经走上直接革命武装暴动的新阶段”；把国民党反动派暂时缓和对我边区的进攻，看成是“边境统治阶级在全国政治经济危机之下日益走向崩溃死亡”^①的表现，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们急于组织各种形式的“总暴动”，否定前一段推行的正确工作路线，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并且对部分基层干部、党员中已经克服了的不正确观点和错误倾向纠缠不休，要反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这种“左”倾情绪，在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现出来，后来就成了党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危害湘鄂赣苏区的基础。

^① 引自1930年6月27日边境特委向湖南省委的报告（第一号）。

二、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三〇年六月八日至十七日在平江东乡四区匆忙召开的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本来应该总结“九·二”扩大会议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制订进一步前进的工作计划，利用当时出现的有利形势，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促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然而，会议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不适当地提出所谓纠正“九·二”会议以来形成的不正确工作路线的口号，以种种借口改选了任期不到十个月的第二届特委，给以后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

大会共到代表六十八人，包括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春、新昌、通城、通山等县的代表和省委参加会议的代表。另外，还有十五人参加旁听。

会上听取了关于《边境政治和党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集中对“九·二”扩大会议形成的路线进行了批判。

会议指出，目前的革命形势，是“由成熟复兴日益走上革命高潮”的形势。认为“九·二”扩大会议的时候，正值平、修革命斗争失败的时候，边境党受到莫大打击，失败情绪充满党内；当时以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盲动主义的结果，于是形成党内一种不正确的反盲动主义错误；加上当时对全国政治形势未能全面了解，在政治认识上十分模糊；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就产生了“九·二”扩大会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了“秘密割据”、“和缓斗争”的严重右倾错误。认为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虽然指出了边区党内的右倾思想，批评了“不动主义”，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仍然带有极大的保守主义，甚至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认为现在革命形势已经向前发

展，主观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因此决定：“纠正过去不正确的工作路线，站在中央正确路线之下，省委正确指示之下，决定目前中心任务和主要策略是：反右倾，反富农斗争，反保守主义，坚决执行中央第七十号通告，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有计划的布置边境总暴动。”^①

在此基础上，会议通过了政治、组织、宣传、军事、农村斗争与苏维埃问题、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组织、反帝斗争、互济运动等决议案。规定边境今后工作的要点，大致有以下各项：一、“八·一”前后举行边境总暴动；二、七月二十日召开边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边境苏维埃政权；三、召开边境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边境总工会；四、普遍进行土地改革，迅速分配土地；五、督促平江、万载两县最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六、加强通城、宜丰的指导机关，以便迅速成立县委；七、派三人去湘阴、岳阳工作，加强粤汉铁路武长段沿线的工作；八、从赤卫队预备军中抽五百人加强独立师，选派工农分子三千名参加红军。

会议认为，第二届特委“任期已满”，加上“特委成员有所调动”，应选举成立新的特委。通过酝酿，选举边区第三届特委执委九人，候补委员四人。由李宗白、石夫、留泥（陈秋光）、赖汝樵、佐平（张启龙）等五人组成常委，李宗白担任特委书记。从此，第二届特委的工作宣告结束。原决定“八·一”前后的总暴动，不久在鄂东南部分地方付诸实行，其他地方投入了攻打长沙的战斗，边区开始了新的斗争。

^① 引自1930年6月27日边境特委向湖南省委的工作报告（第一号）。

第三节 红三军团建立，第一次攻打长沙城

一、红五军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

红五军一、三、四纵队返回边区时，全国政治局面已有新的变化。在革命主观力量增长与客观有利形势的刺激下，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党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的思想指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命令红军集中力量攻打武汉、南昌和长沙等大城市。

六月初，红五军军委按照上级指示，在大冶刘仁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回来，传达了中央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和决定。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共八千多人，由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党代表。红五军九千多人，由邓萍任军长，张纯清任党代表。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共一万七千多人，由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红三军团六月在大冶马蹄驿成立，全军士气高昂，军威大震。随即攻打黄石港、石灰窑，在下陆击溃敌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一个团，接着歼灭来援之敌一个团，又乘胜攻克大冶城，在城内西桥街一家百货店里召开了前线指挥部会议，阳新、太冶等县负责人应邀参加。会上，总结了斗争经验，决定除留红八军中的两个营（后扩编为红十五军，编入四方面军），由陈奇、柯庆施、郭子明等率领，在鄂东南坚持武装斗争外，主力南下。

红三军团在崇阳、通山一带集结，经崇阳，全歼城内守敌一个团，然后离开鄂东南，挥师南下，直取岳阳。七月三日，消灭了敌王东原师一部分，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城，缴获了敌军不少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还缴获了七五野炮四门和山炮几门，此后，红三军团开始有了炮兵。夺取岳阳，这就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敌人十分惊恐。武汉行营忙调驻长沙的十五师一部、咸宁罗霖部、浏阳钱大钧部向我军进攻。我军趁敌主力尚未集中，七月五日主动退出岳阳，重返平江。在“向平江的途中时，人山人海如潮水，围绕着红军。每到一处，只要短时间，就可以成立各种革命的组织，建立政权。”^①七月十五日，三军团主要领导人和战士代表，参加了在长寿街召开的平江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随后，红三军团向平江县城挺进，守敌望风而逃，我军复占平江县城。

二、二十万红军农军进攻长沙

七月中旬，何键派刘建绪率六个团向平江进攻。为此，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特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究情况。当时，由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都取得了胜利，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自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湘桂军阀战争又起，敌人互相厮杀，削弱了反革命力量；湘军为了防止桂军再犯，不得不屯重兵于湘桂边界，从而使省内防守力量异常薄弱，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联席会议遵照中央命令，同时估量了长沙地区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进攻长沙。

会后，前委和边特委便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成立了湘鄂赣

^① 引自彭德怀1930年9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

边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由赖汝樵任总指挥，并发出《为实行湖南总暴动敬告全湘民众书》，号召全省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夺取长沙，实现湘省总暴动。

在湘鄂赣边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平、浏、修、铜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组织二十多个团，还有许多没有正式编制的担架队、运输队等，纷纷向平江集中，共有二十万人左右。

七月二十二日，数万人参加了在平江天岳书院广场举行的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从天岳书院门前直至鲁肃山下，方圆一里多路，全是荷枪束装、威武雄壮的红军和农军，平江城郊，一片沸腾。

何键闻讯后，妄想堵击我军于长沙城外，急调第十五师危宿钟四个多旅的兵力，分两路向平江进攻。敌人进驻晋坑一带后，因不知虚实，按兵不动。我军在彭德怀率领下，挥戈直扑晋坑。当主攻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后，敌人招架不住，退至殷家洞一带。我军截断敌人去路，把它压缩在古家洞至殷家洞一条狭长地带，前后夹击，歼灭危宿钟师一个整团，团长侯鹏飞被俘，危宿钟慌忙率残部退守距长沙城一百三十里的金井。

晋坑战役胜利后，红八军沿平(江)长(沙)大道直逼金井，红五军绕道从左后方包抄金井，两支部队对金井形成夹击形势。战斗开始后，我军集中最大火力，向敌人阵地猛烈扫射，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反复冲杀五次，从上午八点激战到中午，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防守阵地。与此同时，湘鄂赣边独立师师长邱训民，带领三个连，机智地潜入敌人机枪阵地，夺取了一挺机枪，对敌人猛烈扫射，加快了敌人的溃败。敌人在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的猛烈冲击下，慌忙向长沙方向溃逃。我军夺取了

敌人长沙外围据点金井，奏出了一曲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联合作战的胜利凯歌。

三、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

金井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四个旅的兵力，防守在梨梨市一带，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前进。七月二十七日，我军向梨梨市进发，陈光中和危宿钟残部抵挡不住，望风而逃。我军从梨梨市过河，进攻沿路的敌人，在七里港与刘建绪等部展开了激战。当时，长沙近郊有敌十一个团兵力，七里港一带敌人火力很强，彭德怀认为不宜正面进击，便派红八军第三纵队绕道梨梨市，抄敌后路，占领杉木港，组织火力从左后侧向七里港



第二排左四为何长工，左五为袁国平，左六为滕代远。

敌人扫射，掩护红五军主力正面冲锋。敌人两面受击，遭到重创。我军缴获各种枪支三千多，俘敌四、五千，残敌纷纷向长

沙城窜逃。我军前哨部队乘胜进入长沙韭菜园、小吴门一带，很快扫清了城内残敌，后续部队当天陆续进城。晚上九时，胜利攻克长沙。在此前一天，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还高叫“本主席守土有责，势必与城共存亡”，而今只得带了随身马弁，狼狈逃窜沅江。他战战兢兢地给蒋介石拍电报说：长沙失守“致上贻钧座南顾之忧，下辜湘人倚托之重，俯仰自愧，悲愤无似。”^①红三军团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败敌军，攻占了湖南省城长沙。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攻占的唯一省城。

部队进城后，捣毁了省政府、法院等反动机关，救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夺取了营盘街军火库，获得了大批枪支，缴获了军用电台。

七月二十八日，红三军团指挥部、政治部分别设立办公处于浏阳门正街，积极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工作。

二十九日，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发布《告群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三军团总政治部还创办了《红军日报》，即日发行了创刊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午，长沙约十万工农群众举行盛大集会，欢迎红三军团和赤卫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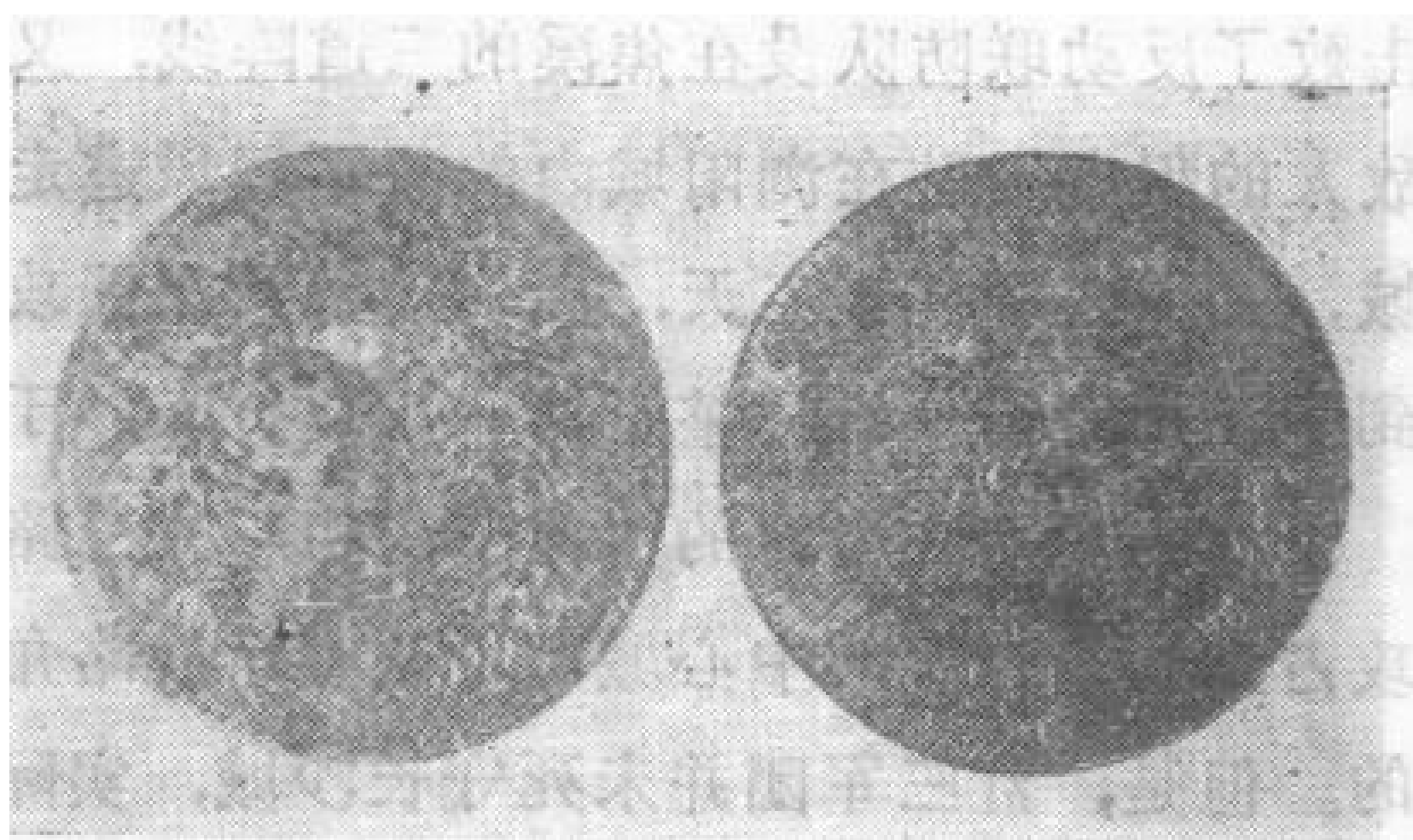
三十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任主席，因未到职，由王一分（即王首道）代理，彭德怀、李宗白、杨幼麟等十三人为委员。宣布了苏维埃政纲，颁布了省苏维埃政府《暂行劳动法》和《暂行土地法》。

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宣传我党主张，组织人民群众，创办了《苏维埃日报》。街头巷尾写满了红色标语，直至九月下旬，“环城马路及天心阁一带，随处皆有尚未涂去之共党标语”。^②

① 《湖南省政府公报》，1930年9月28日第59号电。

② 《中央日报》1930年10月2日。

为了肃清反动分子，成立了肃反总司令部。曾经从秋收起义部队叛逃、并出卖了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郭亮的叛徒苏先骏，被红军逮捕枪决。为了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银元。

解决部队给养，救济贫苦大众，组织了没收委员会，“没收了几家商店及帝国主义的堆栈、洋屋及领使(事)、贪污(官)、豪绅的财物”^①，筹款达四十万银元，又没收了一些兴风作浪的反动分子、不法奸商的谷米，并规定了谷米油盐的价格。与此同时，省苏维埃政府还恢复和组织了纱厂工会和各行业工会五、六十个，并召集近郊农会代表开会研究分田问题。这一切，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强大生命力。在占领长沙期间，红军扩大了四千人。

红军攻克长沙，大大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何键迅即调集他所有的部队进行反攻；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保武汉，一面派出军队、军舰和飞机援助何键；国民党军总司令部对四十五旅说：“如能克服长沙，当转请给赏大洋五万元。”曾经因轰击长沙而被我军驱入下游的帝国主义军舰，又相继开入。在这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军便于八月五日离开长沙，向浏阳撤退。

部队撤退时，在长沙城浏阳门外消灭了敌军一个团，沿途

^① 彭德怀1930年9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

击败了反动联防队设在焦溪的三道阵线，又在鸡婆山打退了敌人的狙击。驻在浏阳城内的敌军闻风逃走了。我军开进浏阳城，在城内驻扎了三天，因何键部前来围攻，人数较多，便退到平江长寿街一带休整。第一次攻打长沙于是宣告结束。

红三军团在当时的情况下，执行立三路线，集中大量红军，攻占象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是不恰当的。但是，红三军团并未死守长沙城，实际上，占领长沙“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而这是红军时期我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攻占省城，“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①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筹集了大宗款项，装备了自己；鼓舞了红军斗志，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斗争勇气和信心，其效果是良好的。

湘鄂赣边境独立师参加打长沙后回到边区，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将平、浏、修、铜、岳各县一部分赤卫队补充进去，编为红十六军，由胡一鸣任军长，孔荷宠任副军长，下辖七、九两师。七师师长邹之谟，政委李楚屏（后叛变）；九师师长俞庚，政委高咏生。不久，由孔荷宠任军长，黄志竞任政委。

第四节 第二次攻打长沙城

一、红一军团在浏阳歼灭戴斗垣旅

红三军团退出长沙进入浏阳，何键部十个团尾追而来，其右路戴斗垣旅进驻浏阳重镇文家市，构筑工事，扼险固守，妄图

^① 毛泽东语。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51页。

伺机袭击我军。

这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正在南昌附近的奉新、安义活动，得知何键进攻三军团消息后，“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阻击敌，直取长沙，（再）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①，遂率部迅速西进。军至万载，得知三军团活动详情。于是，一面要求三军团向浏阳永和市侧击何键部左路，一面决定一军团先行消灭戴斗垣旅，然后合力直下长沙。

毛泽东、朱德在万载黄茅，听取了文家市区委关于敌情的汇报，分析研究了情况，立即作了周密的部署，决定分三路攻击文家市敌军。八月二十日拂晓，正面攻势发起后，敌人设置在文家市后面制高点高升岭上的机枪阵地威胁我军进攻。红一军团第九支队队长柯武东接受占领这个制高点的任务。他立即率领一个短枪队，突破了敌人的工事，夺取了敌人的机枪，掉头向敌人猛射，击毙了不少敌人，我军乘势攻上敌军阵地九峰寺和棺材岭，敌军象一群被赶的湖鸭子，从山上滚下去，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即获全胜。敌部除一个营侥幸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活捉或打死，旅长戴斗垣被击毙，三个团长都成了俘虏。我军缴获长短枪数千支，轻重机枪三十余挺，各种子弹数十万发。浏阳赤卫总队也打垮了敌人的一个运输队，缴获银洋二百多担。在这次战役中，支队长柯武东不幸在夺取制高点中英勇牺牲。后来，苏维埃政权在宜春县设立了一个武东区，作为对柯武东烈士的永久纪念。

^① 引自毛泽东1930年8月19日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信。

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和第二次攻打长沙城

戴斗垣旅被歼后，何键部迅即退守长沙，因而三军团向永和市侧击扑空。八月二十三日，一、三军团在永和市胜利会师。

按照中央的指示，一、三军团在永和合组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一方面军辖红一军团的三、四、十二军和红三军团的五、八、十六军，共计四万余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革命军队。

红一方面军召开了第一次总前委会议，“决议再打长沙，扩大红军”。^①当时其所以这样决定，理由是：何键率十四个团左右的兵力离开了长沙，进入平浏地区，长沙城内空虚；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无几，而我军士气高昂，敌方士气低落；从第一次打长沙看来，我军能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同时地方武装力量也较强大。

对于再打长沙，当时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是深表赞同的，它在八月二十九日给长江局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再度占领长沙，“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并且指令在占据长沙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中央临时政权，以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相对峙。

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永和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次日，分三路进攻。正在浏阳城内的何键，惊慌失措，急往长沙城内退缩。我军未能达到在长沙城外歼敌一部分的计

^① 见彭德怀1930年9月21日给致民同志转赣东特委并转各级党部信。

划。

敌人在长沙城周构筑坚固工事，装设高大电网。我军虽已包围长沙，但缺乏攻坚武器，第一次出击不利。于是后撤数里，诱敌出城，以便在运动中歼击。起初，敌据城不出，后来终于出来了。敌右路出击部队至南门外猴子石一带时，被我军俘虏和击毙二千余。在易家湾企图偷袭我部的敌军，亦被歼甚众。敌中路和左路部队，也分别为我军击溃。遭此挫折后，敌军龟缩城内，不敢越雷池一步。

随后，红军三次发起总攻，并突破了第一道和第二道工事。攻击第三道工事时，曾用“火牛”冲破了一些电网，突进了一些部队，但终因敌方火力太猛，只得退了回来。我军亦在城外构筑工事，形成对峙局面。在此过程中，赤卫队勇猛参战，工农群众帮助红军挖战壕，运弹药，抬伤员，打扫战场，出力甚多。

这次攻打长沙是一种冒险行动。虽然也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敌人重兵守城，久据不出，大批援兵却源源而来。我军围城达半月之久，粮弹渐乏，伤亡亦较大。毛泽东见形势不利，便当机立断，提出了停止进攻，撤离长沙，掉转头去打吉安的正确意见，并得到了朱德、彭德怀的同意。九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撤出阵地，向湘东赣西进发，使部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失败，明显地证明了在当时条件下要求全国实行总暴动、攻打大城市战略的错误。

第六章 苏区军民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节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向湘鄂赣苏区的平、浏地区进行疯狂反扑。十月，湖南反动当局成立了“平浏绥靖处”，委刘建绪为处长。刘率十五、十六、三十一等师之敌进攻平、浏苏区，并颁布了“窝藏共匪者杀无赦”、“收留匪探者杀无赦”、“勾结匪类者杀无赦”、“袒护匪共者杀无赦”、“潜藏匪特者杀无赦”、“宣传赤化者杀无赦”等“十大杀令”，反革命气焰甚为嚣张。当时，红十六军和各地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作战，取得了很多胜利。平、浏两县城控制在红军手中，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驻城办公达半年之久，领导贫苦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同年十月，蒋、冯、阎军阀大混战结束后，蒋介石反动政府于年底集中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自此，湘鄂赣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赣苏区的部署是：敌独立三十二旅刘夷部驻南昌、南浔路及奉新等地；郝梦麟五十四师的两个团驻

武宁；新编三十二师陈光中部、新编三十一师陶广部和十五师王东原部驻浏阳、平江、通城一线；新编第十师谢彬部驻通城、崇阳、通山；二十六师郭汝栋部驻大冶、阳新。除正规军外，在各县还配有“常练队”、“挨户团”、“靖卫团”等地主武装。敌人在“进剿”中，一方面残酷屠杀群众，烧屋，烧山，抢劫粮食、财物等，妄图达到使群众和红军无法生存的罪恶目的；另一方面，胁迫每家每户派一人参加民团，说什么“办民团者，则不杀人、不烧屋、不抢东西”^①，否则，杀、烧、抢，谁也不能幸免。敌人进攻的策略是：厚集兵力，以应付红军的分散游击，逐渐推进，扩大烧杀，组织民团，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红十六军在群众武装的配合下，遵照中共湖南省委办事处的指示，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同敌人打圈子的战术，展开了反“围剿”斗争。

反“围剿”开始以后，红十六军在修水的马坳、渣津等苏区反击敌人的侵犯，取得了胜利。十二月九日，我军在修水地方武装数千人的配合下，攻克了修水县城，接着进攻武宁。敌独立三十二旅开往修水、武宁增援。途中遭红军袭击，交通联络亦被切断，损失惨重。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急电蒋介石求援。十七日，蒋介石电令湘鄂赣三省边界之敌向修水、武宁围攻。十二月底，敌王东原师与陶广师分别从平江、通城进入修水；陈光中师由浏阳进入万载、铜鼓；谢彬师一部由通城、崇阳进入修水；江西方面以刚入九江的郝梦麟五十四师向武宁、修水进攻。当敌军从四面八方方向修水、武宁围攻时，红十六军选择了王东原师，在平、修边境的土龙铺地区予以痛击，敌军伤亡惨重。

^{①②} 《鄂东特委报告》，1931年3月16日。

土龙铺战斗后，红十六军向敌兵力薄弱处发起攻击，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乘虚由平江浆市插入敌后，向通城游击。红军出发的那天，大雪纷飞，北风凛冽。为了打破“围剿”，将敌人全部甩在后面，红军不畏严寒，走过了天岳关、黄龙山，克服了行军途中的重重困难，抵达通城的麦市。在麦市与小股敌军遭遇，战斗仅两小时，消灭敌军一个半连，缴获步枪一百四十余支，重机枪一挺。残敌向通城逃跑，我军连夜追击至城下，第二天即发起了通城战役。

攻城战斗打响后，由于城墙高大，我军装备较差，弹药不足，经激战一天，未能攻下。下午五时后，敌人派来增援的四架飞机，误以为红军已攻克通城，向城内投下十多枚炸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乱作一团。天黑时，红十六军军部决定，趁敌慌乱之际，由七师向东门发起攻击。顿时东门外的山岭上烧起了“望火”，冲锋号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见东门吃紧，即将主要兵力调往东门。我九师攻击部队则登上云梯，向守城兵力单薄处攻击。通城便很快被我攻破。一月十八日，占领通城，全歼守城敌军谢彬部一个团，俘虏团副一名，缴步枪千余支，手枪二十多支，重机枪数挺，子弹数千发，军用品无数，筹款三万多元。两天后，敌陶广等两个师向通城急速前进，企图将红十六军歼灭于通城。此时我军已马不停蹄地迁回到湖南平江，使围攻通城之敌扑了一个空。红十六军乘胜猛攻平江城，歼灭守敌一个团，缴枪八百余支，俘敌一千五百余人。这时，进入江西之敌三个师，发现红军主力在平江，即星夜撤出万载、铜鼓、修水，拚命向浏阳、平江回窜。红十六军又避敌主力，向万载转移，于一月下旬进入江西，连克万载、宜丰、上高、高安等县，取得了一连串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苏区军民也粉碎了郭汝栋部对大冶、阳新根据地的进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濬令二十六师郭汝栋部进攻阳新北部根据地。郭即派王俊和、刘家驹各率一个团向阳新的黄颡口进犯。同时武汉行营复令驻汉航空第一队派飞机轰炸黄颡口一带，又令海军鱼雷司令派军舰于江面上堵击。十一日，敌又增派四十四师肖之楚部两个团由黄冈的团风向黄颡口进犯。敌军对当时鄂东南之中心，特委所在地阳新太子庙一带形成了包围圈，形势十分危急。^①

这时，以胡梓为首的鄂东特委（一九三〇年七月根据湖北省委指示，撤销大冶中心县委，成立鄂东特委），立即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当郭汝栋部向太子庙进攻时，我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些游击队，敌我力量悬殊，同敌人硬打硬拼是不行的。为了保存实力，待机歼敌，我警卫连等革命武装保护驻太子庙的党政军机关和革命群众，主动向南撤至三溪口等地。敌人先后占领了太子庙、大小牙山，凤凰山、大王店、潘家桥等地。阳新北部的福丰、金龙两个区也大部失陷。

在三溪口鄂东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以警卫连为基础，把阳新、通山、大冶等县的部分游击队和赤卫队集中起来，建立红七团，由红三军团留下的军事干部刘振山任团长。我军采取突击敌人弱点，夺取武器，以扩充红军实力的战术，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将短枪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特务队，深入白区游击，打击民团，发动群众，牵制敌人兵力，以恢复和巩固苏区。

郭汝栋攻占阳新的太子庙后，率部向南尾追，又占领三溪

^① 《湖北中山报》，1930年12月。

口、沿埠头等地，一直深入到阳新南部的龙港外围。一九三一年一月，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一六一旅，亦由赣北向龙港进攻；郭汝栋部刘公笃旅以该旅第五团留在沿埠头为后防，刘亲率二、三、四团南下夹攻，又侵占了阳新之木石港、龙港及通山的燕厦等地，形成了对我军的包围形势。但是，敌人深入苏区内地，占地甚广，只得分兵把守，从而暴露了战线长、兵力分散的弱点。于是我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打击一路的办法，以增援而来的红十六军一部和当地赤卫队共同阻击南来之郝梦麟部，并在龙港一带牵制敌人的主力，而以红七团为主，配合大批地方武装，于一月三十日夜，乘朦胧月色，悄悄从龙港附近之隐蔽地出发，直趋沿埠头，以袭击敌军后防第五团。天色刚亮，我军进至沿埠头街口，立即发动猛烈进攻。我军的武器多是快枪和梭镖，短兵相接，正好发挥威力；加上四周红旗簇立，群众呐喊助威，号角齐鸣，声势浩大，敌人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纷纷溃败。战斗仅两小时，全歼敌军第五团，当场击毙团长袁帮铃，击伤副旅长一名，生擒民团团长余召台，缴枪二百支，子弹数千发，俘虏士兵二百余人，逮捕反动土豪劣绅五、六十人。①刘公笃见其后防被毁，慌忙率部北撤，我赤卫队乘机反击，红七团又从侧翼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敌受这个打击后，恐慌异常，占据龙(港)燕(厦)三日即行退出。”②至此，敌人对湘鄂赣苏区第一次“围剿”宣告彻底失败。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湘鄂赣边区党领导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是红军巧妙地运用“避实击虚”、“突击敌人弱点”、“集中兵力打击一路”，以及时东时西同敌人打圈子等战术

①② 《鄂东特委来信》，1931年2月12日。

原则的结果，是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和工农群众组织的运输队、担架队等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结果。这次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也使革命武装在反“围剿”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十六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得到了补充，士气高昂，军威大振。军部决定兵分三路，开展游击活动：红七师进驻高安一带，红九师率两个团进驻宜丰、上高一带，军部率九师一个团进驻铜鼓一带。部队一面进行休整、筹款，一面发动赣西北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巩固根据地，发展新苏区。与此同时，鄂东南苏区的党政机关和红七团，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转移至阳新的龙港。

一九三一年初，在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地方武装，根据党的指示，编为三个独立师：以平浏地方武装为基础，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下设两个团，计二千余人，师长邱训民，政委李鄂；以万宜萍及浏阳一部分地方武装为基础，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师，直辖四个大队，枪支一千左右，师长邱金生，政委徐洪；以鄂东南地方武装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郭子明，政委叶金波，下辖三个团，除原红七团外，以沿江游击队和赣北武宁、瑞昌的游击队为基础，以红三军团留下的伤病员为骨干，吸收大批工农群众，组织了红八团和红九团。全师共约二千余人，长短枪一千余支。

红独立一、二、三师的建立，为配合湘鄂赣苏区的主力红军十六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以及巩固和扩大苏区，增强了实力。

第二节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一、万载潭埠战役和红十六军两次攻克铜鼓县城

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惨败以后，经过了四个月的准备，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湘鄂赣三省的敌人，为了配合对中央苏区的“进剿”，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也发动了进攻。他们重新调整和部署了兵力，将原驻湘鄂赣边区的郝梦麟等师调往吉安、吉水，进攻中央苏区。另调刚在中央苏区吃了败仗的谭道源五十师和朱耀华十八师进抵湘鄂赣苏区。谭部驻修水、武宁、铜鼓、奉新、上高、宜丰一带；朱部驻宜春、万载等地。原刘夷旅驻高安、南浔路一带，王东原师驻平江，陶广师驻萍乡，陈光中师驻浏阳。进犯鄂东南苏区的仍是郭汝栋和谢彬两个师。

红十六军自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以后，开始在宜丰、上高、高安、铜鼓一带活动，后游击于平江、浏阳、通城、崇阳各地，做巩固和发展苏区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三月初，红十六军乘敌调防之机，进入江西，攻克了铜鼓县城，县长唐英国逃往修水。这时，敌朱耀华十八师两个团和地主武装，进犯万载潭埠苏区，并断绝交通，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消灭我军主力。湘鄂赣边的党组织首先领导大批游击队，积极向白区发展，沟通苏区与白区的物资交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接着，我军采取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选择了朱耀华部为首战对象。朱部刚在中央苏区吃了败仗，士气低落，地形又不熟。红十六军于是集中七、九两师主力，在潭埠对朱耀华部予以迎头

痛击，经两小时激战，俘敌百余名，缴获步枪二百余支、迫击炮三门、机枪二挺，取得了重大胜利。随后，红十六军与红色地方武装，转至湘赣边境各县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以打击。六月初，我革命武装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鼓舞下，乘机出击。首先在浏阳的官渡击溃了敌陈光中、王东原等部，随后回师江西，在宜春、万载、宜丰、铜鼓一带游击。六月十九日，红十六军再次攻占铜鼓城，县长唐英国只身逃遁。在此期间，敌朱耀华师和刘夷旅虽然也曾侵入苏区，但由于苏区人民坚壁清野，敌军到处找不到粮食和向导，终于被苏区军民击退。

二、通山战役和官埠桥、马桥战役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郭汝栋部发动了对阳新苏区三溪口的侵犯。当时，敌人在鄂东南地区兵力的分布情况是：郭汝栋师四个团驻阳新，两个团驻大冶；谢彬师一个团驻通山；谭道源师一个团驻武宁，一个营驻瑞昌；十四师一个团驻咸宁高桥。郭汝栋奉令从上列各处抽调兵力向三溪口集中。三溪口被围，形势危急。鄂东南特委（一九三一年初，中央指示调整苏区党的组织，鄂东特委改名为鄂东南特委）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红三师的一部分和地方武装相配合，与敌军作战；另一部分红军分散到刚被敌军占领的阳新金龙区、福丰区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时，由红三师派一个营到修水与红十六军取得联系，以便两军互相支援，协同作战。在我军和赤卫队的有力打击下，围攻三溪口的敌人，除郭汝栋部仍不时向阳新苏区骚扰外，其余都各自溃退，^① 苏区大部分被收复。

^① 《鄂东特委来信》，1931年5月12日。

五月底，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湘鄂赣边特区委立即抓住这一有利形势，命令红十六军和红三师紧密配合，主动出击，发起了通山战役和官埠桥、马桥战役。

六月初，谢彬部向通山苏区发动进攻。红十六军和红三师决定合击通山城，捣毁敌人巢穴。红三师星夜从龙港、燕厦赶至通山大畈集中，在大畈举行了誓师大会，然后分三路向通山进攻，同时派一个团埋伏在由通山到咸宁的要道上，以便切断敌军退路。在通山附近与敌激战一天，未分胜负。这时红十六军由通山冷水坪赶到，两军合击，敌军纷纷溃败。我军故意让开一条路，诱敌向咸宁方向退却。敌人果然中计，陷入我军伏击圈，大败而逃。这一战役，活捉敌营长三名，营长以下官兵九百余名，毙伤敌官兵七百余名，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战果辉煌。红军进入通山县城以后，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没收地主、反动富商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

六月十二日，谢彬部又进犯通山的山口，红三师“因敌情不明，触火少许，即退回长安区”^①。红十六军七、九两师，消灭了来犯之先头部队，得枪一百二十余支。十六日，红十六军及红三师分两路进攻咸宁官埠桥、马桥之敌。马桥驻敌约一团，官埠桥驻敌有两营。红十六军七、九两师攻官埠桥，红三师及红十六军第一团攻马桥，两路均获大胜，各缴获步枪三百支上下，共缴获花机关枪十五支、水机关枪两支，驳壳枪三十支，子弹两万余发，毙敌营长一名，俘敌营长二名，还俘敌连长以下官兵三百余名，我军一直逼进咸宁城。^②这是湘鄂赣苏区红军的一次重大胜利。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赣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叶金波同志给阮耕同志并转大冶县苏区的一封信》，1931年7月17日。

第三节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一、红十六军和红一、二、三师各个击破进犯苏区之敌

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以后，仅仅隔了一个月，一九三一年九月间，蒋介石又以其嫡系部队为主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开始，敌军对湘鄂赣苏区采取守势，其兵力分布情况是：谭道源师驻高安、铜鼓和宜丰，朱耀华师驻浏阳，陶广师一部驻萍乡，谢彬师驻通城、通山，郭汝栋师仍驻阳新、大冶。

湘鄂赣边特区委在第二次反“围剿”以后，为了加强红军的力量，继续有力地打击敌人，粉碎新的“围剿”，巩固和扩大苏区，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作出了《秋收斗争计划决议案》，要求各地“提出集中军事力量，坚决消灭苏区敌人，冲破敌人围剿的口号”，要在秋收斗争中，“举行征集红军新兵运动周，在湘鄂赣边特区，应预计征集十万志愿兵到红军中去”，其中还“应征收红军的干部”千百人供给红军，决议还号召群众援助红军的粮食。实现这个计划，就能保证红军的来源和给养，增强红军在反“围剿”中的战斗力。

根据决议案的要求，红军在各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小规模集中作战，各个击破进犯苏区之敌。其中较著名的是阳新玉岭山战役和修水黄坊战役。

玉岭山之役：在官埠桥、马桥战役以后，我军进行了一周的休整。七月下旬，红十六军、红三师及地方武装共两万多人

进驻三溪口、木石港一带，准备集中力量向郭汝栋部进攻。阳新县长张鹏闻讯，忙向武汉行营告急，代主任何成濬急忙命令郭汝栋率领所部四个团向三溪口、白沙铺、木石港三面进犯，又命令武昌、通山的军队支援。我军见三面受敌，便决定集中兵力，攻其虚弱，各个击破。红三师和红十六军便以少部分兵力佯攻阳新北部的鸡笼山，而集中主力攻打木石港的敌二十六师第三团胡荡部。胡荡部被我军包围后，死守工事不出。我军于是召开了军事会议，发动广大指战员出主意。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军佯为撤退，每天派一排人到木石港附近山上去侦察，吹号，诱敌出击。敌人一来，这一排人立即跑入深山，如是者数次。敌人摸不着头脑，找着当地的土豪劣绅了解我军情况。这些土豪劣绅也不知真情，皆言我军主力已经撤退。敌人信以为真，等我们再派一排人去时，便出动一个营紧追，一直追到我军埋伏地——吉山。这时我军伏兵四起，敌知中计，赶忙抢占玉岭山，结果被我军围困，全营被歼，营长也被击毙。胡荡率领余部全力反击，经十余小时的鏖战，又被我军歼灭数百人，胡本人仅以身免。玉岭山战斗，我军缴获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十门，步枪八百余支。在这次战斗中，红七团团长刘振山光荣牺牲，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把木石港区改名为振山区。

玉岭山之役的胜利，给侵犯鄂东南苏区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之残部被全部赶出苏区，广大工农群众欢天喜地，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贫苦的青壮年农民也踊跃参加红军。

黄坊战役：玉岭山战役后，红十六军和红三师继续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消灭地主武装，以巩固和扩大苏区。一九三一年九月，驻修水敌刘夷三十二旅，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另拼凑了一个保安营，侵犯渣津。红十六军即回师修水苏区，

与红独立第二师两千余人，埋伏于马坳、黄坊一带。当敌向渣津进犯行至黄坊时，被我伏兵打个措手不及，死伤惨重。此役共缴获敌步枪四百三十七支，俘敌三百余人。红十六军政治部特为此役发了胜利捷报，并通令嘉奖全体指战员。

二、红军在有利形势下主动出击

正当湘鄂赣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旨意下，东北三省很快沦入敌手。日寇的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这种形势下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还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两广军阀同蒋介石集团已经由武力对峙发展为前哨战。事变一发生，陈济棠、李宗仁等更利用全国的民气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冲突，直接影响到它对湘鄂赣苏区的进攻。在“九·一八”前夕，原驻湘鄂赣边区各县之敌，除少数仍继续对苏区进行骚扰外，一般都退守城镇和交通要道，并有撤退之势。如“平江之敌共有三团退守在城市”，“有全部撤退之势。”“浏敌亦有三团之众，退守浏城、左港、金家塔一带”，“同样有全部撤退之消息。”“万载之敌有一团，宜春之敌亦系一团之众，大部驻扎城市未动。”“阳新之敌只是死守县城未动。”同时，“阳新有一营人之兵变，通山有一连人之兵变。”^①

① 《抓住目前客观环境的转变，加紧进攻敌人，巩固与恢复苏区工作的又一指示——湘鄂赣省委紧急通告第四号》，1931年9月15日。

湘鄂赣省委（一九三一年七月成立）根据上述形势的变化，于九月十五日发出了紧急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抓住目前客观环境的转变，除加紧巩固红军外，还应加紧进攻敌人，消灭地主武装，巩固与恢复苏区。

红十六军和红一、二、三师及各县地方武装，根据省委指示，迅速行动，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歼灭敌人。十月，敌朱耀华十八师的一〇四、一〇五两个团和宜春山田地方团匪，联合进攻万载的茵果苏区。敌军由潭埠方向窜至茵果，占领了茵果桥附近一带山头。红十六军闻讯后，迅即自黄茅经昌集冲赶至茵果，在湘鄂赣红色警卫团、万载县地方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迅速在豫湾至排江一带部署兵力，严阵以待。茵果苏区群众，当即拿起鸟铳、梭镖等武器，配合红军进入阵地。

第二天黎明，战斗打响了。敌人投入了约五千兵力，并以机枪、大炮组成强大的火力，妄想压倒红军。我军约有四千人，十二挺机枪和两门迫击炮，每个战士只有二十五发子弹。我红军战士虽然英勇顽强，但打得的确也很艰苦。正当激烈战斗的紧急关头，红独立一、二师赶来增援，他们象一把锋利的尖刀，从黄茅走芳林迂回至敌人左后侧。敌腹背受击，十分惊慌，便向石脑背且战且退。红十六军乘势进行反攻，自排江插至敌人右后侧，并占领这一带的山头，和红独立一、二师形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圈，控制了敌人由枫林头后撤的退路。我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英勇战斗。有个战士，先后两次只身冲入敌阵，缴获敌机枪两挺，当他第三次冲入敌人阵地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茵果苏区某乡苏维埃主席兼救护队队长谢国平，带领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往返抢运伤员。妇女们也争先恐后地给指战员送茶水。阳德妹等三名妇女，还把自

己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煮成稀饭，在密集的枪弹之下，送到前线给红军战士充饥。群众的积极参战和支援，更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到下午四时，我军将敌压缩在松树坳、石脑背一带狭小的山头上。黄昏时，敌人为了免全军覆灭，从枫林头抄小路，经门江、柏树一带突围，向大桥狼狈逃窜，我军一直追击至陂田的仓前。

这次战役毙伤敌军三百余人，缴步枪三百余支，机枪数挺，罪大恶极、绰号“霉豆腐”的山田地方敌团长，也被击毙。

茵果战斗胜利后，十月十六、十七两日，红十六军和红三师，与敌刘夷部激战于修水之渣津，敌死伤惨重。接着，红十六军于十一月初，由武宁的辽田经黄连洞挺进到阳新之龙港、通山之燕厦，打击敌军和地主武装，连获五次大的胜利。第一次是十一月十五日，我军转入武宁，猛攻武宁之横路，消灭了敌独立第三十二旅的一个营，缴枪一百三十余支。第二次是二十日在通山的大畈，消灭了谢彬师四个营，缴枪三百余支，机枪两挺。第三次是十二月六日到十日，打垮袁英师两个团，缴枪一百九十余支。第四次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阳新的刘星湾，全歼郭汝栋两个营及一个保安大队，缴枪三百七十五支。最后，在江西瑞昌消灭了两个顽固的土围子，取得了第五次战斗的胜利。^①

上述各次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而且恢复和发展了鄂东纵横百余里的苏区，革命武装迅速发展，湘鄂赣根据地也空前巩固和壮大。

^① 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11日。

三、革命武装的壮大和省军区的建立

随着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湘鄂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以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迅速地获得发展壮大，战斗力大为提高。我军自一九三〇年夏到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止，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增加长短枪三千五百余支。到一九三二年二月，全省主力红军由原来的二千五百人增至七千五百人。七月，又猛增至一万五千余人，六千五百多支枪。到一九三三年春，扩大为二万多人。

为了便于对全省革命武装的统一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九三一年夏成立了湘鄂赣省总指挥部，总指挥孔荷宠，政治委员黄志竞。总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部：宜萍浏万为南路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一师；修平铜通为东路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二师；鄂东南为北路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三师。^①红十六军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由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指挥，部长杨幼麟。到一九三二年春，成立了湘鄂赣省军区，红十六军由省军区指挥。军区司令员孔荷宠，政委由林瑞笙兼，政治部主任刘学昊，参谋长严图阁。^②

同年秋，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增强主力红军的力量，将红军独立第三师编入红十六军。一九三三年二月，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师编为红十八军，军长严图阁，政委徐洪。

红三师编入红十六军后，为了加强鄂东南地方武装的力量，鄂东南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地方游击队编成警卫团，共辖四个营，每营用快枪装备两个连，用梭镖和土制炸弹装备一个连，经常

① 《湘鄂赣省苏对全省选民的工作报告》，1932年4月。

② 李宗白：《关于湘鄂赣省的工作报告与过去所犯的错误及其责任》，1932年。

在各驻地袭敌、扰敌，收缴豪绅地主武装，发动与帮助广大劳苦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这支队伍平时由各驻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指挥，如需要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时，则由团部命令集合统一指挥。

鄂东南地区的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在不断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壮大。到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扩大三倍以上，约三、四千人，警卫团和地方武装扩大一倍以上。^①这时，鄂东南道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警卫团改编为新的红军独立第三师。五月八日，部队在龙港正式改编，由张涛任师长，叶金波任政委。红三师的重建，为保卫和建设鄂东南苏区，增加了一支新的武装力量。广大工农群众热烈地举行了庆祝大会，既表彰老红三师过去所建立的功勋，又真诚地预祝新红三师在尔后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① 《中共鄂东南道委常委扩大会议决议案》，1932年4月。

第七章 湘鄂赣苏区的军事建设

第一节 苏区革命武装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湘鄂赣边区革命武装力量的来源：一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平、浏、修、铜、万等地农民暴动的群众武装和鄂南秋收起义的群众武装；二是平江起义和大冶兵暴等武装部队；三是特委恢复后边界各县不断建立起来的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是从战争中俘虏或投诚过来的白军士兵。

平江起义时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三个团，共二千多人。不久，改编为五个纵队。在土地革命初期农村暴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赤卫队，绝大多数加入了这支队伍。平江起义后，在湘鄂赣边特委以及后来的湘鄂赣省委领导下，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独立团（营）等武装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发展，出现了全民军事化的景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了正规红军。一九二九年七月，阳新、大冶等县的游击队合编为十二军，共数百人，长短枪百余支。同年冬，平、浏、修、铜、万等县的游击队合编为湘鄂赣边区独立团，后来又扩编为独立师。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然后红五军、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共一万七千余人。同年秋，在边区独立师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下辖七、九两师。一九三一年初，在湘鄂赣边区各县工农革命武装发展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以后，第三师加入红十六军，第一、第二师合编为红十八军。至此，湘鄂赣边区的正规红军已经发展壮大为了一支可观的队伍了。

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二是游击队；三是地方独立师、团、营。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军事组织，是全民武装的基础，是正规红军的后备军。赤卫队由二十四岁到四十岁的男女劳苦群众组成，分常备队、预备队两种，县有纵队，区有大队，乡有中队。每中队分三个分队，每分队十至十三人。主要任务是：警戒、放哨、送信、转送伤病员、运粮草弹药、维护地方治安、管制地主豪绅以及配合红军、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等。少年先锋队由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男女劳苦群众组成。县有纵队，区有大队，乡有中队，村有分队。每大队下分三个中队，每中队下分三个分队，每分队三十至四十人不等。其活动由共青团领导，任务与赤卫队基本相同。一九三〇年春，湘鄂赣苏区依据苏区地方军事会议的决定，又将“纠察队、赤卫队、少先队中最积极坚决强壮并志愿的成份都编入赤卫军或游击队”。^①稍后，又将少年先锋队、赤卫队、赤卫军中的优秀队员单独编成赤卫模

① 《中共鄂东南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1931年8月14日鄂东南特委扩大会通过。

范营和模范少先队，作为地方武装的基干队伍。

游击队一般流动性比较大，参加军事活动比较多。随着湘鄂赣苏区的扩大，游击队的任务和编制训练也有所变化。根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湘鄂赣省委将游击队按其任务不同，分为：边区游击队和挺进游击队。边区游击队通常是由赤卫模范营和模范少先队所组成。其任务是：发动苏区附近的白区工农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瓦解白军的兵运工作，消灭地主武装，侦察敌情，保卫和扩大苏区。挺进游击队通常是由红色独立团、营所组成。其任务是：深入敌后交通要道开展游击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截夺敌人辎重，牵制进攻苏区的敌人；深入白区筹款和采购物资，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向白区群众和白军士兵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苏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发动白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白军士兵运动。

湘鄂赣苏区还有红军独立团、独立师。这些地方红军，都是在工农群众武装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师的编制和正规红军一样，设有师长、政委，下辖团或大队。它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保卫和扩大苏区。其中有的编入了正规红军十六军和十八军，有的一直坚持和红十六军并肩战斗，如红三师。此外，各县还有担任保卫地方苏维埃政权任务的警卫团、营、连等武装。这些也属于地方红军。

以上情况说明，湘鄂赣苏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全民动员的程度，它由正规红军、地方红军、独立营（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所组成，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等群众性武装相结合的工农武装体制。它的发展壮大，是经由赤卫队、游击队到地方红军，再发展为正规红军这条路线的。

部队的成分，“农民占大多数”；^①部队的武器，主要是从敌人的手中夺来的。它实质上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

第二节 苏区军事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工作

湘鄂赣边区的革命武装，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建军思想建设起来的。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五军，一开始就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湘赣边区紧密配合，共同战斗。随后，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一九三〇年八月两个军团在浏阳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统一领导。后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红十六军和红独立一、二、三师，又是在红五军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历史原因，使毛泽东、朱德的建军思想不断在湘鄂赣边区的武装力量中得到贯彻。

在建设革命武装的过程中，湘鄂赣边区党组织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证党对革命武装的绝对领导

在革命武装力量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不断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

在红军创建初期，湘鄂赣边特委虽然注意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有党代表的委派”，^②但由于缺乏经验，党代表所做的多是“不关于政治的工作”。^③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特委为了加强党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1929年10月。

^{②③}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1929年8月3日。

对红军的领导，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特决定采取如下办法：（1）在红军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支队组织党的支队委员会，属边特指挥，支队部组织党小组，属支委指挥；纵队组织党的纵队委员会，纵队部及大队部组织党小组，属纵委指挥；中队组织党支部干事会；分队组织党小组。（2）红军中的党组织应特别注意小组会议，至少每周一次。会议中须认真讨论党的总路线、各种决议和通告，以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3）将红军中表现积极的有觉悟的勇敢的指战员吸收到党内来，以巩固党的基础。另外，还规定：“支队部、纵队部、中队部各设政治委员一人，经常的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除向当地群众做宣传工作外，对士兵每日至少须用（有）一小时的政治训练”。①

湘鄂赣边区红军执行上述决定的结果，既在实践中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提高了红军战士的政策水平和政治水平，又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落实到了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成立后，建立了中共第五军军事委员会，邓萍、滕代远等先后任军委书记。军委下辖各纵队，纵队设党委，各大队设党支部，各中队设党小组。② 一九二九年十月，全军约三千人，其中“党员约六百”③，占全军人数的百分之二十。红十六军成立后，也设立了党的军委，但由于当时人才缺乏，约从一九三一年七月起，才开始“实行政治委员制”。④ 红十六军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三分之二的连队，有政治指导员。据一九三

①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1929年8月3日。

② 王首道：《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四号，1929年12月2日。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1929年10月。

④ 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11日。

二年一月份统计，红十六军中有党员一千三百一十二人。^①《鄂东特委报告》说：“红三师党的组织有党员三百之谱。每连一个支部，全团有团（党）委，团（党）委指挥各支部的工作。各支部委员会……指导员帮助政治委员的工作，连支部工作颇好”。游击队和赤卫队也是在同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

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红军中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加强对战士和群众的思想教育。军队中设有政治机关和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连有政治指导员，团以上有政治委员；军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处，管理日常的政治教育工作。红十六军政治部出版了《红军实话》和《工农小报》两种刊物，为下级提供了政治教育的材料。党还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了青年团和列宁室。青年团通过团小组对广大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列宁室设有识字小组、墙报组和各种研究组等。配合党的工作，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在红十六军中，识字小组遍及各连，很多青年自动参加学习，效果显著。列宁室还发挥另一种作用，即新兵入队时，由列宁室召开军人大会欢迎，帮助新战士工作，使他们深感革命队伍的温暖。红十六军的政治思想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九团中党、团员的十之八、九，一、七团中党团员的半数，都能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②，游击队和赤卫队，也都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争夺群众”，“使千百万群

^{①②} 邓乾元：1932年9月11日《关于红十六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决定，红十六军第七师改称第一团，第九师改称第七团，独立第三师改称第九团。

众团结到党的周围”，^①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湘鄂赣边区的红军，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了多种方式，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取得了很好的经验。红军每到一处，首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继则将没收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如遇群众担心红军走后遭受豪绅屠杀而不肯接受时，则派宣传员进行个别教育，说明红军的主张和群众团结起来斗争才有力量等道理，并要他们晚间去搬运粮食和财物，解除他们的顾虑；对于个别胆小怕事的群众，则主动将豪绅的财物送到他们家中。同时，从群众中挑选一些勇敢的先进分子，进行秘密活动，组织工会和农会。红军初到一地时，往往遇到群众因受反动派的谣言蛊惑而群起逃避的情况，我军则先找老弱妇女谈话，劝他们动员亲属回家。然后再派宣传队到附近山林中喊话，有时甚至进山捕捉。被捕的群众无论何人，即使是挨户团或靖卫团的团丁，都不加责难，只予劝导，宣传党的政策，令其回家。对于俘虏的敌方士兵，也给予宽待。“这种事实的宣传已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已揭破敌人的欺骗（“见人就杀”），获益甚大！”^②

三、红军的群众工作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中明确规定：“边境的红军，主要的任务，是要应群众之要求，消灭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帮助群众发展斗争，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同年十二月二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四号再次规定，红军除打仗以外，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斗争”。遵照党的指示，红军经常在战斗间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1929年10月。

隙中或战斗胜利后，深入白区打土豪，把粮食财物分给群众，宣传并组织群众。红军开展宣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1）文字宣传品，如宣言、小传单、小册子、画报、标语、歌谣、告工农群众书等。（2）讲演，如集会讲演和个别谈话等。（3）游艺，如化装表演。（4）在斗争中宣传，如对敌方士兵谈话、呼口号、唱歌等。”^①一九三二年初，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红十六军一、九两团自三月六日至四月八日分布在修水之官墩、程坊、蒲口、沙垅、卢场一带做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分配了土地，建立了七个乡苏维埃政府，两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团体，还组织了少先队、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拥有二十五支枪的一支游击队。红十六军政委邓乾元总结这段工作时说：“在这次工作中，我看到十六军的战斗员作群众工作是非常积极的，所以能在最短的期间内，获得建立纵二十里横三十里的新苏区。”^②

四、建立士兵委员会，军内实行民主制度

红军中完全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湘鄂赣边区的红军，在创建过程中曾发生极端民主化和官长打骂士兵等军阀作风的错误倾向。通过红军各级党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军内的民主生活后，这些不良作风都不断地得到纠正。红军中废除了旧军队的封建习气与等级制度，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官长只在指挥上和训练上负责。在物质生活菲薄、战斗十分频繁的情况下，红军废除了薪饷制度，上自军长、师长，

^① 王首道：《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四号，1929年12月2日。

^② 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11日。

下至战士，都过着同样的生活。部队的支队部、各纵队、各中队，均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上级士兵委员会指挥下级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中队士兵委员会指挥全中队士兵的工作。士兵委员会代表战士的利益，管理红军生活问题，保证与监督官兵在经济上一律平等，还在“训练士兵、惩罚士兵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①中，发挥其作用。士兵委员会的组织是彭德怀创立的。早在北伐时，彭德怀在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第一师中就秘密成立了士兵会。一九二七年初，士兵会公开建立。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五军，承袭了这一制度，并加以改造，在红军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后来它被推广到边区的革命武装之中。

五、实行正确的培训制度和提拔干部的政策

随着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湘鄂赣边区的党组织深感领导干部奇缺，特别是军事人材不足。一九三〇年五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开赴鄂东南时，提议创办一所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鄂东南特委遂于这年冬在阳新龙港肖家祠创办了一所红军军事学校。为了纪念彭湃、杨殷^②二烈士，这所学校命名为“彭杨学校”，校长张涛。该校学员是红军中排级以上的干部和部分优秀战士及赤卫队、游击队的班长、小队长。学习期限根据革命战争需要及当时的环境情况而定，三个月、六个月乃至十个月不等。学校按军事编制分为军事、机炮、步兵三个大队，

①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1929年8月3日。

② 杨殷：广东中山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8月在上海被捕，3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

每期学员二百至五百人。学习内容一是政治课，二是军事课，三是文化课。另外，还编有《红军步兵新教范》、《野外笔记》等讲义，供学员学习。彭杨学校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基本停办。一九三三年，敌人进占龙港，彭杨学校改为随营学校，共有学员六百余人，校长鲁连。一九三四年冬，因敌人进攻苏区日趋严重，随营学校又改为教导队。在短短的几年中，这所学校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为地方武装输送了许多好干部。这些同志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在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战争中，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一九三二年，湘鄂赣省军区还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第五分校，校长高咏生，政委李楚屏。学员有八、九百人，按军事编制分为政治、步兵、炮兵三个大队。学习期限一般为六个月，先后共办了三期。后因战争频繁，斗争环境恶劣，改为教导队，随红十六军行动。

湘鄂赣边区的党组织除开办军事学校，专门培训干部外，在红十六军中还采用两种办法培养干部：第一，对党政军各级所需的干部都实行按级准备的制度。对于选定的候补者，先由各级负责人施以特定内容的教育，再给予党、团领导工作的实际锻炼，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威信；第二，设政治训练班及教育队等专门造就干部的机关。这两种培训干部的方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提拔干部问题上，红十六军提拔连指导员，开始是以能识字、有较熟练的军事常识为主要条件。后来从工作实践中得到了教训，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工农出身的战斗员身上，提拔这样的战斗员。对于地方输送的干部，则强调要在地方上受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方能接收。关于部队的成份，据红十六军政委邓乾元一九三二年一月份的统计，

红十六军第一团和第九团中，贫农出身的战士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七团占百分之八十。^①

六、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湘鄂赣边区红军在创建过程中，在同敌军多次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是游击战的）一套战略战术原则。

（1）打圈子战术。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我军“想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的声威”，结果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适得其反”^②。吃一堑，长一智。我军撤出平江后，即运用游击战术，于一九二八年八月攻占修水城。当大批敌军向修水“进剿”时，我军便主动撤出修水城，转向铜鼓游击，使敌扑空。敌尾追而来，我军又返回平江东乡一带，开展游击战。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打圈子战术（敌称之为盘旋战术），终于把“会剿”我军的十余团敌军拖垮。从此，我军坚持在湘鄂赣边界，“以地形的熟悉，善于潜伏的游击战争”，与敌周旋，“常能出奇制胜”^③。

（2）分兵与集兵。当敌军严重进攻时，我军常“采用‘化整为零’的计划，到乡村分散游击”^④的分兵战术。但有时也集中一部分兵力，到非割据区域游击。不过这种“集中”只是为了深入白区筹款和发动白区群众斗争而使用的战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宜于集兵，集兵与分兵又应以多少为好，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军战斗经验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得到了解决。一九二

① 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11日。

② 彭德怀：《往事回忆》，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③ 王首道：《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4号，1929年12月2日。

④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1929年8月3日。

九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指出，在环境较好的时候，宜迅速集中部队，进占政治经济中心地点，扩大红军宣传，加紧群众组织，增进革命势力与政治影响；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应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过大则行动不敏捷，难免不遭意外的硬战，过小则遇挨户团、靖卫队都难以对付，只能在赤区内做打埋伏的工作，难于到白区发动群众。红军的分兵一般以三、四十人枪为宜，其势力可战胜挨户团，可抵御一、两个连的敌军。在敌人“进剿”时，可乘间隙插入敌后，击其虚弱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敌军如分散追来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总之，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兵与分兵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只采用某一种方式。到同年十二月，红五军经常以一个纵队为游击单位，每遇军阀战争、敌人动摇时，则迅速集兵向地主武装进攻，并以此壮大自己的队伍。红五军的四、五纵队，经常运用这种方法，取得辉煌战果。

(3) 避实就虚，专打弱敌(或打其一路)。一九二九年红军和敌军作战中，已经运用了“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击虚、专打小敌”^①的战术。到一九三〇年以后，敌人连续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了多次“围剿”，每次“围剿”，往往调集多路兵力，凭借这种优势兵力和先进武器装备，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我军适应当时的形势，在战争中学会了集中优势兵力，攻敌弱点，打其一路，各个击破的战术。如一九三一年三月敌人调集六个师两个旅的兵力，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1929年10月。

我军就是采用这种战术，集中了红十六军七、九两师的主力，选择了敌军中刚从中央苏区吃了败仗而来、士气低落、地形不熟的朱耀华师的两个团为首战对象，在万载潭埠予以迎头痛击，获得了俘敌百余名，缴枪二百余支的重大胜利。

(4) 正规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行人民战争是红军战略战术原则中最根本的原则。湘鄂赣边区的红军从建立之日起，始终重视武装工农的问题。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多次的决议中，都号召边区的人民群众，实行全民军事化。根据地的人民，是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毛泽东说：“敌人视为畏途，主要的也在这一点。”^①在战场上，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一九三〇年底，敌人以郭汝栋师为主，配有新编第十师谢彬部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发动了对大冶、阳新苏区的进攻。我军避敌主力，向后撤退，敌人连续占领了阳新的太子庙、三溪口、木石港、龙港等许多地方。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底，我红十六军一部与地方武装红七团以及大批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相配合，出其不意地打击敌后沿埠头的一个团，战斗仅两小时，即全歼该团。这一胜利，就是实行人民战争的结果。

湘鄂赣苏区红军在多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运用上述战略战术原则，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巩固了；工农革命武装发展了，壮大了。但是，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以后，由于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集中全部红军，同敌人打硬仗，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使红军既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又日益丧失自己的有生力量。红十六军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和红三师都因此遭到惨重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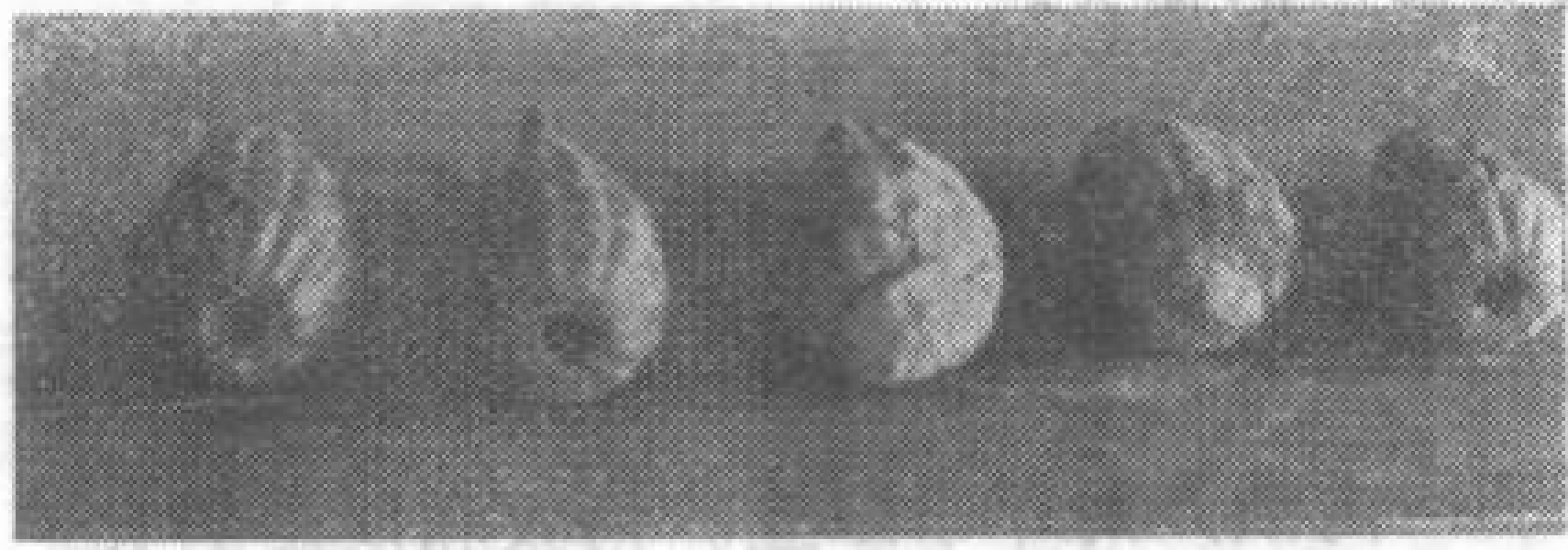
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好后勤工作

关于革命武装的军械、军需等物资的供应，“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①在这个前提下，限于当时的条件，湘鄂赣苏区自己也建设了若干小型的军事工业和其他事业。

红军兵工厂：一九二九年鄂东南游击队成立后，由胡兆丰、向士俊领导，在游击队中挑选出原在汉阳兵工厂工作的三名技术工人，又吸收了其他几名工人，共十余人，设立了一个修械所。到一九三〇年，工人增加至八十余人，遂改名为鄂东南兵工厂。一九三一年，成立了湘鄂赣兵工厂，共有工人一百六十余人。一九三二年，在平江黄金洞栗山建立了枪械局，共有职工一百七十余人。该局的任务主要是修理大炮、机枪、步枪等武器，其次是制造弹药。浏阳、醴陵等县红军部分枪械的修理和弹药供应也由该局担负。一九三三年，上述两厂一局合并为湘鄂赣兵工厂，厂址设在黄金洞。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湘鄂赣省委先后将该厂分为四个分厂，共有工人一千五百余人，其中纠察队一百六十四人，担任保卫兵工厂的工作；运输队一百四十八人，担任枪械、弹药的运输工作。

湘鄂赣兵工厂在长期残酷的游击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部分地保证了苏区工农革命武装枪械的修理和弹药的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供应，支援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培养了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为发展苏区的军事工业奠定了基础。

湖北阳新县红色兵工厂制造的炸弹。

基础。在红军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以后，它跟随部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兵工厂厂长胡兆丰，政委向士俊，在兵工建设上立下了功勋。

红军被服厂：一九三〇年在龙港成立了鄂东南被服厂，有职工八十余人、缝纫机十余台、染坊一个。其主要任务是为红军生产军服、军帽和军被。厂内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十天定一次生产任务，对超产者按超产数发给奖金。厂内有党、团、工会组织，还设立了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阅览室，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娱活动都开展得十分活跃。

一九三〇年八月，在平江嘉义建立了红十六军被服厂，同年十二月迁至黄金洞烂泥湖。该厂有二十部缝纫机、五十余名职工，平均每人每天可生产棉衣两件，全厂每天生产一百多件。一九三二年，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该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迁至万载的小源，一部分仍留黄金洞。直到一九三五年，才被敌人破坏停办。

红军医院：湘鄂赣边区先后建立了四所红军医院，可容纳伤病员四千余人。一九三〇年在平江的徐家洞建立了红色第三医院，不久，迁至黄金洞。全院有医师和工作人员二百余人，院下设六个诊所，可容纳一千多名伤病员。一九三二年，在该院附近又设立了一个制药厂，采用中草药，提炼和制成一百多种

中药成品，部分地解决了缺药的困难。一九三一年春，还设立了一所鄂东南红军总医院，附设五个分所和一个手术室，分所分布在五个自然村，每个分所有医护人员二十余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该院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动手，勤俭办院，在简陋的民房里施行手术，以门板做病床，自采自制中草药，搜集民间药方，运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为伤病员治病。在两年的时间里，该院治愈了一千多名伤病员，使他们重返前线。

第八章 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

第一节 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和党的建设

一、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各县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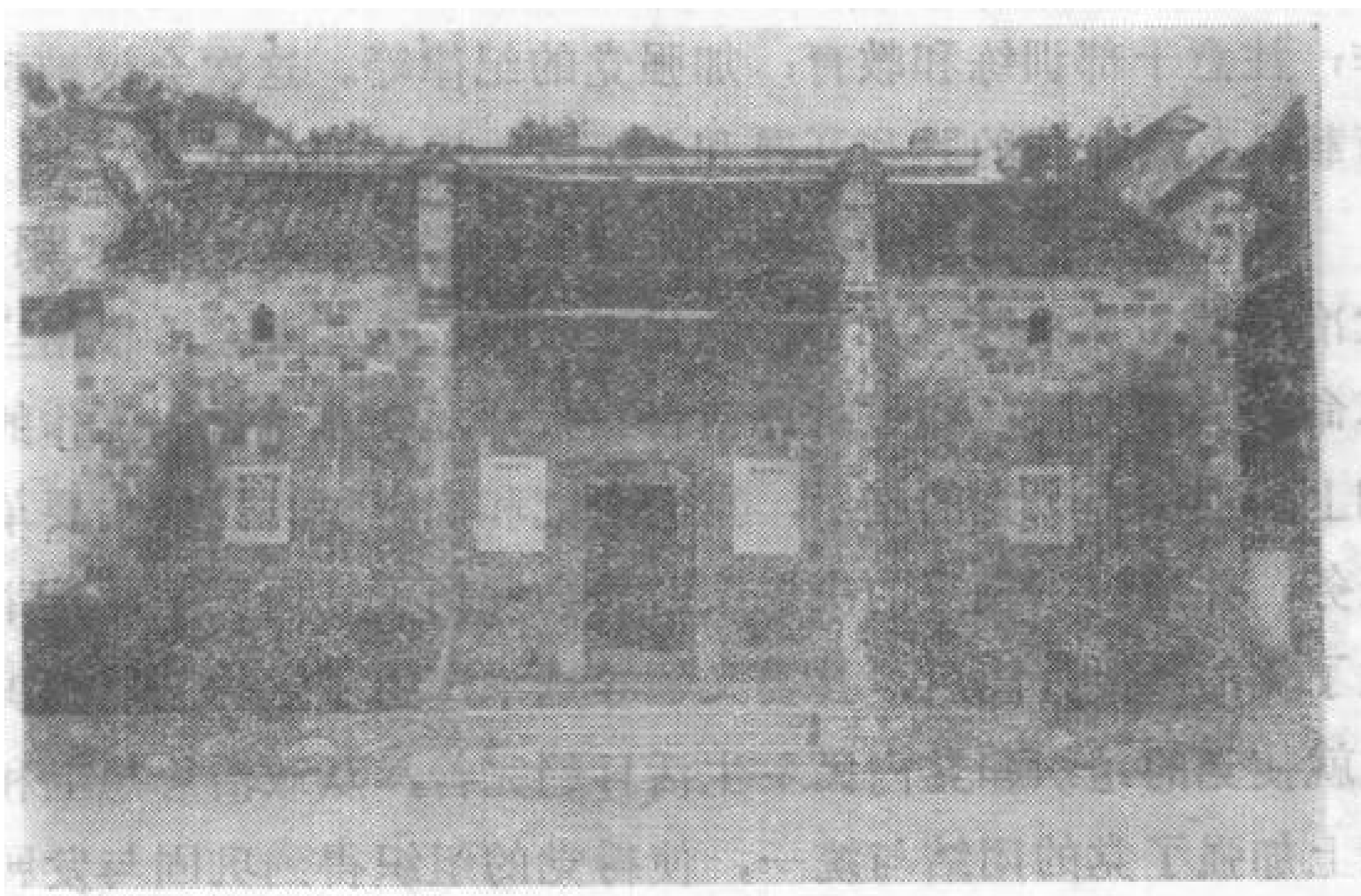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湖南省委常委第三次会议曾通过决议，“取消湘鄂赣特委的组织，边境各县由省委直接指挥”。事实上，湘鄂赣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并没有变动。一九三〇年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湖南省委又决定取消湘赣边特委，成立湘东特委，以平江县委兼湘北特委，使湘北工作向中心城市发展。到八月二十五日，在立三路线影响下，苏区党、团、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行委成立后，由于各方面工作失调，失掉了领导中心。不久，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被破坏，湘鄂赣苏区便由湖南省委办事处（简称“湘委办事处”）^①领导。到一九三一年三月，根据中央巡视员滕代远的意见，湘鄂赣苏区党的领导机构改为湘鄂赣边特区党委。

湘鄂赣边党组织非常注意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到一九

^① 据张启龙1982年5月回忆，湘委办事处由刘建中、李宗白、张启龙、李梦弼等组成。

三一年，党在每一个县、区的苏维埃区域内，都建立了党的县委、区委，在湖南的长沙及江西的德安、上高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共计建立了二十余个县委和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关。党员约四万以上，其中平、浏各有党员三千，修、万各有四千，铜、宜（萍）各有一千五百左右，鄂东之阳新、大冶、通山、武宁、瑞昌等县共约二万五千以上，鄂南之蒲圻、嘉鱼、崇阳共六百左右，通城、宜丰各有五百上下，在赣北、湘北之白区共有党员三百左右，此外，红军中有党员一千四百左右。党员成分：贫农占百分之六十，纸工、雇农占百分之二十，中农占百分之十五。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党员发展到约五万人。其中湘东北有六千余人，赣西北有一万四千余人，鄂东南有三万人左右。

苏区的许多县委，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和部署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在各项革命工作中的战斗作用，在



阳新龙港中共鄂东南特委旧址

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间，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

一九三〇年五月，万载临时县委在王寨张家屋召开了全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万载县委，书记辛克明。大会通过了中共万载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等。《政治决议案》规定目前党的总路线是：加紧争取群众，团结并集中工农兵劳苦群众的一切革命力量，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地方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取得边境总暴动的胜利。为了贯彻这条总路线，《决议》规定农村斗争应以发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与组织地方暴动为中心策略；职工运动应以发动工人独立斗争，由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政治罢工和示威运动为中心策略。在《组织决议案》中，对万载党的组织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了党组织的进步、弱点以及还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对目前党组织的任务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巩固党组织和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城市工作；建立和加强支部生活；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加紧巡视工作；注意干部训练和教育；加强党的纪律等。这次会议推动了万载县革命斗争的胜利开展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在此前后，湘鄂赣苏区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阳新、大冶等县，都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这些大会，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重新研究和确定了各县的主要革命任务，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大会发扬了党内民主，选举产生了党的县委；随后，县委又领导选举产生了党的基层组织。这就使党的组织和党内民主生活日趋完善，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党的团结与统一，使得党的组织得到巩固与发展。

二、苏区党的建设

随着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党的建设问题,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曾强调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要使党组织有力量和政策不错误,必须十分重视和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当时,苏区党的建设,主要是解决在“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②的情况下,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苏区党组织是着重在下列两方面来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力量的。

(一) 党的思想建设

湘鄂赣边区各县在斗争初期,党内存在着许多错误的倾向和一些性质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万载党内曾发生过自首叛党的事件;平江党内“尚存在着失败的情绪和畏惧的倾向,尚不能积极领导群众斗争”;有的党组织纪律松弛,自由行动;惩办主义普遍存在,有时甚至轻易杀人。后来,由于战争频繁、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对党员思想教育的不足,党内又出现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如盲动主义的残余、极端民主化、地方观念、派别意气之争、腐化堕落和严重的个人主义,等等。不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党就不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革命根据地也就得不到巩固和发展。为此,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以及后来成立的湘鄂赣省委,为了把绝大多数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特别加强了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其主要内容是: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②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1.加强政治形势与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特委经常将特委通告、政治消息、特委告同志书、特委对各县工作决议案、特委对各级党组织的日常通讯及个别问题的指示等，发给各级党组织，要求各级党组织的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和讨论。这样执行的结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县“党员已开始讨论党的政策，对于盲动主义的错误，已能自觉纠正”。^①

2.加强党的政治理论教育。特委及各县委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一是开办训练班和党校。“调各级同志到训练班来，施以短期的训练”，^②把政治形势、党的策略、组织问题和宣传问题等，交给同志们讨论。一九三二年七月，湘鄂赣临时省委克服许多困难办了第一期党校，为红十六军、省委巡视团及区级苏维埃政权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③有的县也办了党校。二是创办各种刊物。特委出版了《工农兵》、《斗争》等不定期刊物，作为宣传教育材料。苏区各县党的组织也办有自己的刊物。经过政治理论教育，党员政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平、浏同志已认识革命理论的重要，干部人才能从斗争中学习革命理论，并较前日有进步”。^④

3.加强军事教育，实现全党军事化。特委把对全党的军事教育，列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经常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所有党员除参加红军外，都编入地方革命武装，投入对敌斗争，经受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坚定革命意志，增强革命信心。

① 王首道：《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四号，1929年12月2日。

② 《中共湖南省委给湘鄂赣特委的信》，1929年12月30日。

③ 胡筠：《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第一期党校的总结》，载《红旗》第十二期，1932年7月24日。

④ 王首道：《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四号，1929年12月2日。

各级党组织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这是湘鄂赣边区党组织在极端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能够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和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以后，党内进行过几次思想斗争。本来，党内的思想斗争，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党的团结和统一不仅毫无妨碍，而且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省委在这几次的党内斗争中，由于受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却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惩办方式，用简单的办法代替了党的思想教育，其效果适得其反。这是湘鄂赣省党组织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一大错误。

（二）党的组织建设

湘鄂赣边区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进行了下列工作：

1. 不断纯洁党的组织。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边区各县开始发展党员时，是以下列三条为标准的：一是家庭的经济地位；二是阶级觉悟与对党的认识；三是工作能力及政治表现。^①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各县发展党员注意质量不够，除大多数是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成份多系贫苦农民外，也混入了小地主、富农及流氓分子等；在党组织大发展的时候，许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也被吸收到党内；如一九二八年“平、浏苏维埃区域滥收党员至七万余人，使党的组织事实上变成了农民协会”。^②针对这种情况，特委遵照上级指示，于一九二九年进行了整顿党组织的工作，将一些混入党内的小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等，开除出党。对于自首自新分子，特

①、②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关于苏维埃问题与任务及农民经济、红军党务问题》，1929年9月5日。

委规定，一定要在新的革命斗争中表现非常坚决勇敢，已经成为群众中新的积极分子，洗刷了过去的污点，才可以重新入党，而且需有较长的候补期。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在省委的领导下，苏区的各级党组织又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成分改造和整顿，洗刷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使党员在阶级成分上来了一个大转变。在多次的洗刷和整顿过程中，有的地方曾发生了一些偏差。如一九二九年平江、浏阳“竟将七万余党员清洗至一万余人”。^①一九三一年八月，阳新、大冶、通山、武宁、瑞昌等县，只注意洗刷党的不良分子，没有同时注意发展新党员，以及单纯强调成份等，致使党员数量锐减，给党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2. 建立产业支部。边区各县的党组织中，工人党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党员占极少数。为了适当改变这种状况，边区特委积极地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产业支部。并且吸收优秀的工人党员参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工作。

3. 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首先选拔了一批有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充实各中心县委、县委和区委。其次，注意在实际斗争中提拔新的、优秀的工农分子到党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工作，分配他们经常性的任务，事先作详细的指导，事后有严格的检查。与此同时，加强支部组织生活，把重要的政治问题和革命斗争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提交支部讨论，以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4. 建立党的巡视工作制度。边区各县不少党员干部政治水平不高，工作经验不足，开展工作有困难。特委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建立了党的巡视工作制度，经常派巡视员下去观察了解

^①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关于苏维埃问题与任务及农民经济、红军党务问题》，1929年9月5日。

干部、党组织和群众的实际情形，传达上级党委的决议、指示，与地方党组织共同研究，制定工作计划，指导地方工作。

5. 新党员实行候补期制度。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边区党组织除规定有的知识分子入党有候补期外，一般没有候补期。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后，湘鄂赣省委规定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雇农入党没有候补期；贫农入党候补期为两个月；独立劳动者（即做手艺的）、中农以及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入党，候补期为六个月；不属于上列三项的，入党的候补期可以按照特殊情形延长到一年或两年。候补党员候补期满时，必须办理转正手续，经支部大会讨论。如不能转为正式党员时，则按情形延长其候补期。候补党员不举行入党仪式和填写入党登记表，等到转为正式党员时，才办理这些手续。候补期制度的实行，对保证苏区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6. 深入白区和白军中建立与发展党的秘密组织。湘鄂赣边特委和省委把发展白区和白军中党的秘密组织，看成是发展和巩固苏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做好这项工作，不但能为我军掌握敌情、分化瓦解敌军以及粉碎敌人的进犯提供有利条件，而且能给苏区以各种物资的支援，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此，苏区经常开办训练班，挑选强有力的干部，经过短期训练，利用各种关系，派往白区和白军中工作，秘密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及其他群众团体，一俟条件成熟，即发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创建新的苏区。

湘鄂赣边区的党组织，由于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重视了党的建设，因而在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政治上逐渐成熟，组织上也日趋巩固。尽管曾经执行过“左”倾路线，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十年之久的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边区

党组织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领导湘鄂赣边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湘鄂赣边界建立了拥有二十余县（全盛时期）的大片革命根据地，摸索和积累了不少党的建设、军事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培养了象李宗白、陈寿昌、徐彦刚、赖汝樵、胡梓、高咏生、严图阁等大批优秀干部，成绩是显著的，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二节 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第一、二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湘鄂赣省委的成立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湘鄂赣特区委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了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李宗白、赖汝樵、胡梓、杨幼麟、孔荷宠、杨琦、于兆龙、汤昭、刘建中、张启龙、黄志竞等为省委委员，李宗白为书记，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赣省委，属苏区中央局领导。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各项工作决议案^①，内容为：发展组织，加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巩固和扩大红军，促进革命运动的新高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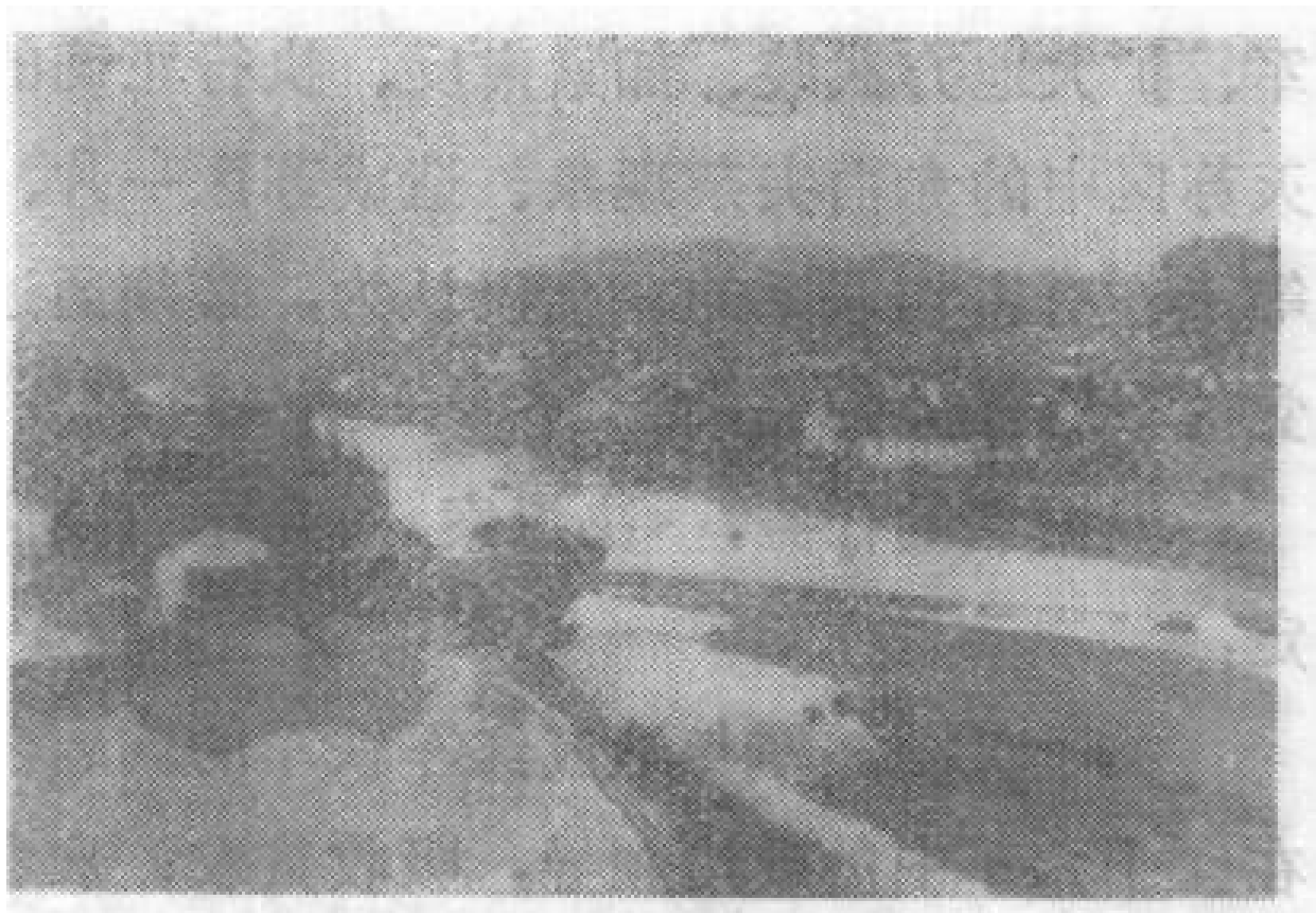
省党员代表大会以后，湘鄂赣苏区的各级党组织，纷纷举行会议，贯彻大会精神。一九三一年八月，鄂东南特委在龙港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六月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及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

^① 关于湘鄂赣苏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文件，我们至今尚未见到。

大会的决议。会议通过了《中共鄂东南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决议虽然强调“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强调“绝对反对分给豪绅地主反动家属宗教徒等以任何土地”，强调中心城市工作等，但在其他很多重要方面，如对于巩固与扩大苏区、武装工农、扩大红军、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都作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决定，并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特委书记胡梓调任省委工作，便改造了特委，由方步舟任书记，委员有刘海山、王应田、叶金波、吴干等。会后不久，鄂东南特委所辖范围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二、第一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省委成立后，于同年八月，在中央巡视员黄火青的指导下，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在湘鄂赣苏区贯彻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讨论了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等问题，通过了《湘鄂赣省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由于党中央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以后已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因而湘鄂赣省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也受了一



浏阳东门，湘鄂赣省委曾在此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定的“左”的影响。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决议案》认为，在英、日、美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的军阀战争将成为政治生活上的中心问题。因为“这种战争将要由局部开始，扩大到全国范围，牵动全国的政治生活”，所以，“统治阶级是在日益崩溃和死亡”。这样就夸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危机。但《决议案》同时指出，无论何时，统治阶级对革命势力的进攻，仍是主要的问题和最主要的危险，如果谁否认这一点，则是错误的。

根据对形势的上述认识，会议确定湘鄂赣省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团结和依靠赤区群众，发动和争取白区群众，建立边境苏区中心根据地，将边境革命势力联成一片，占领阵地，巩固地向外发展，与湘鄂西、赣西南、鄂豫皖取得联系，促进湘鄂赣三省革命的首先胜利之实现。据此，会议又提出党应执行如下的中心任务：冲破敌人“围剿”，坚决发动秋收斗争，保障已有苏维埃区域和恢复失败区域的工作。而这一中心任务的完成，应该是与重分土地、改造政权、巩固红军与造成红军铁军、扩大地方武装、加紧肃反、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消灭苏区中的赤白夹杂现象、造成苏区一片、极力注意向南发展等工作有密切联系的。会议认为，必须通过上述工作，以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

根据党的任务，《决议案》对几个主要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关于巩固红军与造成红军铁军的问题，强调要绝对保证党在红十六军中的政治领导，吸收贫农、雇农及积极的中农充实红军；加强红十六军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利用一切军事技术充实军事力量；由苏维埃政府保障红军的给养，纠正过去红

军专靠到白区打土豪解决生活问题，而不注意军事训练的错误。对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李宗白提出，在敌人重兵进攻苏区的情况下，红军兵力薄弱，应该分散进行游击战争。另一些同志则认为，红军已发展为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应该正规化，不要搞游击主义。经过讨论，《决议案》最后规定为：对红军的战略战术，要时刻不忘记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无计划的冒险的征东击西和离开根据地的行动，同时亦应反对死守根据地的保守观念，在某种条件下，更应注意到与各地红军行动上的配合。

关于重分土地问题，《决议案》完全贯彻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认为“立三路线给予边境党所犯最严重的错误，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富农路线与十足的机会主义”。因此，规定在重分土地中，立即收回地主和反革命者家属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分给雇农贫农中农等，没收富农好的土地，给以坏的土地。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决议案》规定：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反对投机商人抬高物价，流通赤白区域的物资；发展属于苏维埃管理的生产事业；对政府没收来的生产企业，可出租与私人经营，私人企业、作坊、工厂不违反苏维埃政纲时，允许存在；对发展农业生产、开办银行、统一货币、统一全省的财政和税收等问题，也作了一些规定。

关于工人成份的划分，《决议案》规定：出外从事独立手工业的（如缝工），过去认为不能加入工会，是错误的，他们是手工业工人，可加入工会；带一个学徒的师傅，如果在经济上是相当于贫农地位的，可参加工会；靠做零工和月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是雇农，可加入雇农工会；独立生产出售者，不被别人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是手工业者，不得加入工会（按：这种规定

是不正确的),只可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但资本很小,生活困苦者,亦可参加贫农团;雇两个以上学徒或几个帮工进行剥削的,是手工业主(如船老板、包头等),不得加入工会。执行以上规定,使党在苏区团结了广大贫农和手工业工人,增强了革命的主观力量。

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按照会议对实际工作的部署,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

在军事上,省委对全省的革命武装实行了统一编制,统编为四个团两个独立营。编制名义是:1.保存红十六军与军部名义。2.各师部名义保存,机构撤销。3.原有七师为七师一团。4.平、浏、万、宜警卫团为七师三团。5.原有九师为九师七团。6.红三师为九师九团。7.赣北独立营为红十六军独立第一营。8.鄂东独立营为红十六军独立第二营。同时,加强了对红军的领导,掀起了扩大红军运动。对红军的给养、兵工厂和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的四个月中,红十六军有武宁之横路、通山之大畈、阳新之刘星湾等诸役的胜利,共缴获敌人枪支一千五百以上,红军数量也得到了相当扩大^①。但到一九三二年初,由于党和红十六军的某些负责人,不顾敌人已占领了平、浏,并驻有强大兵力的客观情况,认为“无条件的平浏非打不可”,采取冒进攻坚的办法,硬打平、浏,以致一月二十一日之三都一仗,我军伤亡一百八十余人;二月二十二日浏阳的白沙一仗,又伤亡三百余人。

在党的领导机构上,省委也作了改变:1.鄂东南成立道委,指挥阳新、大冶、通山、咸宁、瑞昌、通城等县工作。蒲圻成

^① 《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赣省委信》,1932年9月14日。

立中心县委，指挥蒲圻、嘉鱼、崇阳及咸宁的一部分。2. 赣北改为修水中心县委，指挥修水、铜鼓、武宁、宜丰、奉新五县的工作。3. 万载成立中心县委，指挥上高、分宜、萍乡、宜春、万载等县。4. 平江、浏阳、湘阴直接受省委指挥。

此外，省委还在革命斗争中，对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改造，进一步开展了肃反运动，进行了重分土地的工作。

总之，自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后，虽然湘鄂赣省的工作受到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广大党员的努力下，苏区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三、第二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省委在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后半年来，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深感许多问题例如健全省委领导的问题，对敌斗争的策略问题等，需要重新研究，于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了过去夸大军阀战争与忽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致进攻苏区的错误；指出苏区根据地不应机械地确定在平、浏，而应转移到赣北，赣北（修水）应成为省委工作的中心地区；红军在策略上应该纠正硬打平浏的错误等。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与湘鄂赣省的战斗任务》。

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党中央在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下，于一月九日发布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且陆续发出了一些其他的指示，声称党的目前任务是“为占取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

利而斗争”。因此，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了第三次“左”倾错误。

首先，《决议案》对“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形势，作出了估计。认为：中央和其他苏区连续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和红军都发展壮大；“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新高潮，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鄂豫皖、湘鄂西开始受到红军的打击而部分失败了，江西红军已取得了占领赣州、攻下抚州、进逼吉安的胜利，……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所谓“中国革命如潮似涌的高涨”的形势，“国内战争到了更尖锐化的决战时期”。因此，“争取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已不是口喊的宣传口号，而是成为现时的实际的行动方针”。在湘鄂赣省也同样出现了这种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

第二，从以上估计出发，《决议案》对湘鄂赣省苏区的发展便规定为：“争取修、铜、万，向南发展，与湘赣苏区及中央苏区的革命势力汇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首先胜利，和湘鄂西打成一片。”很显然，在当时情况下，要争取实现这种前途，是超越了实际可能的。

第三，为了实现上述前途，《决议案》规定湘鄂赣省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修、铜、万三县政权打成一片，加紧向南发展。湘鄂赣省党的战略是：一、配合这些地方的群众，给修、铜、万及其附近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直到根本消灭。二、对平浏老苏区则准备恢复东南两乡的苏维埃政权，发动西北两乡及长、岳、醴等地的游击战争，对鄂东南苏区则在巩固现有苏维埃区域之下，将主力向修水发展，以消灭修武崇通边、蒲崇通修

边的赤白夹杂现象。三、加紧发动德安、瑞昌、安义、永修及鄂城、大冶等沿江一带的工作，与鄂南的嘉鱼及临（湘）湘（阴）岳（阳）等地最广泛的游击战争。四、万宜铜苏区的党组织，应积极发展上高、分宜、宜丰、靖安、奉新等县的游击战争，直到在这些地方建立有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政权。

第四，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必须准备粉碎敌人对苏区的新的进攻。因此，遵照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会议提出了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问题。《决议案》指出，“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象癫狂般的在开始进行着，在鄂豫皖苏区国民党的所谓剿匪主力军已到十师，湘鄂西已到了十师以上之众”。“国民党对付湘鄂赣省的革命势力，自然是不会有丝毫的放松的，在军事上我们统计敌人的力量计有六十团以上的兵力”。因此，会议认为，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的准备，巩固的扩大红军是湘鄂赣省党的第一等任务。要在最近两个月内，计划扩大红军两个师一个独立团，提供红军充分的给养。为了不牵制红军的行动，鄂东、鄂南、平、浏、宜、万都要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有计划的扩大地方武装。但是，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危险性和紧迫性还是估计不足的，因此没有向群众明确地提出击破敌人“围剿”的任务。

第五，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会议认为红军应集中不应分散，要使红军在一定军事计划下，能消灭敌人较多的力量。军事上绝对不容许今天打一仗，明天再来讨论打第二仗这样的作法，认为“这种错误是过去游击时代的传统观念”。红军最要紧的战术的运用，“应该特别注意到阵地战与堡垒战的演习”。这就否定了红军时代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的问题。因此，给以

后的军事斗争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第六，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会议认为单纯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是错误的，规定了以人口和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分配土地。同时，又规定对富农的剩余生产工具不是全部的没收，在反富农斗争中要防止动摇中农的“左”倾行为。

此外，会议还提出了加紧春耕运动，奖励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大力提高群众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扩大与群众有密切关系的合作社运动；反对滥发纸币；以及加紧各革命群众团体的工作，等等措施。

总之，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从总的情况看来，是进一步贯彻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的。但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还认为湘鄂赣省委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不力，转变不彻底，因此决定派一个中央代表团来改造省委，全面贯彻第三次“左”倾错误。

第三节 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

一、共青团

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赣边区各县的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一九二七年冬，平江、浏阳、阳新等县的个别地方才开始恢复团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恢复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同时，确定建立共青团湘鄂赣边特委。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平、浏、修、铜四县共青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共青团决议案。在这个决议中，明确规定今后团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建立和健全组织，加强对团员的教育，扩大青年群众的组织（如少先队、童子团

等)和加强青年武装组织的训练,领导团组织积极参加党发动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帮助发动青年,为青年的利益而斗争。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团的领导,推动了团的发展。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平江、浏阳、湘阴、万载、



阳新县第十九区少年先锋队袖章(1931年)。

宜春、铜鼓、修水、萍乡、阳新、大冶、鄂城、通山等十二个县已成立团县委,岳阳建立了团市委,通城、宜丰、武宁、瑞昌、岳阳等五县成立了团的特区委。边区共有团员二万五千名以上。团员中,工人约占百分之十五,贫农约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小商、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①湘鄂赣苏区的团组织,原先叫少共湘鄂赣边特委,由邓湘君负责。一九三一年四月在边境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改称少共湘鄂赣边特区委。九月,在特区委召开的第一次执委扩大会时,又改称少共湘鄂赣省委,并选举汤昭、李华英、邓湘君等为团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汤昭为书记。

少共省委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开展工作,建立了几个指导机关,并划定了指挥范围。在鄂东方面,以阳新为中心,建立

^① 少共湘鄂赣特区委《给少共中央的报告》,1931年4月。

了少共鄂东道委，指挥阳新、大冶、瑞昌、武宁、鄂城、通山、咸宁等七县；在鄂南方面，以蒲圻为中心，建立了少共蒲圻中心县委，指挥蒲圻、嘉鱼、崇阳三县工作；在赣西北方面，以万载为中心，建立了少共万载中心县委，指挥宜萍、万载、上高、宜丰等县工作。修水、铜鼓、平江、浏阳等四县，归少共省委直接指挥。在红十六军中，建立了少共工作委员会。此外，还建立了萍通岳边工作委员会，修铜宜奉边工作委员会、平湘岳工作委员会，负责在游击区和白区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各级团组织在领导苏区广大青年完成党交给的各项革命任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以组织青年参加红军、支援红军，成绩更为显著。一九三一年三月，平江县黄金洞石堰乡第一村，在土地革命完成后，接连有一百六十名青年参加红军。团组织还领导青年群众成立慰劳队、宣传队、口号队（主要是童子团）、担架队、洗衣队等随军行动。在领导团员和青年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土地革命、执行党的经济政策、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等斗争中，各级团组织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少共还实行“礼拜六”工作制，每个星期六，组织团员和青年，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作。团组织对青年的特殊利益也给予关注。曾领导过牧童和青工进行反对工作时间过长、待遇过低的斗争，领导过反对虐待童养媳的斗争。团组织通过上述各种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的在一万以上，参加少年先锋队的在十万以上，参加童子团的在十三万以上。

一九三二年四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后，少共省委被撤销，成立了少共临时省委，由郭潜任书记。至一九三二年九月，少共临时省委召开了少共第二次全

省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了少共省委，书记郭潜。一九三三年郭潜调回中央，以后任少共省委书记的有邱策新、刘玉堂、谭启龙、秦化龙、肖辉锡等人。

二、省总工会

湘鄂赣边区的工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一样，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以后，湘鄂赣边区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建立和恢复了许多工会组织。到一九三〇年时，边区各县共有工会四百一十四个，工人四万四千七百〇四人。^①平、浏、万、阳、大、通（山）等县成立了县总工会，有的县则成立了县总工会筹备处。在各县总工会成立的基础上，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成立了湘鄂赣省总工会筹备处。一九三一年九月（或十月），召开了湘鄂赣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目前工人的主要任务，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成立了湘鄂赣省赤色总工会，指挥三十余县的工会组织，委员长为陈桂生。鄂东南成立了省总鄂东南办事处，指挥十余县的工会。^②

省总工会成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整顿工会组织。省总成立以前，工会组织比较混乱，系统不清，成分也非常复杂。有手工业主混入工会的，有富农混入雇农工会的，也有中农被拉入雇农工会的。针对这种情况，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对县总工会以下的各级工会，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整顿，洗刷了非工人分子出工会，纯洁了工会组织。到一九三二年二月，除平、浏、万、阳、大、通（山）等县原已成立县总工会

^① 《湘鄂赣边特委关于工人运动的一般状况的报告》，1930年。

^② 《省总鄂东南办事处代电》，1932年1月1日。

外，宜（萍）、修、铜等县也成立了县总工会，通（城）、咸、瑞、鄂、武、蒲、崇、嘉等八个县成立了县总工会筹备处；大冶矿区与武长路也建立了部分工会组织。这时共有工会会员六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平、浏、万的纸工次之，雇农工人再次之。

其次，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宣传教育。根据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关于每县半年至少要开办一次工人干部训练班的决定，在平、万、修及鄂东办事处已开办四个训练班。在边区各赤色小学附设了工人夜校，吸收工人进校学习。很多工会小组都组织了识字班。省总宣传部出版了《工人斗争》，报道各地斗争消息；组织部发行了《工人生活》，登载各地工会工作情况及省总工会对各工会的指示。这些刊物，对于教育工人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培训和输送工人干部。省总在各县成立了专门机构，训练工人干部，介绍他们到红十六军或苏维埃政权中工作。同时，省总还组织各县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介绍新兵参加红十六军，组织各种服务队支援红军。

第四，加强雇农工会的工作。为了加强对雇农的领导，统一全省对雇农运动的指挥，省总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雇农代表大会，成立了湘鄂赣省雇农总工会。雇农与失业工人在土地革命中原来不分配土地，在重新分配土地中得到了纠正。

第五，领导工人开展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工人待遇及实行劳动法的斗争。对苏区的私人工厂、商店，组织了劳动监督委员会，订立了劳动合同。对苏维埃的工厂、商店，组织了管理委员会，工人参加管理。省总在领导工人斗争中，虽然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也发生过一些偏差，例如片面强调改善工人生活，忽视根据地的一切斗争都必须服从于革命战争需要这个根本原则，以致有的工人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引起农民的不满。另外，有的工会在苏区内发动工人举行罢工、示威，这更是错误的。

正当苏区工人运动取得进展的时候，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向湘鄂赣省派来了中央代表团，全面推行其错误路线。省总根据全总巡视员陈佑生等的意见，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召开了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揭发省总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产生了“工会任务”与“工会组织”两个决议，改选了省总执委会。选出傅秋涛等二十一人作为委员，以七人组成常委会，傅秋涛为委员长。九月十五日，又召开了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全省职工联合会，进一步贯彻第三次“左”倾错误。“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认为，省总成立将近一年，“错误很多，笔难译说”。^①于是对原各级工会组织实行了彻底改造。在改造中，片面强调各级工会干部的工人成分。撤换了一批原工会工作中具有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这样，“左”倾错误便在苏区工会工作中得以全面贯彻，使湘鄂赣省工人运动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三、贫农团

贫农团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贫农自愿参加的群众组织。它以乡为单位，下设小组。贫农参加的很多，组织发展也普遍。但是，贫农团在发展过程中曾发生一些偏向，有的把中农拉入，并占据了领导地位；有的则过分严密，使真正的贫农

^① 《湘鄂赣省总党团报告》，1932年7月。

不能参加。省委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布置今后的工作，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第十九次常委会上，对贫农团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通过了《贫农团问题决议》。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帮助贫农团工作，使贫农团在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边区党的各级组织，遵照省委的指示，加强了贫农团的工作。除扩大贫农团的组织，建立贫农团的组织系统外，还开展了对贫农团的经常性的工作。贫农团经常讨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提出改进意见；号召全体成员，积极贯彻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动员全体成员投入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合作社和为红军储藏粮食等。贫农团成了苏维埃政权的一根坚固的柱石。

四、妇女代表会

湘鄂赣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党组织对妇女运动的领导有所忽视，虽然边特委内部有妇运工作的分工，但抓得不够有力，因而劳动妇女会的组织发展不普遍。湘鄂赣省委成立后，加强了关于妇女在革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的教育，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妇女运动问题，并作出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促进了妇女运动的开展。一九三二年“三·八”节，由省委发起，召开了湘鄂赣省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近百人。其中平、浏各八名，修、万各六名，宜萍、铜鼓各四名，鄂东十五名，各医院、各单位代表若干名。大会检阅了全省妇女工作的成绩，检查了缺点，决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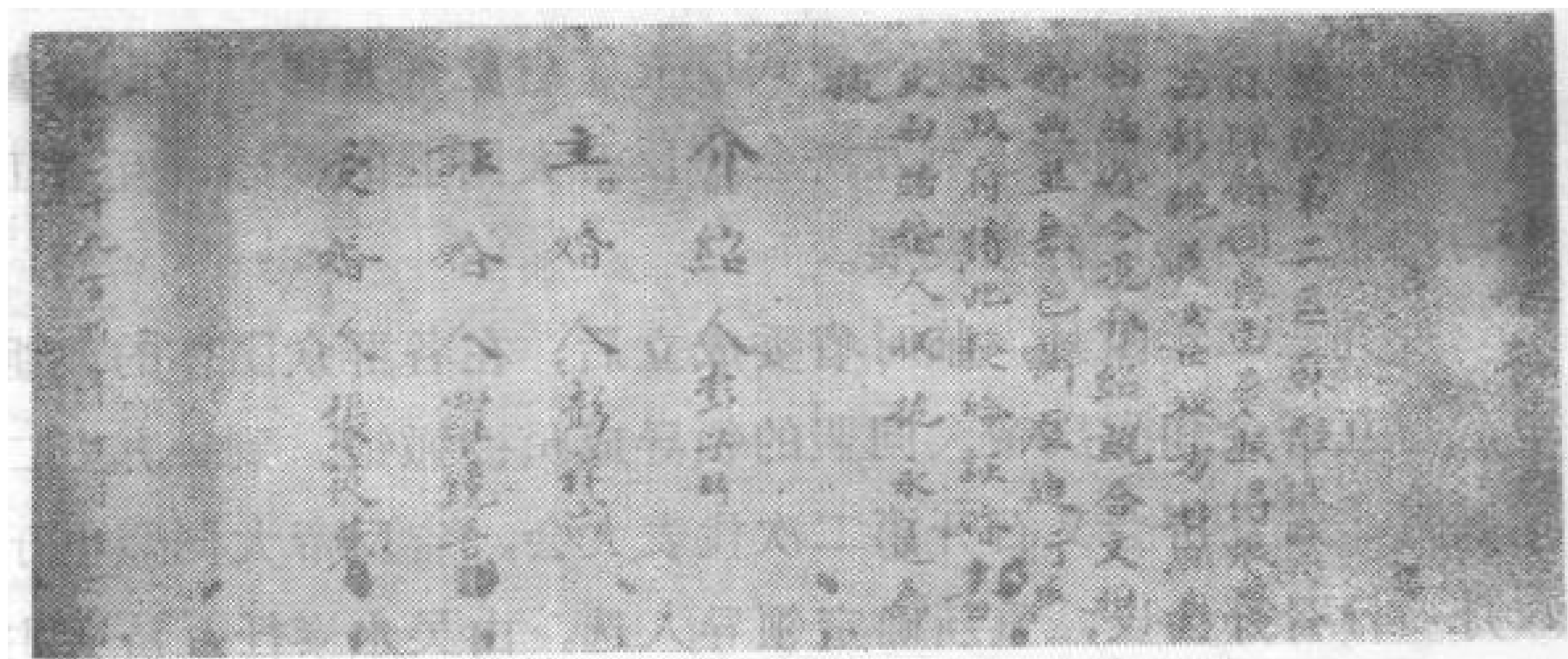
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苏区妇女纷纷参加妇女会，有的还参加了赤色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团体。

妇女组织起来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如参加地方武装组织；动员丈夫或儿子参军；帮助红军放哨、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积极支援战争；组织洗衣队、缝补队、慰劳队等，主动热情地为红军服务；帮助红军家属耕种、收割等。

妇代会还领导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和根据地的建设。当时，男子参军的较多，妇女就代替男子站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为多打粮食供给红军，支援革命战争而流汗。她们还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合作社，并从事其他经济工作。

妇代会还发动妇女参加夜校和半日班学习。平江徐家洞两所夜校里，各有二十多名妇女学员，识字班内妇女更多。为了培养妇女干部，省委和有的县委还专门开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进行短期的培训。结业后，分配从事革命工作，充实党的干部队伍。

妇代会还领导妇女进行反对蓄童养媳、实行婚姻自由等为争取自身解放的各种斗争。一九三一年九月，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颁布了婚姻法，使妇女的婚姻自由受到了



浏阳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证婚书。

法律的保护。在鄂东南、赣北的农村，还开展了剪发、放足的活动。

湘鄂赣苏区的妇女，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妇代会的具体指导下，通过各种革命斗争，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得到锻炼成长，成为建设和保卫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

互济会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发展比较普遍。这是一个群众性组织，任务是抚慰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开展革命的互济互助，团结革命力量。在湘鄂赣苏区各县，每县至少有三千名会员，全省约有二十万名左右。反帝大同盟是群众性的反帝拥苏（联）组织，成立较晚，不及互济会组织广泛，因混入过一些剥削阶级分子，曾发生与苏维埃政权机关相对立的现象。鄂东地区有些群众甚至认为它是反革命团体，不愿加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成立了省互济会筹备处。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召集了全省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互济工作，选举了领导机构，由丁庭松任互济会主任。一九三二年一月，成立了省反帝大同盟筹备处，并在三月十八日举行了全省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研究了反帝工作，正式成立了省反帝大同盟，由张警吾任主任。由于加强了对互济会与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互济工作与反帝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一九三二年四月，临时省委成立后，在各群众团体的改组中，省互济会和省反帝大同盟的领导成员被撤销。到一九三二年五月，省互济会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省反帝大同盟也于八月一日召开会议，重新确定领导人选，由吴永泰任互济会主任，邓洪任反帝大同盟主任，继续开展工作。

第九章 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 和各项建设事业

第一节 各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全省第一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湘鄂赣边区的红色政权，是在湘鄂赣边区各级党组织领导下，通过人民革命斗争逐步建立起来的。它是由赤色农会或农民委员会（实际上起着政权的作用），发展为工农兵暴动委员会，再演进为苏维埃政权的。

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湘鄂赣边区平、浏、修、铜等地先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这些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力量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临时性的政权，其基础并不牢固。

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根据边境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新形势，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成立了湘鄂赣边暴动委员会，以赖汝樵为主席。这是湘鄂赣边区统一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个政权组织。不久，改名为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九月，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发布宣言，指出：“本会是湘鄂赣边区革命的大本营，工农斗争的指挥部。一切革命民众，都应踊跃加入当地的赤色工会农会，一致在本会统一指挥之下，

参加英勇的阶级斗争。须知国民党一日不推翻，则工农痛苦一日不能解除，亦即本会的责任一日不能完成。故本会愿意与一切革命民众贯彻始终，奋斗到底！”^①

在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推动和影响下，边区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委发出第九号通知，指出：“建立边境苏维埃政权，已成为边境革命民众之迫切需要，边境的党应以实现群众此一需要为迫切之任务。特委有鉴及此，除指示各级党部努力扩大苏维埃政权宣传并加紧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以走向苏维埃的道路以外，并决定以边境革命委员会名义召集边境各县民众团体联席会议，进行建立苏维埃的准备工作。”

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根据特委的决定，于四月十日召开边境各县民众团体联席会议，积极准备和推进边境各县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工作。从此，边境各地有领导地召开乡、区、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正式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〇年六月，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朱溪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县各区乡的代表三百七十多人，来自各级党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二百二十人。大会选出十二名执行委员，樊其发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内政、军事、土地、劳动、教育、财政、食粮、保卫、裁判、交通等十个部以及拥红扩红、坚壁清野和生产计划三个委员会。

六月，阳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排市召开，正式成立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刘怀玉为主席，机关设在大凤区郭家冲。

七月十二日，万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折桥岭下杨

^① 《工农兵》第一期，1929年9月。

家祠召开，正式成立万载县苏维埃政府，周达为主席，辛克明、王建华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七月十五日，平江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寿街次青港第二高小召开，到会代表三百多人，湘鄂赣边特委代表李宗白、平江县委代表涂正坤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临时土地法、苏维埃组织法等，正式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张怀一（后叛变）为主席，涂正坤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

十月，浏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蒋埠江狮子山仙人庙召开，由县委刘大荣主持，湖南省委派王首道、潘心源等出席指导。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三百人，修、铜、万、平等县派出一百八十个代表列席大会。大会制定了浏阳县《施政纲领》，选出十九人为执行委员，张启龙为主席。

通山、大冶等县也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通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阮立梅，机关设在大畈白泥坑。大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吴松林，机关设在罗文俊村，后迁殷祖。

一九三〇年八月，在阳新县太子庙召开了鄂东南地区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成立了鄂东南革命委员会，由曹玉阶任主席，机关设在太子庙，后迁阳新三溪口。一九三一年二月，鄂东南党政机关再迁阳新龙港镇。从此，龙港镇成为鄂东南苏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镇上设有四十八个机关单位。

到一九三一年，湘鄂赣边区先后建立县苏维埃政府的有：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萍、宜丰、通山、通城、阳新、大冶、鄂城、瑞昌、武宁、崇阳、咸宁、蒲圻、嘉鱼等二十几县。当时各县苏区面积大小不等，万载、阳新、通山约五分之四，修水、蒲圻、大冶约三分之二，宜丰、宜萍、铜鼓、鄂城约三分之一，通城、咸宁、崇阳、武宁、嘉鱼约五分之一，

平江、浏阳约六分之一。此外，湘东北之湘阴、岳阳等县也创建了小块苏区。

“苏维埃是工农的政权机关，目前是工农斗争的武器”^①。它代表着工农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谋福利，因此，深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当时流传在苏区的一首民歌，反映了工农群众兴奋喜悦的心情，歌词是：

五月榴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亲爱的农友们！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二、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平江县长寿街召开了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有二十多个县的一百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会前开了三天预备会，推选李宗白、刘建中、杨幼麟、于兆龙、涂正坤、赖汝樵、邓乾元、胡筠、张警吾、张怀一、孔荷宠等十一人为主席团，组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开会期间，遵照中央训令，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撤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管辖湘东北、鄂东南及赣西北地区，选举赖汝樵、李宗白等二十三人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廖畅一、廖鸿禄、辛克明等六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内容为：接受中央指示，反对立三路线；巩固和发展苏区，深入敌后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十万铁的红军，改组红十六军；反对攻坚

^① 《阳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1930年6月。

打硬，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争取白军士兵拖枪投诚，大力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武装；加强对白军士兵的阶级教育，打入白军组织，破坏敌后交通，发动白区群众斗争；加强妇女工作，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加强少共及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和领导；遵照中央指示，彻底执行土地法，分配土地、实物、肥料、耕牛、种子等，应给贫雇农以优先权；对出征红军战士的家属，应特别照顾，坚决执行优抚代耕制度；等等。

大会于十月四日结束。五日，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届执委会召开会议，推定赖汝樵、刘建中、杨琦、刘彦、杨幼麟、张怀一、涂正坤、李楚屏、曹玉阶等为常务委员，赖汝樵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建中为副主席。省苏维埃政府成员分工是：杨幼麟为军事部长，李



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印。

楚屏为文化部长，涂正坤为财政部长，张怀一为粮食部长，刘彦为经济部长，胡梓为卫生部长，杨琦为劳动部长，黄志竞为外交部长，于兆龙为交通部长，李宗白为市政部长，赖汝樵兼政治保卫局主任，黄仁为统计局长，曹玉阶为工农检查所主任，会议决定立即建立军事、经济、财政、文化四部和政治保卫、统

计两局，其余各部则视工作情况陆续建立。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全省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在党的领导下，改变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出现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使各级苏维埃组织日趋完善。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还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重要法令。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斗争，从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保卫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

与此同时，湘鄂赣省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广大群众，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努力恢复被敌人占领的苏区，积极发展新苏区，促进了政权建设的发展。

一九三二年六月，鄂东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距龙港十里左右的桂盛潭召开，参加大会的有阳新、大冶、鄂城、咸宁、蒲圻、崇阳、通山、武宁、瑞昌等县代表。大会讨论了“全苏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和各种政策法令，通过了《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宣布撤销鄂东南办事处，成立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下设内务、财政、土地、劳动、食粮、卫生、文化、工农检查、裁判等部和政治保卫局。大会选举了盛茂炯为主席，曹玉阶、徐福亨为副主席。

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浏阳、宜萍、铜鼓等县，都恢复了一部分乡苏维埃政府。在万载宜春边界的丰顶山，新成立了万宜上县革命委员会，并成立了三个区革命委员会，其中三阳区政权的势力，已发展到距袁州（宜春）只有十华里的地方了。另外，修铜宜奉苏区，修武崇通边，湘鄂边等处，增加和恢复了五十多个乡苏维埃政权。^①

^① 《红色湘赣》第一期至第三十五期，1933年——1934年。

湘鄂赣苏区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底共有二十几个县。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湘鄂赣省各县苏区虽时有变化，但一般说来，基本上都保存着。

三、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及组织系统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暂行湘鄂赣边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法》作了明确说明：“苏维埃是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以团结暴动的力量，推翻反动的统治，由群众自己创造的革命政权，它有任何政府与军队所不及的威权与力量，它是为广大劳苦群众所信仰所拥护的社会政权机关，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是根本不相容的。”

苏维埃政府一开始就明确宣布自己的任务是：消灭一切封建剥削，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进行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生活，使工农民主政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

湘鄂赣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是根据一九三〇年五月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颁发的《暂行湘鄂赣边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组织的。它包括县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区苏维埃政府组织法、乡与村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共八章。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组织规定如后：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为县苏维埃政府之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最高的立法行政管辖机关。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九至十三人、候补委员二至六人组成。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选举五至七人，组成县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之下组织秘书处及各种委员会：（1）主席，（2）赤卫委员会，（3）财务委员会，（4）经济委员会，（5）土地委员会，（6）食粮委员会，（7）肃反

委员会，(8) 裁判委员会，(9) 市政委员会，(10) 卫生委员会，(11) 文化委员会。区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与县苏维埃政府基本相同，仅机构与人员略少。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七至十一人、候补委员二至六人组成，区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常委会之下设秘书处及各种职务，包括主席、赤卫委员、财务委员（必须由常委兼任）、裁判及肃反委员、食粮委员和文化委员等；另设经济委员会，主任由常委兼任。乡民代表大会或群众大会为乡苏维埃政府之最高权力机关。乡苏维埃政府不设常务委员会，只设执行委员会管理日常事务，执委会下设秘书一职，各执委分工为：主席、赤卫委员、财政委员、裁判兼肃反委员和文化委员，还设立土地委员会，主任由执委兼任。

凡地域过宽或人口过多的乡，则划分若干村，成立村苏维埃政府。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三人、候补委员二人组成，执委会推选主席一人，接受乡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及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管理日常事务（一九三二年四月，缩小区苏维埃的管辖地域，取消乡苏维埃，定为县、区、村三级）。

苏维埃政权还不断清除混入政权内部的反动分子，罢免不可挽救的堕落分子，大量吸收工农分子参加管理，使苏维埃政权永远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充分行使人民政权的职能，真正起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保障人民利益的作用。

第二节 苏区的土地革命

湘鄂赣边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土地

制度，以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湘鄂赣边区的土地革命，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九年冬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没有土地法，没有经验，一切处于摸索之中。各地在没收土地之后，有的试行“共耕制”，有的试行“分耕制”。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〇年冬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土地革命在各地全面展开。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田，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地主、富农分得同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重新分配土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强调反富农斗争，改土地苏维埃所有为农民所有。一九三二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冬是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进一步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查田查阶级，纠正在反富农斗争中严重存在的侵犯中农利益的作法，在查田斗争中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现按照上述的四个阶段，略述苏区的土地革命情况如下。

一、土地革命的开始阶段

湘鄂赣边区各县大部分土地为地主阶级所霸占，广大贫苦农民无地或只有很少土地。如大冶县殷祖村共有八千亩土地，其中，大地主殷益成一宗七户（七个儿子），即占有六千四百亩左右，为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又如平江县黄金洞金塘乡的土地，地主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贫雇农占百分之十左右。就平江全县看，只占全县总户数百分之六的地主，所占土地却达到土地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这种封建土地

占有状况下，贫苦农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濒于绝境，迫切要求砸碎这种封建的土地制度。

一九二七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平江等地试图解决土地问题，曾提出“拔界毁滕”、“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等口号，但由于缺乏经验，加上敌人进攻，形势恶化，这种做法暂时失败了。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农民要求分配土地的情绪非常强烈。刚刚恢复的湘鄂赣边特委，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既无经验，又无土地法可循的情况下，在边境少数地区没收一切土地，试行了共耕制和分耕制的办法。

共耕制：以“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为原则。其具体内容是：由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土地，调查土地人口情况，以乡为单位，将土地划为若干块，将劳动者分为若干组，每组在指定的土地上共同耕作；劳动组每组十人至十五人，设组长一人，在乡苏维埃政府之下，组织共耕委员会，指挥各组长，并监督指导耕作。通过共同生产所得的产品，由苏维埃政府依照农民需要，实行共同分配。这种办法在平江黄金区、浏阳一区以及阳新、大冶部分地区试行过。其结果是，第一，因没收一切土地，引起自耕农不满，不利于组成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第二，农民不愿共同耕种，以致发生怠工现象，使农业产量减少，甚至导致了田园荒废；第三，在战争环境下，敌人经常骚扰，“共耕”也难于实行。

分耕制：苏维埃政府根据土地和人口的多少，按劳动力或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农民耕种这一部分土地上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农业税以外，其余归农民所有。这种办法，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部分地区试行，其结果，虽然较多的农民满意，但仍有下列问题：第一，侵犯

了自耕农的利益，使自耕农对土地革命不满，不利于组成反对豪绅地主的统一战线；第二，土地肥瘠不同，远近情况不同，在平均分配中，容易发生纠纷，等等。

以上两种办法在试行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旋因一九二九年春耕紧迫，为了不使土地荒芜，边区特委又制定了春耕条例，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以应当时春耕生产的急需。它的内容是：原自耕农的土地仍归自耕农耕种，地主租给佃农的土地仍归佃农耕种，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及公共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实行这种办法，佃农得益较多，雇农等得益较少，特别是没有触及封建的土地关系，不过是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权宜之计。

湘鄂赣边特委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集中主要精力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开创，对土地革命没有大规模的开展，仅在少数地区试行了上述办法。这些办法为土地革命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二、土地革命的全面展开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到一九三〇年，边区进入巩固发展时期。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规模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已趋成熟。于是，边区特委集中主要精力，抽调大批干部，在苏区的广大农村全面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以及具体步骤和方法，边特委在总结第一阶段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开始作出一些规定，并在实践中继续摸索和总结。一九三〇

年二月六日，边特委在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二十九号通告中，明确指出：“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农村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是从雇农起至中农止。”^①关于富农问题，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曾指示，“中农、富农亦应吸收到革命的四周，使他们同情土地革命。对于富农，如果已经反对雇农、贫农的利益，绝对不因联络富农的政策而让步，绝对应拥护雇农、贫农的利益而向富农作斗争。”^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大冶中心县委根据上述指示，在《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策略路线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富农在反帝反军阀反豪绅地主斗争中有参加革命战斗的可能。但当着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富农必定跑到反革命方面去，此时绝不应该放松雇农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这表明，一九三〇年以前，党对富农的策略是争取团结在农民群众反封建势力革命战线的周围，以集中力量打击地主阶级。到一九三〇年，党对富农的策略有了变化。二月，边特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说：“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常至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③

关于没收对象，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发布的《革命政纲》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

①③ 《湘鄂赣边特委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目前农运的任务和工作路线》，
1930年2月6日

②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1929年8月3日。

没收的土地归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及退伍的红军士兵使用。一切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公田、公地，概归当地苏维埃没收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同年十二月，大冶中心县委也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①可见，没收的对象，已由没收一切土地明确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田。这是策略上的一个进步，很快在苏区各县得到贯彻。

一九三〇年六月，阳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没收土地和分配简例》中，就更详细地规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与具体办法。没收的原则是：一切祠堂、庙宇、公会、教堂、公户、官荒、无主之土地、荒地、沙田，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剩余土地，均实行没收。自耕农土地暂由其本人使用，但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一切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公有。分配对象和分配办法是：没收之土地由苏维埃分配。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分别情形给以土地：1.无地及少地农民；2.失业工人及退職官兵愿意耕作者；3.有生活职业而不够生活的，得斟酌情形分给之。分配土地应以土地之肥瘠、劳动力情况及人口之多少为标准，年满四岁者即计算人口，年满十六岁能耕种者为一劳动力，红军现役之军官和士兵本人为一劳动力。先按每一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其余之土地，按照劳动力所属的四岁以上的人口多少，平均分给。土地分配暂以一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分配，区苏维埃指导帮助。土地分配后，凡无依靠之老弱残废、孤儿寡妇等不能从事劳动者，由苏维埃政府维持其生活。一切山场、矿产、森林、河道、塘堰，概归苏维埃政府管理。

^① 《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策略路线决议案》，1929年12月。

凡山里水边居民，依靠山水生活者，原来供其生活之山场水道，仍给当地居民使用。收归公有之山内坟茔墓地，由苏维埃政府维护之。

在同一大会通过的《土地使用暂行条例》中，又规定了土地使用和取消土地使用权的办法：凡男女年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能遵守苏维埃政府法令，能自己耕种者，或于居住有必要者，可以使用土地。但一切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公有。使用土地者，须领取苏维埃政府的土地使用证，并在土地局登记。旧时田契佃约一概废除。凡使用土地者，不得自由买卖典押，不得在土地上筑造无益工作物和种植无益植物。凡有重大疾病或故意怠工荒废土地经劝戒不改者，得中止其土地使用权。凡使用土地之个人死亡或被剥夺公民权者，或使用土地于禁止之目的者，或违法租佃者，得取消其土地使用权。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都设有土地革命的领导机构。开始县、区、乡各级均设有土地委员会，后来县改为土地部，区、乡设土地委员。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乡一级由党支部书记、乡苏维埃主席、土地委员以及各群众团体代表共同组成土地革命委员会，具体负责土地革命的有关工作，如调查户口，登记土地、评定土地等级、划分阶级、分配土地财物等。

土地革命的整个过程，一般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划分阶级成份：雇农——一无所有靠做长工过活，终年债务缠身者；贫农——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佃耕地主富农的土地，卖零工，经常向地主富农借债者；中农——农具较齐全，自耕自吃，一般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者；富农——有十几亩田，自己参加劳动，农具齐全，一部分土地

自耕，一部分出租，雇长工或短工，或兼放高利贷进行剥削者；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出租土地或雇长工，放高利贷，或兼营工商业，全靠剥削为生者。第二步，发动群众清理地主的财产，烧毁田契、债条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配给贫农、雇农，现金和金银器皿则交公。第三步，丈量土地，按人口分配，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这是红军田”石碑，立于1930年。

为了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在开展斗争中，对罪恶不多、民愤不大的地主严加管制，不准随便乱动；对作恶多端、群众十分痛恨的土豪劣绅，则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揭露其罪恶后予以镇压。

一九三〇年初，修水县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较早的上衫、靖林、台庄等十五个乡，首先进行土地革命。同年秋，又在黄坊等二十四个乡进行土地革命，全县共有三十九个乡分配了土地，分得土地的农户约三万户。

一九三〇年三月，平江全县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先后完成土地革命的有嘉义、献钟、黄金洞、长寿、思村、钟洞、天岳、龙门、安定、三眼桥、清水和谈岑等区，只有琅洞、石洞、南

江桥等少数地方因受白军的严重摧残，未能完成土地分配工作。平江苏区山多田少，土地分散，人口分布不平衡，加上土地分配时有的以区为单位，有的以乡为单位，结果农民分得土地的多寡不尽相同。如黄金洞每人分得零点六亩，徐家洞、灶门洞每人分得零点八亩，虹桥区每人分得一点二亩。

同一时期，浏阳县在占全县四分之三的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超过部分由乡苏维埃政府统一处理。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分给坏田，贫农、雇农、红军官兵、苏维埃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分给好田。在外地的白军士兵，确实不是反动分子，则予以记名分配土地，俟其返回苏区时列入实际分配数，以便争取和瓦解敌人。

一九三〇年夏，阳新县在全县四分之三的苏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除县城城郊、富池口、枫林等地没有分配土地外，全县有五十万人分得了土地。通山、崇阳、咸宁、鄂城等县，



浏阳县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各有几万人分得了土地。

三、重分土地和反富农斗争

从一九三一年起，湘鄂赣边区党组织在苏区进行了重分土地的斗争，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原则。开始，有的地方对地主本人不分土地，而给地主家属分了土地；富农不但分了土地，而且不少分了好地。七月，湘鄂赣省委成立后，中央巡视员黄火青向省委提出重分土地问题。李宗白等认为，“重分土地在湘鄂赣省已成为老生常谈，不如提出收回地主家属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没收富农好的土地，给以坏的土地。”^①同时，在反富农斗争中，提出了几条新的规定：一是富农中有劳动力者分配土地，无劳动力者则不分。但浏阳县委认为，这种作法表现了消灭一部分富农的倾向，向省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后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改为无劳动力者分配三分之一的土地。二是富农的房屋全部同贫雇农的房屋实行互换。鄂东南党组织提出不同意见后，改为对富农的房屋，根据贫农耕种之方便，斟酌更换之。三是对富农的剩余生产工具，实行部分的没收。^②

八月，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决议：收回已分给地主豪绅家属的土地，没收富农好的和剩余的土地以及生产工具。富农按劳动力分配土地，雇农、贫农、中农和红军士兵及其家属，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红军士兵原籍在苏区的，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其土地。原籍在白区的，以乡为单位设立红军公田，由群众共同耕种，田地收益交给红军。经过群众讨

^{①②} 李宗白：《关于湘鄂赣省的工作报告与过去所犯的 error 及其责任》，1932年。

论同意，可保留一部分土地，作为修建桥梁道路、修复河道和开办学校之用。逃难来苏区的群众，无法返回而要求分配土地的，苏维埃政府可以分配其荒田荒土，鼓励开垦。群众开垦的荒田荒土，不与一般土地一样进行分配，且免征农业累进税五年。

同年九月，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法》，规定对富农的土地，剩余的耕牛、农具等一律没收，分给坏的土地。对富农的房屋，为便利雇农、贫农、中农、工人、红军及其家属耕种，得令富农移居。但对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将原来规定的归苏维埃所有改为归农民私人所有。农民对土地有买卖、租佃和赠予之权。这个改变，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还规定道士、卜相、看风水、宗教职业者、小贩、商人、医生、教师等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都不分配土地。后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和省苏维埃政府鄂东南办事处，还作出《反富农斗争决议案》，规定剥夺富农公民权利，不准富农参加苏维埃政权，不准富农加入各种革命团体，富农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会时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没收富农好土地，分配坏土地；没收富农剩余的耕牛、农具、肥料；没收富农好房屋，分给坏房屋；驱逐富农出各级指导机关；扩大反富农斗争宣传，使每个贫苦工农积极参加反富农斗争；村苏维埃政府宣布富农罪恶，公布富农名单；没收富农一切武器；无反动表现的富农教师，准其教书，但须监视言行；富农子弟只准到初小、高小读书，但须交付学费等。自此，苏区的重分土地和反富农斗争进入高潮。有的地方贴出“杀尽富农”的标语。有的地方捉拿富农要

钱，没收富农所有财物，不分配富农土地。有的地方把富农的标准弄得混乱不清，认为稍有一点钱存放在家里的（如卖猪卖麻所得）就是富农，以致随便把中农划为富农等^①，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针对侵犯中农利益的严重情况，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曾发出土字第一号通令，规定划分富农的标准，“主要以剥削关系，次以家庭生活的原则”。但在实际上，这种“以家庭生活”为划分富农的即使是次要的原则，也是很难掌握的。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召开的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虽曾提出各地在反富农斗争中要防止动摇中农的“左”倾行为，但因省委很快被改组，没有来得及实施。

原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改组后，过左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改变。一九三二年四月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订出的三个月工作计划中，要求组织各级土地委员会，执行重分和整理土地的工作。除贫农、中农、红军及其家属，一律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外，强调地主不分配土地，富农只按劳动力分给坏的土地，各乡村以前所保留的公田，如教育公田、桥梁公田等，一律分给群众。所有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如果不是贫、雇、中农和失业的工人、苦力以及独立劳动者，一律不分配土地，已分配了的要收回。计划也指出了凡把中农划为富农而被没收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应退还给中农，或照贫、雇农一样分配。这个计划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执行。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省苏维埃政府还发出土字第五号通令，宣布：这次分配土地以后，实行生者不补、死者不退，

^①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鄂东南办事处《反富农斗争决议案》，1931年12月6日。

准许租借买卖（但不许租借或卖给豪绅地主家属）及家人继承，以后不再重分。土地分配完毕后，即按省苏维埃政府所制定的土地登记册分别登记，逐户发给土地所有证。此后，凡是靠自己劳动增加了农业产品而提高了自己生活的，即使生活富裕了，也绝不当富农来反对。

重分和调整土地的工作，到一九三二年冬进行完毕。

四、查田运动

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苏区贫苦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各级土地部对于阶级成分的划分，多半界限不清；有的负责人存心弄假，使自己得利；有的地方由于家族观念、亲戚关系和土客籍界线等原因，使一些地主的土地没有完全没收，富农仍分了好田，或者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为此，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开展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二年冬，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实行的。当时，要求在查田运动中，纠正过去的错误，从查田斗争中进一步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成份，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查田运动是在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和工农检查部的领导下进行的。一般以乡为单位组织查田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由雇、贫、中农和红军家属组成，苏维埃政府及土地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参加过分配土地的人员不得参加。查田委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如发现地主分了田，富农分了好田，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多分了好田，或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中农划为富农，或把富农划为中农等，就要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斗争，在斗争中加以纠正，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贫、雇、中农身上。

查田运动在湘鄂赣苏区各地开展以后,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没有开展起来,有些地方在进行一段以后又处于停顿状态。后来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经验传到湘鄂赣苏区,明确了“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①于是,查田运动在提法上改变为查田查阶级运动。强调不容许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潜伏在革命队伍中,要发动一个从下而上的检举运动,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组织。在实际斗争中,这一运动便和肃反运动以及改造各级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团体的工作联系起来。

查田运动中,有的地方重新分配了土地,有的地方解决了过去分田中肥瘦不均的问题。“地主得了土地、富农得了好田者,均在群众斗争中分别收回了。”^②富农还酌换了较坏的土地与房屋。机关团体中一部分成份不好的人被清理回家。这一运动,至一九三三年底结束。

尽管土地革命中出现了许多“左”倾错误,但通过这一革命运动,打破了封建的土地关系,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无不欢欣鼓舞,由衷地感激党的领导,革命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军,支援革命战争。生产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农业生产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据修水县上衫乡统计,土地分配后,粮食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八以上。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贫苦农民有饭吃,有衣穿,光棍结婚了,真正过上了人的生活。

① 毛泽东:《在八县查田动员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6月14日。

② 《湘鄂赣省苏维埃一九三二年的工作总结》,1933年3月1日。

第三节 苏区的经济建设

处在白色政权四面包围之中的苏区，敌人不仅经常进行军事上的“会剿”、“围剿”和“清剿”，而且到处设立“管理所”、“检查卡”、“食盐煤油公卖处”等机构，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从经济上扼杀苏区人民。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开展，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湘鄂赣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在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仍然领导广大人民，积极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一、苏区的经济政策

苏区党组织通过前段的斗争，特别是反对盲动主义倾向，开始认识到，适应当时情况的需要，制订正确的经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在经济问题上，苏区各县早在一九三〇年就有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一九三一年，湘鄂赣边特区委印发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的《经济政策草案》。这个《草案》包括工业、商业、财政与税则、市政等方面，主要内容有：（1）外国经营的企业，凡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政策法规的，准许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2）中国资本家及手工业主经营的企业，不违反苏维埃政府法令，尚不实行国有，保证其自由营业，不加干涉；（3）保证商人自由贸易，但严禁投机，严禁抬高物价，特别是严禁大商人以商会名义垄断价格；（4）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适当的累进税；（5）发展消费合作社，保

障劳苦人民的利益；（6）取消高利贷者的各种债务，实行低利借贷；（7）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8）减低房租，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的房屋和财产，分配给工人和劳苦群众，改善劳苦人民的居住条件。八月召开的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又对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作了决议，规定：私人企业只要不违反苏维埃政纲，就允许存在，但须实行工人监督；政府没收来的生产事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奖励适应群众需要的私人生产；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成立管理委员会，组织煤炭、金矿、陶器、纸业、石灰等专利生产；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征收累进税，反对商人投机倒把，抬高物价；对外贸易实行保护政策，鼓励以生产品代替现金（按：指银元）出口；现金出口须得苏维埃政府许可等。一九三一年九月，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经济决议案。各级苏维埃政府遵照经济决议案，特别重视建立转运站，建立苏维埃商店，组织供销合作社，开办工厂，准备粮食等，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于认真贯彻了省苏维埃制订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一些停产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各种军用民用的工厂逐步建立起来了，有的地方还有了一定的规模。粮食生产有所增长，各种经济作物也有发展，群众贸易不自由的现象有所改变，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在执行上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左”的干扰，也出现过由苏维埃硬性规定物价和无条件没收商人货物的行动。有些地方，商品流通停滞。一九三二年三月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后，成立临时省委，对前段的某些经济政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向群众说明情况，解释原因，公开承认错误。临时省委决定：苏维埃商店一律撤销，尽量租

给供销合作社或私人资本经营，普遍发展群众性的合作社运动，动员广大群众发展苏区与白区的物资交流。同时禁止无条件地没收商人货物的行动，保证商业自由，欢迎白区商人在不妨害革命的条件下来苏区贸易，活跃苏区的商品市场。同时尽量把以前收归国有的工商业企业，如纸厂、染织厂、各种大商店、矿山等，有计划地出租给私人资本经营，或者由工人和手工业者组织合作社经营管理，尽量避免由苏维埃政府直接管理。尽管这些政策有正确的方面，但在当时情况下，由于取消和租让了苏维埃商店和工厂，而私人资本一下子又不能发展起来，经济并没有振兴，相反却一步一步走下坡路了。

二、苏区的农业生产

在苏区的生产事业中，农业是最大最主要的部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苏维埃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由各级苏维埃会同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组织督耕委员会，督促群众生产，开展生产竞赛，并奖励积极生产者，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苏区，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了红军，农业生产不得不由妇女或半劳动力承担，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妇女突击队、耕田队等，充分发挥妇女的积极性，及时播种和收割。对鳏寡孤独户的生产，则采用兑工、换工、帮工等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

2. 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困难。实行耕牛登记，禁止宰杀耕牛。有的地方耕牛缺乏，则由各县组织互相调剂。同时，组织共耕队或耕牛站解决耕牛和农具的困难。并号召和组织老农，选择良种，研究种子改良的方法。

3.兴修水利，奖励开荒，积制肥料。苏维埃政府号召群众加紧修理池塘堰坝，工程过大的，由苏维埃政府补助一部分材料费。从前因风水迷信被禁止开塘的地方，应从发展生产出发，组织兴修。鼓励群众尽量开垦荒山、荒地及湖坪，谁开垦归谁所有，若干年内免交累进税。大力积肥，改进施肥方法，烧制石灰。

4.切实保护森林，植树造林。对于桐、茶、棕、竹和果树等，要求时常培植保护。对于大片森林，不准任意砍伐。省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二年六月还颁布了《培植森林暂行条例》，促进了森林的保护和管理。每年在春节期间开展植树造林运动，规定每人植树数量。

5.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要求凡能植棉的地方，每家每年至少应植两升棉籽的棉。开展植麻竞赛；凡挖毁麻根的，须向督耕委员会说明理由。保护竹笋、油树、棕树，禁止砍伐。注重培育药材，组织及时收买。大力养鱼，购运鱼种。注意牧羊喂猪，植桑养蚕，多种芝麻、茶子等。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因此，农业生产获得了显著提高。阳新龙港蔡家湾一带，土改前每亩平均产稻谷二百斤，最高不过四百斤。土改后的第一年，平均亩产达到四百斤，高产的达到六百斤。主要经济作物苧麻、棉花、油料的产量也大有提高。万载县的粮食产量，大大超过土改以前的水平，据军屯乡的调查，一九三一年的粮食产量比革命前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二至三十三点二。

三、苏区的工业生产

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工业建设上，苏区首先建立和发展了

一些军用工业，如兵工厂、枪械局、被服厂、缝纫厂等。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这些民用工业是：硝盐工厂，在平江黄金洞石堰乡盖板洞等处，每天产硝盐百余斤，供应当地群众食用。矿业工厂，有阳新县十区、十八区、十九区三处的硫磺矿工厂，武宁县泉家源的煤矿工厂，大冶、鄂城几处煤矿厂以及各县的石灰厂等。纸业工厂，纸是湘鄂赣边区的特产之一。为了发展纸业生产，私人纸厂已停办而不愿复业的，由苏维埃政府接办。苏维埃政府还开办了一些纸厂，如大冶龙泉寺纸厂，通山第四区纸厂，阳新湖市沿河纸厂、平江徐家洞、灶门洞纸厂，万载纸厂等，除生产一般文化用纸外，还生产皮纸。染织工厂，有大冶、阳新等县开办的染织工厂，所产布匹，除供应军服厂的需要外，尚有小部分供应民用，原料系染织厂收买当地妇女手纺的土纱。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妇女中组织纺纱队，鼓励纺纱，以保证供应。制药工厂，设在平江黄金洞，利用中草药原料，提炼出一百多种药品，解决了当时缺少药品的不少困难。金矿局，在平江黄金洞，淘洗砂金，有六十多人，一九三二年上缴砂金三十三两。

除上述厂矿外，各县根据当地的资源和特点，还开办了印刷厂、夏布厂、花爆厂、碗厂、制笔厂、制伞厂、樟脑厂、篾货厂等。此外，还鼓励群众集资开办了一些工厂。

交通、邮电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第四节 苏区的商业、财政、金融工作

为了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苏区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而长期遭受破坏的农村，极需休养生息，恢复创伤，人民不能负担

过重。这就是矛盾。因此，苏区的商业、财政、金融工作，必须采取既着眼于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又立足于减轻人民负担的方针。

一、苏区的商业

苏区的商业有国营、合作社和私营三种经济成分。当时，由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苏区群众在生产生活上发生许多困难。苏区的土特产，如茶、麻、油、纸、煤炭、竹木、皮革、鞭炮等运不出去，找不到销路；而群众日常生活用品，如盐、煤油、药材、布匹等又运不进来，奸商便乘机抬高物价，扰乱市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困难，苏维埃商店、转运局、合作社和私人商店，均发挥自己的作用，收购土特产，经售日用必需品，抵制了奸商的操纵，活跃了苏区的商品交流。

苏维埃商店大多数是没收了土豪劣绅的，一部分是苏维埃政府投资兴办的供销合作社。平浏交界地区原来由苏维埃政府开办的一些手工业企业，后来也改为营业性的商店。苏维埃商店，可向银行借款，作为基金。苏维埃商店的货物价格，一般比私人商店便宜一些，盐和煤油平价供应，不赚分文。商店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店内一切事务，审查账目，防止贪污。各县一般都设立了总商店，下设分店或支店。如阳新龙港镇，除鄂东苏维埃总商店外，还有七个苏维埃商店，经营布匹、南货、药材、油盐 and 粮食等物。

苏维埃商店主要负责苏区内的贸易，转运局则负责对外贸易，解决苏区与白区的物资交流问题。最初，有的地区称为贸易局或转运站，后通称为转运局。除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设转

运局之外，各县设有县转运局，县之下设有分局。省苏维埃政府还在龙港设立了鄂东转运总局，管辖阳新、通山、大冶、咸宁、鄂城各县局。鄂东转运总局在武宁县温汤建立了一个转运分局，以加强与省转运局的联系。转运局属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领导，内设土产部、外贸部、运输队、交通队、秘密货栈等。主要任务是替群众把土特产转运出去，把日用必需品特别是食盐、布匹、煤油等，以及兵工厂所需要的钢铁、钢丝、锉刀和硝，红军医院所需要的药品，纺织厂需要的棉纱、花绒，纸厂需要的皮线和碱等物转运进来。转运局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奸商的违法活动，保证群众的物资供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合作社经济是苏区的主要经济成份之一。党和苏维埃政府都十分重视合作社的发展，因而合作社组织在比较巩固的苏区，是十分普遍的。很多县建立了总社，区成立了分社，乡成立了支社。苏区的消费合作社有两种：一种是由苏维埃政府投资经营的，一种是由农民集资经营的。前一种消费合作社多改为苏维埃商店，后一种消费合作社系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多是经营屠宰、豆腐、杂货等业。消费合作社便利了群众生活，减少了商人的中间剥削，在对敌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苏维埃政府的提倡和帮助下，消费合作社较普遍地建立起来，每乡至少有一个，医院、兵工厂、学校也建立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组织条例，苏维埃政府翻印了《合作社简章》，主要规定是：消费合作社由群众集股经营；入股者须是中农以下的工农群众；股份宜小，以五角或一元为一股；消费合作社贩卖的货物主要是食盐、煤油和布匹，奢侈品禁止贩运，等等。

私营商业也较活跃。当时苏维埃政府强调保障商业自由，

欢迎白区商人在不妨害革命的条件下来苏区经商，运进苏区需要的商品，推销苏区的土特产。当时龙港就有“公私”、“和记”等几家较大的私营商店。

总之，国营的苏维埃商店、转运局和合作社以及一部分私营商店，互相配合，对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维持物价的稳定，保障群众的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苏区的财政工作

湘鄂赣苏区的财政工作，前一个时期，由于没有严格的财政制度，造成了一些混乱，出现过贪污和浪费的现象。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统一全省的财政与税收，确定全省的预算与决算，反对贪污与浪费，清查过去的账目，实行财政公开。后来，省苏维埃政府又提出了整理财政的要求，明确其方针是：统一收支，开发财源，节约开支，充裕国库。

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1）苏维埃商店、转运局和国营工矿企业的利润收入。（2）没收逆产和筹款的收入（逆产，指土豪劣绅、祠堂庙宇的金钱财物。筹款，指当时组织的筹款委员会，到白区去筹款，主要是向白区的土豪筹款）。（3）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必须统一上缴，集中使用。财政支出要尽量节约。各机关团体所需费用，每月必须造具预算决算，严格审批手续。凡无预算的开支，不予报销。特殊情况开支的项目，确系必需的，经审批后才能报销，非必要的开支，则不予报销。一九三二年六月，省苏维埃政府发出财字第二号通令，确定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行政经费标准。如乡苏维埃政府，每月经费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十六元；各机关要紧缩编

制，以减少开支；红军和地方武装的经费，以自给为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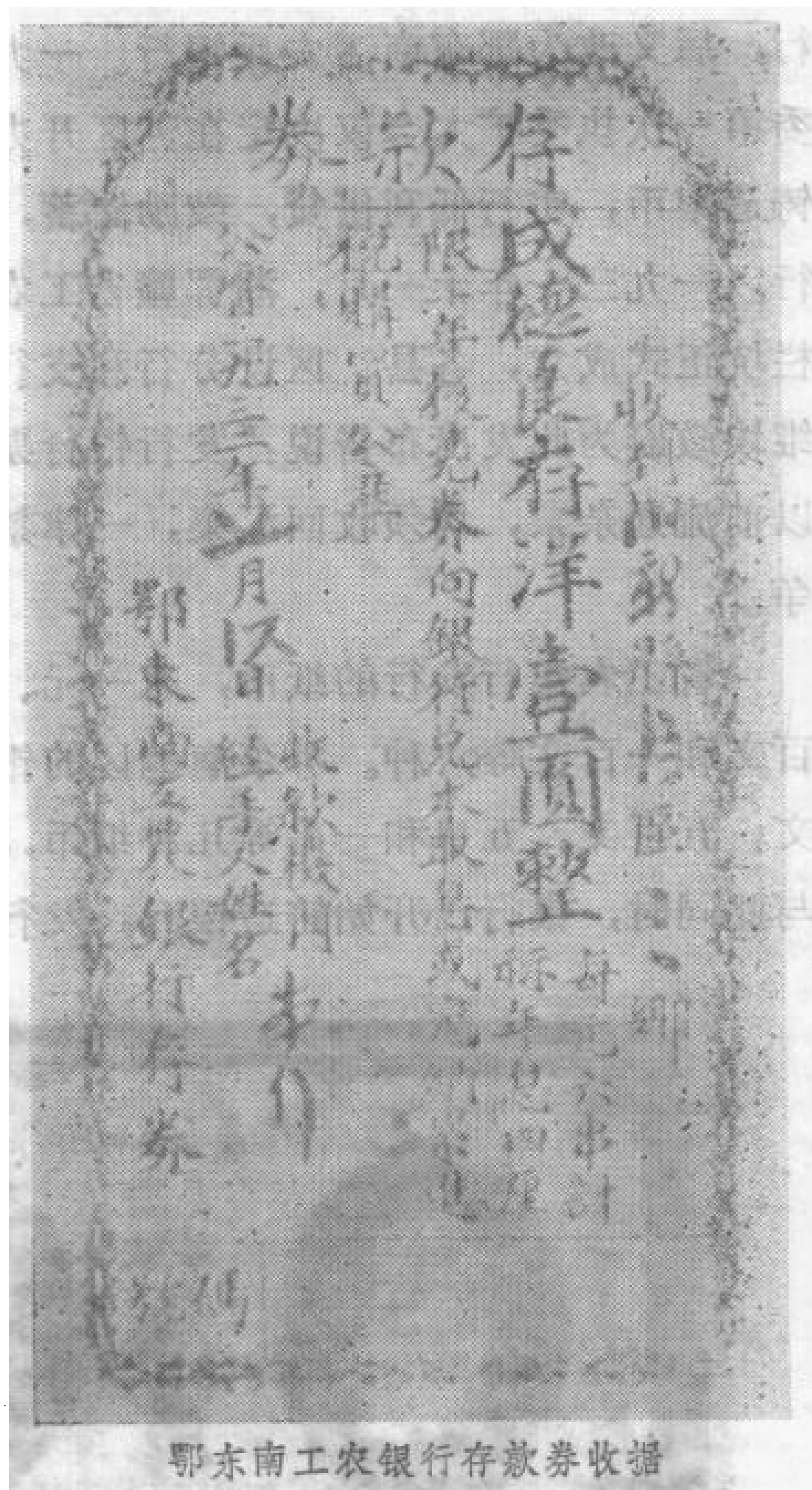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全省财政收支情况如下：收入：（1）向土豪筹款一千六百四十元；（2）没收逆产四千一百元；（3）苏维埃商店、转运局、金矿局盈余七千多元；（4）银行上交十四万六千多元。^①。共计收入一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余元。支出：（1）军队在省库支出九万元（在鄂东和各县支用的尚未计算在内）；（2）省级机关和医院给养支出七万七千八百元。共计支出一十六万七千八百元。收支两抵，尚亏九千余元。这说明，当时苏区的财政状况是十分紧张的。

为了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苏维埃政府曾试行过由银行发行票币来填补缺额的办法。但票币发行多了，币值下跌，仍然不能解决困难。一九三二年六月，苏维埃政府通令采取节约粮食和其他开支的办法：（1）全省各机关和革命团体每日一律吃两餐粥，一餐饭，多搭配红薯丝或其他杂粮。（2）各机关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每人每月不得超过大洋三元，超过者，公家不予津贴。（3）晚上用一盏灯或两盏灯集中办公，过夜灯只留一盏，以节约灯油。（4）重病无法工作者，始可延医吃药。鄂东南各县财政经济部长联席会议也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存款应如期上缴，不得随意保留；故意出卖公家没收的东西，要受到严厉处分；借用公家没收的东西，要照价付款；各革命团体的经费，一概以自给为原则，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得随意拨款；机关的冗员必须尽量裁减；凡领有生活费的人员，在各机关吃饭，必须按餐付钱；禁止蒸酒熬糖，违者即予没收；喂养牲畜，以蔬菜杂粮为主，禁止使用谷米。

^① 《湘鄂赣省苏维埃一九三二年的工作总结》，1933年3月。

一九三三年，苏区的粮食比较困难。前方红军和后方医院、各级机关尚缺粮食四万余担。当时，省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每人节约三升米帮助红军，每人储谷五十斤或二十五斤卖给红军，这样，共得粮食一万余担，尚差二万余担。^①

在财政严重困难的面前，苏区不因此而损害群众利益，仍坚决反对违反规定随意加重群众负担的行为。一九三二年春，宜萍县苏维埃政府曾向群众预征秋季农业累进税。万载县苏维埃政府向群众预征谷子几千石。省苏维埃政府发现后，为此发出通令，指出：“今后无论何种费用，困难到何种程度，都不得向群众借一斗米或一串甚至几百文钱，尤其是预征税收的国民党工作方式，更不允许沿用。如有胆敢违反这一通令，仍有向群众预征税收，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当予严惩。”^②



① 《湘鄂赣省苏维埃一九三二年的工作总结》，1933年3月。

② 《湘鄂赣省苏维埃财字第四号通令》，1932年6月19日。

三、苏区的银行事业

一九二九年，鄂东南地区在阳新大王店建立了鄂东农民银行，一九三〇年改名为鄂东工农银行，继而改为鄂东南工农银行，后又改为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一九三一年八月，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在苏区开办银行，发行和统一票币，铸造银币，实行低利借贷，鼓励储蓄，全省设总行，各县设分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在平江黄金洞牛栏坑正式成立，各县、区设分行和支行，并发行了纸币。省苏维埃政府为此发出布告说：“发行银行票币，一律现金照兑。以前流通杂票，均须收回汇集，一律禁止使用，避免混乱纷争。”

省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有一元、五角、三角、二角、二百文和一百文等六种。鄂东南地区的银行发行了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五串和一串等几种纸币，在鄂东南苏区流通使用。与此同时，银行已开始铸造银元，发行银币。一九三〇年，在



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

平江芦头设立造币厂制造银元，分大头、小头、五角星三种。所需原料，靠到白区打土豪搜集，或在苏区收买手饰供应。后来，由于敌人不断进攻而停办。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浏阳县委设立的造币厂的基础上，设立了“湘鄂赣造币厂”。该厂从兰冲搬到坪坪庙，每天可铸造银元三百八十多元。省币发行后，杂钞收回，克服了苏区金融市场的混乱状态，打击了敌钞劫夺根据地物资的企图，对稳定物价、发展根据地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银行资本尽量用于生产方面。矿山工厂需要借款，经批准后由银行供给，而银行得随时监查这些矿山、工厂的工作情形。银行还配合信用合作社，开展借贷业务。借贷的限期，工农为四个月，商人为两个月，借款利息，群众是一分，商人则为一分六厘。储蓄利息，短期的为六厘，长期的为八厘。这对苏区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银行在苏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发生过纸币发行过多的错误。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烧杀政策，苏区物资极其匮乏，粮食恐慌，食盐、煤油等价格高得出奇，红军、苏维埃机关和医院给养难以解决，财政赤字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银行发行纸币增多。到一九三二年四月，省工农银行已发行纸币三十万元，而准备现金仅四万余元；鄂东南银行发行纸币达五十万元。银行发行的票币无法兑现，在群众中失去信任，市面上不易流通，平、浏、修、铜一带发生阻滞现象；鄂东南地区币值低落，工商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都受到影响，政府的工商业税收亦因之减少。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统一票币的价格，反对滥发票币，银元在苏区准许流通，但绝对禁止出口。四月，省苏维埃政府作出决定，银行不再发行

一文票币，省银行已发行的限定三个月内全部收回，所需银元十万元，由各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十六军分担筹措；鄂东南银行的票币，则由鄂东南苏维埃政府于八月以前收回。票币收回后，即取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再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给以现金帮助之下，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分行”。当时，各县和红十六军银元均较缺乏，各县分担收回票币的银元，直至六月份，除修水县交来一百九十元外，其他各县均未交来。票币难以大量收回，价值日趋下跌，币值贬至三、四折。一九三三年收回了五万多元。但因军需紧急，又发行了一些票币，除收回者外，在市面流通的仍有十九万多元。为了筹措战费，一九三三年初，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决定发行短期公债券五万元。公债券面分五角、一元两种，利率为年利一分。规定到一九三三年底，由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负责归还本息。这一措施，缓和了当时财政收支的矛盾。

四、苏区的税收工作

苏维埃政府以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了正确的税收政策，增加了国库收入，使群众的负担得到合理的分配。

一九二九年十月，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发布《革命政纲》，宣布：摧毁剥削群众的税收机关，如厘金局、杂税局等；焚毁粮册及地主田契借券；取消湘鄂赣边三省反动政府之一切苛捐杂税，由苏维埃政府重新设立单一的累进税。

为统一做好税收工作，省县都成立了税务局，区、乡由国家银行代收。发现违反税收政策、增加人民负担的现象，立即进行纠正。一九三〇年，苏维埃政府的税收，有农业累进税、

工商业累进税、商品进口税三种，税值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这就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对于农业累进税和商业累进税的征收办法，具体规定为：农业税征收率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十五，累进到百分之二十五为止；粮食之外，其他农产品每年征收一次，折合谷价计算，合并征收；商业税征收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五，成本在四百元以上的，不管多少，只按百分之二十五征收。参照上述税则，湘鄂赣苏区结合本地情况，征收农业、商业累进税，农民负担一般都有所减轻。据平江县枚团区东茅墩农民税收负担统计，一九二八年每人平均负担五元左右，一九三〇年每人平均负担下降到一元左右，一九三一年继续减少，每人平均只有八角左右。

第五节 苏区的文教卫生事业

一、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不但要求成为土地的主人，也要求成为文化的主人。尽管当时物资困难，教师缺乏，但苏维埃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依靠农民群众，兴办了一些学校，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他们利用祠堂庙宇作教室，用砖块和木板搭成桌凳，把一些稍具文化知识的人吸收到教师队伍中来，在教课中提高自己。许多学校就这样因陋就简地办起来了。这些学校虽然非常简陋，却是新型学校。学生入学的年龄和资格不受限制，只要是工农子弟和红军子弟，而又有读书要求的，均可

入学。因此，十五、六岁的小学生到处可见。这些学校，打破过去陈腐的教育制度，与根据地的生产和战斗结合在一起，为生产和战斗服务。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规定，苏区的教育目的是：“以教育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造就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技术等专门人才，培养儿童有集体的思想、革命的热情、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投身阶级斗争，以推翻反动统治，巩固苏维埃政权。”^①在施教的具体过程中，苏区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军阀主义教育，禁止采用国民党党化书籍作为教材；反对复古主义和封建教育，禁止采用四书五经作为教材，不许学究先生教老书；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消除崇洋媚外思想，崇尚民族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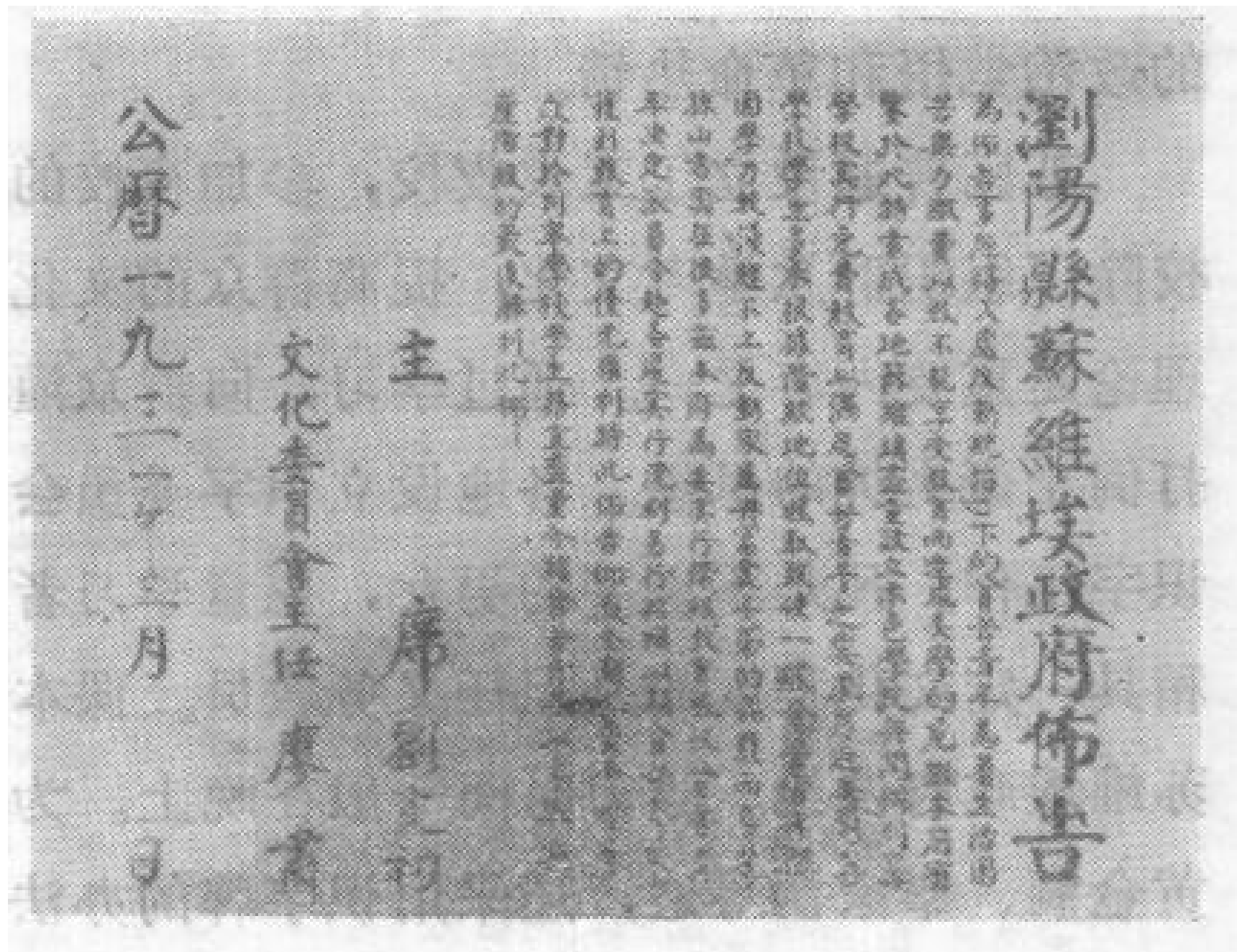
苏区的学制当时规定有普通学校、专门学校和研究院三种。普通学校有幼稚园、列宁小学和特别学校（教育残废等特别儿童）。三岁至七岁的儿童入幼稚园，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入列宁小学。列宁小学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为四年，后段为三年。专门学校有赤色女子职业学校、工场学校、农场学校和教员养成学校等。如浏阳女子职业学校，每周授文科十八小时，职业科目有缝纫、染织、编物等。这种学校多是半耕半读，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学习期满后，即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技能。此外，为适应各种需要，还设立了相应的专门研究院。

当时，苏区处于战争环境，财经也很困难，颁布的学制无法全部实行，一般只在每乡设立列宁小学一至三所，每县设立列宁高小和女子职业学校各一所。万载和修水办的列宁高小和

^①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字第一号训令，1932年5月。

职业女校，学生一律免费。万载有列宁小学一百四十六所，大冶有二百零三所。当时，浏阳的教育事业也是比较发达的。“一九三一年上期，该县计有列宁学校四所，学生二百一十一名，其中男一百四十四名，女六十七名。赤色小学校一百一十六所，学生四千二百三十七名，其中男二千九百八十三名，女一千二百五十四名。赤色女子职业学校一所，学生六十名。特别赤色小学校（专教育孤儿及避匪民众子弟的）一所，学生三十名，其中男二十七名，女三名。妇女半日学校十二所，学生二百五十六名。工农夜校十五所，学生二百八十四名，其中男二百一十名，女七十四名。共计男女学生五千余名。”^①

在教学方法上，学校针对不同年龄的教育对象，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禁止对学生体罚；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开展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后来列宁小学还增设军事教育课程，每周有两小时左右的持枪训练。学校课本一般由县苏维埃文化部门编辑，交省苏维埃文化部审查出版。课本内容，多是灌输革命思



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关于发展
农村教育事业的布告

^① 《暴动周刊》第十三期，浏阳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出版，1931年5月26日。

想，也包括一些知识性的介绍。这样，使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都得到发展。如小学《红孩儿读本》第一册中，有这样的课文，

小弟弟，年纪小，
常恨自己力量小。
他说：土豪又高又肥胖，
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
我说小弟弟莫心焦，
莫怕拳头小，只怕拳头少，
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
要把土豪打成泥！

苏区的社会教育，主要是扩大党的政策宣传，扫除文盲，破除封建迷信，丰富工农群众的文化生活，从而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

苏区普遍设立了工农夜校，参加夜校的多为成年男女。夜校除了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外，学习革命理论是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学习，向群众灌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思想。各地设立识字委员会，计划扫盲和指导识字工作。凡是不识字的男女，愿意学习者，都可参加。推选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担任义务教员。课本是《工农读本》，由苏维埃政府发给。学习时间一般在晚上。为了方便群众，平江黄金洞、事家洞等地，还采用识字牌的办法：在十字路口或往来行人经过的地方，竖立一块黑板，用粉笔写上一些有关生产和生活的字，如马、牛、羊、柴、米、油、盐等。有的还在字旁配上图画，便于农民群众识别记忆。

苏区还利用各种纪念日，对群众进行社会宣传和社会教育。

一九三一年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规定的休假纪念日有：一月二十七日——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日；二月七日——“二七”惨案纪念日；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四月十二日——上海惨案纪念日；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五月卅日——上海五卅运动纪念日；七月二十七日——红军夺取长沙纪念日；八月一日——全世界反帝运动日；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

二、文化出版工作

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红旗出版社。出版社最初采用油印，成立木梓局、印刷局以后，采用石印。除印制各种文件外，出版发行了报刊、书籍、革命歌曲和革命传单等。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先后出版了十多种报刊。有省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战斗报》，先为日报，后改为三日刊，共出版一百多号。有《工农战斗画报》，共出十一期，每期印数为一千五百份。有报道苏区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红旗报》和《红旗小报》。另外还有《列宁青年》、《儿童实话》和《工人生活》等。各县出版的刊物中，较为著名的有阳新的《无情斧》，每月出刊一期，内容丰富，有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现状的分析，有对工农出路的研讨，有对当地群众生活状况的报道等文章，并附有歌谣之类的文艺性质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影响，每期销售达两千份。平江县的《平江农村周报》，内容多为评述农村的斗争和报道农民群众的生活，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其他如万载的

《红色万载》，也有自己的特色。

出版的书籍有《列宁主义浅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歌谣、戏剧等。另外还出版发行了有关识字运动的材料和挂图，以及初级列宁学校的读本等。

当时各地自编自演的新戏，很受群众欢迎，出现了一些如《送夫当红军》、《十恨民团》和《罗伟就义》等好的剧本。

此外，苏区还创立了文工团和俱乐部。文工团多则几十人，少则十儿人，分演戏、唱歌、跳舞等组，在不妨碍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各项文娱活动，满足群众的文化娱乐需要，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群众团体，都建立有俱乐部（又叫列宁室），用以组织工农群众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平江长寿街俱乐部，有读报、打拳、唱歌、打球、讲故事、唱“莲花落”等项目，深受群众喜爱。很多县和一些城镇设有赤色图书馆，有些地区还有下乡的流动图书箱，满足群众精神食粮的需要。

三、卫生保健工作

当时苏区处于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但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是十分重视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开办医院，培养医务人员，扩大药物来源，进行卫生宣传，预防病疫流行，增强群众体质。

苏区先后创办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红色医院。这些医院，主要为红军伤病员服务，农民群众持有当地苏维埃政府证明的，亦可免费治疗。鄂东南地区一九二九年在通山县王文四角山开办的“红军后方医院”，后改为鄂东南红军总医院。这个医院到一九三一年，两年间治愈伤病员一千多名，给周围农

民群众五百多人治了病，为小孩接种牛痘五百人次。后在总医院之下增设龙港、四顶山、沙子店、留祖桥、燕厦等五个分所，更加方便了群众。万载县苏维埃政府一九三〇年二月在花桥包家山创立了后方医院。一九三二年，省卫生部聘请医师，设立群众医院，并在医院内附设医师训练班，培训医务工作人员，同时协助互济会购买痘苗，发动群众种痘。

一九三二年六月，省苏维埃政府卫生部颁布《市政卫生条例》，规定在街头巷尾设立公共厕所；不准随地吐痰；小贩摆在摊子上的食物，应用清洁器具遮盖；禁止贩卖病死的猪、羊、鸡、鸭、牛与腐烂的食物，等等。同时省苏维埃政府还发出训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团体，加紧领导群众，开展捕蝇灭蚊运动。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苏区经常开展大扫除运动，开展卫生检查，不断提高了卫生水平。

对于其他福利事业，苏维埃政府也给予了相应的注意。

第十章 第三次“左”倾错误在 湘鄂赣省的全面贯彻

第一节 湘鄂赣省委第一届第三次 执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一、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临时省委的成立

湘鄂赣省委第一届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后，中央认为“省委仍然没有彻底转变到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上来，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必须予以彻底改造，因而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来湘鄂赣苏区。代表团成员包括来担任省委书记的林瑞笙，全国总工会巡视员陈佑生（后叛变），来担任少共省委书记的郭潜（后叛变），以及严图阁、谭凤鸣等。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带着彻底改造原省委、坚决转变路线的任务，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修水上衫。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孔荷宠等，也同代表团一起回来了。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省委在上衫召开了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代表团的代表外，还有李宗白、赖汝樵、杨幼麟、于兆龙、胡梓、黄志竞、杨琦、胡筠等四、五十人。会议听取了林瑞笙的政治报告，经过对原省委的揭露与批判，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同时，还讨论了“红军与地方

武装问题”，“接受全苏大会决议法令和苏维埃问题”、“工会和群众工作问题”、“CY工作问题”等。会议认为，这些问题不需要单独作出决议，因而决定将讨论的结果搜集起来，委托新的省委起草一个“三个月工作计划”，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执行。

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虽然对湘鄂赣省全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几年来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定的肯定，但认为过去省委的政治路线却是不正确的，在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前，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在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后，虽然开始接受了国际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实行真正的转变，仍然是违背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是李宗白、杨幼麟，而对这些错误采取公开调和倾向的是于兆龙。

会议从“左”倾错误观点出发，对原省委以下几个问题集中进行了批判：

（一）认为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是对政治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消极的，死的，最多“贴在墙壁上”，“挂在负责人的口头上”。认为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向下崩溃与沉没”，不可能发动第四次“围剿”。

（二）认为原省委坚持以平浏为中心根据地，没有明确地提出以修水、铜鼓、万载为中心根据地，积极向东南发展，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这就在发展方向上，妨碍了六届四中全会所规定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中心任务的完成。

（三）认为原省委指挥红军“完全停留在游击时代的游击主义”，今天东征，明天西击，没有确定的方向，没有正规的军事政治训练，没有把扩大红军和创造铁的红军当作第一等任务。

会议主张红军搞正规化，打阵地战、堡垒战。

(四)认为原省委“平浏地域观念”严重。因此，在反“平浏地域观念”的口号下，大批排斥从平浏地区出来的、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干部。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前夕，原省委从平浏等地调集一些干部，准备派往鄂东南等地工作。林瑞笙、陈佑生等认为，这是平浏地域观念的反映，应该停止派遣。因此，原来调集的干部，有的被遣回原地，有的被派到红军第五分校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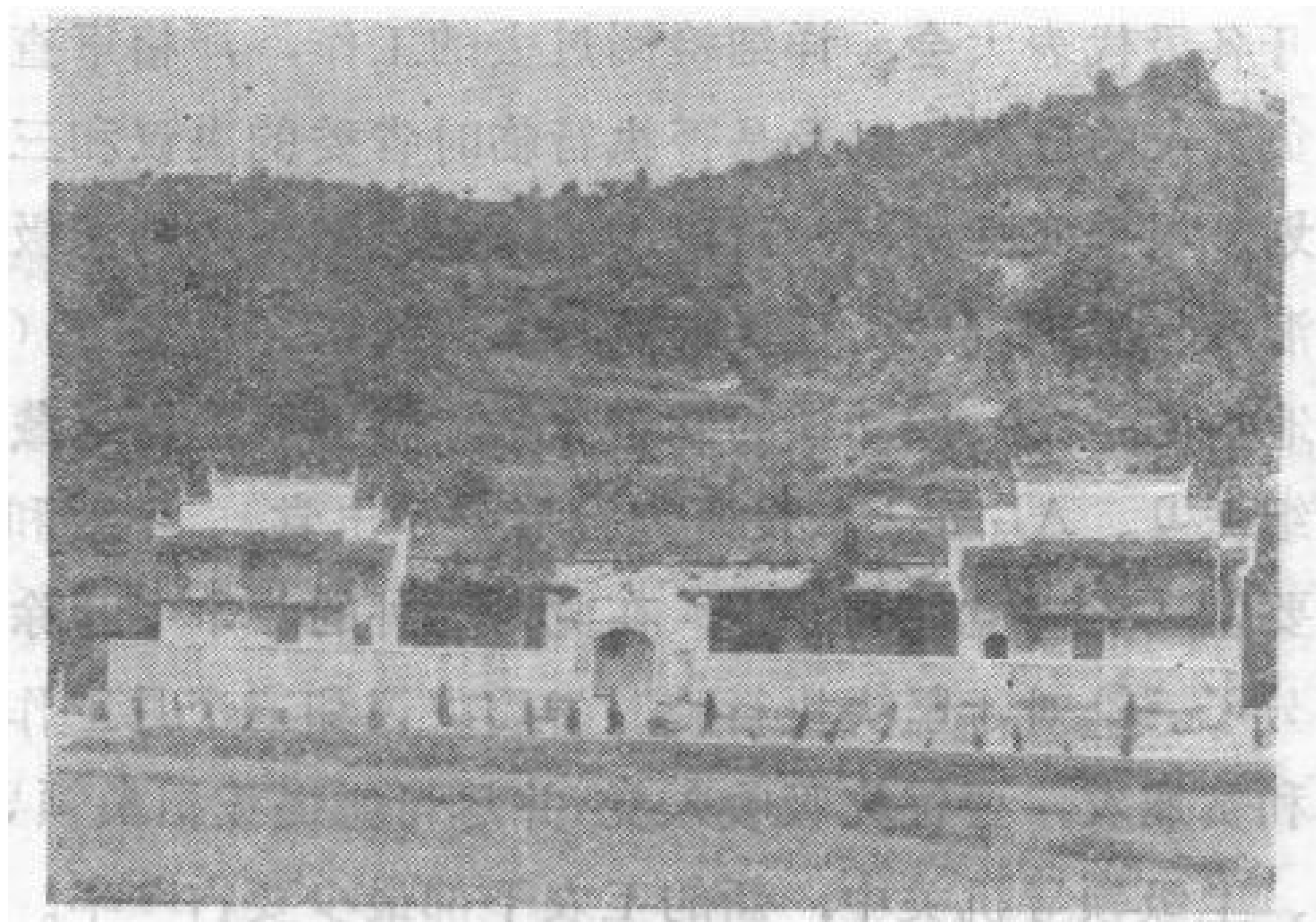
会议在揭露和批判原省委的同时，详细分析了原省委犯错误的原因。林瑞笙在大会报告中说原省委犯错误的根源是：“(一)过去盲动主义和立三主义中毒太深；(二)右倾托陈取消派的思想影响不小；(三)旧省委成分多系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分子只有一个；(四)黄火青传达中央和国际路线的不彻底不详细，甚至有些地方有无聊的曲解。”^①

扩大会议根据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撤销了以李宗白为首的原省委，推举林瑞笙等成立临时省委，林瑞笙为临时省委书记。以林瑞笙、胡梓、杨琦、蓝桥、黄加高、洪紫青、陈桂生等七人组成临时省委常委，执委还有刘建中、江运樊、孔荷宠、黄志竞、郭子明、刘学昊、徐洪、周国辉、樊明德、何周章、张和、喻俊青、包小山、周长工等十四人。^②

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还宣布：一笔勾销原省委所发布的一切文件和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同志，坚决执行共产国

① 林瑞笙：《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载1932年4月25日出版的《湘鄂赣红旗》第2期。

② 湘鄂赣临时省委给中央的第一号简报，1932年7月20日。



万载小源中共湘鄂赣省委机关旧址

(1932年4月—1934年1月)

际、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和临时省委的一切文件和决议案。这样，就为第三次“左”倾错误在湘鄂赣苏区的全面贯彻铺平了道路。

二、临时省委三个月工作计划及其实施

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后，临时省委特别强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了执行向东南发展的任务，于四月间将省级机关从上衫迁至万载小源，并根据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制定了一个四、五、六三个月的工作计划，要求各级党组织遵照执行，并派出巡视员分赴各地检查督促。四月二十日，还发布《告同志书》，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彻底认识原省委过去的错误，坚决转变党的全部工作，完成三个月工作计划。

三个月工作计划要求在三个月内召开湘鄂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要求在大会召开前，各基层支部及区、县党组织，都

要召开各级代表大会，详细检阅过去的工作，严格审查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的成分，以及是否执行临时省委的决议和三个月工作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改组另选，“坚决洗刷消极怠工，腐化浪漫、脱离群众、违反群众利益的阶级异己分子（富农、豪绅地主的子弟）和动摇的知识分子，特别要洗刷暗藏在党内的改组派①、AB团、恋爱研究社等分子出党。不要和平的洗刷，要发动党内党外的斗争，在党内党外的斗争中开除以上这些坏分子。”②对于坚决执行临时省委决议和三个月工作计划的工人和贫雇农，要优先吸收入党，并尽可能提拔担负领导工作；在中、上级领导机关中，新的工农干部最少要占一半。各级党组织在红五月里要公开征收党员两个星期。三个月内，全省要发展新党员二千六百名。

三个月工作计划要求改造各级苏维埃委员的成分，召回地主富农出身、犯了错误及兼职过多的共产党员，分配其他工作。提拔当地工农干部到苏维埃指导机关工作。为了巩固修、铜、万根据地，扩大苏区，规定三个月内修水须扩大到全县面积的五分之三，铜鼓扩大到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二，万载扩大到全县面积的五分之四。鄂东苏区要与鄂南苏区、修水苏区打通。

三个月工作计划要求改造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成分，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和改组派、AB团等，提拔和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使他们担任军事政治的指挥员。尽量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各地

① 改组派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国民党派系之一。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合流，但内部又发生矛盾，汪精卫、陈公博等组织在“野”反对派，既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又反对共产党的工农革命，打着改良主义旗帜，戴上国民党“左”派的假面具，以第三条道路相号召，迷惑、欺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② 中共湘鄂赣省临时省委三个月（四、五、六月）工作计划，1932年4月4日。

除供给独立师的战斗员以外，还要选送一万名新兵给红十六军和中央苏区。四、五、六三个月内先扩大四千名，三千名给红十六军，一千名给中央苏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不妨碍工作的前提下，应当大批地参加红军。

三个月工作计划中，还对土地革命、经济工作、肃反工作、白区工作以及机关工作作风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作了一些规定。

根据三个月工作计划，临时省委以改造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分为中心，在苏区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作。

四月一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省苏维埃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临时省委的提议，认为在执委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赖汝樵、杨幼麟、李宗白、李楚屏、胡梓、杨琦、于兆龙、刘彦、丁庭松、周达、辛克明、方幼梅、徐升平等十三人，因成分不好，犯了错误，或兼职过多，不宜留在省苏维埃政府中负责，须公开召回，分配其他工作。所遗缺额，推选了王显德、彭德怀、包小山、黄廷厚、王有华、樊象日、陈世南、雷赤群、严图阁、明瑞卿、宋桂香、汤明山、韩祖盛、王桂林等十四人予以补充。加上原来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刘建中、涂正坤、袁凤英、张怀一、刘文初、孔荷宠、陈桂生、黄志竞、郭子明、曹玉阶、盛茂炯、廖鸿禄、廖畅一等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之一——万载小源（1932年4月—1934年1月）

十三人，共二十七人，重新组成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推定王显德、彭德怀、刘建中、包小山、袁凤英等五人组成主席团，以王显德为主席，刘建中、彭德怀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四个月行政计划》，作为湘鄂赣省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行政方针；宣布省苏维埃政府过去颁布的一切法令、政纲、文告、决议等，一律无效；并决定八月十五日召开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改选执委；还决定撤销湘鄂赣省鄂东南办事处，在六月份召集鄂东南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鄂东南苏维埃政府，仍归省苏维埃政府管辖。

各群众团体也进行了改组。遵照临时省委的指示，省总工会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撤换了一部分原来的执委，产生了新的执委，推举傅秋涛为委员长。临时省委还撤销了原来的少共省委，成立了少共临时省委，由郭潜担任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委还否定了三月十八日召开的省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和四月十二日召开的全省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其人选。

与此同时，临时省委把肃反同改造各级组织结合起来，以AB团、改组派等罪名，逮捕了一批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清理各级机关中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排斥认为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团员；在军事工作中，大搞所谓“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在土地革命和查田、查阶级中，强调按劳动力给富农分配坏土地，按人口给中农贫农分配土地。从此时起，一些人的不正派作风开始盛行，常常把“旧省委”的错误和“新省委”的成绩相比较，把一切错误归咎于“旧省委”，把一切成绩归功于新省委，并且尽量予以夸大，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由于三个月工作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许多没有完成，临时省委又于七月份制定了一个“参战计划”，八月份还制

定了一个全省革命竞赛的“冲锋计划”，进一步做了一些工作。这样，就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组织上，为全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第二节 湘鄂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湘鄂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万载小源韩家祠堂召开。

召开这次党代会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全面地、深入地贯彻“左”倾路线，同时使临时省委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合法化。大会听取了林瑞笙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批判了原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通过了《宣言》、《政治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对CY工作的决议案》、《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问题决议案》、《肃反斗争决议案》等十一个文件。选举了林瑞笙、陈佑生、黄加高、傅秋涛、张金楼、孔荷宠、陈桂生等为省委委员，成立了省委，省委书记仍由林瑞笙担任，副书记陈佑生。

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分别给大会发来了指示电，要求大会接受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建议大会不必另选书记，仍以林瑞笙为书记，并决定把陈佑生暂时留在湘鄂赣，从事工运工作；指示省委以最大力量做工会运动，实行劳动法，进一步提高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加入红军的积极性，以巩固无产阶级在政权中，在红军中，以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大会在中央的指示下，不得不接受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并写进相应的决议案。

大会政治决议案肯定：自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来，临时

省委忠实于中央局、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推翻了过去右倾机会主义的原省委，政治路线一般是正确的；临时省委在五个月的斗争和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党和红军都发展了，党员增加了两万多人，红军增加了枪支三千以上；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负责人的成份也有了普遍的改变，工人、贫农、雇农出身的干部，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确定了巩固修、铜、万为根据地、向东南发展的中心任务，发展了一部分新苏区，在发展方向上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大会认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苏联取得伟大成就，帝国主义的危机却更为加深。帝国主义企图从进攻苏联和世界革命中解脱危机，缓和矛盾。因此，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是“箭在弦上，十万火急”。同时，中国革命的时机更加成熟，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更加动摇崩溃，红军战争的发展已形成了包围武汉与南昌的局面。因此，红军实行全线出击，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争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更有把握。目前革命的中心，就是“以革命的进攻回答敌人对革命的进攻”。

大会确定，湘鄂赣省党的总任务是：积极领导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党的组织到十万党员，扩大红军一倍，加紧巩固修、铜、万根据地，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猛烈向东南发展，建立新苏区，夺取大城市，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为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奋斗。

为了认真贯彻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各种组织在大会前后展开了活动。

在召开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前夕，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在万载小源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参加会议

的代表一百余人。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红军问题等十一个决议案，正式选举了王显德等二十七人为第二届省苏维埃执行委员，同时成立了新的省苏维埃政府，推选王显德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彭德怀、刘建中为副主席。

省党员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省总工会召开全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贯彻省第二次党代会决议精神，并选举了傅秋涛等二十一人作为省总执委会执委，由傅秋涛担任委员长。随后，召开了全省妇女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省第二次党代会的精神。九月，少共临时省委召开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贯彻省第二次党代会《对CY工作的决议案》，正式成立了少共省委，由郭潜任少共省委书记，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积极推行“左”倾路线。另外，省反帝大同盟、省互济会也相继召开了会议。

与此同时，省委决定成立高安中心县委，负责高安、靖安、安义、上高、清江等县工作。并分别派出三个工作团，深入白区发展组织。一九三三年一月，又成立赣北工作委员会，去德安开展工作。不久，九（江）、德（安）、瑞（昌）办事处和修铜宜奉中心县委相继成立，积极完成向东南发展的任务。四月二十三日，在浏、宜、万各县举行反帝群众大会，大造声势。五月十日，在省苏维埃执委扩大会议上，更换了王显德，由何振吾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仍由彭德怀、刘建中继任。六月，全省少先队进行第一次总检阅，编成少先队模范营，号召少先队员发扬“冲锋”、“竞赛”精神。随后，郭潜被调回中央，少共省委书记由邱策新担任。十一月，召开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检查布置扩红、支前和反罗明路线等任务。

总之，湘鄂赣苏区自省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后，以

林瑞笙、陈佑生为首的省委，在政治上，积极推行第三次“左”倾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各项工作；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打击了大批好干部。新上台的，多为执行“左”倾错误更为坚决的分子。党员干部稍有不满意，即诬为“右倾机会主义”、“AB团”、“改组派”等，受到残酷迫害。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不正派的作风开始盛行。使苏区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第三节 苏区的肃反工作

对于湘鄂赣苏区，敌人一方面从外部打击它，一方面从内部破坏它。早在一九二八年，平江就发现“四七团”等反革命组织。一九二九年，浏阳的反革命分子潜入苏区，张贴反动标语，进行破坏活动。这个时期，反动组织人数较少，活动范围亦不大，但在苏区陆续有所破获。据记载，一九三一年初，开始发现“改组派”、“AB团”、“恋爱研究社”、“白军团”、“姊妹团”等反动组织。“改组派”在鄂东南曾进行过有组织的活动。据阳新、大冶、通山等地破获的“改组派”的口供说，这个组织准备在苏区搞“暴动”，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浏阳、万载、宜萍、修水、平江、通城、铜鼓各县，“AB团”和“恋爱研究社”等，活动也十分猖獗。根据以上情况，苏区先后开展了肃反运动，在湘鄂赣省委成立后一个时期，肃反运动便大规模地进行了。

一、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前的肃反工作

湘鄂赣省委成立前夕，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湘鄂赣边特

区委曾发出第一号通告，提出关于肃反工作的意见。通告指出，反革命派在苏区的潜伏和活动，是革命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革命斗争愈激烈，敌人的这类活动则愈加厉害。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肃反工作当作唯一的中心工作，认真进行。并决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建立由五至七人组成的肃反委员会，担负肃反工作。通告强调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宣传、侦察、拘捕以及公开审判等工作；注意消灭敌人中的坚决分子，争取动摇分子；不能滥用刑讯，不可专凭口供；必须做到不放掉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这一通告发出后，肃反运动便逐步开展起来了。

七月，湘鄂赣省委成立后，肃反运动进一步开展。省成立了保卫分局，由赖汝樵兼任局长。当时，由于肃反运动是一项没有实践经验的新工作，由于通过运动逐步增长起来的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心理，也由于主观思想脱离客观实际而对反革命活动的不正确估计，以致在实际斗争中，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偏向，有些地方甚至还很严重。修水等县曾提出以肃反代替一切的口号。很多单位随便捉人，刑讯逼供，任意处决，造成了乱供、乱捕、乱杀的严重情况。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发现了这些问题，省委书记李宗白曾指出不能以肃反代替一切，要根据阶级地位和社会关系、工作历史和斗争表现以及反动罪恶的轻重来区别是否反革命分子。尽管这样，却未能制止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据统计，在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前，全省被处决的人先后达五千多名。其中，鄂东不下三千，修水和红十六军不下五百，平浏铜宜不下两千。上述被处决的人中，虽有一些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也有不少是贫苦工农出身的战士、工作人员和工农群众，其中多数是被胁迫被欺骗而犯有错误的，

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除了许多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外，还错误地组织驱逐队，把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和地主豪绅的家属，用武装押解出境，以肃清所谓“反革命的社会基础”。这些问题，在湘鄂赣省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得到了揭发和批判。

二、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后的肃反工作

在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湘鄂赣省原省委肃反中的问题，曾被指责为犯有简单化、扩大化、非阶级路线的错误。会后，临时省委也进一步开展了肃反运动。不同的是，他们基于贯彻那一套“左”倾错误的需要，把肃反运动的重点从社会上转移到了内部。

临时省委认为，湘鄂赣苏区反革命党派的组织与活动仍然是很严重的，其势力并没有减少。因此，对一切反革命团体必须采取进攻策略，严厉处置豪绅地主残余和富农分子等反革命派，对于工人贫农出身的人，准其悔过自新，但倘系坚决的反动首领，即使是贫苦工农分子出身的，也应严厉处置。

在组织上，临时省委撤销了原保卫分局局长赖汝樵的职务，由涂正坤代理保卫分局局长；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竭力帮助保卫分局开展工作，但不能包办；各级保卫局未经上级保卫局许可，不得逮捕同级负责人，但在特殊条件下则例外。这样，就赋予保卫分局以极大的权力，使它实际上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一九三二年四月，临时省委在修水宣布了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分局的新成员，委员有涂正坤、郑宝、曹衍安、周益春、罗□、林焕然、傅秋涛等七人。同时，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萍、通城、修铜宜奉、鄂东南、阳新、通山、

大冶、咸宁、鄂城、武宁和红十六军、红独立一、二、三师建立了十九个分局，负责肃反工作。

在此基础上，临时省委把肃反工作同所谓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结合起来，同反对所谓“平浏观念”纠缠在一起，不加区别地把敌人的破坏同我们工作上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大肆逮捕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据记载，当时被拘捕、审讯或处决的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省反帝大同盟主任张警吾、省互济会副主任胡筠、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红十六军组织部长刘英杰、红十六军九师政委李幼军、红十六军团政委汤钊、红三师政委叶金波、万载县委书记何曾益、铜鼓县委书记王楚来、平江县委书记王直、浏阳县委书记左之前、蒲圻县委书记高飞、阳新县委书记罗冠国等。同时规定，凡是领了“白符号”^①的群众都是肃反对象，都必须逮捕审查。保卫局还成立了直属保卫队，动辄以“AB团”、“改组派”等罪名捕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据当时统计，一九三二年内湘鄂赣苏区因反革命案被各级保卫机关拘捕的约五百四十人，因反革命嫌疑被拘捕的约二百人，因刑事犯罪或领“白符号”、捐钱捐米资敌而被拘捕的四百余人，共计一千一百余人。这些人中，当时被处决的有一百四十余人。其中政治犯约占三分之二；准许悔过自新的约三百人；宣告无罪释放的约四百三十余人；在关押中病死的约八十余人，年底在押的一百四十余人。这种做法，特别是以“改组派”、“AB团”或“托派”的罪名，随意拘捕、轻意处决一批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开始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出了力的知识分子干部的做法，造成了

^① 国民党反动派“清剿”时，强迫群众领取白符号，以示悔过自新。

苏区极大的恐怖。崇阳、通城等县曾发生过这样极不正常的现象：区委向县委会报工作，在山头喊话，不敢见面，怕被杀掉。会报完毕，最后总要说一句：“我是好人。”人心惶恐，一至如此！而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真正坏人，则利用这种情况，采取“以赤制赤”的办法，达到破坏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目的，造成了许多恶果。

为什么临时省委一方面指责原省委肃反简单化、扩大化，而自己却又大搞简单化、扩大化呢？

在思想认识上，他们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认定每一个机关团体都有反革命。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和被认为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都看成是投机革命的分子，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这些人将逐步动摇叛变，由投机革命发展到反革命。他们用这种推论，作为理论依据，处决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和所谓地富出身的干部。

在组织上，他们使各级政治保卫局超越于党和政府之上，严重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在得不到党和群众监督的情况下，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鄂东南保卫分局局长明安福，根本没有经过鄂东南道委研究，就逮捕了道委副书记王应金，甚至准备逮捕道委书记胡梓。

在方法上，各级政治保卫机关的干部在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不重调查研究，以致发生乱供等情况，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直到中央发出明令，停止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分局的捕人之权，并派出新的领导后，问题才基本上得到解决。

湘鄂赣苏区的肃反运动，虽然打击了一些敌人，但也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削弱了党政机关和红军的力量，使革命团体

受到损伤，这不能不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四节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二年六月，正当林瑞笙、陈佑生还在高唱敌人不可能再次进行“围剿”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湘鄂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虽然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提出了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但林瑞笙却辩解说：旧省委看见敌人进攻严重，就惊慌失措，看不见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红十六军，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狂喊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他虽然承认临时省委取消这一口号是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又说临时省委的实际工作成绩“无论如何比旧省委多些，好些”。

临时省委这一政治上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没有充分进行；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工作，没有努力去做；动员群众参战的工作，没有认真实行。党内一些干部对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问题仍无深刻的理解，没有认识到第四次反“围剿”将比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间更长，情况更严重，因而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直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省委在苏区中央局一再指示下，才不得不召开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接受中央局来电，纠正省委机会主义的错误，不动摇的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全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的决议》。

敌人在第四次“围剿”中，进犯湘鄂赣苏区的兵力部署大致是：彭位仁的十六师和李觉部驻平江、浏阳，陶广的六十二师

驻万载、萍乡，朱耀华的十八师驻宜春、分宜，罗霖的七十七师驻宜丰、上高，刘夷的独立三十二旅驻武宁，岳森的五十师驻修水、铜鼓，郭汝栋的二十六师驻阳新、大冶，谢彬的新编十师驻通城、崇阳，袁英部驻蒲圻。

敌人进攻的策略是：以重兵包围苏区，占据较大城镇，修筑碉堡，截断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在这种策略指导下，平江之敌由长寿街向龙门进攻，并进占嘉义、平南一带；后又深入朱溪厂，企图与修水之敌取得联系。但修水之敌受到鄂东南革命势力的牵制，不敢深入湘境。浏阳之敌，由古港、永和、达浒进驻东门、文家市一带。原萍乡之敌则由万载黄茅进驻浏阳张坊。修水马坳之敌向渣津进攻。铜鼓排埠之敌向张坊苏区骚扰。万载、宜春等县之敌多龟缩县城，不敢外出。大冶之敌进驻殷祖、刘仁八，阳新之敌企图进占龙港，通山之敌进驻花桥、石家。

针对敌人的兵力部署，湘鄂赣省委采取的战略是：巩固修、铜、万各县苏区，力争苏区之间，特别是同鄂东南苏区之间取得紧密联系，使湘鄂赣边区革命势力打成一片，以利在斗争中互相支援；红军及地方武装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意图，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作战；湘鄂赣省主力红军集中行动；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担任截敌、堵敌、扰敌的任务，使主力红军养精蓄锐，在运动中选择时机消灭较弱的敌人。

反“围剿”战斗开始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红十六军和红独立一、二师联合进攻铜鼓县丰田的敌人。红独立一、二师首先包围丰田附近之排埠，红十六军一、七两团围歼铜鼓出援之敌，红十六军九团担任正面攻击任务。激战一小时后，我军占领丰田，全歼敌人一个营又一个连，俘敌营长、副营长

各一名，连长三名，士兵三百名，缴获步枪三百余支，机关枪六挺。十月三日，新成立的红独立第三师在阳新之龙港、咸宁之杨林桥、通山之大畈、横石潭同敌郭汝栋部激战，给敌以重创，红三师也受到重大损失，鄂东南道委所在地龙港为敌所占。十月八日，红十六军攻占靖安县城，该城地主武装及豪绅地主逃窜一空。十月二十日拂晓，红独立一师进攻离长沙市六十里的永安，缴获敌人步枪二十二支，驳壳枪四支，电话机六架。红独立二师向湘北进击，攻占离岳州仅六十里之中黄、桃州二处，缴获枪械二百余支。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根据中央指示，红军独立第一、二两师合编为红十八军，军长严图阁，政委徐洪。三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湘鄂赣省红军，沿锦水向东行动，进逼南昌，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省委接到中央指示后，于三月十九日将全省红军二万五千人集中于万载高村一带，派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傅秋涛等到前方加强领导，召开誓师大会，进行政治动员。

四月初，全军沿锦水北岸向南昌方向进发。部队到达宜丰之港口，与敌罗霖部一个营相遇，激战四小时，将敌全部消灭，缴获步枪二百五十多支，重机枪五挺，敌代理营长（团副）席炳南被俘。敌人一个团前来增援，两营由宜丰之芳溪星夜赶来，一营由黄岗口来援。我军驻扎港口，早有准备，次日拂晓，登山布阵，与敌激战半日，全歼敌军，缴获步枪四百多支，重机枪十挺，敌营长被击毙，代理团长刘浪滔被俘。

港口之役后数日，敌彭位仁部两个团由浏阳开到万载，乘机侵占我苏区腹地万载之白水，威胁省委驻地小源。我军闻讯后随即折回，向白水之敌进攻。这时敌人已占领小源附近之株

木桥。四月八日拂晓战斗在株木桥打响，红十八军担任狙击任务，红十六军与红三师轮番向敌人进攻。这天正值天下大雨，战斗打得极其艰苦。经一天一夜激战，毙敌六百多人，缴获重机枪三挺。我军也伤亡四百多人，其中红三师损失较大。嗣后，红十八军在宜春小洞与敌陶广部直属营及萍乡挨户团两个大队交战。当地革命群众积极参战，协助红十八军攻克敌人正在修建中的一座炮楼，俘敌官兵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机关枪四挺。四月二十七日，我军全部向平江方向移动，意图攻占长寿街，巩固和扩大苏区。红十八军已攻进长寿街，因敌增援而又退出，向南攻占献钟、思村，计划到永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筹借款项。但敌人集中七个团的兵力狙击，此项计划未能实现。红十八军与红十六军九师即转向铜鼓，筹集粮食。红十六军七师转向湘北筹款。红三师则转回鄂东南苏区。五月底，红三师联合鄂东南的游击队、赤卫队进攻驻在咸宁杨林桥的一营敌人，一举将该敌歼灭。接着又进攻驻在咸宁之官埠桥另一营敌人，因敌派铁甲车增援，未能攻下。七月，红三师与当地游击队共一千七百余人，与敌徐源泉部一个团大战于石灰窑，重创敌军。至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在我边区军民的奋力反击下，终于被粉碎。但是，红军也大大地损耗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奉命改编为红六军团的十六师和十八师；八月正式改编，红十六师师长由高咏生担任，政委由温锦惠担任。同年冬，红十八师在徐洪率领下，去湘赣苏区活动。红十六师则转回万载进行休整。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根据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赠给红十六军“坚强苦战”旗帜的精神，编成红十六军军歌，以鼓舞大家继续前进。歌词如下：

全苏大会赐我旗：“坚强苦战”。

鲜红旗帜招展兮，光荣灿烂。
几年艰苦血战兮，精神不灭。
今后如何贯彻兮，工农利益。
坚强苦战，光荣灿烂，万岁，万万岁！

这支军歌，曾在红十六师和苏区群众中广为流行。

第五节 苏区中央局着手解决省委的问题

湘鄂赣省委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苏区中央局原来对湘鄂赣苏区有过许多指示，林瑞笙等在执行中大为偏离，苏区中央局曾多次派人到湘鄂赣苏区巡视工作，多次给省委电示，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认真加以解决。然而，湘鄂赣苏区的情况不仅没有明显改进，而且越来越严重。后来，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兼管湘鄂赣省委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朱德、周恩来去函苏区中央局，指出红十六军存在的问题，建议“最好仍准备罗迈（按：即李维汉）去任省书”^①。七月，苏区中央局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进行了专门讨论，作出了改造省委的决定，并派陈寿昌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任省军区司令员，刘玉堂任少共湘鄂赣省委书记，谭启龙任少年先锋队湘鄂赣省队长，共派出干部三十多人去湘鄂赣苏区工作。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组织了苏维埃工作团，由钟志英任团长，张兴任副团长，准备到湘鄂赣省帮助省苏维埃

^① 朱德、周恩来《请调罗迈任湘鄂赣省书》函，1933年6月1日。

政府工作。八月，中央给湘鄂赣省委发来电报，明令停止省政治保卫分局捕人之权，已逮捕的人，待新任省委书记到达后解决，从而制止了肃反中乱捕滥杀的行为，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九月，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给湘鄂赣省总工会发出指示，指出陈佑生及湘鄂赣省总工会的问题，决定撤销陈佑生全总巡视员职务，调回全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撤去了孔荷宠红十六军军长职务，“但望其尚可教育”，于一九三四年调他到中央红军大学学习，以后调往补充师工作，但他乘机在途中投敌叛变了。

赴湘鄂赣苏区工作的干部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瑞金叶坪接见了陈寿昌、徐彦刚、钟志英、刘玉堂、谭启龙、张兴以及其他干部，勉励大家到达湘鄂赣苏区后，把红旗撑牢，把红旗扩展，坚持武装斗争，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中央的这些措施，对解决湘鄂赣苏区的问题，对苏区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在以后的艰苦岁月中坚持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月，陈寿昌、徐彦刚、刘玉堂、谭启龙等三十多名干部，肩负着党交给的重任，奔赴湘鄂赣苏区。从中央苏区到湘鄂赣苏区，路程虽不太远，但中间隔着敌占区。这时蒋介石正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陈寿昌、徐彦刚等行至中央苏区边缘的沙村时，已无法前进，只好住下来待机行动。直到十一月，才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穿越白区，渡过锦水，进入湘鄂赣苏区。十二月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万载小源。这时，国民党西路军“剿匪”司令何键，正命令第二纵队刘膺古部向小源进攻。小源附近之株木桥、高村

一带，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在那里修筑碉堡，构造工事。小源危急。

陈寿昌、徐彦刚等到达小源后，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陈寿昌、徐彦刚、刘玉堂、谭启龙等人外，还有在小源的省委委员、省级机关负责人和各中心县委书记。会议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宣布改组省委，撤销林瑞笙省委书记职务，撤销陈佑生全总巡视员、省委副书记职务。同时，任命傅秋涛为省委副书记，邓洪为省政治保卫分局代局长，严图阁为省军区参谋长，刘玉堂为少共省委书记，谭启龙为少先队总队长。会议初步揭发了前省委领导人林瑞笙、陈佑生的错误；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会议提出要在湘鄂赣苏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和转变省委工作的意见；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军民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敌人重兵压境，形势危急，会议来不及系统而全面地总结湘鄂赣苏区斗争的经验教训，很快地就结束了。

小源会议以后，省委开始着手解决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一方面，批评了前省委、省政治保卫分局在肃反工作中的错误，调整了保卫分局的领导成员。另一方面，在省政治保卫分局的干部中了解情况，审阅案卷，与被关押的部分干部谈话。随后，根据情节，除处决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恢复了自由。不久敌人进攻小源，省级机关和部队向铜鼓幽居转移。与此同时，省委派出了一批干部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其中省委组织部长黎申庚到修水台庄、靖林和平江黄金洞一带，帮助建立平修铜县委和修铜县委；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和省总工会委员长施济到修铜宜奉边开展工作；省委秘书长钟期光到湘鄂边任中心县委书记。他们下去以后，宣传贯彻苏区中央局对湘鄂赣苏区工

作的指示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群众开展新的斗争，从而改善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争取和团结了苏区、游击区的大多数群众，对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有了一定的准备。

第十一章 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第一节 边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军事斗争

一、红十六师向袁水、锦水流域行动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和二百多架飞机，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湘鄂赣边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在萍乡设立了“西路军总部”行营，调集了两个纵队，向湘鄂赣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袁水以北、修河以南以及平浏等地，为敌第二纵队各部，归刘膺古指挥；修河以北、鄂东南地区为敌第三纵队各部，由陈继承指挥。十月中旬，敌五十师、三十六师、三十二师及地主武装共五万余人，进攻正在修水苏区的红十六师。红十六师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在马坳、塘城、路口迎击敌人，在噪内同敌五十师激战，击溃敌一个团。

十一月，敌第二纵队占领湘鄂赣苏区中心附近浏阳之严坪。湘鄂赣省委决定予以反击。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省委和红十六师：不打严坪之敌，立即向东行动，会合从湘赣苏

区北上的红十七师，破坏南浔铁路，钳制敌人，以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省委执行中央命令，并派副书记傅秋涛、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随红十六师行动。十二月，红十六师转战万载、宜春、分宜，然后沿袁水东进，经新余向北入高安，在灰埠附近击溃敌人两个团，缴枪几百支。二十三日，红十六师分别从高安的英岗岭和清江的杨公墓，向袁水岸边的重镇临江进攻。这时，敌南昌行营慌忙派飞机轰炸，红十六师佯装撤退，至离临江三十里的地方隐蔽，转移敌机轰炸目标。二十四日拂晓，红十六师乘弥漫大雾，一举攻克清江县临江镇。接着，向南昌挺进。二十六日在南昌西山万寿宫附近与蒋介石的庐山教导队两个团相遇，红十六师主动出击，消灭敌两个营，俘敌二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缴获大量军用品，并威胁南昌。

敌教导队被我击溃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匆忙从南昌调集两个团，组成一个纵队，由飞机配合追赶红十六师。红十六师攻克临江镇时，敌第二纵队各部在湘东以及赣西的铜鼓、万载一带，寻找我主力。何键命令他们东移，从西面堵截，妄图东西夹击，一举消灭红十六师。红十六师随即调头西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渡锦水向宜丰前进。此时敌第二纵队之一部已入锦水流域，红十六师中途为敌袭击，又遭十几架敌机轰炸，师部电台被炸毁，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负伤，部队伤亡严重。二十八日，红十六师到达宜丰之黄沙，敌朱耀华的两个团赶到黄沙堵截，红十六师师部集中火力，并调集一个营的干部和党员，组成尖刀队，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十分疲困的情况下，将敌人击溃。三十日，红十六师进入宜丰、奉新交界的九仙汤的深山大岭中隐蔽休整。

二、木石港战役的胜利和王文驿遭受伏击

在红十六师向东南行动的时候，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鄂东南道委在通山之石门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军委给省委的指示，部署鄂东南地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会议决定把红三师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攻打阳新驻敌，恢复龙港、燕厦、木石港等地苏区，然后向瑞昌、武宁方向发展，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年底，红三师在崇阳集中，计划“打回龙港过新年”。不久，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也到了鄂东南，于是，两部决定联合进攻通山燕厦守敌郭汝栋部。但后来由于两部没有很好配合，伏击敌人的计划落空，敌人从龙港增援，红三师腹背受敌，转胜为败，损失不小。

燕厦战役失利后，红三师经过休整补充，战斗力得到恢复。不久，鄂东南道委决定红三师进攻阳新之木石港，准备恢复木石港苏区，然后直逼龙港，进取武宁、瑞昌。这时敌新七旅主力驻扎木石港，并派兵驻守周围的何子恕、胡田畈，建立战略支点。鄂东南道委调集红三师、河北指挥部警卫师、赣北独立师和当地赤卫队共七、八千人，向何子恕、胡田畈发起进攻，随后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木石港，围歼敌人。这次战役由于充分发动和依靠了群众，指挥得当，配合紧密而获得了胜利，摧毁了敌碉堡十三座，俘敌七、八百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恢复了木石港周围的苏区。这是鄂东南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取得的第一个战役胜利。

木石港胜利后，鄂东南道委决定红三师转移到武宁、瑞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以避敌优势兵力的反扑。但红三师负责人骄傲轻敌，既不遵照道委的决定转移，又不乘胜追歼逃敌，而

在木石港休息了七天，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敌第三纵队司令陈继承就在这几天时间内调动二十六师、新四旅、三十七旅及新七旅残部在阳新紫金山一带集结，布置伏击阵地。红三师自木石港到大冶花犹树，然后由花犹渡过富水，直趋黄沙。行至紫金山附近的王文驿，陷入敌人的伏击圈，我军仓促应战，全师损失三分之二，余部一千多人转移到通山九宫山休整。

一九三四年春，敌军向修河以西压来，为了调动和钳制敌人，三月十四日，湘鄂赣省军区命令红三师和红十六师四十七团攻打瑞昌的桑下桥，并命令龙（港）湖（市）瑞（昌）独立团攻打乌石街，然后合取瑞昌。红三师首先进攻桑下桥，同时，龙湖瑞独立团进攻乌石街。由于瑞昌和阳新黄桥的敌人驰援，我军进攻受挫，撤出战斗。不久，敌人进攻鄂东南道委驻地通山黄沙，道委转移到冷水坪。一九三四年九月，敌人利用叛徒和地主武装，冒充我游击队，混过岗哨，向道委机关进攻，我军损失很大，道委书记吴致民（胡梓）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为了纪念吴致民同志，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划出修武崇通苏区一部分建立一个县，命名为胡梓县。

三、红十七师北上湘鄂赣苏区

一九三四年初，红十七师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由湘赣苏区北上湘鄂赣苏区，准备同红十六师一道，破坏南浔铁路，截断敌人向中央苏区进攻的运输线。

一月二十六日，红十七师在师长肖克率领下，冒着凛冽的寒风，从湘赣边安福的古江一带出发北上。二月初，当部队进至宜丰之黄沙时，敌朱耀华十八师和六十二师钟光仁旅赶来堵截，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我军伤亡渐多。在这紧急关头，

肖克沉着指挥，当 he 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阵地摆上白布标记同飞机联络时，立即命令战士在自己的阵地上摆上同样的标记。敌机失去了轰炸目标，只好在上空盘旋，不敢投弹，不能配合作战，敌我双方乃形成对峙局面。到下午，红十七师利用战斗空隙，调整了兵力部署，向敌人占领的西面山头发起攻击，正面只用少量的部队阻击，主力部队从两翼的荆棘丛中悄悄上去，发起猛烈进攻，打得敌人纷纷逃窜，溃不成军。此时敌机以为溃军是我部队，即往前面不断扔弹，敌死伤惨重。红十七师紧紧追击，直到天黑才收兵。这次战役，我军以不足三个团的劣势兵力，打垮了敌四个团、两个旅部和一个师部，俘敌三百多，打死打伤敌人五百多，缴获步枪四、五百支和大量弹药及军用品，击落敌机一架，取得北上湘鄂赣苏区后的第一个大胜利。这次战斗，红十七师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四百多人，师参谋长李达在战斗中负伤。

黄沙战役一结束，修铜宜奉县委立即组织广大群众慰劳红十七师，打扫战场，护理伤病员。红十七师把缴获来的部份武器送给修铜宜奉独立团。不久，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

黄沙战役打响时，红十六师正在离黄沙不远的九仙汤山区休整。师长高咏生接到肖克要求驰援的信件后，即率部赶到黄沙，但战斗已经结束。两支红军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会师了。随后，两军并肩沿修河而下，向武宁挺进。敌郭汝栋师赶来堵截，我军边打边走。到瑞昌的小坳时，中央军委来电，命令红十七师轻装前进，破坏南浔铁路；红十六师担负警戒任务。于是红十六师留在小坳一带，准备堵截武宁方向来犯之敌。红十七师轻装东指，到达南浔线上的马回岭车站。敌人十分惊慌，驻守南浔铁路的敌独立四旅、三十六旅、七旅，从德安、瑞昌

向马回岭麋集。红十七师准备破路，因无破路工具，又不懂破路技术，未能成功。敌人又压过来，于是回头西走，进入秦山脚下的九渡源山里。敌何键即调集第二、第三纵队共二十二个团和一些飞机，分三路向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进攻。红十七师在敌人层层包围中，于黑夜冒雨翻越九渡源到秦山，通过悬岩陡壁，向南突围，从永修柘林再渡修河，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然后进入奉新的上富深山丛林中休整。敌军随即向上富包围过来，红十七师再次突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湘鄂赣省委当时驻地铜鼓幽居。

当敌人在秦山地区包围红十七师时，红十六师也遭敌人重重包围。他们在小坳完成警戒任务后，向西突围，先期到达幽居。二月间，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又一次会师了。幽居人民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己吃野菜，千方百计节省稻米和薯丝支援红军。

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到达幽居后，何键立即调动西路军第二纵队向幽居围攻，我军即转入修水、平江地区游击，与敌周旋。最后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登上了平浏边境的连云山主峰浏阳坳。这时，红十七师接到中央军委令其返回湘赣苏区的电报，乃与红十六师分开，挥师南下。敌何键急令第二纵队钟光仁、陶广、李觉三个支队兼程猛追，并用火车把王育才旅从老关运到萍乡宣风，在株亭山一带埋伏，妄图在宣风、芦溪之间消灭红十七师。红十七师将部队分成数路，趁天黑绕过敌人的埋伏圈，越过芦溪，粉碎了敌人的堵截，于三月二十二日回到湘赣苏区。

红十七师北上湘鄂赣苏区，两个来月驰骋三千里，调动了敌人四十六个团，击溃敌人六个团和许多保安团和地主武装，

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也直接支援了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第二节 边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一、敌人对湘鄂赣苏区中心的进攻

敌人对湘鄂赣苏区的疯狂进攻，吓倒了一些投机和动摇分子，他们有的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有的竟成为可耻的叛徒。一九三三年十月，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昊以检查防务为名，从浏阳芦坳投敌叛变。他发表反共声明，攻击诬蔑我党我军，鼓吹向国民党投降。敌人用飞机在湘鄂赣省首府小源上空散发刘学昊的“声明”，发动了反革命的政治攻势。

刘学昊的叛变，暴露了苏区的军事部署和主力红军的战略意图，使敌人了解到小源的情况。当时小源只剩下新组建不久的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和红军学校第五分校学生队，兵力薄弱。敌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乃令所部，在高村、小源周围赶修碉堡工事，并令岳森师一部推进至万载西坑一线，构筑工事碉堡，部署对小源的进攻。

一九三四年一月，敌彭位仁十六师由浏阳张坊向铜鼓排埠进攻，占领了排埠。排埠是浏铜万边境的咽喉，又是小源的西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陈寿昌、徐彦刚到小源后，想趁敌人在排埠尚未站稳脚跟时，一举夺回。于是决定攻打排埠。当时敌人经常押着民伕从浏阳挑运石灰到排埠修筑碉堡。省军区指挥部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诱敌出排埠，伏击歼灭，将排埠夺回。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领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和浏宜万独

立团埋伏在铁树坳两侧的山上，当敌人一个排押着民伕快到铁树坳时，徐彦刚派出一个连前去阻击，排埠守敌得报后，立即以一个营增援。狡猾的敌人不走大道，绕道从大围山腰的百亩田、苦竹垅前来，我军预定的伏击计划因而未能实现。徐彦刚立即改变计划，令浏宜万独立团阻击敌人，自己率领四十七团直取排埠。浏宜万独立团击溃敌人一营。第二天，当四十七团快要夺取排埠时，敌人一个团从铜鼓赶到，用重武器占领排埠周围的制高点，把四十七团压在山下。徐彦刚带领部队拟从半山腰插上去，几次冲锋失利，损失颇大，只好撤出战斗。

排埠之战受挫，小源四面受敌。省委当即决定将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省级机关撤出小源，向铜鼓幽居、祖庄一带转移，并派省委常委、白区工作部长邓洪向任弼时汇报湘鄂赣苏区反“围剿”斗争情况和省委转移的决定；选留一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协助小源区委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

省委撤出小源以后，各苏区之间联络困难了，为便于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浏宜万工作团和省军区第一、第二、第三作战分区。以鄂东南为第一作战分区，由道委书记黄加高兼任政委；修铜宜奉边为第二作战分区，涂正坤为政委，方浩然（后叛变）为司令员；浏宜万为第三作战分区，省委副书记兼浏宜万工作团书记傅秋涛兼政委，邱金生为司令员。省委还令周济美、梁海山等组织白区工作团，到靖（安）奉（新）武（宁）一带，以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撤出小源，这是湘鄂赣省委迫不得已的行动。从一九三二年四月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由修水上衫迁到万载小源起，小源逐步成为湘鄂赣苏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源人民怀着必胜的信念，热情地参加革命，支援战争。男儿参军参

战，英勇杀敌；妇女努力生产，积极支前。苏区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办起了兵工厂、造币厂，建立造纸、瓷器等工业，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增加财政收入，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立下了不朽功勋。湘鄂赣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六师指战员同小源苏区人民互相帮助，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九三四年一月，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以及苏区失陷时逃到小源的群众，第一批撤离小源。不久，陈寿昌率领省委和省军区机关与小源人民挥泪告别，向铜鼓的幽居、祖庄转移。徐彦刚率领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到鄂东南活动。接着，地方党组织有条不紊地组织小源的群众疏散撤退。小源成了一座空荡荡的集镇。

一月十二日，敌刘膺古发出命令，组成五个支队准备向小源进攻。以敌十九师五十七旅为第一支队，旅长陶柳为支队长，从西面向小源进攻；六十二师两个团组成第二支队，旅长钟光仁为支队长，从东面向小源进攻；十八师两个团组成第三支队，旅长易振湘为支队长，从东南面向小源进攻；从十师抽调三个团组成第四支队，旅长彭璋为支队长，从北面向小源进攻；调一八五旅组成第五支队，旅长李国钧为支队长，从萍乡移驻万载作为后备。同时，调航空第一支队进驻万载，准备轰炸小源，并把西路军第二纵队本部及野战医院，由宜春迁往万载。还在万载之大桥、白良设立伤病员转运所，从而完成了对小源进攻的全部准备。

一月二十四日，敌刘膺古发出总攻小源的命令。首先，敌人用飞机滥炸小源，接着敌第一支队由夹石、下界岭，第二支队由分水坳、白杨店、清水塘，第三支队由大西坑、阴功岭，

分三路向小源进攻。湘鄂赣军区留守小源的少量部队同敌战斗后主动撤退，转移到浏阳、铜鼓交界的大围山地区。二十八日，小源被敌人占领。

小源失守后，湘鄂赣苏区丧失了巩固的中心区域，主力红军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依托。从此，在敌人的频繁进攻中，省级机关经常转移，不能很好地领导苏区的斗争。小源的失守，是湘鄂赣苏区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前奏。

二、省级机关继续转移

在敌刘膺古向小源发动进攻的时候，湘鄂赣省级机关，已经转移到铜鼓的幽居、祖庄一带，所属的工厂和红军医院，也分别转移到平江的黄金洞和辜家洞。

幽居和祖庄地处大龙山腰，西与平江黄金洞毗邻，可通平浏长、湘鄂边；东与修水台庄接壤，经渣津、马坳可至鄂东南苏区；南经铜鼓西向、官山可至修铜宜奉苏区。这一带重峦叠嶂，沟汊纵横，山高林密，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这里又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早在一九二八年秋，彭德怀曾率领红五军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幽居人民有较高的阶级斗争觉悟和坚定的革命精神。这都是对我有利的条件。然而，这里人口不多，田地很少，粮食不足，要负担省级机关及所属工厂和红军医院数千人的粮食是极其困难的。省级机关迁到幽居不久，红十六师和红十七师也先后到达，粮食供应更加困难。这时，敌何键已调动军队，对幽居布置了一个大包围圈。南面，李觉的十九师从铜鼓石桥、高桥向幽居逼近；东南面，彭位仁的十六师由宜丰找桥经铜鼓大垅、西向、水洋坪向幽居进犯；东面，朱耀华十八师从山口、

漫江，经铜鼓的港口直犯幽居；西面与北面，邓南骧旅从龙门厂、长寿街向幽居进攻。此外，敌军第三纵队副司令郭汝栋率两个旅集结于崇阳古市岭、修水朱溪厂一线，敌岳森的五十师集结于修水程坊、渣津一线，准备堵截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敌人包围紧逼，加上粮食供应极为困难，形势越来越险恶。省委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认为省级机关必须迅速转移，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向东南发展。这时，东南面的修铜宜奉边开辟了一块新苏区，修铜宜奉独立团已扩大为独立师，筹款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那里盛产粮食，比较富裕，便于解决粮食和经济上的困难。于是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于四月份从幽居出发，向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区转移。

省委的这次转移，只看到修铜宜奉边的经济条件较好的一面，忽视了那里是新开辟的苏区，群众基础较弱的一面；只看到比较容易与赣东北苏区呼应的一面，没有注意到那个地方离南昌较近，敌人容易进攻的一面。如果当时省级机关由幽居向平江黄金洞苏区转移，把机关驻扎在黄金洞，不作这次长途的搬家式的转移，利用熟悉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敌人周旋，在运动中打击和消灭敌人，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不致以后遭到“六、七月事件”那样的失败。这是省委的一次失策。

三、“六、七月事件”

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省保卫大队及赣北独立团，从幽居西出，到湘鄂边活动后，折向东行，于五月间到了修水划坪。红十六师在浏阳坳与红十七师分别后，这时也转战到了修河西岸的全丰、划坪一带。

省委和红十六师到全丰、划坪后，敌五十师、三十三师、二十

六师及驻修水的吴抚夷保安团，一齐扑向修河西岸，向全丰、划坪包围过来。为了摆脱敌人，省委决定先向鄂东南方向突围，以后再折回修铜宜奉边去。在红十六师的掩护下，省级机关安全转移到了鄂东南。可是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在划坪同敌激战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六月九日，高咏生带领二十多人，向修通边境的黄龙山突围，在修水全丰的坑口遭敌吴抚夷保安团第九中队袭击，不幸被捕。十四日傍晚，高咏生在被押往修水县城的途中，借上厕所之机，打倒敌人哨兵后逃脱，敌人四面追捕，他跑到山崖边，由于天黑，看不清道路，不幸坠入崖下的脚鱼潭，壮烈牺牲。敌人发现后，残暴地割下了烈士的头颅，挂在修水县城示众。高咏生是湖南平江县人。后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了纪念他，在平江河西建立了咏生县。

省级机关到鄂东南后，红十六师四十六、四十八团余部也到了鄂东南。不久与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会合。由于师长高咏生牺牲，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受损，省委和省军区决定红十六师整编，由徐彦刚兼任师长，陈寿昌兼任师政治委员。整编后，在鄂东南收集了一批干部和地方武装，便同省级机关一道，移师南下。在武宁澧溪击溃敌人一个营，渡过修河到了洞口。这时，敌二十六师已从后面追赶上来，陈寿昌主持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堵击尾追之敌。但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作了错误估计，把敌两个团误作一个团，加上部队刚刚改编，战斗力不强，地形又不熟，因此经过一天的战斗，未能击退敌人，红十六师却伤亡几百人。于是，撤出战斗，南下向修铜宜奉边龙门山区转移。

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省委机关转移到龙门山区奉新的百丈、西塔。计划在这一带驻扎下来，建立根据地。省委派出

一部分干部深入各乡各村，帮助发展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省委原计划到达此地后，召开中共湘鄂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广大军民反击第五次“围剿”。各中心县委和县委已根据省委的布置，认真总结了工作，选举了代表。省委到达百丈后，各地代表也先后到达百丈。这时，敌五十师、七十七师、十八师和六十二师向我包围过来，形势危急，我军在百丈、西塔无法立足。省委决定向平江黄金洞转移，并把各地前来参加省第三次党代会的代表编成连队，随省级机关行动。

当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从龙门山区西出时，敌五十师已经占领了龙门山附近的肖家、找桥、九仙汤一带，他们拆村并村，强迫移民，并布置了一个包围圈。我军处境十分困难。省委和红十六师立即组织突围。由徐彦刚率领红十六师四十六、四十八两个团向靖安、永修方向突围；陈寿昌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率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和省级机关干部组成的特务团及家属，向宜丰、铜鼓方向突围。突围中，四十六、四十八团在斜岭遭敌十九师夹击，由于部队刚在武宁洞口战斗中失利受损，十分疲困，加上缺乏粮食，地形又不熟，遭受了惨痛损失。四十七团和省委机关行至宜丰高枧时，遭敌五十师第三〇〇团伏击，伤亡严重，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省委决定再分三路突围：一路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何振吾率领，从西南方向向黄岗口、排埠突围；一路由省政治保卫局代局长邓洪带领，从西北方向向铜鼓三都、西向突围；一路由少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手枪队，保护双脚发烂行走困难的陈寿昌从北面突围。结果，何振吾率领的队伍，在突围时被打散；邓洪率领省保卫大队和省级机关眷属，从龙门山顶翻过，再穿越几十里

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官山，越过敌人的三都封锁线，到达铜鼓之西向，遇敌袭击，队伍被打散，省委的电台被打掉，几经艰难困苦，才在铜鼓的水洋坪收集被冲散的人员，带回到黄金洞。刘玉堂带领的手枪队，因手枪射程不远，无法突围，只好返回宜丰高槐的山里，隐蔽起来，一面待机突围，一面给陈寿昌治疗脚疾。敌人在山脚下巡逻搜查，手枪队在山腰隐蔽。过了一个多月，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黄金洞苏区。

斜岭战斗后，徐彦刚带领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余部，到了永修云居山。这时部队只剩下三、四百人，敌人又从四面包围过来。徐彦刚在云居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分数路突围，并布置突围后能返回黄金洞的就回黄金洞，无法回黄金洞的就到第二作战分区，或者到高(安)奉(新)边的华林寨山区开辟新苏区。会后，干部带着战士分成若干小队向四面突围，由于敌众我寡，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少数突围出去后，一部分回到黄金洞，一部分去到华林寨山区。后来，徐彦刚带领十几个战士杀出重围，历尽艰险，返回黄金洞。

在龙门山战斗中，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六师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战斗，高唱军歌，与敌人厮杀，许多人血洒青山，骨抛原野，为湘鄂赣苏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湘鄂赣苏区斗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当时，湘鄂赣省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干部共一千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部队“仅剩约一营人”。^①此后，“苏区受到敌人蹂躏、摧残，分隔成为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②。这次惨痛的失败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六、七月

① 徐彦刚、傅秋涛给任弼时、肖克同志转中央军委的报告，1935年6月7日。

② 中共湘鄂(赣)省委给弼时同志转中共中央的信，1935年6月30日。

间，当时湘鄂赣省委称为“六、七月事件”。

“六、七月事件”是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标志，使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三个月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第十二章 进入艰苦的三年 游击战争时期

第一节 重建湘鄂赣苏区主力红军

一、在恶劣环境中坚持斗争

“六、七月事件”后，我国苏维埃区域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局面。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连遭失利，苏区范围逐步缩小，主力红军相继转移。各根据地虽然仍留有部份红军和游击队，但数量极少，无法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尤其严重的是，在“六、七月事件”中，省委的电台被击毁，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络，对党中央的决策、指示一无所知，对全国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变化不甚了解，因而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决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与方法。此时此刻，犹如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航船，突然失去了灯塔的指引，只能摸索前进。

“六、七月事件”后，敌人更加紧了对各分区和中心县委所在地的进攻。由于湘鄂赣主力红军所剩无几，在多于我军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进攻中，各分区独立营（团）、中心县委和县委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相继受挫，有的已全部损失。到一九三四

年底，湘鄂赣苏区约损失枪支四千支，人员一万左右。

湘鄂赣苏区革命武装的受损，使工农武装割据失去了支柱。因此，浏宜万、万宜上、宜萍、平浏长、浏醴、临湘岳、平修铜、修铜宜奉、万铜丰、龙湖瑞、修武崇通、咸蒲崇通等根据地，都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或白区，有的只剩下一些山头。苏区与苏区之间难以联络。省委转移到黄金洞后，敌人又向黄金洞“围剿”过来。黄金洞苏区缩小至嘉义之丽江山中及献钟之辜家洞、徐家洞、白水、芦洞等处。而平江北乡之三墩，恩溪之留良洞及横江一带，也只保留一小块苏区。湘鄂赣苏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游击队，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给养越来越困难，经常处于一日数移的状态，很难抵御敌人的进攻。

敌人闯进苏区以后，疯狂地施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烧山毁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湘鄂赣千里苏区，顿时狼烟滚滚，血迹斑斑，一片荒凉！敌人的“还乡团”、“铲共队”、“清乡队”、“毁灶队”等，对苏区人民反攻倒算，到处搜捕革命干部、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和赤卫队员，施用种种法西斯酷刑，残酷拷打，百般折磨，任意杀戮。

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战争锻炼的苏区人民，并没有因为敌人的白色恐怖而失去对革命的信念，放弃对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的支持，而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越过敌人造成的许多障碍，支援红军，共同战斗。

在恶劣的环境中，湘鄂赣苏区各级党组织振奋精神，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领导军民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组成许多游击小队或游击小组袭击敌人，炸毁敌人碉堡，破坏敌人军事设施，捣毁敌人区、乡政权，使敌人胆颤心惊，不得安宁。有时，游击队还深入到外线活动，建立新区。原红十六师四十七

团八连指导员汪克明，在“六、七月事件”后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主动地收拢失散和负伤的战士，到高安华村寨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武装。经过艰苦的斗争，成立了修铜宜奉游击第二大队，开辟了高(安)奉(新)边新区。省军区通讯班班长王义勋在龙门山战斗失败后，带领战士成立了靖(安)奉(新)高(安)边游击队，在靖奉高边打土豪，分浮财，筹粮筹款，建立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干部是这样忠心耿耿，重振旗鼓，继续战斗，战士也含辛茹苦，前赴后继，坚持斗争。原红十六师四十八团十六岁的小号兵丁朋华，在战斗中被打散后，同另一个青年战士林子金一起，餐风宿露，寻找队伍。他俩先在靖(安)武(宁)永(修)安(义)深山的一个纸槽里，一边做工，一边向纸工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纸工觉悟。随后在纸工中建立工会组织，带领纸工们用一把号一支枪，机智勇敢地袭击了地主民团。后来组织纸工成立了地方游击队。一九三五年，他俩带着这支游击队，找到东北分区，回到了红十六师。湘鄂赣苏区广大干部、战士就是这样忠诚于革命事业，经受着艰苦考验，坚持着革命斗争。

二、八月紧急会议和红十六师的复建

“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负责人，先后回到了平江黄金洞苏区。为了认真总结龙门山失败的沉痛教训，从思想上武装广大党员、干部，迅速地恢复红十六师和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散布的湘鄂赣红军已被消灭的谣言，八月间，省委在平江黄金洞何家垅召开了紧急会议。省级机关负责人，转移到黄金洞的各中心县委和县委的书记，也都参加了会议。

省委紧急会议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教训，指出了省委工

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批判了因暂时失败“而失却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苏维埃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确定湘鄂赣苏区党的战斗任务，“最主要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①；没有再强调向东南发展，而是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平、浏、铜苏区根据地，恢复和扩大红十六师，发展主力红军等口号；发出了“猛烈发展红军，好党员、好干部去当红军”的号召。会议一方面指出，这一次失败，陈寿昌、徐彦刚负有责任；而另一方面，又说在平江主持日常工作的涂正坤、方浩然没有积极向修水行动，以配合这次转移，是他们的“机会主义错误”，应予反对。最后，会议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收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

八月紧急会议后，省委派副书记傅秋涛和鄂东南道委书记兼第一分区政委黄加高，到鄂东南收集和扩编部队。黄加高思想消极，没有执行八月紧急会议关于到鄂东南河北地区集中独立一团及部分游击队，以恢复红十六师四十八团的决议，使部队遭敌袭击而全部损失，受到撤职处分。傅秋涛带领七人短枪队，经平江南江桥到通城云溪，遇敌突围后，绕过通城县城，到达湘鄂边中心县委所在地药姑大山，由中心县委书记钟期光派游击队护送到了崇阳县，又由崇阳县委书记王全德派游击队护送到了通山县冷水坪，在这里，正好与严图阁、方步舟、谭凤鸣率领的部队相遇。

方步舟是八月紧急会议之前被派到咏生县和鄂东南去找谭凤鸣率领的咏生县独立营以及红三师第七团的。方步舟在咏生县苏区找到独立营后，便把这个营带到鄂东南。接着又找到了红

^① 中共湘鄂(赣)省委给弼时同志转中共中央信，1935年6月30日。

三师七团余部，乃把独立营合并到七团中。部队经过整顿后，不久又与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相遇，严正带着“六、七月事件”中被打散的及在鄂东南收集的一部分武装，在这一带活动。几支部队便汇合在一起了。

傅秋涛与严图阁、方步舟、谭凤鸣在冷水坪相遇后，即举行了会议。傅秋涛传达了省委关于恢复红十六师的决议及计划。会议决定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扩大队伍，返回黄金洞苏区。

随后，傅秋涛、严图阁率领这支部队南下，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行动。经过平江的伍公市、新墙、新市街、南江桥等地时，沿途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区、乡政府，打击了土豪劣绅，击溃了敌新七旅一部，消灭了南江桥驻敌一个排，连续打了一些胜仗，缴获了一批枪支武器和物资，俘虏了七、八十个敌兵。沿途又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一千一百多人。

十月，省委在黄金洞米筛坝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寿昌、徐彦刚、刘玉堂、涂正坤等。会议总结了八月省委紧急会议以来扩红运动的经验，提出了三个月的扩红计划。会议还讨论了去前线领导恢复红十六师的人选问题。当时，省委很多领导同志都要求到前方去，陈寿昌虽然身体不好，也坚决要去。最后，会议决定陈寿昌和徐彦刚赴前线，调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工作。

会后，陈寿昌、徐彦刚即率领省军区独立营一百余人，从黄金洞出发，向西南行动，在平江斑鸠坳，与傅秋涛、严图阁率领的部队相遇。陈寿昌向傅秋涛传达了米筛坝省委会议的决定。傅秋涛把部队交给他们，并遵照省委意见，率领省军区独立营返回黄金洞。十一月，陈寿昌、徐彦刚率领部队北返鄂

东南，路经平江献钟时遇敌，损失一、二百人。随后部队再次到了通山冷水坪。他们同鄂东南道委商量后，决定将这支部队（包括红三师七团余部、咏生县独立营和严图阁所收集的部队），编为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取消红三师建制。部队在冷水坪召开大会，宣布正式恢复红十六师（实际只有一个团），由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兼任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已由湖南西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十六师计划由崇阳、蒲圻到临湘、平江、岳阳一带活动，向西南发展。于是从牛牯山西出，不料到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时，遇敌三十三师两个团，我军虽然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陈寿昌指挥部队冲锋时中弹负伤而被迫撤退了。晚上，陈寿昌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部队连夜撤回崇阳的河坪，在那里，红十六师四十六团指战员和鄂东南道委，为陈寿昌及其他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为了纪念陈寿昌这位湘鄂赣省委领导人，后来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崇阳、通城之间建立一个县，命名为寿昌县。老虎洞战斗中，我军损伤四百多人，只剩下七百五十多人，徐彦刚也负了伤，后返回黄金洞治疗。部队便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崇阳金塘休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中共湘鄂赣省委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陈寿昌牺牲后省委的领导人选和战斗部署等问题。由于形势严重和时间紧迫，没有通知鄂东南道委派人参加。会议确定仍按米筛坝会议的决定，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决定学习和推广中央苏区扩红经验，把扩红工作列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作出了一个半月的动员工作计划，准备把东南地区一部分独立营补充到四十六团中去。

会议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扩红突击队，深入各苏区开展扩红工作，江渭清担任省扩红总队队长。

杨雀坦会议后，湘鄂赣省各苏区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尽管敌人对红军家属进行残酷的迫害，尽管斗争的形势十分紧张，斗争生活越来越艰苦，湘鄂赣苏区人民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党对红军无比深厚的感情，踊跃把自己的儿女、丈夫和亲人送去当红军。当时，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春季里来万物新，我送我儿当红军；
家中事情莫牵挂，一心奋勇杀敌人。
夏季里来月儿圆，我送哥哥上前线，
你当侦探我带路，长大我也把枪捐。
秋季里来秋风爽，妹妹送哥我送郎；
淌好鞋子千层底，冲锋立功好得奖。
冬季里来雪漫天，家家儿郎上前线；
三九严冬心似火，人人心里象蜜甜。

扩红运动深入开展，到处出现参加红军的生动景象。在高安、奉新交界的一个山村里，有个大婶把二儿子送去当了红军，后来苏区变成游击区，联保长把她抓去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放出来后，她带着遍体伤痕，又把小儿子送到苏区，参加红军。苏区人民就是这样百折不挠地支援革命。杨雀坦会议后仅一个半月时间，咏生县、平江之黄金洞以及铜鼓、浏阳、修水等地，就动员了三百七十多人参加红军。与此同时，修铜宜奉、浏宜万、平浏铜三个独立营，都补充到了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各地游击队也有了发展。

一九三五年初，省委又提出了一、二、三月扩红战斗动员计划，进一步推广咏生县学习中央苏区扩红的经验，开展后方

扩红同前方消灭敌人的竞赛，提出“前线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的战斗号召，使扩红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四月，省委在黄金洞召开了有红十六师参加的扩红总结大会，总结扩红经验，表彰先进，提出了“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几个月时间，在东南八县扩红一千二百多人，西北各县扩红七百多人。经过这半年的突击扩红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共动员了二千五百多人参加红军。六月，在黄金洞的牛栏坑，编成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不久，红十六师四十八团也得到重建。红十六师的迅速恢复，对于坚持工农武装割据，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反复“清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省委在恢复红十六师时，对于“赤卫队组织的扩大与动员仍然被放松”^①，特别是一批批地将各分区和各县的独立营(连)、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红军后，忽视了地方武装的发展，使各县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因而在敌人进攻时，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抵抗，而使苏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武装少了，不利于造成人民战争的局面，使红十六师陷入孤军作战的被动地位，以致后来几经挫折，几乎濒临覆灭的境地。当时有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看到地方武装一批批被抽走，心里十分难过，曾经提出过意见，进行过抵制，但没有被采纳。这是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反对所谓“游击主义”，一味强调“正规化”的结果。

^① 《中共湘鄂(赣)省委给弼时同志转中共中央的信》，1935年6月30日。

第二节 红十六师的发展壮大及再次受挫

一、在主动出击中发展壮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在娄山关和遵义消灭了王家烈两个师，扭转了被动局面。蒋介石十分恐慌，急忙调兵遣将，加紧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在这期间，敌人一部分军队被调到湘黔边境，进攻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有所减少。中共湘鄂赣省委由于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对遵义会议的精神和全国的形势毫无所知，但发现敌军减少，便抓住敌军调动的空隙，组织红军主动出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一月一日，红十六师四十六团从平江黄金洞向东北行动，进攻通山大屋陈的敌新三旅二营，歼敌一部分。三日到通山杨芳，与敌激战一日，击溃敌两个连，并消灭由下铺增援的一连敌兵，旋即到通山敌后活动，拔除敌人碉堡，在那一带开辟新区。一月之内，拔除碉堡数个，缴获轻机枪四架、步枪四百余支，补充了大量枪支弹药，部队士气高涨。

红十六师四十六团的胜利，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二月间，我四十六团除留下一个连在崇阳金塘保卫鄂东南道委机关外，全团开往崇阳大源桥，拟向西行动，配合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行动。在到达大源桥的第二天，敌五十师第三〇〇团即紧追而来。

岳森的五十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该师第三〇〇团团

长李邦藩又是岳森的妹夫，堪称嫡系的嫡系。该团每月发双薪，武器装备精良，“进剿”时十分残忍凶狠，是“六、七月事件”中疯狂屠杀红十六师指战员的刽子手。湘鄂赣苏区军民对他深恶痛绝，四十六团指战员曾提出：“留下开花子^①，去打三百团”的口号，决心为“六、七月事件”中牺牲的战友报仇。

敌第三〇〇团来到大源桥后，我师部决定在大源桥进行阻击。部队迅速进入阵地。营长袁立生率领一营，从左侧迅速占领大源桥附近的高地，在敌人快登上山顶时，全营数百人在袁营长指挥下，手持马刀，直向敌人砍去。敌溃不成军，拼命往山下逃窜。此刻，四十六团主力正在山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山上敌人溃退下来，冲乱了敌人自己的阵脚，军心为之动摇。袁营长趁机带领战士猛冲下来，截断敌人退路。敌人受到夹击，无心恋战，纷纷向四周逃窜，敌右翼部队即被我消灭。接着，四十六团夺取了敌人机枪阵地，抢占了制高点。敌仍凭借最后一个山头，负隅顽抗，等待增援部队。四十六团几次冲锋都未成功，部队伤亡渐多，这时，徐彦刚一面把轻重机枪调集在一起，对准敌人阵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旧址
之一——平江黄金洞牛栏坑

^① 开花子，指弹头会爆炸的步枪子弹。

地扫射；一面组织突击队，抢占山头。四十六团留守金塘的后援部队，也赶来增援。全团士气大振，迅速攻占了山头。敌人支持不住，纷纷败退。

大源桥一战，红十六师用马刀杀出了军威，全歼敌人两营半，击溃敌四个营，缴获重机枪五挺，步枪三百多支，获得了胜利。

大源桥战斗后，敌人月余不敢进犯。四十六团抓住有利时机，在寿昌县一带，捣毁敌人碉堡，恢复苏区，动员青年参军。接着，再出崇阳，到了高枧。这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调一〇五师刘多荃部到崇阳一带“进剿”，并派出一个连驻守高枧。四十六团负责人在山上观察到敌人脚穿大皮鞋，用枪当拐杖撑着上山，表明敌人不适应山地战的情况。于是，派出一个营迂回至高枧敌人后侧，同时从山上发起正面进攻，敌人猝不及防，转头逃跑，被我侧后截住，大部分被俘，只有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逃回高枧碉堡，接着，四十六团又把高枧敌人碉堡包围起来，准备第二天进攻。

晚上，红十六师了解到，敌一〇五师系张学良的东北军，非蒋介石嫡系，对蒋的卖国投降行径颇为不满，希望抗日，收复东北三省。蒋介石调一〇五师到南方“进剿”红军，是想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剪除异己的目的。因此东北军“剿共”并不积极，士兵也不愿同红军作战。鉴于这种情况，四十六团对碉堡乃围而不攻，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唱救亡歌曲，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阴谋，并派出俘虏将劝降信件递交敌连长。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连长终于带着碉堡里的一个排投降了。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扩大政治影响，四十六团杀猪款待全连士兵，每人发给三块银洋，由敌连长带领徒手返回崇阳县城。这次战役，缴获敌人轻机枪九挺，步枪七十多支。

武汉行营获知俘虏返回崇阳的消息后，深感惊异，即派一个高级参谋带领一个营，到高枧进行调查。两周后，他们进入高枧，当他们在山谷休息做饭时，四十六团迅速占领山谷两侧高地，出其不意地进行袭击，敌营长和那个高级参谋均被击毙，其余敌人纷纷投降。这次战斗，缴获轻机枪十几挺，步枪二百多支，俘敌四百多人。这些俘虏经过教育后，全部加入了红军。这时，红十六师在四十六团三个营的基础上，已扩编四十七、四十八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

二战高枧后，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旋即南下。敌陈继承急从八十五师、三十三师、三十七旅和新三旅中调集九个团，分三路追来。红十六师从敌人布防间隙处穿出，到敌后消灭了敌人一营。然后进入平江。敌军追到通城、修水，不敢妄动，只在修水一带修筑碉堡。

红十六师返回黄金洞后，省委为了同中央军委和湘赣苏区取得联系，命令红十六师南下。三月下旬，红十六师南出浏阳、宜春、安源，由茶陵到莲花，在五宫山停留了三天。“五宫山碉堡稠密，比铜、万碉堡更多，苏区没有，关系找不着。”^①于是返回黄金洞，向省委汇报，并参加省委召开的三个月扩红总结大会，接受省委检阅。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红十六师进入黄龙山、幕阜山一带活动，摧毁了平江之木瓜、上洞一带的敌人碉堡，月底进至平江之虹桥。这时，敌十九师陈铁侠旅两个团和湖南两个保安团跟踪而至，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十六师”。这时，红十六师经过几个月战斗，接连获胜，士气旺盛，加上虹桥原来是老

^① 徐彦刚、傅秋涛给弼时、肖克转中央军委的报告，1935年6月7日。

苏区，群众基础好，地形熟悉，便决定在虹桥迎击敌人。

虹桥东北面小山上，有敌人过去构筑的防御工事，红十六师将四十八团二营和师部机枪连配置在那里，作为正面防御。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两个营及师部，隐蔽在后山东侧高地森林中。敌人到达虹桥时，我机枪连立即开火，吸引敌人。敌人分两路向我阵地扑来，一路从正面向红十六师防御阵地猛扑，一路从侧翼向西端高地进攻。四十八团二营和师部机枪连向敌人猛烈扫射，把正面敌人压在山下。敌旅长陈铁侠老羞成怒，调动侧翼部队向我正面阵地进攻。我四十八团二营和师部机枪连佯装退却，待敌人一涌而上时，徐彦刚一声令下，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两个营从侧后横杀过来，势不可挡。敌人知道中计，慌忙退却。我师机枪连和四十八团二营乃回头猛冲下山，前后予以夹击，敌人伤亡惨重。这次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一个团，缴获各种枪支四百多支，俘敌五百多人。敌人带来准备捆绑红军的绳子，结果捆了他们自己。

虹桥战役的胜利，打击了敌人对苏区的疯狂进攻，给湘鄂赣苏区人民以巨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正在开展的扩红运动。

虹桥战役后，红十六师接着摧毁了平江洞口、三墩、钟洞、桃花洞一带的敌碉堡，恢复了咏生县大片苏区。随后乘胜西出。五月初，由南江桥打到岳阳的黄岸市，摧毁了岳阳保安团一个加强连驻守的大碉堡。短短一个月中，横扫敌碉堡三十多座。打下黄岸市后，红十六师折向北行。走牛牯山向蒲圻之羊楼洞行动。在那一带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恢复和建立苏区。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由于省委全力抓了扩红运动，红十六师又消灭了大量敌人，壮大了自己，从而使三个团的建制全部得到恢复。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谭凤鸣任

师参谋长，钟其光任师政治部主任。魏平任四十六团团长，赵段中任团政委；钱林任四十七团团长，曹茂柏任团政委；谭凤鸣兼四十八团团长，袁洪国任团政委。

红十六师的壮大和主动出击，不仅迅速恢复了原来被敌人占领的苏区，而且开辟了一些新的苏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版图此时恢复到六块。最大的有平江长寿、修水、通城和岳阳之间的苏区，此外还有平浏长、大围山、药姑山、修武崇通和修通崇苏区。这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比较兴盛的阶段。

二、麦市突围

一九三五年六月，蒋介石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等部，调到湘鄂赣边区，会同何键的西路军以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保安团，共六十几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赣省委驻地平江之虹桥长庆苏区“进剿”。^①敌人在西起平江、浏阳，东至铜鼓、修水、武宁，南起株萍铁路，北至通山、崇阳的广大区域内，挖壕堑，筑工事，设路障，建立了一个大包围圈。大包围圈内又有许多个小包围圈，形成连环包围之势。这个包围圈向虹桥、长庆一带逐步紧缩，妄图一举剿灭红十六师和湘鄂赣省委机关。湘鄂赣苏区又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当敌人大举包围我军的时候，红十六师正集中在虹桥、长庆^②一带休整训练。由于省委和红十六师领导人沉浸在上半年

^{①②} 傅秋涛回忆是平江南江桥，而钟期光、刘玉堂回忆是平江虹桥、长庆一带。钟期光1981年4月回忆说：“平江全县赤化，只有黄少谷挨匪头子盘踞的南江桥地方，与黄龙山的卢伯魁挨匪头子所盘踞的地方，工作从未开展过，还有南乡的清水地方，从未建立党的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整训是在长庆，而不是南江桥地区，南江桥与长庆是一山之隔，东面是长庆，西面是南江桥。”

的胜利之中，骄傲自满，麻痹轻敌，加上省委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白区工作又没有得到恢复，难以获得敌人活动的情报，对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北上转向进攻湘鄂赣苏区的情况毫无所知，因而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及至发觉后，敌人已接近完成其包围计划了。

面临着十多万敌军压境的险恶形势，省委在长庆召开了紧急会议，省军区亦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突围出去，以保存有生力量。徐彦刚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敌人虽然兵力多，碉堡多，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我军可以突围出去。省委决定除由咏生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领部分精干武装和干部留下坚持斗争外，省级机关、省保卫大队和咏生县的县、区干部组成特务团，同红十六师一道突围。当时，制定了两个突围方案：是向东往修水方向突围，到修铜宜奉边，然后取奉新、高安，打开几个县，开辟一个新苏区，如能立足，就坚持下来，否则就沿罗霄山脉到湘赣苏区或中央苏区去，以后待机再打回湘鄂赣苏区；另一个方案是向北往通城方向突围，经崇阳、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的大别山，如果无法渡过长江，就到赣北的瑞昌、德安、永修一带活动。

当省委作出突围决定的时候，敌人在通城的麦市到修水的白沙桥一带，尚未完成封锁。如果我军迅速果断地从这里突围到外线去，就能获得主动。然而，省委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繁琐的动员，又等待咏生县的县、区干部集中，结果，贻误了时机，致突围失利。

六月十四日，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按第一个突围方案行动。部队到修水渣津西北一线时，因敌人火力封锁严密，伤亡甚大。这时敌第四师又从通城方面赶来增援，我军无法突围，乃

决定撤出战斗，连夜折回到黄龙山。部队到修水之石桥休息做饭时，敌人又追上来了。傅秋涛主持召开了战地紧急会议，决定在石桥打击尾追之敌。红十六师和特务团迅速占领了山头，敌人向山头进攻。到下午，敌投入三个师，战斗越打越激烈，一直打到半夜，红十六师伤亡三百多人，才被迫撤退。

部队受挫后，十五日晚，乃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当晚改向西行，翻越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向北走，入通城之盘石、云溪。云溪原是苏区，我军两百多名伤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便安置在这一带群众家里，然后分左、中、右三路突围。以徐彦刚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和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为中路；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副参谋长郭子明、省委组织部长刘玉堂率领的红四十七团为右路；红十六师政委方步舟、副师长魏平和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领的四十八团为左路，三路分别从麦市一带渡河突围。

六月十六日黑夜，我军三路成扇形从麦市渡河，中路四十六团和左路四十八团（一个后卫连除外）都胜利过去了。他们在崇阳大沙坪等待四十七团和特务团，等了两天，还不见来，便进到通山之高湖，恢复高湖苏区。这时敌新七旅追至，四十六团与敌接火不久，增援的敌新三旅又赶来，四十六团乃主动撤退，越过太阳山，进攻沙州店驻敌两个营，因敌人工事坚固，久攻不克，旋取道咸宁、鄂城，到大冶、阳新。这时部队在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意见，徐彦刚考虑到红十六师是湘鄂赣苏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战斗过的湘鄂赣苏区土地，不能离开养育他们的湘鄂赣苏区人民，主张从阳新之黄颡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码头镇，然后到靖安、奉新一带。一部分人则主张从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黄梅、圻春到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

去。多数同志同意徐彦刚的意见。于是部队在太子庙休整后，由徐彦刚率领四十六团为前锋，轻装前进，师部和四十八团担任后卫。四十六团到黄颡口后，找到了一些船只，即顺江而下，拟登陆后，再由这些船只运送师部和四十八团。当师部和四十八团赶到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而追敌又至，部队只得撤往云山头，在此，四十八团有所损失，旋即返回太子庙，准备出凤凰山，南返平江黄金洞。此时只剩下凤凰山的凤凰寺一条路了。凤凰寺北靠大冶湖，南倚龙角山，是敌人的重要据点。师部决定由方步舟率部为前锋，钟期光、魏平为后卫，带领四十八团和师部向凤凰寺冲杀突围。凤凰寺敌人用重机枪猛烈扫射，后面敌人又追了上来，我军前后受敌，指战员浴血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了，只有方步舟带领几十个战士冲了出去。后来钟期光、魏平、谭凤鸣、杨建新等十几个干部和少数战士转移到大冶龙角山隐蔽，十一月才辗转回到黄金洞。

徐彦刚率领四十六团，从黄颡口乘船沿长江而下，在瑞昌码头镇上岸，为敌所袭，损失一部分，后转战到永修、靖安一带，又遭敌人包围，伤亡严重。战斗中，徐彦刚负伤，他把部队交给团政委明安楼，对他说：这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回黄金洞，交给党，交给湘鄂赣人民，坚持下去。徐彦刚带一个排到永修云居山治伤。后来，四十六团的一个营长叛变，带领敌人的便衣队，用锄头将他打死了。徐彦刚的壮烈牺牲，使湘鄂赣苏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是苏区的重大损失。四十六团剩下的六、七十人，后来由明安楼带回黄金洞。

三、粉碎敌人妄图消灭省委和红军的阴谋

中路由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跟在四十六团后面。由于十

分疲倦，在中途休息时耽误了时间。当赶到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河面，无法过河。右路四十七团以及左路四十八团的一个后卫连也未能突围过河。傅秋涛率领特务团回到通城的云溪、盘石后，会合了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团的一个后卫连，共一千七百多人，向南行动。

敌人发觉红十六师大部分未过麦市，立即调动两个师，一个师走修水的白沙岭向西南从后头追来；另一个师从天岳关向东北，到前面堵截，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四十七团被逼与追踪之敌激战，虽然重创了尾追之敌，但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团政委袁宏国在战斗中牺牲。接着，部队从云溪翻山入平江，在幕阜山区同敌人周旋。不久又从平江长庆冲破敌人封锁到洞口，截击了敌人一个运输队，缴获了一些大米，然后进入平江周坊、横江山区，与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江渭清率领的地方武装会合。这时，敌人已从燕岩、团头，三眼桥、钟洞围攻过来。驻平江三眼桥敌团长给傅秋涛写信，狂称：“本部从三眼桥至献钟十五里，配至七个营，看你们从哪里过去。”“希你率部属人员携枪械前来投诚，才是生路”，“本团长还可嘉奖”。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敌人的威胁面前，省委加强了连队的工作，把一部分省级机关干部分配到连队协助工作，为继续突围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并决定从三眼桥、燕岩之间突围。在一个黑夜里，部队一千多人屏气轻步，悄悄地穿过三眼桥、燕岩之间的碉堡群，越过敌人设置的重重路障，迅速从雷家滩渡河到达爽口，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特务团和四十七团突围后，经平江沙墩入保丰，再从思村的敌人碉堡群中穿过，进至蒋山、尧峰，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下旬到达平浏边界之芦洞。这时，敌人一个营尾追到芦洞，四十

七团和特务团利用高山有利地形，在十分疲惫的情况下，奋力战斗，给尾追之敌以沉重打击，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为了使省委机关有一个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同时使四十七团能够轻装到外线活动，以粉碎敌人妄图消灭省委和红十六师的阴谋，四十七团由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带领，于八、九月间转到外线，省委机关回到了黄金洞。

麦市突围及以后几次突围战斗中，我们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省委书记傅秋涛后来总结说：“这次突围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很深。主要是我们没有及时看出红军主力长征，敌人大举进攻苏区形势的急剧变化，大块根据地要转变为小块的根据地，规模较大的对立作战，要转变为游击战，老的局面要转变为新的局面，老的斗争方法要转变为新的斗争方法，这种急速的转化，我们没有及时看出来，及时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还是以过去的老观念、老方法来对付敌人，缺乏应有的警惕。特别是当红十六师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之后，有些麻痹轻敌。这个时候，红十六师的三个团，本应分散轮流休整，而采取了集中休整的方法，对于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白匪主力，会转回来进攻湘鄂赣苏区，事前没有作出应战的准备，以至大敌临头，失了主动权。这种及时的转变，是关系着我们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转得过来就能生存，就能发展，转不过来或转过来了行动不积极，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们被形势所逼，被动地转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①

^① 傅秋涛：《高举红旗，坚持斗争——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197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十三章 粉碎敌人的联合“清剿”

第一节 “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包围，返回平江黄金洞。这次突围，虽然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省委和红十六师，全部占领苏区的罪恶阴谋，但是，经过一年来历尽艰苦斗争壮大起来的红十六师，又遭到重大的损失。几块比较大的苏区，如鄂东南、平修铜、浏宜万等，又被敌人分割。从此，湘鄂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一、湘鄂赣三省反动派的联合“清剿”

一九三六年三月，湘鄂赣三省反动派召集“剿共”联席会议，随后，调动了十一个师、三省保安团和十一个别动队，向湘鄂赣苏区疯狂地进行“清剿”。

敌人由过去的大举围攻，改为分兵、分期、分区的“清剿”。他们把湘鄂赣边区划分为三个“清剿”区：第一“清剿”区，以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边区为主，中心点是平江县的黄金洞、义口、芦洞、辜家洞、徐家洞、白水、胡坪、周坊、横江；

浏阳县的大江洞、萤火洞、金坑、桃坪、大围山；铜鼓县的胆坑、幽居；修水县的台庄等地，由罗霖指挥，配备敌十五师、四师、七十七师、六十三师、十九师，以及湖南省几个保安团和七个大队，还有一个由叛徒编成的特务队。第二“清剿”区，中心点是阳新、大冶两县交界的七峰山、大湾、小湾、龙角山、百庄园；武宁、通山两县交界的九宫山、三界尖、冷水坪；临湘、岳阳两县交界的大药姑山等地，由陈继承指挥，配备敌四十师、三十师、三十五师另一个纵队，还有地主武装。第三“清剿”区，以万载、宜春两县为主，中心点是万载县的小源、株木桥、金钟湖、高村；宜春县的慈化、小洞，萍乡县的桐木；万载、宜春两县交界的丰顶山；铜鼓县的排埠、高桥；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的铜官山等地，由谭道源指挥，配备敌十六师、十八师、五十师和江西省保安团。此外，每县还有一个保安团和地主武装。

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大于我数十倍的兵力，在“清剿”区域内，越过省与省、县与县、支点与支点之间的界限，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所谓“囚笼”政策。在军事上，采取“清剿”、“进剿”、“驻剿”、“搜剿”相结合的恶毒手段，即派重兵分期分区“清剿”外，还调配小股部队，进山埋伏，搜山“进剿”；派遣叛徒、特务、便衣队，深入山区，坐山“驻剿”；利用地主武装挨户团、靖卫队，按村按屋场“搜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清剿”的过程中，加紧镇压人民的反抗，实行法西斯的统治，采取了各种毒辣手段和措施：

一、推行碉堡政策，进行层层封锁，重重包围，分割苏区。凡是苏区或游击区的交通要道、重点地区、高山隘口、城镇圩场和重要村庄，敌人都筑有大小碉堡，以碉堡为据点，进行分兵

把口。五十户以下的村庄，建立一个碉堡，五十户以上的村庄，建立两个以上的碉堡。在较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敌人驻有一个师、一个团或一个营的兵力。在小块的游击区或半游击区，也有一个连、一个排或一个班把守。周围修筑碉堡群，构成封锁线。举铜鼓为例，从该县的排埠开始，沿着铜鼓与浏阳、铜鼓与平江交界的山区，敌人构筑了两道弧形碉堡封锁线。该县东南地带，筑有碉堡一百八十座。其中，“军”字号碉堡一百二十六座，由白军驻守；“民”字号碉堡五十四座，由地主武装驻守。在平江、浏阳、修水、万载、宜春、阳新、大冶、崇阳、通山等地，也是一样。真是碉堡林立，星罗棋布。敌人以碉堡为依托，扬言要“车干塘里的水，活捉塘里的鱼”。他们一年要派出大批军队进行几次、甚至几十次的“清剿”，每次七、八天或十几天。

二、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国民党反动军队与地主武装相结合，对苏区干部和人民进行大屠杀。他们的刑罚有几十种，如火烧、烟熏、刀割、挖眼、灌开水、钉手掌、脚掌、千斤吊、单边吊、钻子钻、躺钉板床、铁丝穿手心、烙铁捅肛门、凌迟碎剐，等等，残暴野蛮，骇人听闻。浏阳县双洞乡大光洞龙塘，一次被敌人活埋了九十九人，萤火洞一次被活埋八十八人，各地被活埋的不计其数。平江县连云山一带，被反动派杀得尸横遍野，人烟断绝。通城县大恶霸葛皇甫狂吠“三洗黄袍，血染药姑”，在黄袍山、药姑山一带，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达一千多人。宜春县慈化苏区，一千二百六十多人被杀害。反动派在临湘、药姑山一带，过去杀人以人头计数，以人头示众，以人头报功，后来杀人如麻，就改以耳朵计数，以耳朵示众，以耳朵报功。敌人在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地屠杀苏

区人民的同时，还疯狂地烧毁人民群众的房屋，劫掠他们的钱粮财物，并建立“清乡会”、“挨户团”、“铲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在敌人“三光”政策的严重摧残下，老苏区断垣残壁，一片荒凉。平江县辜家洞是个老苏区，原有七百多户，三千七百多人，五百多栋房屋，三百多个纸棚，八百多个纸槽，一千二百多亩水田，两家油铺，三十家商店，六所小学，经过反动派多次“清剿”后，全洞只剩下两间半破房，山光林毁，田园荒芜，纸槽纸棚被破坏殆尽，“辜家洞”成了“孤家洞”。宜春县慈化苏区大岭村原有九十多户，五百多间房屋，三家店铺，二十八个纸槽，经过敌人的反复“清剿”后，全村房屋倒塌，荒无人烟。

三、强迫移民并村，实行经济封锁。敌人配合军事上的“清剿”，采取法西斯手段，驱赶苏区群众到驻有敌军的县城、集镇或碉堡附近居住，企图断绝红军与苏区人民的联系。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商人去苏区通商，用各种办法限制监视群众购买生活必需品，凭“良民证”计口购盐，计口购粮，实行定量配给，并设置关卡，检查盘问，唯恐群众为苏区提供各种物资，妄图断绝苏区一切物资供应的来源。

四、实行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敌人为了控制和镇压游击区、边缘区和白区的人民，实行按村编组保甲，五家一联，十甲一保。推行所谓“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防政策，强制各家各户互相监视，违者，轻则罚款、坐牢，重则杀头。

五、软硬兼施，利用叛徒进行“招抚”。国民党反动派收买叛徒孔荷宠，纠集了两千多名叛徒、走狗，分驻在平江、修水、铜鼓、宜丰、阳新一带苏区和游击区的周围，设立“招抚”机

关，散布各种谣言，张贴反动布告，散发“反共”的标语口号，蛊惑人心，欺骗群众。同时，敌人还采取各种威胁利诱手段，利用叛徒“招抚”一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投敌叛变，危害甚大。

敌人的摧残洗劫，疯狂屠杀，并没有吓倒苏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他们在中共湘鄂赣省委的领导下，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清剿”斗争，不断取得了胜利。

二、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反“清剿”斗争

一九三六年三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部署反“清剿”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当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省委对苏区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作了相应的改变，即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在原先建立的平修铜、修铜宜奉边、浏宜万、修武崇通、湘鄂边等五个特委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精简，实行了军事化，加强了统一领导。即将全省划分为四个特委和四个军分区：一是东北特委和东北军分区，管辖修铜宜奉边、高奉边、靖武奉，特委书记由赵龙（后叛变）担任；二是东南特委和东南军分区，管辖浏宜万、万宜上、万铜丰、万载、宜萍，特委书记由彭建新担任；三是西南特委和西南军分区，管辖平修铜、平浏长、湘鄂边，特委书记由谭启龙担任；四是西北特委和西北军分区，管辖鄂东南、修武崇通，特委书记由秦化龙（随后是江渭清）担任。各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各县委书记是游击队或游击小组的领导者。有的县苏维埃政府被取消，改为县苏维埃工作团，有些区委则以工作队的面目出现。他们一面领导打游击，一面

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同时实行干部地方化和群众化，鄂东南的干部到鄂东南工作，平浏修铜的干部到平浏修铜工作，本地干部去当地开辟工作。这样，人地熟悉，有群众基础，易于适应恶劣的斗争环境。因此，一直到国共合作抗日，都能保持党的坚强的组织领导，保证了各游击区在被敌人分割“清剿”的情况下，能始终坚持革命斗争。

在军事上，省委根据麦市突围的教训和多次的实践经验，逐渐体会到毛泽东所说的，“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①，是完全正确的。省委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只有依靠人民，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遇强敌包围时，即向敌后进军，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打击敌人，这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巩固根据地。这是麦市突围以后省委所坚持的战略方针。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省委提出了创建十个独立营的计划。一方面要求各特委和军分区继续做好扩军工作，如将地方游击队升级为主力红军，动员老兵归队，伤病员治愈后即重返前线，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发展地方游击队组织，广泛组织游击小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组织红军游击队到外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瓦解和消灭敌军，教育俘虏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的武装力量。

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后，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率领省军区独立团的部分兵力，在平江的芦洞、白水、义口、周坊一带发展地方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又分散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这几县的地方游击队的

^①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配合下，从修水的靖林，直到铜鼓的山溪坳、幽居、胆坑、虎坳一带沿途数十座敌人碉堡，均被我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红十六师部分兵力开赴外线活动，在万载、奉新、靖安、武宁、瑞昌、阳新一带，大游小击，沿途消灭了一些保安团、靖卫队，捣毁了敌人的一些碉堡，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加了红军。四、五月，在万载株潭的乱石岭、潭埠和赤兴的书堂三次战斗中，在东南分区游击队和万载县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歼灭了江西保安旅一、二团大部分，击溃了保安第八团一个营。六月间，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利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情绪，打着“反蒋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变”。红十六师趁此有利时机，提出“飞兵前进，横扫敌人”的口号。七、八月挺进到奉新，佯攻奉新县城，围城打援。在修铜宜奉县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伏击了驻在奉新上富的江西省保安第九团，击溃敌人一个团部和一个营，缴枪两百多支。九月向修铜宜奉边一带游击，敌人派出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尾追，我军于奉新与靖安交界之东坑与敌激战，在东北分区游击队主动配合下，取得了东坑大捷，歼敌六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敌团长被击毙。红十六师继续向靖安方向前进，途中穿越敌人碉堡群时，师政治部主任黄加高不幸中弹牺牲。以后部队由靖安，经武宁转向瑞昌。十月，我军便衣奇袭瑞昌县城，枪毙了县长宋友梅。后又向阳新一带活动。约在十一月，又返回平浏地区。这时，红十六师再度恢复到一千多人，驰骋于湘鄂赣游击区各地。

原在长沙、醴陵一带敌后活动的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徐彦刚牺牲后不久，由严任司令员），率领红十六师原四十七团部分兵力，十月间转战到万载，又从万载的上坪游击到宜丰的洞

上、直源、港口、蕉溪一带，歼灭了驻地保安团、靖卫队，后经铜鼓转向修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不久，严图阁因积劳成疾，不幸患病逝世。

这年底，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突破了敌人对平浏地区的“清剿”。红十六师由师长方步舟及新任政委明安楼率领（原政委刘玉堂返回后方养伤），转战鄂东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转向通山县黄沙镇的梅田时，与敌新八师一个团相遇，两军激战后，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遭受损失，乃转移到通山边界的九宫山区。一九三七年一月，傅秋涛率领省级机关和省军区独立团在通山、崇阳交界处与红十六师会合，恰遇敌保安第十团向我军攻击，在崇阳、通山两县交界的三界尖激战，我军受挫，方步舟叛逃投敌。同年二月，傅秋涛、明安楼率领部队返回平江黄金洞，红十六师改名为湘鄂赣野战军。

同年三、四月间，野战军在铜鼓的胆坑和宜丰的同安两次同数倍于我军的敌军作战，均失利，部队从千余人锐减到两三百人，政委明安楼身负重伤。部队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后，在修铜宜奉边的铜官山找到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东北特委和东北分区游击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五月间由政委明安楼，代参谋长吴咏湘率领部队，往北绕道修武崇通地区，翻越崇山峻岭，穿过茂密丛林，夜行昼宿，摆脱敌兵尾追，赶回平江河西咏生县。此后，野战军余部与省军区独立团合编，直到国共合作抗日。

在反“清剿”斗争中，各分区地方游击队，也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广泛开展了游击活动。一九三六年期间，东北特委领导东北分区独立营和修铜宜奉县游击队，反击进犯的敌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在修水、铜鼓、宜丰、奉新一带建立所谓“模范清剿

区”的计划。战斗在万载的金钟湖一带的东南分区游击队，在东南特委的领导下，化整为零，组织游击小组，破坏株萍铁路，阻塞敌人交通。同时还化装奇袭盘踞在万载株潭、黄茅一带的敌人碉堡群，打通通往丰顶山一带的交通线，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在各地的红色游击队，除在军事上集中游击，粉碎敌人的“清剿”外，还分散组织游击小组，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逼租逼债、抽丁纳税、移民并村和保甲联防的斗争。

在反“清剿”斗争期间，省委注意了发展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当每次部队出动时，省委都指示各级党组织，布置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作战。在战术原则上，不是死打硬拼，而是采用精干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的形式，依靠群众，实行大游小击，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专打弱小敌人的办法。敌人进山，我们出垅；敌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向敌人的铁道边、公路边、大城市附近等深远的后方进攻，打挨户团，打土豪，摧毁敌人的乡保政权；敌人集中，我们就分散袭击敌人；敌人分兵，我们就相对的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我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大敌来了，我们就走；小敌来了，我们就打，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我们靠群众掩护，靠群众作耳目，靠两条腿，靠机警灵活，深入白区，打击敌人。^①这一套游击战术，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当时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反“清剿”斗争一开始，省委就确定要巩固和发展以平修铜为中心的游击区。这里，有纵横交错的崇山峻岭，有经过长期

^① 傅秋涛：《高举红旗，坚持斗争》，第36页。

斗争考验的群众，是湘鄂赣边区的中心，便于领导各个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全省各级党组织也都十分注意选择地形条件较好的山区，建立游击区的中心区域。湘东北的黄金洞、连云山、大围山、幕阜山；鄂东南的九宫山、七峰山；湘鄂边的大药姑山；赣西北的黄龙山、丰顶山、龙门山等，地形险要，群众基础较好，都成了游击区的中心区域。这些中心区域是我军有利的作战阵地，便于隐蔽和与敌周旋，可以伺机出击敌人，对湘鄂赣边区人民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湘鄂赣边区军民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反“清剿”的。当时的根据地和游击区，由于战争频繁，人烟稀少，田地贫瘠，给边区党政机关和军民的吃穿住带来很大的困难。一九三六年期间，湘鄂赣省级机关和部队，有半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有时候，两百人仅有两升米，只好煮米汤喝。经常以苦菜、野果充饥。没有油，白水煮辣椒是好菜，白水煮竹笋是家常便饭。穿的住的也很困难。有时茅草当褥子，树叶当被子，山岩石洞当房子，风餐露宿，过着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即使这样，他们毫不灰心气馁，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学文化，学理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第二节 坚持斗争 善于斗争

一、依靠群众，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湘鄂赣省广大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无论是红军部队或各级机关，凡是打土豪获得的粮食和衣物，

总要分一部分给当地群众，使广大群众亲身感受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为了保护苏区和游击区群众的利益，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省委作出关于“今年秋收斗争的决定”，指出“必须把武装民众反日反蒋运动，紧密的联系着劳苦工农武装保



“送夫当红军”纪念章。

卫秋收、抗租抗债抗捐税与反对国民党一切奴役压迫的斗争。”“在开展反日反蒋战线，急进扩大红十六师，恢复与发展湘鄂赣苏区的政治任务之下，必须以领导群众为获得自己实际利益的秋收斗争，为动员群众最基本的策略。”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了这个决定，组织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赤卫军，消灭收租抢谷的地主武装，武装保卫秋收。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湘鄂赣边区革命群众从土地革命获得的切身利益中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他们的救星和贴心人，从而产生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与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父亲牺牲了，儿子上前线；哥哥牺牲了，弟弟去接班；丈夫牺牲了，妻子去报仇。他们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口粮、食盐和衣物，冒着生命危险，送给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机关；在枪林弹雨中，他们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作向导，抬担架，掩护红军，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他们以全家、全村的生命来保护红军伤病员，保护红军家属，保护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一九三六年春，东南

分区游击队有个队员负伤，隐藏在万载金钟湖山上休养。群众送茶送饭，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一天，有个妇女抱着婴儿去送饭，忽然遇到敌人搜山。为了防止婴儿啼哭，以免惊动敌人，保护伤员的安全，这个妇女用奶头塞住婴儿的嘴，使敌人一无所获，而婴儿却在母亲的怀抱中窒息而死。

在敌人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恶劣环境中，苏区群众真心实意地支持红军。用各种办法帮助红军开展工作。例如，有一次，省委书记傅秋涛带领红军游击队几百人，从平江的嘉义与长寿街之间的大水墩过河，到咏生县去，走到中途天亮了，就隐蔽在大水墩一带的村庄里。这里周围敌人碉堡林立，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当地群众为了掩护部队的安全，自动动员起来，派出一部分人轮流在敌人碉堡四周的田间劳动，注视敌人动静，留下一部分人在家里做饭、磨豆腐，热情慰问红军。群众说，“牺牲我们一个人一家人都没有关系，只要红军和苏维埃存在，大家就有希望。”湘鄂赣省的党和红军，依靠着这样好的人民群众，克服艰难困苦，坚持着革命斗争。

二、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湘鄂赣省各级党组织，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对敌斗争中，他们坚持阶级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对于资本家，除了极个别反动的以外，一般都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就有利于团结群众的大多数，集中精力去对付敌人。

针对敌人的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他们开展了反“保甲联防”的斗争。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在关于执行策略方法的决定中，指出要“彻底铲除保甲制度，将保甲分子捉得来，予以公

开告诫，仍又将其释放回去，一方面粉碎敌人欺骗说我们杀人的鬼话，另一方面，使之自相攻击，打坍保甲”。^①当时，在各地普遍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的政治攻势，摧毁保甲组织，强制保甲长登记受训。对保甲长采取了军事上的打击和政治上的争取相结合的办法。凡是干了许多坏事，本身又是地主富农分子的，就给予惩办，以至镇压；作恶不多，不向敌人告密的，就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不暴露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和争取，并利用他们去获取敌人的情报，购买我们急需的物品，掩护我们的同志开展工作。实行这种政策，效果良好。

在湘鄂赣苏区斗争处于十分严峻的时候，出现了少数投敌叛变分子。他们有的是一度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政治上动摇，看不清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是吃不了苦，贪图安逸；有的是被敌人捕捉后，经不起威胁利诱而变节投降，等等。他们投敌以后，有的死心踏地为敌人进行“招抚”，出卖组织和同志，罪恶深重；有的公开作反共宣传，污蔑我党我军，恶迹昭彰；有的则是消极悲观，逃跑回家。对这些分子，湘鄂赣省各级党组织，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予以处理：对罪大恶极的叛徒，给予严厉的镇压；对一般的投降自首分子，给以警告，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政治面目，发动群众监视。

由于湘鄂赣党组织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分化、孤立和打击了敌人，促进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①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关于执行策略方法的决定》，1937年5月27日。

三、到外线开展白区工作

在敌人疯狂“清剿”的严重情况下，湘鄂赣省委提出反对固守山岭的保守主义，把工作放到外线去的口号。一九三六年，省委和各特委先后派出一批干部到万载、宜春交界的丰顶山、宜萍边界的小洞，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鄂东南的九宫山，湘鄂边的大药姑山等地，建立外围支点，同白区工作保持联系，掌握敌情。同时，派出一批坚强的干部深入白区，秘密地发展党员，建立革命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白区工作。例如，受省委派遣的辛苦，曾到上高、高安一带，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区委和县委机关，在当地开展地下斗争；李明秋、袁仲贤亦曾奉命到湖南长沙县铜官镇，秘密发展了一百多个党员，随后成立了湘江特委，建立了一千多人的陶业工会组织，打通了平浏长边区到长沙的交通线。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给苏区和游击区通消息，送报纸，运粮食；当红军游击队到白区活动时，他们就秘密地配合行动。红十六师和省军区独立团，曾多次深入到鄂东南、赣西北、湘鄂边一带敌占区，大游小击，骚扰敌人后方，捣毁区乡政权，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九三七年春，省委指示“要打到敌人屋檐下去”，东北分区集中地方武装二百多人，成立东北分区游击队，由吴嘉民任大队长，刘珍吾任政委，率领部队向南浔铁路、长江流域挺进，以牵制敌人。游击队从修水境内出发，开至靖安北港时，分区司令员聂海如投敌叛变，部队受到损失，遂又折回，在修水、武宁边界继续坚持斗争。

敌人为了防止红军游击队到白区活动，曾强迫群众组织守望队，在碉堡、村头、路口守望。红军游击队采取各种措施，

极力争取守望队员。守望队员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对红军游击队是拥护的，经过我们教育后，大多数能站到我们这边来。红军游击队在白区打土豪，守望队给放哨带路，红军游击队走了，他们才鸣枪报告，掩护脱身。有时敌人搜索很紧，红军游击队就伪装守望队，同守卫队员们一起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对守望队的顽固分子，红军游击队就发动群众，给以制裁打击。这样，红军游击队到外线活动，开展白区工作，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外线斗争和内线斗争结合起来，对苏区反“清剿”斗争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四、找党中央

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省委一度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曾先后派出黎申耕、庄构丰、李楚民、赵德兴、罗其南、李明秋、邓洪等到湘赣、湘鄂西和延安等地找党中央。一九三六年五月，省委组织部长黎申耕等五同志，到中央分局找党的关系，在万载东坑途中遇敌，不幸牺牲。此后还牺牲了赵德兴。交通员庄构丰到湘鄂西找到了任弼时，带回两个文件，一是任弼时在红六军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一是中央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六月，省委又派罗其南、李楚民去延安请示党中央。在这以前，省委已派了邓洪、李明秋去延安，没有得到音讯。罗其南、李楚民化装上路，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于七月四日到达延安。这时邓洪、李明秋也到了延安。他们见到了毛泽东、董必武和李富春，向党中央汇报了湘鄂赣省坚持革命斗争的情况，听取了指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进行

了分析，对江南抗日工作作了指示，还交给他们很多文件带回省委。八月中旬罗其南等回到平江嘉义，向省委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

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湘鄂赣边区广大军民，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正确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正确实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紧紧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坚持游击战争，终于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

第十四章 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一节 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作好谈判和应战两手准备

正当湘鄂赣苏区军民艰苦卓绝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时候，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我国领土，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抗日爱国运动进一步高涨。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停止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七日，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庐山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合作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地切实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七年以前，湘鄂赣省委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只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后来见到《解放》周刊上登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初步了解了我们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一九三七年

一月，才接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发布的“八一宣言”。为了及时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合作抗日政策，一九三七年五月，湘鄂赣省委多次召开座谈会，结合当时边区的敌我斗争情况，反复讨论如何实现和平合作的问题。最后决定，一面派人请示党中央，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战。

经过十年阶级斗争，特别是三年艰苦游击战争洗礼的湘鄂赣苏区军民，许多人一下子都不能理解和难于接受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思想上抵触情绪很大。为此，省委召开了各种会议，反复进行宣传教育，统一了认识，广大军民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合作抗日政策。

为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省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合作，其条件是：（1）划湘鄂赣苏区为特区；（2）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3）释放所有被捕的革命同志；（4）发给经费。另一个方案是停战，其条件是：（1）撤退对我们进攻的部队，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2）把平江县的嘉义市让出来给我们，便于与武汉行营谈判；（3）我们集中部队时要通行无阻，不得逮捕和杀害我们的人员；（4）发给经费；（5）停止诱降行为，叛徒来‘招抚’，我们就杀。”^①方案确定后，省委立即着手进行和平合作谈判的其他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省委还布置各地照常扩大红军，准备应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一面与我党中央谈判合作抗日，一面密令国民党军队，在三个月内消灭南方各省游击区的红军。国民党五十师疯狂地向平修铜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区进攻，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为此，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湘鄂赣

^① 傅秋涛：《高举红旗，坚持斗争》，第55页。

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对动员粉碎敌人新进攻战斗要令》，指示红军游击队加强战斗力量，深入到敌人后方，进攻和歼灭驻敌，占领城镇；各地武装力量应反击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地方游击队应积极配合红军行动，迷惑敌人。在行动上要机警灵活，趁敌人调防时，插到空虚地方，大量捣毁敌人的碉堡，钳制敌人的行动；一切群众武装组织应加紧赤色戒严，严密赤色哨线，肃清苏区内奸，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省委还通知各地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在没有接到省委领导亲笔信件时，不要轻易集合部队，免中敌人诡计；并布置各地积极完成扩军计划，动员老兵归队、群众参军。

同时，湘鄂赣省委还发出《为加速扩大军团在红五月底作一个步骤总结》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红五月扩军动员工作，提出了各分区和各县动员扩军的具体要求，并号召“一切为着保卫以平修铜为中心苏区，联成东北、西北、东南苏区一片而战”。省委指示各地，凡是在当地不能隐蔽下来的干部，即调到红军中来工作；能隐蔽下来的，应建立当地党的秘密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凡是能到白区去的干部，即到白区去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

为了适应联蒋抗日政策的需要，湘鄂赣省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正式成立了“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傅秋涛，委员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五月十五日，并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全国发表声明：主张和平合作，一致抗日。

二、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发表

《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二十一日，湘鄂赣省委作出了《为国共和平合作的政治决议》。这两个文件指出，“目前国内，中日矛盾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次要的”，“中国需要和平合作，一致抗日，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抗日的彻底胜利”；文件提出“只要国共两党和平合作，一致抗日”，就可以“停止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方针”；“目前党的中心口号是拥护国共重新合作，一致御敌救亡，一切服从抗日，为和平统一而奋斗。”这些主张，对合作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时提出“停止阶级斗争”的口号，则是违反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因而是错误的。后经中央指出，及时予以纠正了。

当时，合作抗日的趋势已经出现，湘鄂赣省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号召湘鄂赣边区的各党派、各军队，化除成见，共同抗日。在这一方针下，党的政策和策略也相应地作了部分改变，如将打土豪筹款，改为向土豪筹募抗日捐，劝告地主豪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

根据省委的指示，平修铜、修铜宜奉、浏宜万、鄂东南、修武崇通等地，都加紧进行了抗日的宣传，把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宣言文告、标语传单，散发到苏区、游击区和白区的城镇乡村，分发给各界爱国人士，号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修武崇通县委还派人到驻有国民党重兵的修水三都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造成了强大

的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接受停战谈判。

在谈判开始前，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叛徒孔荷宠之流，用“招抚收编”的方法，来诱骗红军游击队投诚。为此，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于八月二十日发出布告，指出：“近乃有破坏国内和平统一的不肖之徒，当我双方进行谈判时，胆敢欺骗落后民众，散播红军‘投诚’与‘收编’等荒谬离奇鬼话，……对于个别破坏国内和平统一挑拨内战者，本会坚决采取严厉的镇压与取缔。”这一严正声明，及时地揭露了国民党诱骗、瓦解红军的阴谋。

通过上述各项工作，湘鄂赣边区党政军民统一了思想，充实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的武装，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为和平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

湘鄂赣省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国民党方面派出两名连长到平江县义口与我军谈判。省委当即断然拒绝，指出这个谈判是一件大事，只能同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七月十三日，湘鄂赣省委派省委秘书长黄耀南到平江县献钟，与国民党武汉行营派来的两个参谋接洽。十五日，我们同国民党五十师派来的一个团副和武汉行营那两个参谋，在平江县义口的陈家大屋进行第一次谈判。省委提出四项合作条件和五条停战条件，他们只接受了停战条件。第一次谈判乃告结束。

七月十八日，在平江县嘉义镇关帝庙进行第二次谈判。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代表，有五十师一个旅长，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平江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湘鄂赣省委派傅秋涛、涂

正坤、钟期光为代表，跟随警卫的有梁金华、阮汉清。为了防止意外起见，红军部队在外线布置了警戒，作好了应战准备。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代表，宣扬一套所谓“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谬论，我方代表予以严正驳斥。这次谈判，解决了一般性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双方同意提交浏阳谈判去解决。

党中央非常关注湘鄂赣边区的谈判，先后派赖传珠、李涛到湘鄂赣省委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使谈判有了明确的方针。

七月二十日，驻浏阳的国民党五十师师长岳森，派人邀请我方去谈判。省委派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为代表，在浏阳县城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谈判，警卫组长吴咏湘，组员吴光明、汪清、何继先随同。在浏阳住了一个晚上。双方谈定：1.释放在押的政治犯；2.在浏阳建立我方的办事处；3.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至于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我军的经费等问题，待武汉谈判解决。

八月二十日，湘鄂赣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到武汉行营谈判。董必武也到了武汉。这时省委才与党中央直接联系上了。于是谈判就由董必武负责。八月二十九日，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成功，终于建立了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节 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编入 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成立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武汉谈判成功后，湘鄂赣省委派傅秋涛到武汉，会见了周恩来、董必武、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

了湘鄂赣省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等问题，最后决定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湘鄂赣边区最后还保存下来近五百名党员干部，三百九十多名战士，共约九百人。

这时，驻守和平江县嘉义的国民党军队已全部撤走。平江之义口、谢江一带，划为红军游击队集中区。一九三七年九月，湘鄂赣省级机关陆续搬到平江嘉义镇。

当时，省委和省军区陆续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分区整顿和扩大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一九三七年九月，省委派吴咏湘、周逢湘、张学平到东北分区集中收编地方游击队。十月，省军区又派张藩前去协助工作。在这期间，铜鼓、宜丰和奉新三县反动政府勾通一起，将三县政训团调到铜鼓县大垵一带，准备进攻在铜官山一带的东北分区游击队。在他们动手的前一天，吴咏湘等发觉敌人的阴谋，立即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向他们指出，必须马上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他们要负破坏合作抗日的全部责任。经过这番斗争，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在东北特委和宜丰县委工作团的积极配合下，省委和省军区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努力扩大地方游击队。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游击队由原来的三四十人发展到三百多人，组成了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九大队，于十一月从宜丰潭山出发，经铜鼓来到嘉义集中。

当时的扩军整编工作，遇到了一些阻力。这种阻力有来自外部的，如地主豪绅、顽固分子的造谣惑众，暗中阻挠破坏；也有来自内部的，如赣北游击队队长，由于不了解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脑子转不过弯来，竟把省委派来的明安楼作为叛徒误

杀了。虽然工作上有着不少的困难，但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团结了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扩军任务。同年十一月，秦化龙率领西北分区游击队，江渭清收集湘鄂边一带的地方游击队，罗益成、冯杏娥率领平修铜游击队，以及战斗在万载的金钟湖和丰顶山一带的东南分区游击队等，都陆续来到嘉义集中。

各分区和各县游击队来嘉义整训后，改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主要由傅秋涛率领的省军区独立团组成；第二大队主要由吴咏湘、张藩率领的东北分区第九大队组成；第三大队主要由江渭清、秦化龙率领的西北分区和西南分区游击队组成。支队司令员傅秋涛，副司令员刘玉堂，国民党派来的罗世忠亦任副司令员，另外还任命了国民党五六个人为副官。当时，接受国民党人来我军任职，是由于对保持我军独立自主权认识不清所致，后来经周恩来副主席指出，才纠正了这个偏差。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军部决定将江南各省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支队。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江渭清任副团长。

二、省委改为特委和新四军后方留守处的建立

为了推动全国全面抗日的新高涨，发展湘鄂赣边区的革命形势，湘鄂赣边区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充实。在这之前，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进行了人事调整，省委常委会由涂正坤、张德华、骆奇勋、冯杏娥、

曾国祺、谢乾、邓洪、傅秋涛、肖辉锡等九人组成。涂正坤任省委书记，傅秋涛改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洪、刘玉堂任副主席。^①同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将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特委下设组织、宣传、民运、保卫、妇女、青年各部，特委书记涂正坤，组织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长骆奇勋，民运部长黄耀南(后任宣传部长)，保卫部长谢乾，妇女部长冯杏娥，青年部长谭启龙(一九三八年二月谭调走后，由罗其南继任)，傅秋涛、邓洪参加特委常委。湘鄂赣特委根据新的政治任务的要求，重新分配干部，布置边区党的工作。并且选派一批熟悉地方情况、坚强可靠的干部，集中训练，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配到各县去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部队离开平江奔赴抗日前线时，在嘉义设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留守处，主任黄耀南，掩护特委进行工作。各县党的组织也重新进行了调整，建立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春、宜丰、奉新、通城、通山、阳新、大冶等县委。特委强调干部地方化，当地干部去当地工作，准备坚持长期斗争。很多干部用退伍、养病、回家探亲等名义，回到各地进行工作。

为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湘鄂赣特委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的名义，派了一批干部到宜春、平江、浏阳、阳新、通城、通山、修水等县，建立了一批办事处和通讯处。其中，谭启龙到平江县城设立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办事处，李辉

^①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五年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洪，副主席曾国祺、刘玉堂。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国祺、副主席郑济民、刘玉堂。

到宜春的慈化，罗益成到浏阳，邱炳到通城，李成铁到修水，赵勤到阳新，王全德到通山，分别建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各地通讯处的职责是：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界人士宣传我党合作抗日的方针政策，推动他们走抗日民主的进步道路；交涉释放我方被捕的同志；开展支援抗日前线、安置红军家属和抗日宣传等方面的工作。部队离开平江开赴抗日前线后，除在平江嘉义设立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留守处外，其他办事处和通讯处均相继撤销。

三、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抗日前线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由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这时，部队已扩大到一千一百人，有两百一十多支步枪，三挺轻机枪，还有七百三十把马刀。部队经过平江长寿街，浏阳的东门、官渡，到宜春的慈化，沿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青年们纷纷参军，短短几天内，部队又扩大了四百多人。

这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骨子里则深恐人民抗日力量壮大，一直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弱和消灭人民的武装力量。当傅秋涛、江渭清率领部队到达慈化时，即接到新四军军部的紧急通知，获知国民党已派两个团的兵力驻在袁州（今宜春），企图等我部在那里下车时发动突然袭击，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对此，广大指战员义愤填膺，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击敌人。部队到达萍乡后，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了火车，把机枪架在火车头上，马刀亮在车窗外。同时还给火车司机做了政治思想工作，在袁州不停车，一直往前开。这样，火车顺利通过了袁州，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妄图消灭我军

的阴谋。部队到达江西玉山县下车，继续向浙江开化县挺进。到达开化县城时，会见了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这里休息了几天，部队又继续前进，翻过马金岭，到达屯溪、太平，与叶挺军长率领的新四军军部胜利会合。从此，湘鄂赣边区红军胜利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中。

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严重恶果、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党以坚强的组织领导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领导边区军民为保卫革命红旗而坚持斗争。红旗不倒，坚持有功。湘鄂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显著成绩。它配合其他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在革命处于困难的时期，它是一面鲜红的革命旗帜，为我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尔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湘鄂赣苏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直坚持革命，战斗不止，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附录一

湘鄂赣苏区大事年表

一九二七年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爆发秋收起义。

九月，鄂南发动秋收暴动。

九月十六日，平江县农民第一次“扑城”。

十一月，修水农民万余人进城示威。

一九二八年

一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岳阳建立，两月后遭到破坏。

二月，平江县成立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湘、岳游击总队。

三月十六日，平江县农民第二次“扑城”。

六月，浏阳县几支游击队联合成浏阳游击队。

六月，国民党独立第五师调到平江。

六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调滕代远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准备恢复特委机关。

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组织和领导了平江起义。

七月二十五日，红五军党委和平江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红五军成立，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九月十七日，湘鄂赣边特委在铜鼓幽居正式恢复。

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三省“会剿”。

十月，红五军与工农游击队在修水台庄合编为五个纵队，确定一、二、三纵队在边区开展游击活动，四、五纵队上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

一九二九年

四月十二日，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改组特委，部署工作。

四月，一、二、三纵队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边区成立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

六、七月，湘鄂赣三省反动派又一次发动“会剿”。

八月，红五军四、五纵队返回边区，并与湘鄂赣边境支队合编，仍然统称红五军。

八月下旬，红五军五纵队向鄂东南挺进。

九月二日，边境特委在平江芦头举行会议，作出新决定，选举第二届特委。

十月二日，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发布革命政纲。

十一月十六日，大冶兵暴。

十二月，一、三纵队继红四纵队之后去湘赣边区。

十二月十日，在万载陈坑召开第二届特委第二次执委会会议。

一九三〇年

二月，边区发动年关斗争。

三月，举行“三·一八”武装大示威。

三月下旬，红五军一、三、四纵队重返边区。

五月，开展红五月暴动。

六月八日到十七日，召开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六月初，红五军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

六月，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

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万人在平江举行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大会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

七月二十七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城。

七月三十日，在长沙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八月，红十六军宣告成立。

八月二十三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合组红军第一方面军。

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半月后停止进攻，撤出长沙。

十月，湖南反动派组织“平浏绥靖处”，对苏区进行血腥的屠杀。

十二月，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十二月，湘鄂赣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

一九三一年

年初，苏区地方武装编成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

二月，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四月，召开边境团代表大会，少共湘鄂赣边特委改称少共湘鄂赣特区委。

七月初，在浏阳东门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

七月，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八月，第一届省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

九月二十三日，在平江长寿街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九月，湘鄂赣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湘鄂赣省赤色总工会。

九月，少共湘鄂赣特区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改称少共湘鄂赣省委。

十月五日，召开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届执委会，推举正副主席。

十一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正式成立，各县、区设分行和支行，并发行票币。

一九三二年

三月一日，召开全省第一次雇农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赣省雇农总工会。

三月初，召开第一届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

三月八日，召开湘鄂赣省妇女代表大会。

三月十八日，举行全省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湘鄂赣省委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中央代表团来湘鄂赣省，撤消原省委，成立临时省委。

三月，成立湘鄂赣省军区。

四月十二日，召开全省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四月十八日，召开省总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改选省总执委会。

五月，再次召开全省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六月，苏区军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六月，鄂东南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赣省

鄂东南苏维埃政府。

八月一日，召开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

八月十七日，在万载小源召开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在万载小源召开湘鄂赣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九月，召开少共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

九月十五日，召开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全省职工联合会。

一九三三年

二月，成立红十八军。

三月十九日，全省红军二万五千人在万载高村一带集中，奉命沿锦水向东行动。

六月，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奉命改编为红六军团的十六师和十八师，八月正式改编完毕。

十月，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十一月，红十六师主力奉命沿锦水向东行动，配合红十七师破坏南浔路。

十二月，中央派陈寿昌等来湘鄂赣改造省委，到达省委驻地小源。

一九三四年

一月，召开湘鄂赣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组成新的省委。

一月下旬，小源被敌包围，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小源撤出，并决定成立中共浏宜万工作团和第一、第二、第三三

个作战分区。

二月，红三师在王文驿遭敌袭击，损失兵员三分之二以上。

二月，红十六师主力与红十七师在宜丰黄沙会师，执行破坏南浔铁路任务。

二月，省级机关转移到铜鼓的幽居、祖庄一带，受敌包围，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四月决定向修铜宜奉边转移。

五月，红十六师主力转回后，掩护省级机关突围，遭受损失。

六、七月，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转移途中在龙门山区遭敌六个师的兵力袭击，损失严重，仅剩下一营人，称“六、七月事件”。

八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建红十六师。

九月，组编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宣告红十六师正式恢复。

一九三五年

四月，红十六师恢复三个团建制。

六月，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被迫突围。

六月，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分三路从通城麦市突围，损失很大。后来，严图阁带领四十七团一部分到长沙、醴陵一带敌后活动，省级机关及一部分部队先后转到平江黄金洞。

一九三六年

三月，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部署反“清剿”斗争。

三月二十七日，省委提出创建十个独立营的计划。并作出
一系列决定，全省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特委和
军分区。

九月，红十六师再度恢复到一千多人，驰骋于湘鄂赣游击
区各地。

十二月，省委提出：反对固守山岭的保守主义，把工作放
到外线去。

一九三七年

二月，红十六师改名为湘鄂赣野战军。

二月二十八日，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进行人事调整。

三、四月，野战军与敌激战失利，从千余人锐减到两三百
人，后与省军区独立团合编。

五月十日，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

七月，党中央派赖传珠、李涛先后到湘鄂赣边区传达中央
指示。

七月十五日，在平江义口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举行第一
次和平合作谈判。

七月十八日，在平江嘉义镇举行第二次和平合作谈判。

七月二十日，在浏阳县城举行第三次和平合作谈判。

八月二十日，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和平合作联合
宣言》。

八月二十一日，省委作出《为国共和平合作的政治决议》。

八月二十九日，武汉谈判成功，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正式建立。

十一月，全省游击队在嘉义集中整训后，改编为湘鄂赣人

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十二月，省委改为特委，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

一九三八年

一月，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在平江嘉义设立留守处，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附录二

本书主要参阅文献资料目录

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大纲 1928年

夏致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 1928年9月5日

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政纲 1928年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平、修、铜的革命斗争 1929年1月
12日

蒋长卿：给省委并中央的工作报告 1929年3月20日

彭德怀：给中央的信 1929年4月4日

湘鄂赣边特委通知第一号：关于湘鄂赣边“四·一二”扩大会议 1929年4月18日

曹大骏：鄂东组织报告 1929年5月13日

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关于平浏方面综合性的报告
1929年6月14日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
1929年8月3日

湘鄂赣边特委给湖南省委的综合情况报告 1929年8月18日

曹大骏：鄂东巡视员报告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关于苏维埃问题与任务及农民经济红军党务问题 1929年9月5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 1929年

鄂东巡视员吴致民自阳新来信 1929年9月11日

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 1929年10月2日

王首道：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 1929年12月2日

湘鄂赣边特委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决议 1929年12月10日

湘鄂赣边特委报告 1929年12月21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湘鄂赣边特委的信——关于苏维埃、农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 1929年12月30日

湘鄂赣边特委关于政治情形、党务工作、地方巡视等问题与意见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30年1月23日

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30年1月28日

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报告第三号 1930年1月31日

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目前农运的任务和工作路线 1930年2月6日

湘鄂赣边特委关于边境武装斗争的情形和今后工作意见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第十号) 1930年2月24日

湘鄂赣边特委给浏阳县委通讯第九号(浏字第二号)——对于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缺点的指出 1930年2月

湘鄂赣边特委给平江县委通信第五号(平字第一号)

1930年2月

湘鄂赣边特委关于边境工作情况和意见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第六号) 1930年3月9日

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通告第三十号：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

1930年3月21日

湘鄂赣边特委通知第九号——关于召集边境各县民众团体联席会议 1930年3月21日

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为发起召集边境各县民众团体联席会议公启 1930年3月21日

中共万载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1930年5月

暂行湘鄂赣边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法 1930年5月

鄂东特委向中央报告 1930年6月6日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边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政治问题决议案） 1930年6月8日到17日

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一号 1930年6月27日

彭德怀：关于三军团夺取岳州长沙经过及经验教训与平江会战及今后行动方针给中央的报告 1930年9月20日

彭德怀：关于第三军团的组织状况及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之报告 1930年9月21日

中共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为此次夺取长沙政权告湖南工农兵劳苦群众书 1930年9月29日

鄂东南关于苏维埃问题决议草案 1930年

湘鄂赣边特委关于工人运动的一般情况的报告 1930年

湘鄂赣边C Y特区委给少共中央的报告 1931年4月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边特区委通告第一号——对于肃反工作的指示 1931年4月7日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边特区委通告第二号——巩固中央苏维埃根据地与湘鄂赣边特区党的任务 1931年4月12日

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秋收斗争计划决议案 1931年7月12日

中共鄂东南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 1931年8月14日

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 1931年8月3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31年

中共湘鄂赣省委紧急通告第四号：抓住目前客观环境的转变，加紧进攻敌人，巩固与恢复苏区工作的又一指示

1931年9月15日

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 1931年9月

贫农团问题决议——中共湘鄂赣省委第十九次常委会通过

1931年11月16日

鄂东南各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土地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29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宣布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

1931年11月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鄂东南办事处反富农斗争决议案

1931年12月6日

C Y 湘鄂赣省委向 C Y 中央的报告 1931年12月25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通告第七号——击破敌人总进攻计划与目前党的几个重要工作的决议 1931年

李宗白：关于湘鄂赣省的工作报告与过去所犯的错误及其责任 1931年

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法 1931年

湘鄂赣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法 1932年1月1日

湘鄂赣省鄂东第二次各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经济问题决议案 1932年1月20日

鄂东道委给中央的报告 1932年1月20日

苏区中央局致湘鄂赣省委信 1932年1月20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 1932年2月6日

湘鄂赣省总给全总的报告 1932年2月16日

鄂东南各县苏财政经济部长联席会议决议案

1932年2月20日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会第二次执委决议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与湘鄂赣省的战斗任务

1932年3月

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赣省委信——对于省委改组，豪绅、地主问题的处理及肃反工作等指示 1932年3月4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湘鄂赣省委的信 1932年3月20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湘鄂赣省委的信 1932年3月21日

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对省苏第一次执委扩大会的提议

1932年3月29日

应敌决议——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二次常委会通过

1932年4月1日

湘鄂赣省苏对全省选民的工作报告 1932年4月4日

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四、五、六)三个月工作计划

1932年4月4日

胡梓：加紧领导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纠正过去右倾“左”倾的错误 1932年4月25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委扩大会行政计划决议案

1932年4月8日

召集全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工作决议案

1932年4月16日

文化问题决议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1932年4月20日

湘鄂赣省暂时农村工人斗争纲领——湘鄂赣省赤色职工联

合会 1932年4月25日

湘鄂赣省苏文化部“八一”以前的文化工作计划提纲

1932年5月1日

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对原省委财政清查和今后统一全省党的财政决议案 1932年5月4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文字第一号)——确定教育原则及今后实施教育方针 1932年5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文字第二号)——颁布学制与实施目前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 1932年5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三个月工作计划案 1932年6月5日

湘鄂赣临时省委给中央的第一号综合简报 1932年7月

湘鄂赣省总党团报告 1932年7月

湘鄂赣边巡视员黄火青关于给中央信——抄录致鄂东南特委关于土地的分配问题、发动武长路工人斗争问题、兵运工作、改组派问题信 1932年7月28日

中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全部文件 1932年9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给湘鄂赣省分局训令 1932年9月14日

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1932年9月11日

少共苏区中央局给少共湘鄂赣省委的指示信

1932年9月13日

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赣省委的信 1932年9月14日

林瑞笙：完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 1932年10月30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为反对富农与平分一切土地告革命群众书

1932年

检查党在二代会以后的工作和党在一九三三年开端紧急战斗任务的决议案 1933年2月10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二年的工作总结

1933年3月6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一九三三年的政治事变与我红军的战略以及地方党的战斗任务的决议 1933年4月11日

湘鄂赣省委接受中央局来电，纠正省委机会主义的错误，不动摇的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全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的决议 1933年6月16日—18日省委第三次常委扩大会通过

朱德、周恩来：请调罗迈任湘鄂赣省书记函 1933年6月1日

少共中央给少共湘鄂赣省委的信 1933年7月7日

湘鄂赣省委给中央局的报告 1933年7月30日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给湘鄂赣省总信 1933年9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1934年8月15日

徐彦刚、傅秋涛给弼时、肖克同志转中央军委的报告

1935年6月7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给弼时同志转中共中央的信

1935年6月30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两广出师抗日讨蒋宣言

1936年6月20日

湘鄂赣省军区作战计划 1936年6月21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今年秋收斗争的决定 1936年7月10日

湘鄂赣省军区对两广出师抗日讨蒋宣言 1936年7月

湘鄂赣省军区关于地方游击队的建立和战术问题

1936年9月29日

湘鄂赣省军区为军团步骤计划的秘诀—1937年开端起至红五月底止 1936年12月1日

湘鄂赣省军区作战计划 1937年1月3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边区白区组织问题再一检讨的决定
1937年3月9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为加速扩大军团在红五月底作一个步骤总结的指示 1937年3月14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关于转变群众工作的决定
1937年3月15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动员粉碎敌人新进攻战斗要令
1937年4月22日

湘鄂赣省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
1937年5月15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为挽救中国只有抗日告民众书
1937年5月18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关于执行策略方法的决定
1937年5月27日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全体人民及一切白军武装部队宣言
1937年5月

湘鄂赣省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 1937年8月20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
1937年8月20日

中共湘鄂赣省委为国共和平合作的政治决议
1937年8月21日

中共湘鄂赣特委关于湘鄂赣特委工作报告
1937年—1939年

彭德怀：往事回忆 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 载《红旗飘飘》19期

李光：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 载《中国新军队》1936年1月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1931年—1937年） 1943年3月

傅秋涛：高举红旗 坚持斗争

——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197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长工：开辟鄂东南 《星火燎原》下册

程子华：大冶兵暴 《星火燎原》下册

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

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初稿）

肖克：红十七师在湘鄂赣苏区 （调访记录）

刘玉堂：湘鄂赣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调访记录）

杨建新：湘鄂赣红军第五分校生活片断 （调访记录）

吴咏湘：革命斗争回忆 （调访记录）

张藩：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些片断 （调访记录）

罗其南：坚持湘鄂赣边区革命斗争回忆 （调访记录）

国民党西路军第二纵队与红军肖克等部在赣西一带战斗详报 1934年1—4月

国民党第十八师朱耀华部与红军在湘鄂赣边区战斗详报

1936年12月—1937年4月